

# 帝国主义在旧上海的经济掠夺简述

上海沿革编写组

## 一、工业投资迅速扩张

自从一八九五年《马关条约》订立后，帝国主义在上海的工业投资有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发展更快，从重工业到轻工业，从水电煤气等大型公用事业到小规模机器洗衣公司，从酿酒、制蛋到冷藏、制冰，从烟草托拉斯到火柴、烛皂，一切都渗透了外国资本。据一九二八年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统计，在当时上海的工业投资总额中，外国资本占百分之六十四以上。一九三六年，帝国主义在上海的企业占上海工业的比重是：发电量百分之八十五点三，船坞设备百分之五十四点二，纱锭百分之六十点三，布机百分之七十点九。抗日战争前，在关内的帝国主义银行业投资有百分之七十九点二集中在上海；进出口贸易和商业有百分之八十一·二，工业有百分之六十七·一，房地产有百分之七十六·八，都集中在上海。这些数字具体说明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投资有极大一部分是投放在上海的。这些投资，迅速形成垄断上海经济的力量，并通过上海掌握着中国的经济命脉。

帝国主义在上海的工业投资，以纺织工业、烟草和食品工业、公用事业和造船工业为重点。此外，化学工业和日用品工业

也占相当的数量。

## 二、帝国主义在上海经营的纺织工业

甲午战争以前，外国资本家曾迭次要求在上海设立纺织厂，清政府未予同意。甲午战争前夕，上海怡和洋行不顾中国禁令，坚持运纺织机进口。《马关条约》一经签定，帝国主义获得了设厂权，他们就明目张胆地干起来。从一八九五年到一九〇二年短短的七年中，各外国资本家在上海成立了六家纱厂，其中有英资的怡和、老公茂、协隆，美资的鸿源，德资的瑞记，日资的上海纺织株式会社。这几家外资纱厂，再加上一九一一年成立的日资内外棉，差不多占了当时中国全国棉纺业纱锭总数的一半。同时，帝国主义垄断财团通过贷款、套购股票、参与经营、直接购买等巧取豪夺的方式，对上海的中国纱厂实行吞并。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资本在上海纺织工业中的比重有所增加。战后，外国纱厂的势力又迅速增长起来。英资的怡和纱厂在兼并了华资的公益纱厂和英资的杨树浦纱厂以后，于一九二一年成立上海怡和各纱厂有限公司，其地位与日资的内外棉相伯仲。据一九二〇年统计，日本三井、三菱等财团在中国开设的纱厂共有二十九家，其中有二十二家设在上海。

在毛纺织方面，英商在上海有两万五千多毛纺锭、一百八十台毛织机。这个数字相当于抗战胜利后全国毛纺锭的百分之六十二、毛织机的百分之四十八。

### 三、帝国主义在上海经营的卷烟工业

垄断中国卷烟工业半个多世纪的英美烟公司，一九〇二年成立于上海。在头十年中，它的工厂由一个扩充到四个，工人由百余人扩充到近万人，资本由十万零五千元扩充到一千一百万元，超过了当时中国所有华资烟厂资本的七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业务更加扩大。在产量方面，一九三五年，各厂产量共为六十四万六千五百箱，约占全国卷烟总产量（东北除外）的百分之六十。在销售方面，通过买办，勾结地方豪绅，使“大英牌”、“老刀牌”香烟遍销全国，深入内地农村，推销网从东北的琿春、哈尔滨到西南的思茅、腾越，乃至新疆、西藏，穷乡僻壤，无远弗届。在储运方面，它在全国三百七十八个县市设有专业仓库，它的买办专销机构永泰和公司又在全国一百六十九个县市拥有仓库。在扩大采购机构、加强掠夺原料方面，它设置了宏安地产公司和中国许昌烟叶公司（后合并为振兴烟草公司），对中国烟农进行残酷的剥削。英美烟公司的垄断组织异常庞大，在总公司之下，有烟草制造、烟草贩卖、烟草种植、包装用品制造、证券投资五大系统，分别成立了十几个子公司进行专业活动。一九三四年组织成立的颐中烟草公司就是它的主要子公司之一，资本六千万元。从一九三五年到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颐中烟草公司的盈利达原投资额的五倍。英美烟公司同国民党政府紧密勾结，在捐税上享有特别利益，高档烟按低档烟纳税。同时又使用种种卑劣手段，对中国民族资本所办的烟厂进行排挤破坏。例如，它指示代理商购进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香烟，存放

所得利润也越多。汇丰掌握对华贸易，是从印度贩运鸦片为起点，当时上海沙逊洋行专营此项非法交易，汇丰银行为了承揽鸦片垫款，从中牟取汇兑利润，曾订出章程，呈请清廷北洋大臣批准，取得垄断专利。兹录汇丰银行大班网密郎·鲍韦士光绪七年十月十九日（一八八一年十二月十日）为揽办洋烟（鸦片）垫付银款呈北洋大臣李鸿章文中所列条款如下：

一、中国在印度购买洋烟，所有价银均由汇丰银行垫付，其款在中国各口由承办洋药之人，随时算还。

二、从在印度垫付银款之日起，至中国拨还之日止，按照月日扣算利息。

三、按年每本银百两，行息七两。惟利息时价不同，如中国可以七厘为定价，汇丰亦愿遵办。

四、中国揽办洋烟，在印度垫付之款，自必甚巨，至于洋烟装载上船，起存各处栈房，并在各口招商购买，银行分应帮同办理之事，亦极繁琐，故七厘之息实不为多。现在英商购烟垫借款目，所行之息亦不能较此便宜，惟此项生意极巨，七厘之息，银行已可酬劳。

五、在印度垫付之款为罗贝，在中国收回之款为银两，其罗贝之价随时不同，中国如欲定一划一之价，应照时价算账，均无不可，汇丰并不因之取利，因七厘之息已有盈余。

六、在印度垫付银两之日起，至中国各口拨还之日止，大概以四个月为率，然借款之或久或暂，听凭中国为主。

七、中国国家日后如派有总办洋烟事务之员，无论华员洋员或系认派之公司，汇丰银行均愿遵照以上章程办理。

八、洋烟公司未经定议之先，彼此均宜秘而不宣。

九、此事是否按照以上章程办理，敬候核示遵行。

一九一七年三月鸦片贸易根据国际协定被停止后，汇丰掌握控制下的进口贸易，改以工业制成品为主，出口贸易则为中国土产原料，汇丰本身仍然从汇兑上攫取巨额利润。

汇丰银行一向以操纵外汇为其经常业务，同时为英国外交部提供中国的经济情报。北京汇丰银行大班赫利(E. G. Hillin)是个中国通，穿了清政府的袍套，戴着朝珠朝帽，红顶花翎，头上还装上一根假辫子，除面目肤色不能改变外，看上去俨然是个中国的大官僚。后来眼睛瞎了，每天仍要华员读中国报纸给他听。赫利死后，上海行派盖世尔(Cassal)继任(汇丰银行总行在香港，上海是较大的分行，管辖北京、天津等分行)。盖在中国多年，不但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并且还能看中国的报纸。北京大班是不管业务的，专以结交官场为任务，其处心积虑可想而知。

由于汇丰熟悉中国政治和商业情况，在金融界又拥有巨大的势力，所以在英国对华经济侵略的政策上，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英政府对华借款多由它居中策划。一八九八年以前，汇丰银行与德华银行订有协议，共同经营中国铁路借款，后因李鸿章同帝俄订立密约，排除英国在东北的势力，英国为了抵制俄、德两国，授意汇丰银行同怡和洋行合组中英公司(British and Chinese Corporation)，后又改组为中华铁路有限公司(Central Chinese Railways Ltd.)，承办铁路借款，发行铁路债券，购买铁路材料，承包建筑、修理等工程，所有资金均由汇丰银行

负保管之责。

英国对华的政治贷款在一八七〇年前后，由汇丰承贷过一次五百万两，指定以盐税收入为担保。以后续有贷款，大都由汇丰经手收付，均以关税作抵，如一八七四年的六十万英镑贷款，一八七七年的一百六十万英镑贷款和一百九十四万九千两规银的八厘贷款，一八八一年的四百三十八万银元贷款，一八八五年的一百五十万英镑贷款和七十五万英镑的六厘贷款，一八八六年的七十六万两规银的七厘贷款，一八九四年的一千万两规银贷款，一八九五年的三百万英镑贷款等。

中日甲午战争后，汇丰在华势力愈益膨胀。为了垫付中国赔款，它同德华银行合作，两次垫贷三千二百万英镑，第一次年息五厘，期限三十六年；第二次年息四厘五，期限四十五年，均以关税收入为担保。自一九一一年起，中国关税收入全部存入汇丰银行，要由英籍总税务司签字才能提取。一八九八年，德国曾要求以德国人继英国人赫德之后任总税务司，英国大起恐慌，乃以英国在华商务最大为理由，胁迫清政府承认总税务司必由英籍人担任。从此，汇丰经手的各项政治贷款有了更加确切的保障。一九〇五年又贷一百万英镑与清政府，年息五厘。一九一三年五国银行团提供袁世凯两千五百万英镑善后大贷款，以盐税、关税作抵，设盐务稽核所，其副所长一职即由英国人担任，盐税收入也就存进了汇丰银行。这时，汇丰实际上已成为北京政府的财政总管，历任财政当局只有仰承它的鼻息，才能站得住脚。这一情况，一直继续到北伐战争前没有改变。

### 三、最初的两个买办

汇丰上海分行与香港总行差不多是同时成立的。行址原在南京路花园弄，即汇中饭店的旧址。一八七三年迁至外滩海关隔壁。

分行成立前，上海英商会德丰洋行大班麦克利得知在港英商有组设香港上海汇兑银行之议，认为这是个人发展的良机，拟即回国募集股金，筹设上海分行，以便捷足先得。他向该洋行买办叶吉庆借贷二千两银子作为回国旅费，叶与跑楼胡奎兰（一说是胡笛栏）商量之下，认为他的话未必可信，因此婉拒其请。麦失望之余，又去找三余钱庄跑街王槐山商量，王不谙英语，麦的中国话也讲得不好，但因平日业务上往来频繁，因此建立了私人交情。麦请筹借二千两银子，以便返国募股开办银行，言明六个月归还，王为人颇重情面，当即随口答应，但他本人资金有限，麦来取款时无从应命。麦再三声明，此去少则半年，多亦不出九个月，一定返沪，借款本利奉还，决不有误。王鉴于麦氏平日信用昭著，而且情不可却，乃挪用钱庄客户存款二千两借给他。不料麦氏一去年杳无消息，钱庄年终结账，发现王有宕用庄款情事，老板陈三余虽是王的舅舅，也因恪于店规，不便包庇，只得将王开除。王失业后生活十分贫困。两年后，麦克利在英国募集到五百万股金，来沪开办上海汇丰银行，到三余钱庄找王，知其因宕款被开除回乡，更觉歉然于怀，于是函电交驰，促其来沪。一见之下，即要王担任汇丰买办，并声明不要任何担保品。王初犹半推半就，舅舅陈三余表示全力支持，又邀请当时钱业能手俞晓

安、陈广延做他的业务助手，王才敢走马上任。王因得到洋大班麦克利的极端信任，库房钥匙均在其手，遂利用汇丰牌子，做洋厘生意，在汇丰全日收解中，了解到全市现银的存底，从而买进卖出，翻云覆雨，稳操胜算。

王在账房雇用职员达两桌人，终日忙忙碌碌，全年进账约达十万两银子。他前后做了六年汇丰买办，赚了八十万两银子，真是平步登天，一帆风顺，当年做梦都不曾想到。此人头脑冬烘，封建意识极深，平日头戴红顶瓜皮小帽，脚穿粉底缎鞋，身着团花马褂，腰束纺绸带子，手持长旱烟管，每日在账房间里踱来踱去，活象个乡气十足的土老儿，没有半点洋账房的派头。年终谢财神，新正接财神，一切都保持着旧商店的习惯，在当时吃洋饭的买办中颇为突出。

王槐山吃的是洋饭，发的是洋财，但并不相信洋人能够长呆在上海。他说：“洋场十里繁华，好比戏文一出，锣鼓一停，就要曲终人散了。”所以他从来不肯在上海购置产业，除洋大班麦克利将其应得红利代购四万股（每股一元）自来水公司股票外，他没有一幢房子或一块地皮，把所有赚来的资财全部汇到家乡余姚买进田产，创建怀德义庄，一心一意要做一个乡下土财主。

同治、光绪年间，清廷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之后，由于军用浩繁，国库空虚，直隶总督李鸿章派人到上海向汇丰借款五百万两，麦克利要买办负责与之接洽。这是一笔大借款，王槐山一时没了主意，不借，怕触怒皇帝，首领难保；借吧，又怕将来不归还，倾家荡产也吃不起赔账。他和跑楼（副买办）席正甫商量应付办法。席认为这是送上门来的好买卖，但表面不向王说穿，只允承



代为处理。他随即代表王槐山到了天津，与北洋大臣签订了五百万两的借款合同，指定以盐税为担保，从中赚取回扣。这是一笔十拿九稳的赚钱生意，也是汇丰承揽中国政治借款的开端。后来李鸿章以王、席两买办襄赞借款有功，曾保授官职。但在那些日子里，王槐山因怕吃赔账而急得魂梦难安，竟然得了精神病，只得向汇丰提出辞职，麦克利挽留不住，派人把他护送还乡。过了三年中风死去，年仅五十三岁。

王生前将遗产托好友陈广延保管，并同陈合伙在余姚开设钱庄一所，王死后继续营业。王的堂侄王霭如在汇丰进口部任职，因赌博亏空行款，向陈借贷不遂，乃向王槐山之子王其庆进行挑拨，诬陈营私舞弊，侵吞叔父遗产。王其庆大闹要查账，结果陈只得将钱庄收歇。王其庆将王槐山存款划到宁波，开设康太花号，从事棉花投机，不到两年功夫，存款全部蚀光。幸尚存有自来水公司股票及田产，母子仍可维持相当富裕的生活。那知当时有个名叫卢伯祥的候补道，同清廷权贵有来往，谋署上海道缺，王霭如以任道署账房为条件，私下将自来水公司股票变卖（这时股票已大涨，超过票面甚巨），借钱给卢，结果王霭如的道署账房没有做成，而王槐山一生为帝国主义效劳得来的大量家产，至此荡然无存。

席正甫继王槐山之后为汇丰第二任买办。他是苏州洞庭山人，十九岁到上海做钱庄学徒，学会了几句洋泾浜英语，由其出继给舅家的弟弟沈吉成（老沙逊洋行买办，绰号沙逊阿四）介绍，进汇丰银行任跑楼之职，王槐山辞职返乡后，坐升买办。他并非富有，由王槐山垫款二万两作为买办间的周转资金，双方订

立合同，言明按期分派红利。王槐山死后，席并未履行合同分给红利。一九二九年，王槐山的家属找到这份合同，本拟向法院提出控诉，因席的孙子席德懋任中央银行业务局局长，同孔宋豪门有密切关系，不敢贸然打官司，乃托虞洽卿向席德懋说情，希望顾念旧情，予以照顾，但席德懋坚决不买账，结果不了了之。

席正甫做了几十年的汇丰买办，处处得心应手。他自办理清廷的第一次政治借款获得二品衔红顶花翎后，身价顿时提高，清廷大官僚如闽浙总督左宗棠、北洋大臣李鸿章等为了借款问题，每到上海，都要移樽就教，席也乐于效劳，从旁极力促成。左宗棠几次要保举他到北京户部任要职，席不愿改行做官，但与当时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往来极密。他在上海金融界、洋行界都很吃得开，儿孙袭其余荫，一个个扶摇直上。清廷创办的第一个银行——大清银行，其协理一职，就是由他的第三子席德辉充任，第五子席聚星和次子席友于先后任汉口大清银行经理和营口大清银行协理。他的胞弟沈吉成是以贩卖印度鸦片起家的英商老沙逊洋行的买办，其他外商银行的买办也大多与席家非亲即故，如三弟席缙华是有利银行的买办，胞侄席锡藩是麦加利银行的买办（后为华俄道胜银行买办），后任买办王宪臣（沈吉成之婿）是席正甫的侄女婿，正金银行买办叶明斋是席缙华的女婿，花旗银行买办王俊臣是王宪臣的胞弟，华比银行和三菱银行的买办胡寄梅父子也是席家的亲戚。那时席正甫真是上海金融界炙手可热的红人，只要他一点头，任何银行钱庄开一张十万两银子的本票，都可如期兑现。因此，上海钱庄为了取得支援，都要求他加入二毫半的股本，并且要用他所介绍的人做助手，在

上海银钱业中形成了所谓“洞庭帮”(俗称“山上帮”,席是洞庭山人)。当时有一句流行口语说:“徽帮人最狠,见了山上帮还得忍一忍。”

除钱庄外,席正甫还兼营金号、银楼、绸缎等业。据说发生“橡皮风潮”时,宁波帮陈逸卿投机失败,不少钱庄银行受到拖累,外资银行买办间也受了一定影响。为了处理这一问题,外资银行买办组织了一个公会,写信给外国大班,对于有关债务,他们保证清偿,但以两年为清理期限,要求在此期间不计利息。此项要求得到外资银行大班的同意,因此在橡皮风潮中,外资银行都未吃亏,受牵连倒闭的都是中国钱庄,席家在上海钱庄多有股份,要负无限责任,不免吃了一些“哑巴亏”。

席正甫于一九〇四年去世,汇丰买办一职由其长子席立功继任。初由谭海秋垫款二十万元担任副买办,席将垫款还清后,即与谭解约,改聘有利银行跑楼龚子渔任跑楼。立功死后,又由其长子席鹿笙继任,但鹿笙不务正业,终日寻花问柳,实际上由龚子渔负责,双方订有合同,鹿笙仅居买办之名,坐分红利。不久,鹿笙因争风吃醋为仇家暗杀,乃以龚子渔为买办。子渔死后,由其子星五继任。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发生,日军进占租界,龚星五恐库存客户押款黄金被掠夺,曾打电话催促押款人速来提取。不料行内有一汉奸,竟向日本海军司令部报告,诬蔑买办间职员王嘉铭私运黄金出行,日军即将王逮捕,非刑拷打,被释后疗养很久才复元。不久,英美籍侨民都被日军关进集中营,汇丰银行由日本正金银行接收,华籍职工都转为正金职工,龚星五也成了正金银行的买办。上海解放前夕,他去南美洲,买办一职

由其本家龚振方代理，龚在建国初期去了香港。

#### 四、买办的帮凶作用和发财秘诀

帝国主义者初来中国时，因言语不通和情况隔膜，不得不雇用中国人为其利益服役。英语买办一词 Comprador 来源出于拉丁文 Comparaorem，其意义是指西方人在中国开设商行的听差头子，葡萄牙文意则为采买。由于外国商行业务不断扩展，做进口要靠中国人推销，做出口要靠中国人到农村采货，因此买办就成为帝国主义者在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得力助手，地位不断提高。汇丰银行的买办虽然可以大发洋财，其实不过是从帝国主义大量剥削中国人的血汗中分尝余沥。

汇丰除执行银行业务外，在北京、天津两地开设分行，其主要目的是便于同中国政府打交道，刺探政情内幕，策划政治借款。洋大班固然要以中国通充当，华买办也以善于结交王公大臣、军阀官僚者为上选。北京分行第一任买办吴幼龄，就是这样一个手腕玲珑的角色。他同清室王公密切往来，有些王公常将自宫内偷出来的古董字画，通过他做借款的抵押品。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很多亲王贵族将稀世珍物一箱箱地寄存在汇丰银行，以保安全。这些古董文物，其中被洋人贱价收买偷运国外的为数不少。北京分行第二任买办邓君翔同北洋官僚潘复有交情，当总税务司安格联承认拨付关余发放“九六公债”息金时，潘把这个消息秘密告知邓君翔，邓即大量买进，不料安格联食言而肥，“九六公债”因到期不付息而行情惨落，邓投机失败，亏欠汇丰两百万元，汇丰大班念邓效劳多年，未加追究，这场风波才得平安

度过。同一时期天津分行买办吴懋鼎，也是一个交际能手，终日陪伴寓居津门的清室王公躺在鸦片烟榻上，吞云吐雾，伺候非常殷勤，因此颇得这些王公的欢心。他们常将大量赃款及从宫内偷来的古董字画变成现银托其代存，不要任何凭证。辛亥革命后，王公们有的病死了，有的逃亡失踪，于是这位黑吃黑的大买办就把无名存款一律收归己有，从中发了一笔大财。

上海汇丰银行买办间的正常业务，主要是对中国行庄做拆放生意。初期全凭信用，只要钱庄打一张庄票送来，由买办盖章负责，就可放款，两日一转，买办可以取得二厘半的佣金。自从橡皮风潮发生后，钱庄受累倒闭的很多，汇丰银行就提出要道契担保才能放款。放款利息，英国银行法规定不得超过八厘，但对殖民地及华人不受此法限制，因此买办间经手道契放款利息都在八厘之外，再加二三厘作为买办的佣金。钱庄打出五天或十天期的庄票，到期应将现金送到汇丰，每百两由汇丰贴送力五分。后来大都由买办间划账，不必送现金到行，五分送力仍由汇丰担负，也就成了买办间的一笔外快。此外，客户支票要由银两换银元或由银元换银两，照牌价有二厘差额，谓之“洋水”，算是买办间的“合法利润”。

到了席正甫做买办的时候，由于他长袖善舞，应酬广阔，拉到不少政府借款，洋大班对他颇为重视，因此他赚的钱也更多。中国是用银国家，汇丰银行经常从伦敦运进白银大条，每条重一千两，每次运到总有四五千条，摆在汇丰库房，当时有汇丰金银铺地之说，就是从此而来。此项大条成色较纯，交由买办间送到银炉，烱化铸成五十两一锭的元宝。每烱化一条，买办间就有千

分之一的手续费。银炉铸元宝时渗杂两分，铸成“九八规元”。席正甫开设的银楼，包揽了这笔生意，一年就有四、五万两银子的赚头。当时内地商人大多不谙英语，购买洋货不得不依靠掮客，而掮客没有身家字号，不能取得洋商的信任，也就不能先取货后交款，于是由钱庄出一庄票交掮客付与洋商，此项庄票解进汇丰银行，必须买办盖章负责，买办可以从中取得一定的手续费。如果买办自己开设钱庄，这票生意就可承揽到手，成为可靠收入。

汇丰银行的人事组织，大班、副班之下有大写、二写等职，写字间的职员均由大写选用，一律都是洋员，其中也有少数是葡萄牙籍的澳门人。买办间的职员则由买办雇用，一律都是华人。后来帝国主义者为了充分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写字间的职员亦逐渐以华员代替洋员，四个华籍职员的工资仅抵一个外籍人员工资。写字间的华员，虽不属于买办领导，但进银行必须由买办介绍，并负担保之责。这样，买办又可上下其手，另辟生财之道。

以上所述都是汇丰早期的买办情况。后来，外国人在中国任职较久，情况摸得较熟，就不是那样依靠买办，而买办的身价步步趋于下降。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买办的地位更不如前，这是因为南京政府的历任财政部长如要进行政治借款这类勾当，可以单刀直入，用不着绕买办那个圈子。同时由于华资银行风起云涌，过去的钱庄业务大部分为银行所代替，旧式买办人物已不合需要，而以当权的所谓“高等华人”代之，坐在买办位子上的龚星五之流，只等于从前买办间的账房而已。

## 五、关于中国人存款

汇丰银行所吸收的中国人存款，其数目之大，骇人听闻。前清时代的王公大臣，民国以后的军阀官僚，争先恐后地将贪污赃款和克扣得来的军饷都存进汇丰银行，以为可以高枕无忧。在清末就发生过这样一个故事：

庆亲王奕劻将赃款一百二十万两银子秘密存进东交民巷汇丰银行，事为御史蒋式理所闻，上奏参劾，慈禧太后派军机大臣户部尚书鹿传霖彻查。汇丰拒绝将存款人名单宣布，当然查不出真凭实据，御史反而受了诬控的处分。上谕批示说：“该御史以毫无根据之词，率意陈奏，况事情重大，名节攸关，该御史着回原衙门行走，以示薄惩。”

外国人存款都以签名为凭，中国人习惯用印鉴，有的存款人既不谙洋文，也不愿用印鉴，就用相片代替，取款必须亲到，一旦身死，这笔存款就永远无人能够支取。而且买办间核对印鉴极为严格，稍有疑问即拒绝付款。外传汇丰有巨万存款无人领取，并非无稽之谈。本来银行存款人死亡而继承人并不知情，以致存款无人来取，中外银行都有这样的事情，不过汇丰所吸收的不可告人的“死款”特别多，所以就显得更加突出。

一九一一年以后，中国关税收入完全存入汇丰，每月二十日结算一次，届期公布本月所收关税数字，并将应付赔款结汇付给各国庚子赔款代收银行，余数则交还中国政府，后者称为“关余”。后来盐税因借款关系亦完全由汇丰保管。关税、盐税是旧中国政府的两项重要财源，在汇丰掌握之后，头寸周转有多无

少,所以对于一些小额存款满不在乎。因此,有些迷信洋人的财主,要把钱存入汇丰银行,还要托人介绍,才能开户。

华资银行为了要利用汇丰的牌子,经常将现银五万、十万地存在汇丰,目的在于周转头寸时,打出汇丰支票,显得更外有信用,这种存款汇丰是不给利息的。有的华资银行为了要汇丰买办间代为推广钞票,除给以一定的回佣外,同时还要存一笔保证金在汇丰,也是没有利息的。

上海汇丰银行前后曾发生过两次华人提取存款和挤兑钞票的风潮。第一次是一九一二年,这一天适值星期例假,汇丰大班非常狡狴,听了传闻之后,立刻要买办在市场上收购现洋,委托往来钱庄代为兑换,同时请求中国政府出面维持。当日上海都督陈英士出了一张布告,指出这次风潮是满洲奸细散布的谣言,企图破坏南方金融,晓谕居民毋得听信谣言,自相惊扰。因此,次日风潮即行平息。第二次是“五卅”惨案时期,市民激于爱国热情,拒用汇丰钞票,纷纷前往兑现。由于该行钞票在上海流通数目不大,兑现没有问题,但华人提取存款转存华资银行的为数甚巨,当时汇丰是受了一定影响的。

## 六、建筑新行址过程

汇丰银行自同中国反动政府发生借款关系后,营业蒸蒸日上,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二五年尤其是它的黄金时代,每年所获净利在数百万元以上,最高达一千三百万元。上海行为中国各地分行的领导行,规模最大,前后翻造过两次房屋,但仍不敷办公之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政府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对于海



外英资企业加征利得税二成。汇丰董事会为了逃避这笔税款，乃决定于一九二一年在上海重建新屋，提出盈余三千万到四千万作购地及建筑费用，由英商德罗建筑公司打样承造，造价一千万。这些外国佬也十分迷信，请中国阴阳先生选择了一个黄道吉日，于五月五日举行奠基典礼。破土后，在基地内放下中外金银货币数十枚，作为招财聚宝的吉兆。最滑稽的是，在大门正中顶上放了一块蓝底金字牌子，活象中国人的神主牌位，请当时上海闻人朱葆三、傅筱庵等毕恭毕敬地捧上去，同时军乐大奏，表示庆祝，仪式十分隆重。

该屋采用新型希腊式样，建筑朴素坚固，库房设备尤为远东银行界之冠。为了表示威武，特地仿照中国衙门的形式在大门两边置有铜狮子一对，一雄一雌，连同三扇铜质大门，就花了不少的钱。德罗公司既不相信中国建筑工人，又不能从英国雇人前来，于是在外国工头的监督下，以点工的方法剥削中国工人，引起罢工数次，以致工程旷日持久。从一九二一年五月开工，两年还未完成，最后还是请了中国建筑公司帮忙才告落成。一九二三年六月二十三日该行举行落成典礼时，柬邀中外来宾参加，该行总董蓝恩发表了一篇侮辱中国的演说：“深信中国将来有希望，商务必发达。今日中国政治及社会情形虽多可悲，致受外人之干涉，倘至必要时，则外国虽以武力为后盾亦无不可。盖非此不足以恢复中国之秩序，且为大多数受害之中国人所欢迎。鄙人深信今日可憾之情形，惟有各国可以救济。”（见一九三六年中华书局出版《上海研究资料》）

汇丰银行在我国各大城市如北京、天津、沈阳、哈尔滨、大

连、青岛、烟台、汉口、广州、汕头、厦门、福州等地都设有分行，大都是自己建造的房屋。日本投降后又在南京买了大块地皮，准备大兴土木，还没有来得及建筑，南京就解放了。

# 旧上海的洋行买办

杜 温 民

上海开埠以后，外商营业发达与其雇用中国买办有很大关系。盖买办者，外通各国之商情，内联各地之商贾，凡关于外商出入之货物，莫不极力经营，使外人坐收其利。当时各外资银行和轮船、保险等公司，莫不雇用买办，以经营业务，买办之实力，亦日益扩张，乃至成为一特殊集团，在我国近代历史上起了一定的作用。

## 一、买办之起源

最初外人来中国通商，对中国复杂的商业状况以及风俗、习惯等均不了解，又不谙华语，不能不雇用中国人之通晓商事者，使之负一切买卖上之责任。其后贸易日大，各通商码头开辟日多，各地商人见此职业获利独厚，乃争学外国语文，踊跃应雇。既有巨商大贾或知识分子乐充外人买办，于是买办成为专业，而为华洋贸易间不可缺少之人物。

## 二、买办之业务

买办业务，视洋商行号性质之差别而异。（一）洋商银行，各有其营业规则，对买办执行业务，规定不同，但关于中国之银两、

银元、银票、庄票、期票、汇单及票据押款等项，有真伪不辨及到期不兑者，均由买办负其责任。(二)轮船业，洋商以太古、怡和两公司为最大，其次则有鸿安、瑞记、大阪商船、日本邮船、大东汽船、湖南汽船、禅臣、美孚、美最时等公司，皆以运载货物为主，人载为副。其买办有两种：社内买办，管理所有轮船进出之货物，掌握社内事物之全权，称为总买办，另有船上买办，船各一人，经理运载各种货物，及船中一切事务。至搭人船票价格，本由公司核定，除太古、怡和两公司外，其他各船公司多统包于买办，每上下水一次，结算一次。(三)仓库多为轮船公司附业，乃货物屯集之所。昔日代民船存储货物之庄棧，皆狭小而不敷用，不得不自立仓库，以图货物装卸之便利，亦用买办监理货物出进，兼负保管之责。(四)一般洋行买办，业务极为复杂。盖洋行名称虽同，其实则大异。即就上海洋行言之，如纺织业之瑞昌洋行，杂货业之茂生洋行，拍卖业之元芳洋行，生命保险业之永年洋行，水火保险业之老公茂洋行，种类繁多，不胜枚举。行内规则，全由行主规定，买办虽总理行内事务及税关往来之货物，而执行细节，不能逾越行主所定规则之范围。

### 三、买办间之工作人员

买办业务浩繁，不得不雇用人员，以分担其事。雇用人数，以行号资本之大小、业务之繁简而定。今举上海外国银行买办使用之人及职务之分配为例，汇丰最多用五十人，麦加利、道胜各二十五人，德华、正金、东方、花旗均十数人，义丰、宝信、荷兰、华比皆在十人以下，分任跑街、鉴定货币、现金出纳、会计、文书

等事，所有工薪伙食各项开支，均归买办付给。其他各行号买办雇用之人，大体条件与银行无异。如雇用人员有亏空款项等情，则由买办赔偿。一般雇用人员到职时，例须觅取殷实保人，出具保结，保证一切，设有弊端发生，买办固对行号负责，而保人又须向买办负责。兹附列外轮公司买办雇用人员之保结格式如下：

立保单人大英公司×××，今保×××在某轮船公司内管理帐房及水脚银两等事，担保英金××镑，日后如×××私用银两在××元以内，自然照亏缺之数赔偿，决不推诿。此系当面言明，各无异说，恐后无凭，立此保单为据。

年 月 日

立保单人×××

#### 四、买办之收入

银行买办之薪俸，各家所规定均甚微薄，麦加利月薪二百五十两，汇丰、道胜均二百两，东方百五十两，正金、花旗不过百两。但买办经手收入之中国银票、期票、汇单等，每千两准提一两二钱五分，以为买办之手续费（即佣金），卖出千两，其手续费亦同。正俸之外，杂项收入颇多，有至四、五万两一年者。轮船公司之买办，太古、怡和月俸二百元，大阪一百五十元，日本邮船会社和瑞记洋行均为一百元。其他手续费等杂项收入亦不少，通常输出之货物，买办应得之费百分之五。进出口业务之洋行，买办收入除正俸外，则有输出入货物之手续费。例如日商福爱洋行规定：进口洋布、绒线，照买入原价，每千两付买办八两，绢棉织物，每千两付银十两，纯丝绸缎每千两亦付银十两，出口货

粗丝、细纱、丝绵等照卖出原价每千两付买办银五两，盈亏由行商担任，买办概不负责。而在此正俸及手续费等杂项公开收入以外，更有不正当额外收入，或取自卖主，或取自买主，所得实多。有谓行主得一佛郎，买办亦得一佛郎者，故买办之大者，一年所得大有可观。因此生活奢侈，一面奉承外人，一面追求享受，其生活程度之高，至足惊人。

### 五、买办之保证

洋商雇用买办，必先缔结契约，并交保证金，数额根据营业大小而定。即如上海外国银行买办之保证金，数额亦大有出入，道胜十五万两，麦加利、汇丰十万两，正金、东方四万两，华比、荷兰则三万两。保证金之外，仍需保证人四名，互相担保，如买办有不正当行为，银行受到损害，保证人共负赔偿责任。其他各外国行号雇用买办之条件，大体上均相类似，不过细节稍有出入。现在附列上海某银行雇用买办所立之合同与保单各一式，由此可以了解行东、买办与保人三方面之关系。

#### 甲、合同

立合同人行东某某、买办某某今于西历××××年×月××日，在××银行订立合同，并将议定条件开列于左：

- 一、行东在上海开设某某银行，聘请某某为买办，彼亦愿就银行之聘，自立合同之日起，即按照以后所开各条办理。
- 二、买办非执有本行行东字据，不得用银行之名，向人交涉、出入银钱及私行抵借契券票据等事。
- 三、凡属银行机密事件，买办不得在外泄漏。

- 四、买办应遵照银行指示，所收金银元宝、银元、押款票据、契券等项，均需妥慎收管，倘有失误，惟买办是问。凡属买办代银行收付及寄向外埠之金银、押款票据契券等项，均系买办之责。所有买办自己雇用人等，代银行收入之银票、期票、庄票、汇单、票据，押款到期能否收兑，并中国政府官员之欠款及应办事件，可否照议，亦均系买办之责。以上各节，银行如未与买办商议，则概与买办无涉。
- 五、买办应于每日晚间，照银行规则，将总帐交出，以凭核算，或将所收金银、押款票据等项，悉数交付清楚。
- 六、行内雇用帮办×人，由买办自理，所需薪水均由买办名下支給，如有失误亏空等弊，买办照数赔补。日后银行自用人员，与买办无涉，惟雇用如由买办作保，则买办亦负失误亏空赔偿之责。
- 七、日后无论何处银行，有控告买办涉讼之事，即以本银行所立帐簿，及买办代银行管理所立之帐簿为凭，不必另寻帐簿。
- 八、买办于立合同之时，即需备足银××两，存储银行。若日后买办有应行赔偿之款，银行即可按照买办存款随时提出，若此数不足，再将下期之款如数填补。若买办无赔偿之事，则所存于银行之款，银行每年照五厘行息计算，半年给付一次，俟合同满期，各帐交清之后，银行将此款交还买办。
- 九、银行每月给予买办薪金银××两，并按银行指示所买之中国银票、庄票、期票、汇单等项，每千两给佣银一两二

钱五分，又照银行指示所卖之各色银票、期票、庄票、汇单等项，佣银亦照前例给付，此外不得索取。

十、立合同后，银行如欲停歇，此项合同可以随时作废，惟必须六个月以前函知买办。若因买办有欺骗、旷职情事，银行即可将合同销去，勿庸预期函告。如买办欲自行告退，亦必于六个月以前函知银行，方准解约。

十一、此项合同，用汉英两国文字各存一份，日后无论办理何项事件，均以英文为凭。

十二、凡为担保之保人，如遇失业、病歿或不在本地，不能作保者，买办另请妥人代保，且必得行东允许。至保人赔偿银数，均与原保保单所载各节，毫无区别。倘买办于两月限内，尚未觅人担保，银行即可将合同销去，亦不必预行函告。

十三、银行以买办保银及保人银数为准，若有不足之时，即令买办增加保银、保单，买办需照所派之款，如数增加。

以上合同双方画押盖印，双方合意，无得异说，此据。

西历××××年×月××日

行东 × ×

买办 × ×

### 乙、保 单

立保单人某某等，今保到某某银行聘用某某充当买办，如有致使银行受亏情事，应即照数赔偿。为此订立保单如下：

一、买办需请四人代为担保，并提出现银××两，存储银行。



二、担保该买办尽心竭力为银行办事，及买办雇用之人不得更改帐目。

三、担保该买办各事认真，小心谨慎，不得将银行机密事泄漏于外。

四、担保该买办代银行进出存款，寄往外埠之金银元宝、银钱、货物押款券票等类，务必奉公守法，不得有丝毫作弊情事。

五、担保该买办雇用之人，代收中国庄票、银票、期票、汇单、票据等，到期不能收款，或因该买办出口作保，失误欺骗，致使银行受亏，均必遵守信用，全数赔偿。若与买办无涉之事，保人不任其责。

六、担保该买办应交银行各款，不能照数付还，致令银行亏耗时，不论是何情况，均照上文所载将保银赔补，如尚有亏耗不敷之数，仍照上文所载，保人四名，一律摊赔。若银行通融，使买办展限认赔，一任银行之便，即不必函知保人，待其应允后行。所有四家保人情愿担保之数，开列于后：

某某以银 × × 万两为限	} 共银 × × 万两。
某某以银 × × 万两为限	
某某以银 × × 万两为限	
某某以银 × × 万两为限	

如保人情愿退保，均需在六个月之先，专函通知银行行东或署理人，仍俟六个月限满之后，其担保责任方无关系。倘于限内银行有损失情事，仍照以上所载，均系四保人之责。若四家保人

有一人或数人退保时，未退保者之责任仍在，不得藉口推诿责任。

此项保单，用汉、英两国文字缮写，日后如有争议之处，应以英文为准。

××××年×月××日

立保单人 × ×  
× ×  
× ×  
× ×

洋商买办是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帮手。上海买办人数，据日本同文会列表，有姓氏可稽的有朱葆三、虞和德、王一亭等一百七十余人。而大中型洋商行号，雇用买办者，银行有汇丰等十一家，保险业有瑞记等五十五家，轮船公司有太古等二十三家，其他大公司有茂生等七家，代理经销商有祥记等二十六家，代理店及公司有礼和等七十家，经销人有利泰等四十一家，杂项商行有汇泰等一百三十一家。各家除本身营业外，还有代理国外其他行商业者，如茂生洋行代理国外五十四户，每一行号，至少雇用买办一人，太古、怡和各轮船公司，一家且多至数十人，若统计上海买办全部人数，至可惊人。而各华商董事、经理，虽无隶属关系，未尝不事事仰其鼻息。因此建国以前，买办声势在上海市面非常烜赫。反动政府时代，数十年来，凡上海经济界有地位的人，很少不是出身于买办，即使偶有没做过买办，也必与买办有深厚的渊源。

# 英商新沙逊洋行

陈其鹿

## (一) 英商新沙逊洋行的来历

上海有两个沙逊洋行,一个叫新沙逊洋行,另一个叫老沙逊洋行。新沙逊洋行的创办人伊莱亚斯·大卫·沙逊(Elias David Sassoon)是沙逊洋行创办人大卫·沙逊(David Sassoon)的长子,他于一八七二年独资开办另一沙逊洋行,并在行名后缩写己名 E. D.为记,俗称新沙逊洋行。新沙逊洋行的总行原在印度孟买,上海分行原址在仁记路(现滇池路)五号。新沙逊洋行的营业范围比老沙逊洋行要大得多。

九十多年前,沙逊只身来上海,专以贩卖鸦片毒品为业,顿成巨富。他随即以贱价购置位于今南京东路外滩与滇池路口的地产,并雇工建造了一座五层楼的西式房屋,作为贩卖毒品的交易机构,命名为新沙逊洋行。一八八〇年伊莱亚斯死后,新沙逊洋行由其长子雅各比(Jacob)接管,仍以经营鸦片贸易为主。此后将鸦片利润逐步投向房地产并进行抵押放款,自建高楼大厦出租。新沙逊洋行第三代主持人是维克多·沙逊(Victor Sassoon),由于他的祖辈曾得到英国的爵士封号,所以中外人士都称他为沙逊爵士。他能讲华语,没有妻室。他一足是跛的,人称

“蹩脚沙逊”。他一九二三年第一次来上海，看到上海这个“冒险家的乐园”是当时中国商业、金融的中心，而且英国人在上海有很大势力，认为过去新沙逊洋行的经营作风过于保守，决心把他先人的肮脏事业进一步发展，所以自从他继承以后，不再把剥削来的资财大部送往海外，而留在上海作为进一步从事冒险活动的赌注。

## (二) 进出口贸易

一九二一年新沙逊洋行只有洋布间、地产间与保险间，但规模极小，仅雇一两个犹太籍职员办事。保险间是代理英商巴勒水火保险公司 (North British Fire and Marine Insurance Co. Ltd.) 业务。洋布间范围较大，定货客户众多，业务比较发达，上海天津路一带的宝泰洋布字号、久大洋布字号、同盛洋布字号、宏昌洋布字号，南京路的同茂盛洋布字号以及著名的三大祥(信大祥、宝大祥、协大祥)洋布商店等，都是新沙逊洋行的定货客户，尤以宝泰洋布字号的定货为最多。

新沙逊洋行经销最多的棉织品是冲泰西缎，畅销于全国各地，其他黄边泰西缎、丝罗缎、洋斑绫、条子府绸、丝光府绸、花洋布、珠罗纱等次之。以上各货都是由英国曼彻斯特、利物浦和格拉斯哥等地运来。那时，孟买运来的棉花、棉纱、漂细布、漂市布(俗称竹布)、市布(俗称龙头细布)等定货额与冲泰西缎不相上下。以上各种棉织品的定货期一年两季，每年营业总额约值上海规银一百五十万两。加尔各答的麻布、麻袋略有定货。呢绒毛货中毛直贡呢定货较多，其他如轧别丁、凡立丁、毛哔叽、大衣呢等

定货较差，每年营业总额统计约值上海规银五十万两。其定货客户都在河南路一带，例如华新、春和永、新昌、大纶以及承大等呢绒字号。又蜜蜂牌和双虎牌毛冷绒线定货亦旺，尤以前者为多，两种毛冷绒线每年营业总额约值上海规银六十万两。

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八年间，新沙逊把南京路和滇池路之间的旧址翻建大厦，在建筑期内迁至四川路九江路口的安利大楼办公。一九二八年，新屋落成后，新沙逊洋行的招牌改为英商新沙逊股份有限公司，总行改设英国伦敦，上海作为分公司，在香港注册。这时，上海安利洋行因业务范围过广，资金周转不灵，沙逊乘机垫入资本，把它并入新沙逊系统。安利洋行总行设在上海，分行遍设沈阳、天津、汉口等地，因此新沙逊对外营业仍利用安利洋行名义，不过招牌改为英商安利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新沙逊股份有限公司的附属公司。这时沙逊将原来的洋布间改为进口部，扩充了业务范围，兼营汽车零件、荷兰砂糖、人造丝、大小五金、宝塔牌麻纱手帕、纸张、玻璃、玻璃器皿、洋钉、三角铁、水泥、铜皮、钢条、铅丝等，同时兼做了一两年的出口生意，如芝麻、猪鬃、蛋白干、蛋黄干、桐油、肠衣等。

客户向新沙逊洋行定货，照例须经由华买办负责担保，公司给买办百分之二的回佣作为报酬。新沙逊洋行原来只有一个买办，就是南市半淞园的主人沈志贤，他是洋布间的买办，有房地产道契存在公司作为担保。一九二八年新沙逊扩充业务范围时，向沈志贤要求增加担保品，适值他金子投机失败，无力缴纳，不得不拉拢友人邢鼎丞与之合伙当买办，专司新沙逊的洋布、呢绒、绒线等业务。新沙逊后又经营人造丝进口业务，并雇用李廷

栋为买办。安利洋行名下有五金杂货买办吴登瀛，洋布呢绒买办地产商周渭石，人造丝、棉花、棉纱买办尤菊笙等。

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帝怒潮，上海人民举行罢工、罢市、罢课，抗议英帝国主义暴行，英国货受到抵制，客户定货停滞，新沙逊遭到极大亏损。同时，外汇跌价，存货无形贬值，又须负担日积月累的利息和栈租，客户无力出货，宣告破产的、结束业务的、逃避的时有所闻。那时日本布匹在市场上异军突起，日货价钱便宜，装船期迅速，日本资本家又在上海开设好几家纺织工厂，大有后来居上之势。洋布客户乃改变营业方针，群趋日本商行交易。在此情况下，新沙逊洋行亦改弦易辙，经营意大利司尼亚厂出品的人造丝，归其独家经理，现货与定货交易很旺，孔士、华嘉等洋行都向新沙逊进货。三四年间，新沙逊每年营业额总值约有上海规银两百五十万两。日本货虽竞争剧烈，充斥市场，但质量较差，所以新沙逊的人造丝业务还是蒸蒸日上。后来，司尼亚厂见到新沙逊经理的人造丝业务旺盛，于合同满期后，收回自营，因此，新沙逊洋行在一九三六年结束了进口部业务。

沙逊不但经营上海的进出口贸易，还投资于国外的制造业和金融业，在英国伦敦、曼彻斯特、利物浦、格拉斯哥开设大规模的纺织厂、银公司、呢绒厂、人造丝厂等；在美国纽约投资于纽约银行家信托公司；在印度孟买有孟买棉花厂、莱蒙纺织厂（Raymond Weaving & Textile Cotton Mills）、孟买信托银公司，在加尔各答有麻布、麻袋厂；在荷兰有荷兰制糖厂。这样，从商品的生产到贩卖联成一体，利权不致外溢。

### (三) 地产业务

沙逊是一个机警善变、精明狡猾的大市侩。他早料到进口业务不可久恃，狡兔三窟，不能不预备出路，因而在一九三一年成立了上海新沙逊银公司，总行设香港，在香港注册。这个银公司在上海汇丰银行和麦加利银行都订有无限额透支户，欠息月息四厘，而做出的押款，月息五厘半至八厘。银公司还做外汇业务。有了汇丰和麦加利作后盾，在这个大冒险家的主持下，其地产投机事业，达到了空前的规模。

一九二八年，沙逊新屋落成后命名沙逊大厦（今和平饭店）。自从这所大厦建成以后，沙逊顿时身价十倍，此后他就向高层建筑的业务发展。沙逊大厦底层出租作为商店，一楼、二楼出租作为办公室，三楼由新沙逊洋行自用，四楼以上辟为饭店及旅馆，命名华懋饭店，内设餐厅、舞厅。饭店里不仅富丽堂皇，而且搞了很多花样：房间里设有中国式、日本式、英国式、法国式、意大利式、西班牙式的设备，因此颇受富商巨贾、达官豪绅的欢迎。

上海人口不断增加，为沙逊通过地产业务进行掠夺制造了大好机会。在一九三〇年、一九三一年，他将原有沿苏州河畔的西式住房翻造为公寓式的河滨大楼；又将原有江西路福州路之间的里弄房屋拆除，翻建为朝南的都城饭店（即今新城饭店）和朝北的汉弥尔登大厦（即今福州大厦）。此后又在四川路桥堍沿苏州河、天潼路建造了瑞泰公寓；又在茂名路、淮海路、长乐路之间建造了三座大厦，一座名华懋公寓，近处居民称之为十三层楼，即现在的锦江饭店；一座名高纳大厦，即后来的茂名公寓，近

处居民称之为十八层楼，另外一座名高纳花园。此外，又在南京西路建造一所华贵的舞厅，取名仙乐舞厅（即今仙乐剧场）。

沙逊银公司利用客户押款到期无力偿还的机会，收进很多房地产。一九三六年以后，成立了地产部，专营房地产业务，在它的管理下组成的附属公司，有汉弥尔登信托股份有限公司（Hamilton Trust Co.Ltd.）、上海地产股份有限公司（Shanghai Properties Ltd.）、远东投资股份有限公司（Far Eastern Investment Co. Ltd.）、东方地产股份有限公司（Eastern Estates & Land Co. Ltd.）和华懋地产股份有限公司（Cathay Land Co. Ltd.）。以上各公司都在香港注册，投资人都是沙逊的亲属，除华懋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有很小部分是外来搭股外，其余各公司股权都属于沙逊，股票也不在市场交易。沙逊所有的房地产，除以上列举的大厦和舞厅等系属自建外，其很多房产及地产都是押款过期没收或贱价买进的产业。

沙逊在上海的财产主要是房地产，分布在全市各处，共有近百个单位名称，大小房屋共计一千九百多幢，占地六百多亩，所以有“房地产大王”的称号。除上述自建的大厦外，其他押进和买进的大产业有四川中路的安利大楼、四川路三三〇号、江西路和九江路口的老沙逊洋行的沙逊房子、南京路黄陂路口怡和洋行的怡和产业、衡山路建国西路口的衡山公寓等。此外还有很多花园洋房、华式里弄、市房及住房；东面杨树浦、汇山路有百余亩空地、厂房及里弄房屋；南面淮海东路有很多里弄房屋与店面；西面徐家汇路、衡山路、华山路、虹桥路、番禺路、复兴西路、茂名路、淮海西路、南京西路、新乐路、陕西路、长乐路、南阳路有里弄



住房和花园洋房,还有一个小菜场(俗称西摩路小菜场);北面深阳路、嘉兴路、长春路、七浦路、四川北路、乍浦路、天潼路、河南北路、江西北路、苏州河畔等地有公寓大厦、花园洋房、华式里弄、市房与住房。中区除以上列举的大厦外,在浙江路、南京路、山西路、山东路、天津路、宁波路等处也有华式里弄与市房。

#### (四) 其它营业

沙逊贪多务得,细大不捐,除房地产业务外,还设立华懋饭店、华懋洗衣公司、上海啤酒厂、中国公共汽车公司(一度经营双层公共汽车)、都城饭店、仙乐舞厅和国泰大戏院等。对这些企业他都自己握有实权,不轻易借手他人。

他常去外国,在上海的时间不多。某年他来上海,晚上同朋友到百乐门舞厅消遣,侍者见他跛了一足,貌不惊人,不知道他是赫赫有名的沙逊爵士,因而没有特别趋奉他。他大为不满,拂袖和朋友离去。翌日即招工建造仙乐舞厅以泄愤。好在他有现成的空地,咄嗟可办。舞厅初造成时只供他私人娱乐,不对外营业。他离上海后,没有多久就出租与大流氓谢葆生,最后出售给谢。

#### (五) 地产业务剥削的内幕

沙逊系统的投资公司和地产公司都是旧上海有名的地产商。沙逊利用这些公司的名义发行股票和公司债券以吸收大量资金,著名的十八层楼和十三层楼等就是由华懋地产公司发行债券建筑起来的。

沙逊经营房地产押款时所提出的条件非常苛刻,一般押价

极低,只合产值三分之一,而利率却很高,索取八厘甚至一分,还要按季累进。有许多到期无力偿还的押户,产业就被没收,如浙江路同春坊、湖北路迎春坊和黄陂路安义里等产业就是如此。

上海原有租地造房的办法,沙逊在出租土地时不但索取高额地租,还要由他设计建筑图样,并订定租地到期后全部房产归他所有。南京路上的劝工大楼、淮海路上的国泰大戏院、西藏路的东方饭店(今工人文化宫),以及部分新式里弄产业,就是被他用巧取豪夺的手段得来的。

沙逊经营房地产对外用新沙逊股份有限公司与华懋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名义,而内部帐册则又分成华懋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汉弥尔登信托公司、东方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地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等。除华懋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外,其它几个附属公司将每月租金收入总额的百分之二手续费付给新沙逊公司。新沙逊在建国初期的房租帐册记帐单位分美钞、英镑先令和折实单位三种。固定租金以美钞单位折合计算。帐务科的记帐单据分红、黄、蓝、白、绿各色,以示各公司的区别。每月应收租金总共约合新人民币一百六十余万元。

抗战前,新沙逊在新房客办理租赁手续时,先收两个月押租,退屋时发还,同时要收六个月预付租金,连本月份共收九个月的租金,还要商铺担保按期付租。租户进屋后,公司将所收的预付租金于月初转帐扣除。租户转让居住权时,公司索取一笔过户费,相当于十个月的租金数额。抗战胜利后,公司巧立名目,将此项过户费改称“善后补助金”,继续向要求过户的房客收取。此项“善后补助金”的收入,在建国前的一个时期不说,只在建国

后自一九四九年五月三十日起至一九五〇年五月三十一日止，在华懋地产公司名下总共有四十七件，计收入旧人民币五千三百五十四万多元；上海地产投资公司共有二十三件，计旧人民币四千一百六十八万多元；上海远东地产投资公司共有六件，计旧人民币一千四百七十多万元。为了逃避纳税，还有一些租金，由房客以外币付给香港总行。公司当局备有秘密帐册（俗称暗帐），记载不公开的帐目，这种逃避资金的手法，后来被人民政府禁止。

旧中国许多官僚、军阀在上海拥有的房地产，常常化名由洋行代理经租。沙逊公司代理这项业务时收取百分之五的手续费。这些官僚、军阀靠帝国主义洋商牌头，坐收租金，而沙逊从中渔利。抗战胜利之初，上海房屋紧张，有不少国民党军人穿着高级军官的服装，神气十足，来到新沙逊公司要求租赁房子，公司当局对于这些军人的要求均予满足。这些军人亦官亦商，把租得的房子出租、出顶，换取金条。还有不少地皮掮客，俗称黄牛，挂着“房地产经租公司”的招牌，实际上是房地产中间人，专门招揽房地产买卖或做租顶房屋的勾当，从中赚取数目可观的利润。他们经常西装革履，出入于外国地产商行。新沙逊也很欢迎这班黄牛，外籍职员可以从中得到贿赂，公司方面亦可多得过户费。

建国后，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再不容许帝国主义搜括人民血汗。新沙逊就故意拖欠国家房地产税和营业税，日积月累，为数颇巨，而对房屋的保养修理则置之脑后。党和政府为了保障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曾代为进行大规模的修理，公司拖欠了

巨额的修理费。因此在一九五八年十月三十一日新沙逊洋行的全部财产都由中国人民掌握管理。

#### **(六) 新沙逊洋行与安利洋行的关系**

新沙逊洋行同安利洋行的关系在上面已讲了一点。英商安诺特 (H. E. Arnhold) 曾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总董，他原是德国人，最早和另一个德国人卡勃 (Karberg) 组设瑞记洋行 (Arnhold & Karberg Co.)。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安诺特和卡勃拆股，改入英籍，独开安利洋行。该行因沈阳分行吃了倒帐，又因规模过大，资金周转不灵，沙逊乘机投资合伙，解救了安利洋行的困难。同时，安诺特在工部局也能处处帮沙逊的忙。这时正当国内军阀混战，迫切需要军火，沙逊就通过安利洋行，把欧战剩下来的大批破烂军火，以高价转卖给中国军阀，从而获取暴利。一九三四年，宋子文也曾为上海海关缉私营向安利洋行购买步枪等军火。

自从沙逊投资于安利洋行之后，由于资力雄厚，手段灵活，逐渐操纵了安利的全部业务，终于吃掉了安利和它的所属产业。一九三五年，安诺特退出安利，安利就正式成为新沙逊公司系统的机构。

#### **(七) 华洋籍职工的不平等待遇**

新沙逊洋行有华籍职工五百人左右，其中职员一百几十人，工友三百几十人。西籍职员自总副经理、部长以下共二十六人。华洋籍职工待遇，相差悬殊。西籍职员中，副总经理、部长的月

薪折合人民币在四五千元以上（照建国初期外币折合），其他西籍职员，待遇亦有区别。从外国调来的高级职员称 Foreign Staff，多数是英国籍，底薪按英镑计算，折合人民币约两三千元，供膳宿（由洋行自己的饭店和旅馆供给），出入一天四次，由汽车接送，月薪在上海支取一半，在外国支取一半。在上海雇佣的西籍职员称 Local Staff，有白俄、犹太、葡萄牙人等，也有一两个比较高薪的人，月薪约人民币一千元，一般只有人民币六七百元。他们居住在洋行所属的房屋内，可享受仅付原租金额十分之一的权利，房租全免；可享受乘坐洋行特备的大型汽车，每辆十四人，一天四次接送。

华籍职员除买办月薪约人民币一千元外，高级职员月薪人民币六百元者两人，四百元者三人，其他自人民币一百二十元起至两百元不等。工友的月工资自人民币九十元起至两百元不等，技术工头的月工资约两百元。华籍职工人数虽有五百左右，但每月薪资总额只有人民币一万元左右；西籍职员包括副总经理在外，人数只有二十六人，但月薪总额约合人民币三万元。华洋职工待遇的不平等，于此可见。

华籍职员中只有十几人住在洋行所属的房子里，其余四百八十余人都不租住在洋行所属的房屋。

西籍职员每日上下午由华懋饭店免费供应牛奶茶、饼干或其他糕点，中国职员除买办和高级职员能享受外，其他职员不得享受。华籍职员与西籍职员各有专用厕所，华籍职员厕所的门，终日敞开，可以随意出入；西籍职员厕所的门，终日紧锁，他们各备一把钥匙启用。建国后，洋老板们装腔作势，愁眉苦脸，每天

哭穷，连华籍职工们的低微薪工也想拖欠。职工据理力争，揭穿公司的假面具，监督公司收入，控制了公司的经济权。党和政府为保障职工生活，将公司收入尽先拨发中国职工和一般西籍职员薪水，使他们的生活得以维持。

### (八) 沙逊的生活

沙逊在上海期间，在跑马厅里养了很多马。在马霍路（今黄陂路）有一个马厩，英文名 Jardine Stable，特雇马伕数人专门养马，又在沙逊公司内特辟一办公室，雇佣一犹太人依席克尔（J. H. Ezekiel）专门管理马伕与马匹的帐务工作。每遇上海跑马厅赛马时期，沙逊就利用这些马匹夺取奖金。他有一头马名华伦飞（Wallenfield），曾在跑马厅大赛马期夺得锦标，因此更增加了他养马的兴趣。他溺爱赌博，不惜一掷数千金。在一年两次的赛马期中，新沙逊洋行放假三个半天，以便职工们参加赌博。后来，赛马被禁，沙逊的这些华贵的马匹都卖掉了。

沙逊来中国时年龄已在四十左右，虽终身不娶，但有一秀丽的女秘书形影不离，俨同夫妇。沙逊最后一次离沪时，把重要的房地产契据带到海外，上海只留一份摄影副本。传说他在建国前已将在沪的大产业在海外成交出卖，此说是否事实，无从证实。

# 解放战争时期

## 上海华资民营进口行的暴兴暴衰

华 洪 涛

从抗日战争胜利到上海解放这一段短暂的岁月中，上海华资民营进口行，一切只能依随着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意向和国民党政府贸易政令的松紧而兴衰消长，“荣枯由人”，自己掌握不住命运，并无自由发展壮大可能。加上这些行家在开设时就先天不足，根基脆弱，开设后的经营方式，又只是想在投机上发横财而不是在正常的国际贸易上谋发展，因而它们尽管能乘机钻出头来，但所形成的表面繁荣极为短促，仅仅一两年的时间就没落了。

在这里，我对它们的兴衰历程作若干调查，并探索它们所以兴衰的原因。

### 一、抗战胜利后，华资进口行暴兴

#### （一）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初，户数激增

抗战胜利后，在一九四五年的年底，原有的华资进出口业旧行家固在亟图复业，新组织的也已开始萌动。到一九四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上海市进出口商业同业公会组成时，已有华商共近六百余户，其中参加该同业公会的达三百八十五户（尚有二百多户

未参加该公会)。

一九四六年起,华资进出口行大量增设,历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八年春季,达到了一千六百二十一户的最高峰。(其中民营户占百分之九十八左右。官僚资本商行以户数论所占不多,但它们倚仗特权,垄断操纵,能量很大。)

在一九四六、一九四七年所大量增设的华资进出口行,考其业务重点,绝大多数是进口专业;即使号称“进出口兼营”的行家,这时期也实际以进口为主。因为这时的特殊情况是进口稳获暴利而且经营较易,所以新开的华资进出口行固然都以经营进口为主,那些本来是出口专业的老行家,也因那时的进口业务易获暴利,见猎心喜,都兼做了进口。甚至原来只限于专代南洋行家办货出口的“南洋办庄”,也转变业务而兼做了进口,成了进出口兼营。其中尤以菲律宾办庄的采运美军剩余物资来华,更加活跃。

正因如此,华资进出口行在抗日战争前经营业务时,进口专业与出口专业本有明显的分工,而到抗日战争胜利后,则不象以前那样清楚划分了。这时,既因进口易于获利,原来的出口专业尚且改做进口,新开的商行当然更以进口为主。这些商行在向政府登记时虽自称“进出口兼营”,实际都应归于进口专业的一类。至于纯粹只做出口的专业户数,根据材料统计:一九四六年的户数,反较一九四一年的上海“孤岛”时期减少了九十四户;一九四六年冬季到一九四七年春季之间,进口商行正在大量激增的时期,出口专业行反而又再减少了四十户。这说明当时华资进出口行户数的激增,完全是增加了进口专业行。



## (二) 华资进口行所以暴兴的原因

### 1. 国民党政府施行低汇率政策, 进口货易于赢利

这时期华资进口行所以暴兴的客观原因, 最重要的是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通货膨胀, 币值不断下跌, 而又施行“钉住制”的低汇率政策, 以致造成了凡是经营进口货都能赚钱的局面。

“当时国内的物价高, 对外的汇率低, 法币的对内价值与对外价值有极大的差别, 进口商结得廉价的外汇输入货物, 依国内高昂的市价出售, 一转手间利市三倍。”<sup>①</sup>以当时进口硫化元染料为例: 据业内人回忆, 一九四六年春, 从美国购运一担硫化元到上海, 本钱四十美元, 而在上海卖掉后所得法币, 却可按官价挂牌汇率结购外汇五百美元。再以之向国外定货, 可买到十二担硫化元再进口, 这样一来回转手之间, 时间不过四五个月, 竟有十二倍的暴利可得。

这里再略举下列几种进口货作为具体事例, 说明当时进口业务在一九四六年春的一个时期里可获得的暴利(表1):

表1 进口货国外国内差价对比表

商 品	国外批发价	上海市价	比数约计
五灯无线电收音机	每只美金 20元	美金 250元	1比12
丝 袜	每双美金 0.75元	美金 3元	1比4
英 国 呢 绒	每码美金30~50先令	美金 10磅	1比5
配 尼 西 林	每支美金 0.86元	美金 15~20元	1比20

此表根据李宗瀛《进出口贸易巡礼》(1946年4月9日《大公报》)编制。

上海本来就是一个投机的都市, 国民党政权的通货膨胀政

策，更刺激了投机商业的发展。上海商人们吸取了抗日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重货轻币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市场上流传着“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汇”的结论。而这时的进出口业，尤其是进口专业，它们既是用低汇率向政府结购了进口外汇，待外货到埠又因法币币值狂跌，物价飞腾，稳得暴利，它们正是在时代动乱中既作囤货投机又作外汇投机，成为左右逢源、最易发横财的行业。

### 2. 上海人口激增，物资缺乏，游资充斥，投机泛滥

人口的大量突增，一方面是增多了上海都市的日用消耗，使战后本来缺乏物资的上海更感供应紧张，替进口商经营洋货进口扩大了市场；另一方面，又由于内地人口的向上海集中，随着也带来了大批游资。据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初的估计，在三个月中，各地流入上海约有法币六千亿元之多，加上上海原有的两千亿元，游资竟达八千亿元。<sup>②</sup>以当时美金价格计，约有四亿美元之巨。由于大量游资找不到归宿，在法币不断贬值的情况下，拥资者惶惶不可终日。这样，市场兴起投机囤积之风，并给新开设的华资民营进出口行在集资方面创造了有利条件。

### 3. 原来压在华行头上的外国洋行，战后户数大减

在过去，上海的外商洋行，一直倚仗着不平等条约的特权，凭藉其雄厚的资力，把持操纵市场，把华资进出口行压得不能抬头。抗战胜利后，原来在上海占户数特别多的日本洋行以及德意洋行老板，都被遣送回国；英法商人也因身经大战，疮痍未复，不遑东顾。因而，百年来独霸上海的洋行，在这时期，除美商外，户数大为减少，其垄断压迫的力量也相应有了减轻。根据资料统

计：一九四一年上海外资进出口行的总户数原共一千一百四十五户，一九四六年春季锐减为四百九十一户；一九四六年冬季略增数十户而为五百二十三户。<sup>③</sup>这样，无疑是给华资进出口行以有利之机。加之这时很大数量原来在外资洋行服务的买办和职工，脱离了洋行而出来自己开行。他们从洋行中带来了业务技术和国外关系。这种情况，打破了我国外贸商人原来由于找不到国外生产厂的直接关系而不易经营进口业务的难关。

#### 4. 国外厂商对某些华行特意扶植

抗战胜利后，美国垄断资本企图独占中国市场，竭力倾销剩余物资和奢侈品、消费品，对于愿意为它效劳的中国进口商人，特意大力扶植。这时，华资民营进口行对于进口商品的选择，由于一心只在利润上打算盘，便倾全力进口美国的剩余物资、消费品、奢侈品，其品种大自轿车、冰箱，小至香粉、唇膏、香烟、洋酒、水果、玻璃、皮包、玩具、卫生纸无所不有。而对有利于促进国内生产建设的机器、电机等重工业器材设备，则因成本高、手续繁、技术高、利润薄和周转时间长，经营进口的行家寥寥可数。

同时，对于进口商品的价格、规格、数量等，则完全由国外支配。对于他们希望能够订到独家经销合约的那些国外厂商，更是如此。在取得经销合约后，他们为了自己可以按合同多得到佣金和奖励金起见，总是扩大推销，不遗余力。

#### （三）华商经营进口的商品面和量，显有扩展

在抗日战争时上海形成“孤岛”期间，华资进出口行中对于进口业务，不但若干历史上素被洋商所垄断的大宗商品如汽油、煤油、柴油、棉花、煤及焦炭等几乎完全空白，即使数量上可以分

散定购的大路货,如五金、钢铁、化学产品、纸张等商品进口,华商经营的户数亦很寥落。<sup>④</sup>但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情况不同了。华资进口行一方面是户数急剧膨胀,另一方面经营进口的商品面和量也大有扩展。这情况,在一九四六年国民党政府采用所谓“鼓励输入”政策期间,特别显著。

这里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国民党政府输出入管理委员会档案中,上海华资进口行向该会申报而由该会核实的一九四六年份进口实绩,经详细统计,把经营某些“大路货”商品的户数如表2:

**表2 1946年上海华资商行经营进口的“大路货”商品户数表\***

货 名	户 数	货 名	户 数
煤 油	22户	次要化学品	58户
汽 油	1户	未列名化学品	45户
柴 油	17户	西 药	52户
煤 及 焦 炭	9户	安尼林染料及 其它煤膏染料	47户
油、脂、蜡	18户	硫 化 元	35户
黑色金属(熟铁条、块、 片、锭和各式型铁)	32户	靛 青	7户
合 金 钢 板	10户	白 报 纸	13户
铜类金属(包括紫铜)	20户	各种其它纸张	57户
锌 类 金 属	15户	香 烟 纸	16户
白 金 属	9户	生 橡 胶	18户
铅 类 金 属	3户	橡 皮 制 品	12户
镍 类 金 属	3户	棉 花	28户
管子及管子配件	9户	木 材	34户
重要化学品	82户		

\* 此表所列户数,系指经营该类商品的户数而言,而每一家进口行,通常都兼营几类商品进口。例如某一进口行既营西药进口,又营硫化元及化学品进口等等。因此不能以各类经营的户数去相加而求得进口行的总户数。

此表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输出入管委会各卷》综合统计。

按照表 2 所列，可见抗战胜利后华资进口行所经营进口的商品面，以户数之广来说，确已大非昔比。而且，更重要的是对各该进口商品的经营的比重，也空前增加。同样根据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存档，把上海口岸对于纸张及纸浆、拷皮膏、橡胶及其制品、面粉、米、五金类、化学品类、药品、染料、木材、煤及焦炭、人造丝、化学肥料的十三类商品在一九四六年进口的实绩，作综合编算，结果华商所经营进口的比重已上升为百分之五十点六，洋商则下降到百分之四十九点四。<sup>⑥</sup> 这比重是空前的，较战前相差很大。

#### （四）华资进口行在此期内，大都获得暴利

国民党政府放宽进口管制，施行低汇率政策，不少华资民营进口行乘着这个机会，从主要是替美帝推销剩余物资这项生意中获得了惊人暴利。

抗战胜利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七年上半年这一年多时期内，是上海华资民营进口行攫取暴利最好的时机。这时，进口商经营业务，凡是自营进口、自负盈亏的，其利润率已不是论成本的多少百分比，而是论几倍于成本甚至几十倍于成本了。根据访问材料：那时华资民营进口行中的大户维大行，在一九四六年主要经营美国香烟进口，一年间获利一百多万美元；另一大户南洋企业公司，一九四六年度抢购美国海军剩余物资来华，至少获利四十万至五十万美元；一家复业极早的中型户联益商行，以战时存美保险赔款两万美元抢先购运美帝剩余物资，于一九四五年底就运货到沪，接着往返周转一年，获利达五十万美元；一家一九四一年开创时仅四万美元资本的可大公司，

一九四六年经营美国奶粉、咖啡进口，全年获利二十万美元以上。<sup>⑥</sup>

以上几个例子，有两点是共同的：一是它们都在替美帝推销剩余物资、奢侈品、消费品；二是都赶在抗战胜利后的最早时期就抢先经营。在此也说明，华资国际贸易业虽有一定经营能力，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们的经营活动带有很大的消极因素。

## 二、一九四七年下半年起，华资进口行迅速走向下坡

从一九四七年下半年起，上海华资进口行就开始走下坡路。一九四八年初，出现了大批华资民营进口行入不敷出、纷纷停歇的局面。根据当时《同业公会会员录》和《行名录》材料，一九四七年年底，进口行（包括进口专业及进出口兼营）登记户数最多时达一千四百八十二户；一九四八至一九四九年间，户数大量减少，到上海解放后在一九五〇年初新政组的同业公会重作登记时，华资民营进口行已仅七百四十二户，减少几达一半。<sup>⑦</sup>而且即使幸存的行家，也很多是苦撑硬挺，奄奄一息了。

### （一）暴衰的内在因素

#### 1. 资金微薄，先天不足

抗战胜利后新开的华资民营进口行，由于资金微薄，因而经不起风浪。

那时的华资民营进口行，有很多是所谓“皮包公司”。这种公司，只备有极少的一些资金，有的甚至竟是赤手空拳，毫无

固定资金。它们并不雇用职工，有的租着一间、半间房子挂个招牌，也有连自身的办事房间都没有，仅仅借别人的“写字间”（营业所）附挂一块招牌，以收取电报和信件，全公司的全部资产，都在资本家随身携带的一只“皮包”之内。例如那时新开的以进口呢绒为主要业务的熙成商行，股东们除了最初垫付极少数开办费外，并无固定资金；又如在一九四六年二月开设的以进口洋纸为主要业务、到一九四八年底曾积余八万美元资产的胜利贸易公司，初开时公司借设在一家“久记纸号”内，全部资金除购置一架打字机、一本电码簿（CODE）和一些印刷品外，已无多少余款。全靠代客进口，积累佣金，才有了自己进货的本钱。<sup>⑧</sup>

## 2. 经营方式，投机冒险

新开的华资民营进口行，由于资金薄弱，就在经营方式上更趋于投机冒险。当时这些进口行经营业务的做法，大都是先争取取代客定购进口货的生意。在代客定货中，第一种手法是乱加高额佣金。象熙成商行代客定购呢绒进口，佣金率大概要加至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五十。这样的高佣金率，在那时已非罕见；第二种更重要的手法，是浮收客户定洋成数或预收高额佣金，把浮收预收的金额，移充自己向国外定货进口、自负盈亏的货款押汇保证金。由于那时进口货易获暴利，定货客户盲目委定，对代定的条件，佣金高也罢，定洋预付全数也罢，都不大计较，这使进口商易于取巧谋利。如此滚上几笔，如果机会好，进口商就可白手起家。这类的事例很多，简直大中小户进口行普遍都是如此，仅仅在程度上有些差异而已。

另外，这时进口行的经营作风也渐趋于恶劣。对定货客户的欺骗，不仅浮收定银，而且出现掉货、赖货。甚至有些进出口行，收足客户定银，代向国外定货，在货到时因市场价格风俏，即自行变卖，拒不交给原定户，使客户蒙受损失，自己坐获暴利。这作风逐渐蔓延到较多的行家。

资金微薄，经不起风浪打击，是那时华资民营进口行的共同特征之一，而经营方式中的欠债借款、欺骗作伪、进行赌博式的冒险投机，也是它们的共同特征之一。华资民营进口行内部存在这些缺陷，一受外来打击，就迅速倒下去了。

## （二）外来打击，促使急剧衰落

### 1. 输入配额每季缩减，业务愈来愈狭

进口商所赖以获得利润的是进口业务。进口总值上升，进口商业业务旺盛，利润增多，就出现繁荣；反之，进口总值下降，进口商业业务萎缩，利润减少，就必然趋于衰落。一九四七年起，国民党政府因外汇枯竭，不得不改变原来的所谓“鼓励输入”政策，加强进口管制，实行“输入限额”，核定各季限额，按比例分配给各进口行，不在配额内的，不发许可证，不准进口。嗣后上海的进口总值就大为下降。华资民营进口行所能经营到的业务，无论是代客进口而收取佣金的，或是自营进口而自负盈亏的，都被动地一年比一年缩减。

几年中上海进口总值有如表 3。

再就一九四七年二月起开始实行“输入限额分配”制度以后的限额数字来看，限额是一季比一季减少，进口商的业务当然也被迫而季季压小。这种情况可从表 4 看出。



**表 3 上海口岸历年进口总值消长表**

年 份	上海进口总值 (千美元)	与 1946 年 进口作比较 (1946年为100)	备 注
1946年	557,257	100.0	1946年尚未施行“输入限额分配”办法。
1947年	330,246	59.3	1947年2月起,国民党政府开始施行“输入限额分配”制度。
1948年	165,734	29.7	
1949年 1月至5月	63,716	27.4*	1949年全年进口值为78,320千美元,其中14,605千美元系上海解放后6月至12月所进口。

\* 这比数是以1949年1月至5月进口63,716千美元的五分之一,与1946年全年进口557,257千美元的十二分之一相比而得。  
此表根据历年海关“贸易统计报告”综合编算。

**表 4 各季公布“输入限额”比较表\***

季 别	公布日期	包 括 年 月	全国输入限额公布数 (千美元)	与第1季度 限额相比
第1季	1947. 2. 17	1947年2月~4月	99,700	100
第2季	1947. 5. 19	1947年5月~7月	72,610	73
第3季	1947. 8. 5	1947年8月~10月	67,873	68
第4季	1947. 11. 23	1947年11月~ 1948年1月	53,393	54
第5季	1948. 2. 20	1948年2月~4月	} 两季合73,475	每季平均37
第6季	1948. 2. 20	1948年5月~7月		每季平均37
第7季	1948. 9. 8	1948年8月~10月	} 两季合42,140	每季平均21
第8季	1948. 9. 8	1948年11月~ 1949年1月		每季平均21
共 计	—	—	409,192	—

\* 自1947年2月17日公布第1季度“输入限额分配”起到1948年9月8日公布第7、8季度止,共公布了六次,其中第5、6次和第7、8次都是合并公布的。到1949年3月1日,输管会发布了“第9、10两次限额不再公布”的消息。  
此表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输管会档案”综合编算。

从一九四七年五月第二季度配额起，输出入管理委员会又接受工业界请求，将进口商所得配额划出一部分由输管会直接配给工厂，进口商对此只能代理工厂进口，收取有限的佣金。削减了进口商可以自营进口、自负盈亏、多得利润的机会，实际上等于再度减少了给进口商的配额。

其后，输管会接到行政院命令，“凡美援中已有物资，将由第七季限额中抽出，暂缓进口。”而美援物资是由国民党政府特设“美援运用委员会”直接进口的，这样一抽出去，华资民营进口商无从分润，配额更少。

总之，国民党政府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以前，是执行“鼓励输入”政策，滥供低价外汇，尽量放宽进口，华资民营进口行业务大盛，表面上出现了短暂繁荣；而到一九四六年年底，国民党政府对进口突然强力管制，输入限额既逐季减少，商人自备外汇进口的物资也要作走私论罪，进口商的业务愈来愈狭。

## 2. 汇率改采“机动”，进口货成本增加

在一九四五、一九四六年间，“进口商在〔进口货〕成本上受了政府〔低汇率〕的津贴，输入进来的货物还得以较高的价格<sup>①</sup>在市场出售，所以他们的利益是双重的”；<sup>②</sup>后来改行输入限额分配制度，进口的数量大为压缩，但在施行的初期，输管会把各商品的输入限额按核定比例分配给各“合格进口商”，进口商得此配额后，既可以按额申请此项货品的进口许可证，又可以按照官价挂牌汇率向中央银行如数结购进口外汇。当时，一则进口货是由于严格管制进口而来源减少了，能有定货到沪更可保证赚钱；再则官价汇率还是采“钉住”办法，远比黑市为低，能结

购到官价外汇就肯定得了便宜。所以仍旧是双重利益而两面赚钱。因此,在实行输入限额分配的初期,尽管每家分到的配额为数不多,但小户已足抵开支,大户更月有余润。——这情况,当时进口商的从业人员称之为“吃限额”,真是不劳而获,坐享其利。

不过,好景不长,到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国民党政府废除钉住外汇率而采用“机动”的基准汇率市价了。这市价,基本上是随黑市汇率而上下。接着,在一九四八年五月三十一日,又改用“结汇证明书”办法,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再采用“外汇移转证”办法,这些办法都使进口商不能再得到等于“外汇津贴”的低价外汇。也就是说,到了一九四七年八月份以后,华资民营进口行所分配到输入限额,在结汇时付出的汇率,已与黑市相仿佛,所有以前经营进口时那种外汇按官价结购,货价照黑市卖出,商人可坐收汇率差额巨利的机会,从此已经失去。这对进口商来说,是断了他们主要的一重利润。因而论者认为:“一九四七年八月,可视作为中国进口贸易的转折点。”<sup>⑩</sup>

### 3. 民族工业日益衰颓,进口原料销呆价跌

一九四七年下半年起,上海市的购买力就已显著下降。一九四七年秋季,南京路国货、新新、大新、先施、永安五大公司的营业总额,较一九四六年同季减少为百分之二十七点五<sup>⑪</sup>。上海《商报》在一九四八年四月底发表了《工商业的坐食危机》社论,并举行“工商业坐食危机座谈会”,邀请工商业者座谈困难情况,他们的发言,使人痛感对外贸易商人前景一片凄凉。<sup>⑫</sup>

由于人民购买力日益减弱,工厂生产日益萎缩,进口商所进

口的工业品和工业原料，就从风俏热销一变而为销呆价跌。当时，华资民营进口行一厄于进口受严格限制，业务削减；再厄于汇率改为机动调整，进口货成本增加；三厄于商品销呆价跌，进口货无利可图。受此三者打击，进口商们尽管神通广大，也无计可施，只能坐吃山空，日趋没落。

#### 4. 普遍受到金圆券的致命打击

上海华资民营进口行，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所遭到的最普遍最致命的打击，是一九四八年八月间国民党政府以暴力推行金圆券以及随之而来的限价政策。

在实行金圆券之初，国民党政府特派的“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专员”一到上海，就立即倚仗暴力，对民族资本工商业和劳动人民加紧榨取。上海华资民营进口行当时普遍受到的严重损失：第一是资本家悚于雷厉风行的法令，不得不把自己所持有的一些金银外汇，全部捧出，兑换了金圆券。而金圆券币值旋即狂跌，几同废纸，资本家们过去历年所累积的一些资财，大部分因此化为乌有。第二是当时实行暴力限价，将所有物价全面冻结于八月十九日的价格水平上，不得上涨。进口商的仓库被封，查点存货，勒令按限价出卖，上海出现了波涛汹涌的抢购风潮。进口行的进口货，也同样因强制按限价出售，被抢购一空。到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国民党政府因金圆券政策彻底失败而宣布取消限价，上海的物价起了“总暴动”以后，上海零售物价的指数激升，“以八月十八日时为一百计算，则十一月应是两千五百四十三，十一月十七日为止应是两千六百六十五。”<sup>④</sup>相隔三个月，物价较前涨起二三十倍，那些在限价抢购中被抢购掉的货物，已无法

再按原价补进了。

在金圆券的风暴中，过去主要靠“既囤货又囤汇”的双重投机而最易发财的进口商，到这时适得其反，变成为两面受夹击而损失最惨重的行业之一。连实力较雄厚的大、中型民营进口行也都不容易站住脚跟；至于一般实力薄弱的中小户，受损后更普遍陷入困境，无法周转，终致纷纷倒闭了。

---

注：① 李宗文：《一年来的经济》，1947年5月22日《商报》。 ② 参阅资耀华：《国民党政府法币的崩溃》，《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1960年8月全国政协版。 ③ 分别根据字林西报馆1942年1月、1946年7月、1947年1月出版的《一元行名录》统计。 ④ 据现有材料，查得在“孤岛”时期华商经营钢铁五金进口的，只有八户；经营化学产品（包括化工原料、西药、染料、颜料）进口的，只有九户；经营各种纸张进口的，只有四户。 ⑤ 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输出入管委会各卷》综合编算。本文在这里所列举的十三类进口商品（其它商品不在内），统计出的数字为：1. 1946年上海这十三类商品的进口实绩共为122,210,000美元（100%）；2. 其中上海洋商经手进口的为60,365,000美元（占49.4%）；3. 其中上海华商经手进口的为61,845,000美元（占50.6%）。 ⑥ 根据当时经营各该行的原经协理张二铭、忻礼斌、曹家球、王承祥访问记录（1962年）。 ⑦ 根据上海市国际贸易业同业公会存档：《1950年会员登记名册》核算。 ⑧ 根据各该行的原资本主陶际云、钱本义访问记录，1962年5月。 ⑨ 行策：《略论进口结汇新办法》，《经济周报》6卷21期，1948年5月20日。 ⑩ 吴元黎：《战后之中国对外贸易》，1948年11月29日《大公报》。 ⑪ 参阅《从五大公司的营业看国民购买力的低落》，《经济周报》6卷9期，1948年2月26日。 ⑫ 参阅1948年4月26日《商报》载出席4月24日该座谈会的各业代表人士说：这时橡胶工业30%已停工；40%在减工；皂烛33%停工；染织工业30%减工；棉布商业门市生意，最近减去40%至50%；百货公司外强中干，营业收入仅够开支；国货工业品外销公司等，都吃了大亏；全市商业营业数字，本月较上月要减少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 ⑬ 《银行周报》33卷1期10页，1949年1月1日。

照分,亏损概不负责。丰泽楼开张后,搞得有声有色,饭店自办的餐厅都比不上它。尽管如此,栾在经营中也有投机取巧之处。他曾亲口说过,酒席上有人点用熊掌,他曾用骆驼蹄代替,以伪充真。

饭店设有董事会。董事长是吴鼎昌,副董事长是钱新之(四行储蓄会协理)。除有四行高级职员担任董事外,另找了前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官如顾维钧、颜惠庆、王正廷等担任董事(这些人的名字外国人是熟悉的),也找了地方势力如杜月笙当董事,其目的是一是壮大声势,二是遇到什么问题,便于解决。在饭店掌权的人是常务董事,先后有项仲雍、施博群、孙立己(后又兼任总经理)。副经理先后有卢寿联、林勉之、吴沈钺。饭店还用了一些外国管理人员,担任经理的先后有瑞士人、英国人;担任厨师的有法国人及瑞士人;还有担任总招待的德国人。饭店用这些外国人既便于招徕外国客人,并表示饭店的气派,又能利用他们的经验技术把饭店搞得更好。

饭店在管理上成绩比较显著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建筑和机电设备的使用和维修保养,一是侍应工作服务周到。

关于建筑和机电设备,饭店设有工程部,主持其事的先后有五个工程师。第一个是吴清泉,抗战初期他离开了饭店,到航空委员会技术厅工作,现在是邮电部离休干部,离休前是邮电学院教授。第二个是吴沈钺,现任同济大学教授兼图书馆长。第三个是支德明,现任上海市人民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基建处工程师。第四个是徐乃俊,现在泰国一个饭店当经理。第五个是方春霖,现在上海电梯厂任总工程师。这些人工作都很认真负责,

对规章制度坚持执行。饭店为了做好设备维修工作，在即将开业前，就在供应设备和承办安装工程的外国公司或洋行中，选择了美资约克冷气公司、德资道柏克电器公司、美资沃的斯电梯公司、美资电话公司里的几个技工，留在饭店工程部工作，以资熟手。

侍应工作搞得好，最突出的一点是饭店自开业以来，就办了侍应生训练组，一共办了十期，培训了饭店基层服务员。招收的都是初中毕业生，开班上课，让他们学习如何做好侍应工作、客人未来之前的准备工作、客人来时的招待工作、就餐时的服务工作以及离开后的整理工作等等，要求讲究礼节，不断提高技术。工程师还在班上传授如何正确使用各种设备等。经过培训，饭店不断地增加了服务的中坚力量。

饭店各层次均有矛盾。比较显著的有饭店与银行的矛盾，饭店生意好时，款子存进银行，只收到一点利息，而银行却能避免货币贬值，把饭店的存款进行囤积物资赚钱，特别是抗战胜利后，饭店收入是美金，存进银行，它却折算成法币入帐，把外汇头寸全部拿去，好处很大，因此纠缠不清。另一矛盾表现在饭店内部高级管理人员的纷争上。饭店开业时，在结构上有工程、财务、客务、餐务几部，常务董事直接管财务、工程两部，而经理只管客务、餐务部（当然也要听常董的）。正因如此，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经常闹别扭。还有经理与服务员也发生磨擦，主要是为了小账的分润。

国际饭店定名是经过一番议论的。开始时，英文名称定为 International Hotel。当时西经理希勃勒认为这个名称不够响

亮,建议要搞一个易听易叫的名称。原来办国际饭店的打算,除上海外还要在外地办些国际饭店,听了希特勒的意见后,就在译成英文的国际饭店股份有限公司的名称下,加上一个 Park Hotel 的名称,以示在上海的国际饭店股份有限公司所办的是 Park Hotel,将来在别处办,可在国际饭店股份有限公司下面再加一个别的名称,既保持了国际饭店的名称,又有所区别。中文招牌的名称仍是国际饭店。Park 一词是采用饭店右首黄河路的原名 Park Road (派克路)中的第一个词。回忆一九五三年夏,英首相艾德礼来我国时,陈毅市长在饭店三楼进行接待,并在二楼宴请艾氏和他的随员。当时有外国新闻记者打电报到国外报道这一盛会,特别地提到是在 International Hotel 举行的,还说冷气开放,以示建国后的上海经济迅速恢复。

建国前我们中国人能创办在远东首屈一指的大饭店,并不简单。可是国际饭店也给军阀、官僚、大资本家、买办、汉奸、国际间谍和帝国主义分子等提供了寻欢作乐、为非作歹的场所。当时有个四川军阀是鸦片贩子,抗日战争前,用武装贩运烟土到上海出售,包用过国际饭店十五楼,一住就是一年半载。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侵略者占领上海,这里又成为日本特务和德、日法西斯第五纵队的巢穴,他们包下十六楼,用一个洋行的名义作为掩护,在这里进行国际间谍活动。抗战胜利后,一九四八年初,孙科等人为争夺“副总统”的宝座搞竞选,十四楼变成了一大群政客相互竞争的所在。只有在新中国成立后,饭店才回到了人民的手中,真正发挥了为人民服务的作用。



## 旧上海的四个废品大王

朱 梦 华

建国前，上海有些资本家被人称为“大王”，例如：面粉大王荣宗敬，纸头大王詹沛霖，证券大王杨寿生，金子大王陈霖生，地皮大王周湘云，等等。此外也有自称“大王”以资号召的，例如，腌肝大王稻香村，栗子大王新长发，排骨大王小常州，头奖大王老汇利源、大福来，西瓜子大王西园，等等。这些大王在当年确曾名重一时，到今日还有不少人晓得他们，兹不赘述。这里我要写的是旧上海的四个废品大王。

### 破布头大王夏同德

夏同德是夏同德行老板，字继阳，宁波人，住南市薛家浜。原是一个收破布的穷汉，常年挑一副担子到大街小巷收破布，后来开小铺子，做起老板来了。手下也有十多个人替他出外收货，每日回店过秤付钱。替他收破布的人日益增加，营业日益扩展，遂由小铺子发展为行号，并在各处分设收购处或约定若干联购处，于是上海整个破布业，基本上在夏同德掌握之中，“大王”尊号非他莫属。由于收破布是极其零星的生意，一笔生意最多不过百数十文，最小的只有一两个铜板，只可买糖哄哄小孩，他便自设一爿糖坊，做好大盘饴糖。收货人员每日清晨出担收货，领饴糖

一盘，以糖换布，人称“换糖担”，深得小孩欢迎。数量多的，用钱收购。晚上回到号中，称货结算，所收破布还要拣选、分类、加工；成块的裱硬衬，成条的扎拖把，大量的零星碎布和老棉絮则卖给纸厂做纸浆原料。最没用途的是绸缎片块、纽头、鞋底，这些东西在当时毫无用处，一钱不值，如果不拣出来，送到纸厂去，要轧坏机刀，造成大损失。

那时，上海有三家大纸厂：一是曹家渡的江南造纸厂，专做毛边纸和连史纸，不用棉絮做原料，所以不需要破布。一是日晖港的伦章纸厂，最初专做洋连史，一九三二年“一·二八”后改制道林，原料来源是纱厂地脚花和大量破布，因此夏同德行便成了该厂的特约收货处。一是浦东的天章纸厂，专做灰报纸和次道林，适合北销之用，所进原料不求高档，因此夏同德先将破布拣出较好的送伦章，余货送天章，两厂各取所需，而夏同德的货色也就完全出清了。上海收破布的当然不止夏同德一家，但论到收货魄力之大，存货数量之多，除夏同德及其联号夏复泰之外，其余都是零星户头，或者收到货色还是卖给夏同德。夏同德很有一套生意经，为他人所不能及。如伦章、天章虽是有相当规模的厂家，但是经济却时常支绌，往往拖欠夏同德的货款。有一年，天章欠款达十余万元之多，大除夕夏同德自己到厂收账，天章连职工的薪工也发不出来，账房间聚集了不少人在吵闹叫嚷，会计员急得一筹莫展。夏见到情况，非但对欠款一声不问，反而垫出五千元替该厂解围。平日凡是替他收货的，若借贷款，并不需要担保，只要有人介绍，便可给糖盘、借本钱，收货后结账；到年节或遇有疾病，向他借钱，也没有不应允的；欠款一时还不出，他也不

追索,借钱的人除非真是还不出,否则一定清还。以上这些,就是夏同德营业鼎盛的原因。

### 纸边大王方德宣

方德宣,徽州人,人家顺口叫他小方。也同夏同德一样,原是挑担子收些旧货,维持个人苦生活。他为人机智,看到收旧货无大赚头,有另起炉灶之念。当时,徽州帮在上海纸业中很占一部分势力,小方也熟识几个,他见纸号中往往积压许多包皮和破旧零纸,没处存放。印刷所和报馆、书局的刀口、裁余、汇司(即零头)等废品,也日积月累,结果只有花钱雇人出清。小方便动了“人弃我取”的脑筋,浼托熟人代向各纸铺、印刷所、报馆和书局,介绍他长期出清积存地脚。他招集同乡帮同到各处收废纸,集中处理。这项处理工作也很繁重,因为废纸数量非常大,品种又极复杂,所以第一要有巨大容积的堆栈,第二要有细致工作的人手。又因这些废纸来自各处,内中有洋纸、中纸,也有颜色纸;有些还可以成料,有些碎杂只配回浆,需分门别类拣出。第二步是把较阔的汇司、刀口订成大小拍纸簿,洋纸可做信封、切名片,粗细条子可利用来垫饼干听、玻璃器、帽匣,其余零杂废纸则一古脑儿车送造纸厂,重做纸浆,于是废料乃各尽其用。用今天的眼光看来,这些似乎人尽能之,不足为奇,但是在小方的时代,还没有人对这项废料充分利用。就是拍纸簿也直到董和甫办中国切纸公司方才大量推广。由是可知小方心思灵敏,善于找窍门。小方是江南造纸厂特约收货人,他收来的纸边,除一部分拣出利用外,大部分都送江南造纸厂,每年数量相当可观。不上十年,已

俨然成了大老板，全埠纸边由他一手掌握，“纸边大王”之号也就当之无愧。某年，南市九亩地发生火灾，小方的栈房店铺付之一炬，多年积储几乎荡尽，屡欲自杀。但他随后还是收拾余烬，重振旧业，然已力竭气衰，营业不复如前顺手，当年盛况一去不复返了。

### 再生胶大王谢禾泉

再生胶是把旧橡胶废料重行回炉，熬成新胶，再制成应用品，故有“再生”之名。大王谢禾泉原是永和实业公司的工人，自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一直做到一九三二年（民国二十一年）“一·二八”淞沪战役，方才离开公司。永和实业公司最初学天虚我生的方法配制袋头牙粉发售，称嫦娥牌牙粉，后来改做橡胶制品。谢在公司中学到这套本领，心思灵敏，会翻花样。脱离公司后，替几间橡胶厂跑街，积累了一些本钱。一九三七年（民国二十六年）“八·一三”战争爆发后，上海同海外的交通运输发生阻碍，既而沦为孤岛，尤其是被日军指为军用品的橡胶，完全禁止进口。上海数十家橡胶厂，都有原料断档之虞。一九三九年（民国二十八年）后，这些厂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不是停闭，便是减工，剩下几家实力比较充足的，也是前途暗淡，一筹莫展。谢见此情形，私念各厂历年堆积胶鞋剪口和热水袋切缘诸废品，家家弃置，数量可观，大可回炉利用，倘若试制成功，则既可救急，又可发财。他即自设熔炉，收些橡胶废料和着桐油脚、硫磺一起煎熬，一试便即成功，因此名曰“再生胶”。斯时，沪上各橡胶厂正苦胶料不继，得此廉价的再生胶，莫不乐于接受，一时争相定货，大

有应接不暇之势。于是集资自设胶厂于康脑脱路(今康定路)延平路,号曰“申禾”。除技术人员及工人外,又招收货员数十名,挑着担子向各处收买橡胶废料,其对象以各胶厂剪口、缘条为主,此外则旧破套鞋、旧胶底、破热水袋、皮球、皮带管、破轮胎,都以极廉价钱收进。本埠不足,又到外码头设庄收购,汇集解厂。该厂工作主要在熔煮再生胶,供给各厂镶配之用,也自制一些鞋底、鞋跟等件发售,然并不注重,不需要许多技术人员,仅用两个老师傅已足应付,故厂中开销极省。谢自开申禾厂后,一帆风顺,名利双收,不到四五年,已拥有“再生胶大王”称号,积资巨万,商场中起家的快速,无有能及之者。

谢开办申禾厂的时候,自己并没有多少资本,而其时各厂定货踊跃,设厂需款,购机需款,收货需款,以信用未孚,招股无人过问,行庄不肯贷款,如何能应付呢?其唯一途径,只有向人家拆头寸。可是当时市面上金融紧张,向朋辈相识调拆,往往失望而归,倒是他平日在北里和跳舞场中认识的几个妓女、舞女,手头有积蓄,听了他天花乱坠的诱劝,都愿解私囊听其调用。转辗相介,有不少红倌人、名舞女,都和谢有了借贷关系,他的“花界拆头寸”,在北里中大出其名。他利用源源不绝的头寸,营业发展更快,同行中多说他手法巧妙。但是他因常在花柳场中行走,生活日趋糜烂,大小老婆多至十房,住家以外还有几处“小房子”,不但日用开支庞大无边,而且各房争吵,家庭不安,以致无心经营厂务,营业渐形不振。建国以后,厂务更加紊乱,各房互相控诉,更是狼狈不堪。

## 粪大王阿桂姐

粪大王阿桂姐，在建国前，是旧上海大名鼎鼎的人物。她掌握着整个上海市民的清洁卫生命脉，只要三数天不出粪车，市内便要粪秽山积、臭气冲天。阿桂姐管理法租界粪车数十年之久，除了一部分人家备有抽水马桶外，其余家家户户要同粪车打交道，所以“粪大王”之名，传遍各里弄。此人姓马，素善交际，很有魄力。她年轻时住在公共租界，同巡捕头、包探都有来往，仗了他们的恶势力，曾开过茶楼、澡堂等，挣了不少钱。这些生意，原都是帮会里人经营，不是普通人可以对付的，阿桂姐就用“白相人嫂嫂”的手法，来应付那班所谓“日里吃太阳，夜里吃月亮”的脚色，倒也平安无事，未出事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她又认识了法租界某总巡，有他撑腰，包下整个法租界的出粪工作，自设马鸿记粪行，地点在外滩新开河粪码头，粪车数百辆都归她一手调度。以前住在上海市内的人，应还记得粪夫清早出粪，每月都要索取月规钱，千门万户，为数可观。粪夫所得月规钱，例须同马鸿记分拆，阿桂姐从中剥削，坐地分赃，每月进益非个中人不知其详。这项收入还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是没本钱收下来的粪便，每日午前汇集粪行，由农民买去肥田，也有压榨成干饼外销的。由于千门万户聚来，再散向四乡八镇去，每日粪市热闹非常，收进时是秽物，运出去便是银钱，正如前人说的“末等生意，头等利息”。阿桂姐这种好买卖，一连干了二十余年，家私积成巨万，此时已住必洋房，出必汽车，纪纲侍应成群，对人颐指气使，俨然一有身份的“老太太”了。某年，阿桂姐得疾而亡，在桂福里本宅设奠开

吊，上海一班大人先生纷纷送礼临吊，门前高扎牌楼，车水马龙，颇极一时之盛，挽联莫幛，多至宅内不能尽容，一直从里弄底悬挂到街上，市人对之有歆羨者，亦有窃笑者。总之，“大王”虽死，雄风犹在。既而，诸子分产不均，引起争讼，后事如何，不得而知。

# 邮政储金汇业局始末

王安素

我在一九三一年进邮政储金汇业局工作，一九四八年退休。该局于一九三〇年成立，至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后，所有储金部分以及所营银行业务，统由中国人民银行接收；邮政汇兑部分，则仍由邮局办理。现就我所知道的一些材料，分述如下。

## （一）创始和定名

一九二八年，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长王伯群召开交通会议，该部邮政司司长刘书蕃鉴于世界上有些国家办理邮政储金非常发达，建议同样创办。经该会议通过后，即由交通部派刘书蕃前往国外考察。回国后即将考察所得书面报告，并拟定创办计划，呈交交通部转报行政院准予成立，定名为邮政储金汇业总局，由交通部直接管辖，与邮政总局并肩而立。局址设在上海福州路，继迁至福州路江西路建设大厦。抗战胜利后，分配到接收之日本三菱银行（九江路三十六号）为自有之局址。

该局因须与外国邮政往来，需有一英文名称。但英文名称，系用“邮政银行”名义，而不用邮政储金汇业总局字样。当时何以有此中、英文名称不同之决定，不得而知。

一九三五年，邮政工会认为邮政储金汇业总局不能与邮政



总局并立，应与各区之邮政管理局同样隶属于邮政总局。当时几经讨论，嗣呈部核定，把“邮政储金汇业总局”的“总”字取消，改为“邮政储金汇业局”，由“部直辖”改为隶属于邮政总局。该局局长由邮政总局副局长兼任。但行文方式对于各区邮政管理局则仍沿用训令和指令。

## （二）分支机构

邮政储金汇业局在成立之初，只有总局一处，设在上海，而对外营业则称为沪局，负责人并无经理名义，系由总局营业处直接领导。同时全国凡办有储汇业务之邮政局，一律加挂“邮政储金汇业分局”的牌子。但只办储金、汇兑业务，而不兼营银行事业。所有办事人员，俱由邮政局原有人员担任，并不另派专人，对邮政局之开支，也不负担任何义务。因该局在成立之前，即与邮政总局协商确定，凡邮政储金汇业局每年所获之盈余，全部拨归邮政总局作为邮政收入。

一九三一年春间，在南京和汉口两处设立分局，其营业范围与上海之邮政储金汇业局同样办理。其名称则为“邮政储金汇业局某地分局”，以示与邮政局办理储汇业务之分局不同。其组织内容亦与上海相同。嗣后又在昆山、无锡、湖州等处设立办事处，除办储、汇业务外，只作农村放款，不办其他银行业务。昆山办事处并自建仓库，存储抵押借款之农产品，规模较大，成绩亦较好。抗日战争爆发后，所有南京、汉口分局以及上述各办事处先后撤退至后方。抗战时期，该局迁至重庆后，设立重庆分局，办事人员多数系南京分局撤退之人员。嗣后又在昆明、贵阳、桂

林、衡阳、西安等处设立分局。抗战胜利后，凡大都市如北京、天津、济南、青岛、杭州等处都先后设立分局，规模较前愈大，业务亦随之繁荣。

### (三) 领导人选和变迁

该局领导人，最初是用总办、会办等名义。总办（后改局长）一职，由交通部派该部邮政司司长兼邮政总局总办之刘书蕃兼任。会办（后改副局长）：一为沈叔玉，曾任中华懋业银行副理，专管银行业务；一为麦克伦，英国人，为邮政界之老邮务长，专管会计事务。在总会办之下设有总务、营业、会计、储金、汇兑、保险等六处，其职掌和组织具载该局之组织法，不再冗叙。此外又设立联合会计处，专管该局与邮政局往来之会计关系。

一九三二年春，交通部长王伯群去职，刘书蕃随之下台。继任交通部长陈铭枢派杨剑平为邮政储金汇业总局局长，副局长沈叔玉亦被免职，遗缺派该局营业处处长任嗣达升任，还有一个副局长麦克伦是外国人，没有更换。不久，朱家骅继陈铭枢任交通部长，派唐宝书为邮汇局局长。副局长任嗣达因与杨剑平贪污案有关，被免职扣押讯办，遗缺内定派程士范继任，嗣又改派徐柏园为副局长（在唐宝书为局长期间，还有一位副局长，任职时间很短，姓名记不清了）。

一九三五年唐宝书去职，改派沈叔玉为局长，副局长徐柏园调任天津交通银行经理，遗缺由中央银行业务局副局长周守良兼任，嗣又改派徐继庄（曾任中国农民银行总经理）为副局长。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发生，是时交通部长为张嘉璈，调沈叔玉为广

九铁路局局长，改派刘攻芸为邮汇局局长。在此期间，刘攻芸带同副局长徐继庄及部分工作人员迁至香港办公，嗣又搬到重庆，而留一部分人在香港工作。旋刘攻芸调任四联总处秘书长，遗缺由徐继庄升任。

该局在由上海搬去香港时，留在上海的业务和部分工作人员由副局长麦克伦负责，因为他是英国人，可以同当时的租界当局取得联系，得到便利。至于在上海的对外业务，则以营业处名义进行，派会计处长林绍棠代理处长职务。在重庆时，又添派何纵炎（何应钦之弟）为副局长，他本是该局南京分局经理。抗日战争胜利后，该局全部由重庆搬到南京，从此即设在南京，但局长、副局长均在上海办事，大约是因便于同中央银行联络的关系。一九四七年，该局局长徐继庄因贪污案被撤职查办，所遗局长一职由谷春藩继任，直至解放后该局结束为止。

#### （四）资本和流动资金

该局成立时并无固定资本，仅对外说明系以邮政信用为担保。流动资金则令全国各区邮政管理局将所有各邮政局之存款，悉数交存邮政储金汇业局，各邮政局存放当地银行之存款，亦全部改用邮政储金汇业局名义存放，以备调用。同时交通部所属各机关之存款亦悉数交存邮政储金汇业局。因此该局流动资金之运用，颇形活跃。交通部如需扩充交通事业，费用亦可不必向银行筹措，可径与该局订立借款契约，随时拨用，邮政储金汇业局无异是交通部的金库。

抗战时期，法币贬值，邮政收入锐减。当时邮政储金汇业局

已在重庆加入四联总处(当时所谓四行两局),彼此可以用轧账方式调剂资金,因此邮政方面需要款项,可商得邮政储金汇业局同意,开给中央银行之支票,由中央银行划账。当时该局欠付中央银行之款,为数甚巨。

### (五) 业务概况

该局除办理邮政储金和邮政汇兑之外,其主要业务与一般银行大致相同。所吸收之储金,大部投资于有利事业,当时认为稳妥可靠者,莫过于投资于上海之房地产。故该局先后买进之房地产不在少数,以当时买进之价值计算,大约在五、六百万元之谱。计有:1.南京西路长沙路口(今华侨饭店隔壁)之房地产;2.淮海中路兴业里之房地产;3.襄阳北路颐德坊之房地产;4.巨鹿路采寿里之房地产。此外还有邮政局保险项下买进之陕西北路西摩别墅房地产一处,华山路大洋房一所,占地九亩有余(此屋在谷春藩为局长时卖去)。此外还有由邮政局转来之房地产数处。总之,该局房地产之投资确实不在少数,以之作为对邮政储金之担保。但是房地产系不动产,不能以之应付急需,于是同时投资于中外债券和市上认为确实可靠的中外公司股票,随时押款应付急需。

该局对于吸收华侨汇款,曾极力设法发展。当时南洋一带华侨甚多,每月汇回家用,数量十分可观,但几乎全部是由民信局汇划,而在南洋之华侨以福建、广东人为多,故民信局在福建、广东亦较多。如要吸收华侨汇款,首先必须禁止民信局之存在,但民信局有悠久之历史,华侨对之信用极好,一时禁止不易。于

是一方面由政府禁止民信局之存在，同时宣传邮政汇款之历史和信用，使华侨认识到它比民信局更为可靠。数年以后颇收成效。抗战胜利后，该局兑付华侨之汇款为数亦颇可观。因此该局之外币存款颇为当时之中央银行所注意，一再要求将所存外币存款划还邮政局旧欠，该局始终推宕，未予允许。

## 上海橡皮风潮

陈 诒 先

一九〇八年(清光绪三十四年)秋天,一些外商声称在澳大利亚种有大量橡胶树,为开设橡皮公司大量招股,并不断抬高股票价格。一些外资银行如麦加利银行、汇丰银行、花旗银行等,同这些外商勾结,承做该项股票押款,因此,中国商人和市民纷纷争购。到一九一〇年(清宣统二年)七月,幕后操纵者趁股票价格抬高之际,暗中将股票卖出,潜逃国外。这时外国银行宣布停止受押,并追索以前所做的押款,于是股价顿时猛跌,股票有卖无买,成为废纸,不少钱庄受累倒闭,商人和市民受害者更多。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橡皮风潮。

有一年,大闹公堂案(黎黄氏案)的主角——我的同乡、同学关纲之对我谈起这次橡皮股票风潮,言彼做会审官多年,所有积蓄尽丧于此。以下是关纲之的话。

“在一九一〇年上海市面出现一种橡皮股票,没有多时,有钱人竞相购买,一些公馆太太小姐换首饰、卖钻戒,转买股票,如痴如狂,有了钱,还要四面八方托人,始能买到股票。我因做会审官多年,认得洋人,费了许多力买到若干股,买进时每股为三十两银子左右。上海县知事托我买,我也代他买到一些股。我买进之后,股票天天涨,最高涨到每股九十几两。有许多外国人知

道我有股票，手里拿着支票簿，只要我肯卖，马上签字。有一天星期五，股票开始下跌，但为数极小，第二天星期六，只有上午行市，比昨天又小，我心中有点动摇。当时有一老洋人，系研究外国股票的权威，我去问他橡皮股票下跌的意见。他说：‘股票下跌，正是大涨的先声，据我看，这种股票最高可以涨到两百两一股，你如愿意卖出，就卖给我好了。’我听了他的话，决计不卖。第三天星期日无行市，不料自下星期一起股票价天天下跌，由每股九十几两，跌到八十几两，由八十几两跌到七十、到六十、五十、四十，一线下跌，只跌不涨。我若在四五十两一股时卖出，仍可赚进，但贪心不足，九十几两不卖，跌到四十、五十再卖，总不甘心。到了后来，我每股只卖得二两银子。这是一个大骗局，不但有钱的中国人倾家荡产，就是洋人中也有吃大亏的。当七月间风潮正大时，有正元、兆康、谦馀三家钱庄先倒，跟着倒的钱庄不计其数，连票号也起了波动，仅正元三家钱庄，就亏倒六百余万两。当时的上海道蔡乃煌乘专车到南京见制台张人骏，结果决定由上海道会同商会出面借洋款三百余万元，先将所欠各外国银行拆票约两百万元还清，后来又在庚子赔款存款项内挪借两百余万元，周转市面，风潮始渐平息。总计这次风潮，我的朋友中未吃倒账的只有上海县一人，他在八十几两一股的时候，将所购股票卖去一半，另一半看市面到底。他说卖去的一半已有赚头，要是另一半再涨，那就大赚特赚，就算一文不值，也不吃亏，这真是老州县的办法。”

从关绅之叙述的做橡皮股票的经过，可以看出橡皮风潮完全是帝国主义包庇下外国投机商在中国制造的大骗局。

## 旧上海的土地凭证和税收机构

余 芷 江

旧上海的土地凭证名目繁多，主要有以下数种：

一、田单。俗称方单，一八五五年（清咸丰五年）制发，人民所有土地均凭此管业，如有买卖、继承等情，亦凭单转移。如须划分，则将此单分割，由所有人各持一部分，因此此种田单往往分成数片，甚至只有一角者，即将原单所割去的文字，另行抄录，拼粘成单。倘有争执，则取齐配合，以资判断。

二、印谕。凡田单遗失，或遇人力不可抗拒的灾害而遭毁灭，经所有人申报上海县署，查明实情，给予印谕，代作田单凭证，谓之“代单”。所载内容述明失单原因，以及土地坐落、地址和数量，盖用县印，日后原单发现，即作废纸。但年代久远，地痞有勾结图保乘所有人他乡作客，或死亡后遗族孤零，向县署瞒报失单，冒领印谕，并转换道契，谋占土地，酿成日后讼争。至国民党时期上海市政府土地局成立后，市辖区域停止发给印谕，后又开始发给作为溢地代单之用。

三、部照。土地不属人民私有的，如营地、宫宇、官署、寺庙、庵观、书院等，统为官产，设官产局管理，受省署总局节制。如人民需要，得申请价买，由局发给财政部印制的执照，凭照管业（照上加盖厅县印）。又沿黄浦江两岸淤沙成滩，谓之沙田，设沙田



局管理,受省署管辖。人民得依据垦荒条例缴税领地,由局发给财政部执照。

官产和沙田有区别,管理范围各有定章,但上海两局始合后分,继又合一,且一度与宝山县合并,政令迭更,以致发生同一土地,两局各自发给部照,所有人各持部照为凭,虽至司法机关亦不易得到合理裁判。一九二七年后,两局一并裁撤,改归市政府土地局管理。

上海县城墙在一九一二年后拆除,原有城基和城壕(护城河),填平筑路(环形,今中华路和人民路),一部分拨给教育以及公共事业机构应用,余地任凭人民购买,由官产局发给财政部执照,临时设置官产丈放局承办,事竣裁撤。

四、道契。英美法等国在上海开辟租界后,不断谋占土地权益,但依据约章,不能取得所有权,只可用租赁名义,定名永租。其手续是由申请人先向各国洋行或外籍律师事务所设立的挂号处挂号,报明所需土地,经该处转报各本国驻沪领事馆注册,由领事馆照会苏松太兵备道署发给道契。一九一二年后,归驻沪通商交涉公署接办(辛亥革命后南北未统一期间,由上海总商会承办)。至一九一四年沪海道尹公署成立,则由交涉公署和道尹公署合办,契由交涉公署填注,送道署加盖道印。一九二七年道署裁撤,由当时的市政府土地局办理。此后又收回道契,改发永租契。

凡土地成立道契后,原有各凭证和任何契约均作废。以道契向银钱业抵借款项,较田单等抵押为易,并可作各种保证,因此申请换契者日增,开始限于租界以内地区,后渐扩展至界外,特

别是越界筑路地段。一些地痞流氓往往假借外商名义换领道契图利，一时物议沸腾，当局者不得不加以限制，于是对租界外地区，以图保为别，凡未发道契各图保，不得申报转换；已发区域再有申报，即变更名称为“华商道契”，实际与已发之道契并无区别。

道契虽称永租，但可转让权益，由挂号处出给权柄单交持有人以作凭证，实际上等于所有权的转让。

一八五三年小刀会起义，法帝国主义水师助清军作战，事后索酬，清廷即将县城东北门附近地区赠予开辟租界，租界当局有权出卖土地，发给道契，定名“公馆道契”。此后法租界日渐扩展，发给之契和英美帝国主义注册契相同。此项公馆契市上罕见流通，惟在敌伪时期，伪地政局设敌产登记处后曾有发现。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地政局换发土地所有权状时，亦查见法帝公董局出卖土地，竟称法产，帝国主义侵略野心可以概见。

五、营照。清季防军有营基地，如防营变迁，得将营地出租于人民使用或卖给人民，发给营照为证。设立官产局后，并入官产范围，改给部照。

六、芦照。上海县属黄浦江两岸以及吴淞江、龙华湾等处，在清季有芦苇低地，人民可缴价使用，发给执照，由县署征收年税，谓之芦课。

七、土地执业证。国民党时期上海特别市政府所属土地局成立后，本市各种土地凭证一律换发土地执业证。

八、土地所有权状。土地局改称地政局后，又将土地执业证换发土地所有权状。其理由为依据当时法律，执业证有追索权，

原有人得向持有人追索产权，改为所有权状，则永远确定持有人管业之所有权。

清季及民国初年，征收土地赋税及有关机构，迭有变迁。先后有以下各机构的设置：

一、升科局。清季对于无单无粮土地，可由使用人向升科局缴款，取得所有权，称曰升科。至官产和会丈等局设置后，分别接办升科局事务，升科局裁撤。

二、钱粮柜。设于县署内，专事征收土地赋税，一年分两次，称上芒、下芒，另有漕粮，年纳一次，收据统称粮串。初时概缴实物，约土地十六亩缴米一石，惟有上则、中则、下则田区别。后以实物不便，改按米值折合制钱、银币等计算。各乡设有分柜，收集事宜归各图保轮值经办，县署设有催征吏加以督促。此外，该柜尚兼收屯租、芦课、津运、营粮等项，城厢一带非农田土地，亦按芒漕定则征收。此项粮串，如遇田单遗失或毁灭等情，亦得作为所有权凭证或报领印谕证件。

三、宅地税局。上海各区房屋基地及非农田的空地，谓之宅地。一九二六年间，有邑绅呈准省署，筹设宅地税局，从事征税。地方人民认为一地两征，增加负担，群起反对，未经开办即行撤销。

四、官契处。土地买卖以及分割、转移，均须购立官契方可成交。契纸由省财政厅印制，县署设官契处，领发各乡各自承办。

五、年租局。道契地租按年缴纳，由各国领事馆收集，汇交苏松太兵备道署。辛亥革命后，由上海县署接管。开始以银两

折合银币，继以铜币计算，均有溢额。例如收入银元一元五角折合铜币为一千五百枚，按照市值可兑四千五百枚左右，为过去道署和县局额外收益。租界内尚有免租之地，传闻各国领事馆在清季有另行酬报之说。

六、会丈局。土地凭证转换道契，应由注册各国领事馆派员会同会丈局将亩分数额测丈明确，使单地符合，始可立契。一九一一年前，由苏松太兵备道署管理，以后由交涉公署接管，继又加沪海道尹公署会办。凡转换道契，先经挂号洋商报领事馆转交涉署，发交会丈局核丈后，绘图复报交涉署，制契后送道尹署核盖道印，送回领事馆发交挂号洋商，由申请人具领。初时一经会丈，即可确定，各无异议，后以租界工部局均备有租界和越界道契底册，因此日渐干预其事，会丈图稿须经工部局核对，不得任意增删变更，与工部局所丈符合，始能制契。

# 上海租界的房地产买卖制度

叶 叔 眉

## 一、道契和挂号洋商

道契原来是中国官厅所制定的一种特殊契纸，专供外国人到中国经商者在上海租界内租地建屋之用，于便利中寓限制之意。第一，只有驻上海的江南兵备道（海关道）有发给此契之权，所以称为道契。第二，外国人不能在中国买置地产，所以契内不称买卖，而称永租，承租人还须预付年租，抵充国赋。第三，中国人欲在界内租地造房，须经领事馆与中国官宪之准许。

道契本来只适用于外国人在租界内向中国人租用土地，后来由于国势积弱，政府媚外，官吏颀预，酿成国内一班富室巨商不相信中国政府，宁愿托庇于外人，因而购买房地产也要假手外人请颁仅有永租权的道契。这有几种原因：（一）道契经会丈局勘丈绘图，四至明确，不似田单之四至不清，分割时易生纠葛，甚至涉讼多年。（二）道契交割手续简单，无保甲及中证人等从中渔利及含混舞弊情事。（三）道契由洋商出面，一切抵押借款，以及造屋经租等事，都可委托洋商办理，有许多方便之处。由于这些原因，所以经营房地产的商人都欢迎道契。

道契在租界内有特殊信用，而道契的取得必须由洋商出面，

于是洋商中有一种特殊事业应时而生，通称曰“挂号洋商”，极盛时多至数十家。据笔者所知举其著名者：英商有业广地产公司、新沙逊洋行、哈同洋行、德和洋行、通和洋行、公平洋行、新瑞和洋行、泰利洋行、恒业洋行、轮免洋行、公和洋行、马海洋行、德利洋行、玛礼逊洋行、祥茂洋行、昌业洋行、爱而德洋行、高易律师事务所、哈华托律师事务所；美商有中国营业公司、普益地产公司；法商有中法银公司、建业公司、达理会计师事务所、逊百克律师事务所、巴和律师事务所；比商有义品洋行、罗义士洋行；还有意商开宜公司等。其中规模大者，除自营房地产外，兼做房地产押款，更有兼营经租和打样业务的。

凡中国人在租界内购置房地产，必须委托挂号洋商出面，请求发给道契，由洋商签发权柄单（即代管产业的凭证）连同道契交与委托人，手续即告完毕。此后业主如欲将产业出让人，须买卖双方同至挂号洋商处，卖方将原权柄单交出批销，由挂号洋商另立新权柄单，连同道契交与买方，称为小过户。如买方不信任原挂号洋商，而要求另行委托其他挂号洋商时，则必须用大过户的手续，由有关两洋商向该管领署申请过户注册，由领署将道契送请上海道加批过户后，送回该管领署，转交新承办的挂号洋商，然后由该洋商出立权柄单连同道契交与买主，方算完成大过户手续。

## 二、挂号洋商的盘剥和房地产投机

按照惯例，挂号洋商向道契持有人每年收费银十两，小过户收费银二十五两，大过户加收银五十两。但大宗房地产的委托挂

号,或委托人同洋商另有押款或经租等关系者,则对挂号洋商的酬金往往超过惯例。至于洋商代办经租及打样的费用,更无一定规例,随实际情况而定。

以上各项费用,是挂号洋商向中国房地产主所收取的报酬,积少成多,为数已甚可观。但帝国主义侵略者利用道契制度,以巧取豪夺的手段,向中国人掠得的利益,有倍蓰于此者。举一例如下:由于道契在金融界有优越的信用,又由于外资银行乐于承做以道契为抵押的放款,于是一般企业多用道契向银行抵借款项,作流动资金之用。更有一般专做房地产投机的商人,俗称地皮鬼者,工于计算,看到某处房地产有利可图,即与挂号洋商接洽,先以该房地产的道契作抵,借得款项,然后买进此房地产,再行转让,如此一转手间,即以少量资金博得大宗利润。也有用此方法买进空地,委托洋商打样,建造高楼大厦以博更大之利益者。固然有人因此发财致富,但亦有因投机失利而不能依照押款合同还本付息者。尤其是在抗战时期上海沦陷后,多数房地产主避居他处,对于押款到期还本付息等事,无暇顾及,其在上海者亦多销声匿迹,顾命不遑,于是挂号洋商即以押主不能履行为理由,没收押品,大宗房地产就这样转入外国人手中。

抗日战争时期,租界房地产盛行分宅出售办法。盖因抗战开始后,日军攻陷淞沪,租界形势岌岌可危,中国房地产主多思脱售房地产,迁居内地或香港,而苦无受主;另一方面,东南滨海各省沦陷区的大中地主及有活动能力的殷商富室,争先恐后,挈眷避难上海,谋在租界觅屋定居,虽出挖费数千元乃至万余元,

亦所不计。于是房屋顶费愈抬愈高，漫漫乎接近买价。这时有房地产投机商人勾结挂号洋商，将整个里弄的房屋分宅出售，以图厚利。但整个里弄的房地产，其道契只有一张，不能分割，这时挂号洋商想出一种变通办法，要求旅居外埠的房地产主，把道契并全权处理房地产的委托书寄与挂号洋商，实行分宅出售；对于分宅的购买人则由挂号洋商分别出给权柄单，以证实其产权。这办法推行顺利，群起仿效，以致大量房地产买卖集中于某些挂号洋商，他们所得的挂号费既数十百倍于从前，而经手介绍及办事人员的报酬为数也极可观。分宅购买人忍痛出重资购进房产，原为得屋居住，取得产权凭证后，即通知房客迁让出屋，因此引起许多纠纷，甚至涉讼。此外，这些分宅业主中有贪小利者，利用余屋隙地，分租与人，收取挖费，以弥补其置产之损失，于是棚户与阁楼住户开始兴盛。自抗日战争至全国解放十数年间，是租界统治势力消长的变化时期，也是房地产买卖制度紊乱时期。

### 三、帝国主义利用道契进行政治侵略

以上所说我国人买卖租界房地产，因沿用洋商道契制度，所遭受之损失犹属于经济范围，其属于政治范围者，则损失更为重大。

公共租界内的行政机关为工部局，工部局的最高权力属于董事会。董事会由外人纳税会产生，依公共租界章程，凡外人有地产估价在银五百两以上，或每年缴巡捕捐或地税在银十两以上者，才有做会员的资格；界内居户中每年纳税在银五十两以



上，或自己没有地产而年付房租在银一千二百两以上者，才有当选为董事的资格。中国人向无权利参与租界行政，一九二〇年成立华人纳税会，至一九二八年始有华董三人，一九三〇年华董增为五人。这固然由于国势积弱，遭受不平等条约压迫，而道契制度之丧权辱国，也是一大原因。因道契须由挂号洋商出面，挂号洋商英文称为Registered Owner，直译为注册业主，而实际业主则称为Beneficial Owner，直译为受惠业主，因此中国人虽然尽了纳税义务，却要让外国人来享受纳税人的权利，这全是半殖民地的表现。

#### 四、华商道契的由来

一八九〇年，上海人士鉴于洋商道契的发展，为挽回国家主权，向上海道建议，详请南洋大臣核准，创办华商道契，凡华商购地，经会丈局勘丈绘图后，呈由上海道核发道契，同洋商道契一律待遇。一九〇七年，将华商道契事务划归商务总会（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后改称总商会）办理，设华商道契处专司其事。但在帝国主义经济垄断下，华商道契远不及洋商道契吃香，因之请领者并不踊跃，甚至有逐利商人于取得华商道契后再请转换洋商道契者。迨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我国参战，同德、奥绝交，将德、奥地产全部没收，所有本国商人用德、奥商人名义向德、奥领事馆所领道契，全换华商道契，因而华商道契渐为国人所重视。一九二七年上海市政府土地局成立，将洋商道契改称为永租契，对华商道契则予废止，改发土地执业证。一九三〇年又由土地局布告，禁止本国人委托洋商出面领取永租契，但原有挂号洋商

的委托关系,仍旧沿用。直至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人民政府成立,经过房地产制度的改革,道契两字始随着租界的消灭而成为历史陈迹。

## 闸北水电公司

尹邨夫 余芷江

一九一〇年(宣统二年)，由李钟珏(即李平书)等创立闸北水电厂，除募集商股外，由苏松太兵备道库中拨给部分资金，为官商合办性质。至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因借款关系，曾为日资大昌洋行接管，后由江苏省署拨款收回，成为省办事业。主办者单纯追求利润，对于地方主权、人民利益毫不顾及，首将原有小型发电厂废除，向租界外资电力公司馈电，以高价供应市民。水厂因陋就简，向苏州河谭子湾吸收水源，其时苏州河为租界污水宣泄之所，污浊不堪，又因年久失于疏浚，日见淤涸，在此取源，不仅严重影响公共卫生，亦不足供市民日用所需。市民虽一再呼吁改善，省署置若罔闻。省署实业科长金左临鉴于馈电转卖，有厚利可图，与吴淞镇人虚设淞滨电力公司，利用职务上便利，通过省署蒙请实业部批准，划闸北水电厂铁道以北的供电区域(沪宁和淞沪铁道)作为淞滨公司的营业区域。

一九二二年七月间，闸北川公路祥泾丝厂失火，因水厂水力不足，救火会无法施救，酿成焚毙十余工人巨祸。闸北市民联合地方自治筹备会、商业联合会等开会，认为唯有将闸北水电厂改归市民自办，方足解除痛苦，巩固主权，一致议决设立闸北水电公司筹备处。八月间成立，号召市民投资，在殷行乡(宝山

县境)剪淞桥沿浦置地四百余亩作水厂基地。一面推举代表组织请愿团,由余宗周、尹邨夫任团长,向省署和省议会请愿,将水电厂改为民办。在筹备期内,官僚威胁以及绅士和帝国主义者利诱,层出不穷,有如下述:(一)苏省巡按使韩国钧受实业科长蒙蔽,令闸北水电公司筹备处,通缉发起人徐春荣、陈维翰、尹邨夫、管际安等,激起市民公愤,闸北全市罢市三日。江苏县议会联合会和上海、宝山两县县议会以及其他地方团体,纷纷电省抗议,使省署不得不放弃高压手段,进行洽商。(二)淞滨电力公司浣宝山县绅士向筹备处说项,愿意合作,未为所动。筹备处并将该公司内容向实业部申诉,部派黄子仁调查属实,撤销淞滨电力公司注册。(三)英帝国主义覬觎闸北,企图推广租界,乘筹备处集款困难之际,由汇丰银行派人游说,愿取低利尽量贷款,帮助早日成立公司,经发起人等拒绝始息。

经过两年以上筹备,于一九二四年九月间,筹备处向省署缴纳厂价一百三十余万元、营业权六十万元,接收省办水电厂,成立商办闸北水电公司。成立后按原定计划,号召市民认股,由于市民经济力量薄弱和组织不够坚强,这一计划未能实现。公司投资,市民仅占一小部分,大部分仍握在资本家手中,由施省之(即施肇基)任董事长,陆伯鸿任总经理。一九二五年在原购基地上建造水厂,后续购基地建造电厂及其他工程,在当时均属新型设施。沪西一带各大工厂,过去由外商越界供电,亦逐步收回自办。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战起,电厂为日军炮轰,淞沪沦陷,即被占据,破坏惨重。至抗战胜利后收复,仍由商办公司管理。

## 上海开埠初期的洋行

陈文瑜

### 最早涌进上海的洋行

鸦片战争后，英国用武力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上海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最早到上海的一批洋行都是就近从广州分支过来的。一八四三年紧跟着英国领事巴尔福(Captain George Balfour)到上海的，有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宝顺洋行(即颠地，Dent Beale & Co.)、仁记洋行(Gibb Livingston & Co.)、义记洋行(Holliday Wise & Co.)和一个叫司密斯(J. Mackrill Smith)的商人。<sup>①</sup>到一八四七年，也就是上海“地皮章程”签订后两年，“上海租界内已经开设起二十四家进出口洋行、五家洋商店铺、一家旅馆和俱乐部了。”<sup>②</sup>租界市面不断扩展，洋行不断增多，到一八五〇年，上海不仅增加了许多为适应进出口贸易而设立的拍卖行、仓栈以及海船用品和伙食供应等商店，而且创办了英文《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大英医院(Shanghai Dispensary)、丽如银行(Oriental Bank)、大英轮船公司(P. & O.S.N.Co.)，英商成立了商会，以经营进出口贸易为主的洋行增加到三十二户，<sup>③</sup>到一八五二年，也就是太平军进入江南的前一年，继续增加到四十一户。

这四十一户是：

怡和洋行	Jardine Matheson & Co.	英	1843 年
宝顺洋行	Dent Beale & Co.	英	1843 年
仁记洋行	Gibb Livingston & Co.	英	1843 年
义记洋行	Holliday Wise & Co.	英	1843 年
广沅洋行	J.Mackrill Smith	英	1843 年
沙逊洋行	D.Sassoon Sons & Co.	英	1845 年
祥泰洋行	Rathbone Worthington & Co.	英	1845 年
旗昌洋行	Russell & Co.	美	1846 年
利名洋行	D.Remi	法	1848 年
泰和洋行	Reiss & Co.	英	1849 年
和记洋行	Blenkin Rawson & Co.	英	1850 年前
广隆洋行	Lindsay & Co.	英	1850 年前
公易洋行	Mac. Vicar & Co.	英	1850 年前
华记洋行	Turner & Co.	英	1850 年前
太平洋行	Gilman Bowman & Co.	英	1850 年前
客地利洋行	Hargreave & Co.	英	1850 年前
公平洋行	Sykes Schwabe & Co.	英	1850 年前
琼记洋行	Augustine Heard & Co.	美	1850 年前
啤地玛洋行	Wetmore & Co.	美	1850 年前
丰茂洋行	Watson & Co.	英	1850 年前
浩昌洋行	Sillar Bros.	英	1850 年前
名利(隆茂洋行)	Mackenzie Bros. & Co.	英	1850 年前
森和洋行	Wolcott Bate & Co.	美	1850 年前

李百里洋行	Thos. Repley & Co.	英	1850年前
同珍洋行	Bull Nye & Co.	美	1850年前
裕记洋行	Dirom Gray & Co.	英	1850年前
顺章洋行	Pestonjee Framjee Cama & Co.	帕西 (印度祇教徒)	1850年前
复沅洋行	F. S. & N. M. Langrane	帕西	1850年前
天长洋行	W. R. Adamson	英	1850年前
得利洋行	James Mc Donald	英	1850年前
泰昌洋行	Dimier Bros. & Co.	英	1851年
火柏洋行	James Hooper	英	1851年
祥记洋行	Amroodeen Jofferbhoy	帕西	1851年
广昌洋行	Cowasjee Pallanjee & Co.	帕西	1851年
架记洋行	Cassumbhoy Nathabhoy & Co.	帕西	1851年
广孚洋行	Eduljee Framjee Sons & Co.	帕西	1851年
广兴洋行	Dhurmseey Poojobhoy	帕西	1852年
宝文洋行	James Bowman	英	1852年
咸享洋行	Khan Mohammed Aladinbhoy	帕西	1852年
利兴洋行	Thos. Platt & Co.	英	1852年
裕泰洋行	Dallas & Co.	英	1852年

资料来源：根据1852年英文《北华捷报》汇编。

早期的洋行，几乎都是英、美洋行。一八五二年四十一户中，英商洋行有二十七户，占上海洋行总户数的三分之二，从属于英帝国的帕西洋行八户、美商五户、法商一户。英商洋行势力最大，“他们作为进口商和出口商，直接经营的进出口商品，大约

占有全数的三分之二。”<sup>④</sup>一八四八年开设的法商利名洋行，《北华捷报》称它是钟表商(Watch Merchant)。德商洋行直到一八五五年才开设一家鲁麟洋行(Wm. Pustan & Co.)，一八五六年开设一家禅臣洋行(Seimssen & Co.)。

### 商人领事“二位一体”

早期西方一些国家的驻华领事大都由商人充当。在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上海除英国领事是正式政府官员外，其他国家的领事都由洋行商人兼任。如旗昌洋行大班华尔考(Henry G. Wolcott)、克雷斯乌(Criswold J. N. A.)和金能亨(Edw. Cunningham)，先后担任美国领事，金能亨还兼任瑞典和挪威领事，法国利名洋行职员爱棠(B. Edan)一度担任法国领事，宝顺洋行大班比尔(F. C. Beale)是葡萄牙和荷兰领事，怡和洋行大班波斯乌(Alex Percivel)是丹麦领事，广隆洋行大班浩格兄弟(Wm. Hogg 和 James Hogg)是汉堡(Hamburg)、卢卑克(Lubeck)和不来梅(Bremen)领事，广沅洋行大班金氏(D. O. King)是普鲁士领事，旗昌洋行职员劳瑞欧(Loureiro P. T. S.)是西班牙领事等，<sup>⑤</sup>他们既是进出口商，又是具有条约特权的外交官。这些按照条约“专理商贾事宜，与各该地方官公文往来”的领事官，原来就是洋行的商人。裁撤了“行商”〔注〕后，担保外国商人不违法走私、“清楚交纳货税饷钞”的领事官，也是洋行的商人。李鸿章也说：“上半天勾通作弊之商人，下半天即可亲自赴

〔注〕行商，即十三行商人，又称“保商”，是广州一口通商时期负责管理外商在华活动、保证交纳税钞的垄断官商。



道署商办公事，此日到关受罚之商人，即明日道台来拜之领事。”<sup>⑥</sup>清朝官吏平日诚惶诚恐，对外国领事连碰都不敢碰一下，那么这些商人领事理所当然地更加嚣张不法，为所欲为了。

### 洋行的两种类型

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英国纺织工业发展起来以后，虽然已经引起贸易方式和商品结构等一系列变化，但总地来说，仍然没有完全摆脱早期商人资本的原始落后状态，新的产业资本的商品侵略和旧的商业资本的原始掠夺处于交叉进行的状态。洋行贸易仍以鸦片输入和丝、茶、白银输出为其主要经营内容。进口鸦片一般接近上海进口商品总额的四分之三，而棉毛纺织品、杂货和南洋输入的商品总共只占四分之一多些。怡和、宝顺、旗昌、广隆、琼记、沙逊等英美洋行和架记、顺章、广昌等帕西洋行是经营鸦片的主要洋行。这些洋行都是东印度公司垄断时期即在广州从事“港脚贸易”(Country Trade)<sup>[注]</sup>的老牌洋行，从私贩鸦片发财致富，积累了庞大资金。随着时代的发展，又同英国纺织集团相结合，贸易占绝大比重，拥有很大势力。另外一些洋行，如公易、义记、泰和、丰茂、祥泰、和记、公平、李百里、裕记等洋行，一般都以经营纺织品为主。这些洋行都是东印度公司在华垄断结束和鸦片战争后来到中国的，规模较小，户数较多。一八五三年太平军进入江南、上海纺织品市场停滞时，公

[注] 据《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作者格林堡称：“印度、东印度群岛同中国之间的贸易，从十七世纪末叶起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汽轮出世为止，都叫做‘港脚贸易’(Country Trade)……不论是本地人还是欧洲人经营的。”

易等十四户洋行上书英驻华商务监督，要求进口货物于售出后再行付税。呈文中开宗明义就说：“我们是以承办制造品输入为特点的商人。”又说：“本呈文的具名人是代表大多数和接受大部分英国制造品输入本港的代理商。”还说：“鸦片并不为那些热中于兰开夏(Lancashire)和约克夏(Yorkshire)贸易者所普遍经营。”<sup>①</sup> 为了对洋行经营业务有个比较清楚的概念，举一八五一年各洋行经理的进出口船货列表如下：

洋行名称	国别	进港船数	进口装载货物					出港船数	出口装载货物				
			鸦片	棉织品等	杂货	空船	其他		金银	丝茶	杂货	空船	其他
怡和	英	25	18	2	2	3		28	6	9	2	10	鸦片1
宝顺	英	25	17	4		4		26	6	10	2	8	
旗昌	美	34	8	2	7	13	檀香木3 煤1	36	3	14	11	7	谷物1
广隆	英	16	5	4	4	2	米1	20	1	15	1	3	
琼记	美	12	3	2		6	皮毛1	11	2	8		1	
广沅	英	17	1	2	6	5	糖1、米1 木材1	16		9	4	3	
沙逊	英	2	2					2				2	
顺章	柏西	4	3			1		2	1		1		
公易	英	12		7	2	2	檀香木1	11		7	1	3	
和记	英	8		1	2	3	糖2	8		6	1	1	
同珍	美	8		3	2	3		7		7			
仁记	英	7		4	1	1	糖1	7		7			
客利地	英	7		4		2	糖1	9		9			
李百里	英	4		3		1		4		4			

公 平	英	4		2	2			7		4	3	
华 记	英	4		2	1	1		4		4		
啤地玛	美	3		1	2			3		2		1
森 和	美	6		1	2	3		7		4	3	
太 平	英	3			3			3			1	1 陶器 1
义 记	英	2				1	糖 1	2		1		1
隆 茂	英	2		1	1			3		2	1	
泰 和	英	2		1		1		3		3		
祥 泰	英	1		1				2			2	
裕 记	英	1			1			2		2		
大英轮船公司	英	1	1					2			2	
W.M. Davison		1				1		1			1	
丰 茂	英	1				1		1		1		
广 昌	帕西							1			1	
其 他		15			3	10	石 1 家具 1	10			6	3 硝 1
共 计		227	58	47	41	64	17	238	19	128	43	44 4

资料来源：根据 1851 年《北华捷报》每期登载的《进出上海港口船期报告》汇总编制。

怡和、宝顺、旗昌是三大鸦片贩子。一八五一年，上海进口货物总值一千六百三十一万元，其中鸦片一千两百万元，占百分之七十四；棉毛织品、杂货共四百三十一万元，占百分之二十六。<sup>⑥</sup>按照上表，这年进港的鸦片船共五十八艘，其中属于三大洋行经理的有四十三艘，如按鸦片进口总值平均估算，每船二十万六千九百元，计八百九十万元，占鸦片进口的百分之七十四。

进港的其他商品共一百零五船，属于三大洋行经理的有二十一船，如按其他商品总值平均估算，每船四万一千元，计八十六万元，占其他商品进口总值的百分之二十。仅鸦片一项，三大洋行进口的货值即达上海进口商品总额的百分之五十五。如果包括其他商品在内，三大洋行的进口额占上海进口商品总额的百分之六十。输出的情况同样如此。一八五一年，洋行从上海运走金银（主要是白银）十九船，其中属于三大洋行的即有十五船，占百分之八十；丝、茶、杂货五十船，占百分之三十。

### **商人与船东一体，代理行兼营保险银行业务**

洋行的经营方式，以代理为主，兼做自营贩运。在港脚贸易时期，从印度大商号的随船大班（船货管理员）转化为常驻广州代理的洋行商人，开始时都称代理行（Agency House），它的业务主要是代理印度商号买卖货物，同时自己就便做些冒险生意<sup>①</sup>（即自负盈亏的生意，英文称 Speculation）。二三十年代，洋行从贩运鸦片中发了财，本钱多了，以后就经营自己的船队，<sup>②</sup>自己经营冒险生意就成为比较平常的事情。英国纺织业发展起来以后，它们把剩余工业产品运到中国，委托洋行代销，洋行的代理业务更为广泛。

英国是距离中国极其遥远的国家，当时苏伊士运河尚未凿通，海上交通全靠几百吨大小的帆船，绕道好望角来到中国，每一航程就需要半年时间。由于交通阻隔，洋行的代理和自营业务并不限于进出口商品贸易，同时兼营航运、保险和金融汇兑。这种一揽子无所不包的经营方式，是早期贸易处于低水平

下,分工较粗的必然现象。在这种经营方式下,代理内容更为广泛,举凡代购、代销货物,承保票据、证券或其他契约,代办汇票,代人租船,买卖船只,代收进出口运费,保险、理赔,代收债款,代管财产,转运货物等无不代理经营。远隔重洋,市场消息如此隔膜,这批最早到上海的冒险商人都可以从其中取得操纵居奇之利。

试举洋行代销鸦片为例:

印度鸦片的货主大都是帕西或印度本地商人。他们委托怡和等大洋行运至中国代售,由洋行按每一百西班牙银元合两百十卢比的折合率,照发票价预付货主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货价按在中国售得的银元计算。假如一箱鸦片售价为七百元,则洋行代理销售,每箱收入如下:

1. 佣金 3 %	\$ 21.00
2. 墨西哥银元折西班牙银元贴水 5 %	\$ 35.00
3. 按每百元 225 卢比购买印度汇票(与 上述每百元 210 卢比差价)	\$ 50.00
4. 汇款佣金 1 %	\$ 7.00
	共计 \$ 113.00

另外洋行用自己的飞剪船装运鸦片,收取高昂运费,和代理保险收取的佣金都未计在内。但是事情还不止于此,洋行赚钱的花招甚多。形式上虽然同委托户结清账目,实际上它们往往把这批鸦片作为自己的货物,每箱抬高一百元或再多些售出,收进的是纹银,还可以拿到百分之二到三的贴水。按照这样的做法,怡和洋行在短短的一二十年间,股东分红达三百万元之多,

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sup>①</sup>

### 洋行的冒险活动——贩卖鸦片、 走私偷漏、非法沿海贸易、掠卖人口

万里迢迢，远隔重洋到中国来的都是一些冒险商人和流氓。他们憧憬着这个初被打开海禁的富饶帝国，企图冒险寻找发财机会。他们依仗特权势力，在本国领事包庇下，贩卖鸦片，走私偷漏，进行非法沿海贸易，掠卖人口以至抢劫烧杀，无所不为。现分述如下：

一、武装贩运鸦片。鸦片战争后，香港代替了早期的伶仃<sup>〔注〕</sup>成为洋行走私鸦片的大本营。洋行把鸦片从印度运到香港，囤聚在香港的鸦片趸船上，然后随时从香港分运到中国沿海各地销售。象怡和洋行七百吨的霍尔曼·罗曼济号（Horman Romanjee）和宝顺洋行的约翰·巴里号（John Barry）终年停泊在香港。从事这项肮脏冒险生意的洋行，都拥有一支海盗式的武装船队。船只先进，人员充足，武装齐备，各种船只有着完密的分工，据《中国飞剪船》著者拉巴克说：“一种，是从印度载运鸦片到香港，装到各大洋行停泊在香港的趸船上；第二种，是专门把储存在香港趸船上的鸦片分运到各通商口岸；第三种，是把鸦片从香港运到中国沿海不准通商的城镇港口销售，这类鸦片船最为凶狠，因为它们要出没在生疏未经探测的港湾，同陌生的中国土棍打交道，还要对抗清政府官船的缉捕；第四种，是停

〔注〕 伶仃系广州虎门外伶仃洋面上鸦片的集中点，鸦片战争前，走私鸦片一般是先运到伶仃，卸入泊在伶仃洋面的鸦片趸船上，然后走私进口。

泊在沿海各港口外面的鸦片趸船。”<sup>②</sup>前三种都是一两百吨或三四百吨的优质小船,因为运载的唯一货物是鸦片和白银,没有使用大船的必要。船上的水手船员都是重金罗致来的亡命之徒。举怡和洋行两百八十三吨的兰立克号(Lanrick)为例,据《中国》的作者马丁说:“这条船是由一位自有航海活动以来胆量最大、技术最熟练的海员驾驶,……装备着发射九磅炮弹的长炮和枪支等全副武装。这种船使我想到了十七八世纪经常出现在南美洲的海盗。”<sup>③</sup>宝顺洋行的伊蒙特号(Eamont),“每侧配备着四门能发十八磅炮弹的大炮和两门旋转炮。”<sup>④</sup>一个鸦片飞剪船上的船员说:“我们有充分的准备和……中国人较量一番,一两艘官船决计把我们赶不出航线。”<sup>⑤</sup>

上海开埠时,约三至六艘鸦片趸船停泊在吴淞口外洋面已有一年之久了,售出了八千箱、近六百万元的鸦片。<sup>⑥</sup>上海开埠后,吴淞口外的趸船经常有八至十艘,趸船的名称和所属洋行的名称,报纸上公开登载,毫不避人耳目。一八五〇年各期《北华捷报》登载的鸦片趸船如下<sup>⑦</sup>:

复兴号 (Emily Jane)	427 吨	属于宝顺洋行	英
元发号 (Folk Stone)	406 吨	属于怡和洋行	英
顺利号 (Science)	388 吨	属于旗昌洋行	美
开沅号 (Mastiff)	148 吨	属于沙逊洋行	英
和利号 (Snipe)	176 吨	属于琼记洋行	美
威廉第四 (William IV)	176 吨	属于广隆洋行	英
广南号 (Clown)	152 吨	属于广南洋行	帕西
英昌号 (Masteu)	236 吨	属于架记洋行	帕西

(Time)	110 吨	属于顺章洋行	帕西
威廉 (William)	130 吨	属于太平洋行	英

往来于香港上海的鸦片飞剪船经常有一二十艘，每年共行驶五六十船次。以一八五一年为例：怡和洋行一百六十三吨的马济帕号 (Mazeppa)、一百五十一吨的沃达克斯号 (Audex) 和一百四十七吨的埃欧那号 (Iona)，共装运鸦片十八航次；宝顺洋行一百九十五吨的海岛女皇号 (Island Queen)、一百零六吨的纳姆夫号 (Nymph) 共装运十七航次；旗昌洋行三百七十二吨的羚羊号 (Antelope) 装运鸦片八航次等。<sup>⑧</sup> 所有鸦片船都不直接开进上海港口，它们先在吴淞口外把鸦片卸到趸船上，然后空船进港报关。上海本地土棍同洋行谈妥生意后，凭洋行开出的鸦片提单到吴淞趸船提货，自行运回上海。这些鸦片贩子，依仗领事包庇，勾结地方官吏，“贩卖鸦片和吸食都是毫不避人，……整箱整箱的鸦片在街上运来运去”<sup>⑨</sup>，“而且是唯一不受检查的进口货物”<sup>⑩</sup>。

鸦片走私的发展如此迅速，到一八四七年，就是上海开埠后的第四年，洋行在吴淞趸船上售出的鸦片已达一万六千五百箱。这个数量比一八三〇年以前的任何一年输入全国的还要多。从一八四七年到一八五六年，不到十年，从上海输入的鸦片增加了一倍。见下表：

1847 年	16,500 箱	1852 年	27,358 箱
1848 年	16,960 箱	1853 年	20,757 箱
1849 年	22,981 箱	1854 年	25,133 箱
1850 年	19,498 箱	1855 年	28,727 箱



1851年      22,596箱                      1856年      33,572箱

资料来源：以上前三年出自《Return of the Trade of the Various Ports of China for the Year 1849》，p.50。后七年出自《北华捷报》《上海年鉴》(Shanghai Almanac)。

二、商品的走私和偷漏。禁止进口的鸦片要走私，准许纳税进口的商品，尽管协定税率已经很低，洋行走私和偷漏仍极猖獗。中国法律和条约规定一概被置之不理，有时是一伙人用强力破坏港口章程，但比较更常见的却是本地官厅同外国人之间的行贿串通。<sup>②</sup>吴淞口外的趸船是走私的大本营。大量的丝、茶先用小船偷运到吴淞趸船上，洋行商船于结关后，再驶往吴淞载运出口。或者在进港以前，先把私货卸到吴淞趸船上，然后开进上海港报关。用以多报少、高税率报低税率等办法来偷漏关税也是极其普遍的。如丝，通常以包为计量单位，洋行往往把两包打成一包，按一包付税，偷漏关税一半。<sup>③</sup>印花布(chintz)规定每匹付税两钱（约合两角八分），不合销的花布、色布(colour and fancy cotton)规定每匹按值付税百分之五，洋行往往把印花布报成不合销的花布、色布，实际上应付两角八分税款的只付一角。一八五二年一至五月初的四个月期间，洋行呈报进口的印花布共八百五十四，而实销则有两万五千匹，不合销的花布、色布，呈报的进口数量则不下三万九千匹。<sup>④</sup>上海海关自道台以下，对于这种不法行为都视若无睹。<sup>⑤</sup>当时由于洋行之间的矛盾，两起走私案件被公开在报纸上披露出来。一起是一八五〇年怡和洋行利用吴淞走私方法，走私六百九十九包价值二十四万元的生丝，结果仅处以两百元的罚款。<sup>⑥</sup>另一起是一八五一年公平洋行装载四十五万八千六百五十一磅茶叶结关开往伦

敦,发现有二十五万七千两百五十一磅未经报税,也仅责令加倍付税,另课一百元罚金。但是货主却提出抗议,说:“走私惯例,是中英当局一向纵容不管所造成的。”<sup>⑩</sup>既成惯例,走私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了。一八五三年上海小刀会起义,外国领事拒绝清政府行使海关职权,洋行走私更为疯狂,整船整船的丝、茶和进口货物不付关税,公开进出上海港口。

三、非法的沿海贸易。五口通商以后,洋船不顾中国法令,任意往来中国沿海各口,从事航行和贸易活动,这种活动,到五十年代进一步发展。一八五一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外国商船有三十一艘,到一八五五年增加到六十四艘,一八五七年更增加到一百三十三艘。从上海开往其他沿海口岸的商船,增长速度更快。请看下表:

年 份	上海进港船只及来自地区									上海结关出口船只及开往地区										
	进 港 总 数	英 国	美 国	香 港	澳 洲	印 度	南 洋	中 国 沿 海	其 他	日 本	高 港 总 数	英 国	美 国	香 港	澳 洲	印 度	南 洋	中 国 沿 海	其 他	日 本
1851	227	32	40	87	5	6	23	31	3		238	71	35	70	12	3	17	28	2	
1852	218	25	39	88	9	11	20	21	5		216	60	47	61	16	3	14	15	—	
1855	353	30	23	152	24	4	41	64	15		363	75	30	106	14	—	16	109	13	
1857	495	43	17	216	13	8	60	133	5		492	42	22	133	2	2	41	236	14	
1860	652	96	34	141	12	0	19	180	39	131	629	33	16	160	1	1	13	239	21	145

资料来源:根据各年《北华捷报》每期《进出上海港口船期报告》汇编。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 帝国主义在旧上海的经济掠夺简述

上海沿革编写组

## 一、工业投资迅速扩张

自从一八九五年《马关条约》订立后，帝国主义在上海的工业投资有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发展更快，从重工业到轻工业，从水电煤气等大型公用事业到小规模机器洗衣公司，从酿酒、制蛋到冷藏、制冰，从烟草托拉斯到火柴、烛皂，一切都渗透了外国资本。据一九二八年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统计，在当时上海的工业投资总额中，外国资本占百分之六十四以上。一九三六年，帝国主义在上海的企业占上海工业的比重是：发电量百分之八十五点三，船坞设备百分之五十四点二，纱锭百分之六十点三，布机百分之七十点九。抗日战争前，在关内的帝国主义银行业投资有百分之七十九点二集中在上海；进出口贸易和商业有百分之八十一·二，工业有百分之六十七·一，房地产有百分之七十六·八，都集中在上海。这些数字具体说明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投资有极大一部分是投放在上海的。这些投资，迅速形成为垄断上海经济的力量，并通过上海掌握着中国的经济命脉。

帝国主义在上海的工业投资，以纺织工业、烟草和食品工业、公用事业和造船工业为重点。此外，化学工业和日用品工业

也占相当的数量。

## 二、帝国主义在上海经营的纺织工业

甲午战争以前，外国资本家曾迭次要求在上海设立纺织厂，清政府未予同意。甲午战争前夕，上海怡和洋行不顾中国禁令，坚持运纺织机进口。《马关条约》一经签定，帝国主义获得了设厂权，他们就明目张胆地干起来。从一八九五年到一九〇二年短短的七年中，各外国资本家在上海成立了六家纱厂，其中有英资的怡和、老公茂、协隆，美资的鸿源，德资的瑞记，日资的上海纺织株式会社。这几家外资纱厂，再加上一九一一年成立的日资内外棉，差不多占了当时中国全国棉纺织业纱锭总数的一半。同时，帝国主义垄断财团通过贷款、套购股票、参与经营、直接购买等巧取豪夺的方式，对上海的中国纱厂实行吞并。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资本在上海纺织工业中的比重有所增加。战后，外国纱厂的势力又迅速增长起来。英资的怡和纱厂在兼并了华资的公益纱厂和英资的杨树浦纱厂以后，于一九二一年成立上海怡和各纱厂有限公司，其地位与日资的内外棉相伯仲。据一九二〇年统计，日本三井、三菱等财团在中国开设的纱厂共有二十九家，其中有二十二家设在上海。

在毛纺织方面，英商在上海有两万五千多毛纺锭、一百八十台毛织机。这个数字相当于抗战胜利后全国毛纺锭的百分之六十二、毛织机的百分之四十八。

### 三、帝国主义在上海经营的卷烟工业

垄断中国卷烟工业半个多世纪的英美烟公司，一九〇二年成立于上海。在头十年中，它的工厂由一个扩充到四个，工人由百余人扩充到近万人，资本由十万零五千元扩充到一千一百万元，超过了当时中国所有华资烟厂资本的七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业务更加扩大。在产量方面，一九三五年，各厂产量共为六十四万六千五百箱，约占全国卷烟总产量（东北除外）的百分之六十。在销售方面，通过买办，勾结地方豪绅，使“大英牌”、“老刀牌”香烟遍销全国，深入内地农村，推销网从东北的琿春、哈尔滨到西南的思茅、腾越，乃至新疆、西藏，穷乡僻壤，无远弗届。在储运方面，它在全国三百七十八个县市设有专业仓库，它的买办专销机构永泰和公司又在全国一百六十九个县市拥有仓库。在扩大采购机构、加强掠夺原料方面，它设置了宏安地产公司和中国许昌烟叶公司（后合并为振兴烟草公司），对中国烟农进行残酷的剥削。英美烟公司的垄断组织异常庞大，在总公司之下，有烟草制造、烟草贩卖、烟草种植、包装用品制造、证券投资五大系统，分别成立了十几个子公司进行专业活动。一九三四年组织成立的颐中烟草公司就是它的主要子公司之一，资本六千万元。从一九三五年到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颐中烟草公司的盈利达原投资额的五倍。英美烟公司同国民党政府紧密勾结，在捐税上享有特别利益，高档烟按低档烟纳税。同时又使用种种卑劣手段，对中国民族资本所办的烟厂进行排挤破坏。例如，它指示代理商购进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香烟，存放



起来，等到发霉后拿出来卖，借以破坏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商誉，打击中国烟厂产品的销路。

#### 四、帝国主义垄断上海的公用事业

随着上海城市的畸形发展，帝国主义对公用事业的投资，不断膨胀。建国前，美资上海电力公司拥有全市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发电量，美资上海电话公司独占市区绝大部分的电话事业，英资和法资自来水公司占有全市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供水量，英资上海煤气公司也差不多独占了上海市的煤气供应，当时吴淞的煤气厂规模不大，供应煤气地区非常有限。公共交通事业也分别由英、法两国把持。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国主义在上海的政治经济力量日益上升，美国垄断财团独占了上海的电气事业。一八九三年公共租界工部局收买新申电气公司，将其改组为工部局电气处。经过三十六年，它从一个发电容量只有一百九十七千瓦的小发电厂发展到十二万一千千瓦的大企业。由于控制着上海的电力供应，它可以在上海限制华资工厂的设立并决定其地区分布。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时，它竟用停止供电的方法来胁迫民族资产阶级向帝国主义投降。一九二九年，这个长期被公共租界工部局直接控制的电气事业，却被更强大的美国摩根财团所吞并，改组为上海电力公司。一九三〇年，摩根财团控制下的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又吞并了华洋德律风公司，将其改组为上海电话公司。一九三五年，上海电力公司以“中美合办”的名义，勾结国民党政政府，又在上海成立了沪西电力公司。这家公司自己并不发电，实

际上就是上海电力公司的买办机构，替它向更广大的地区推广营业。据一九三六年统计，上海电力公司全年发电总数达八亿多度，占全国（东北除外）总发电量的百分之四十七，超过全国四百四十六家中国发电厂发电量的总和。上海的工业动力差不多全部掌握在它的手中。

上海的交通工具，最初只有小车和轿子。一八七四年法商米拉从日本输入人力车，当时称黄包车，又名东洋车。后来又出现了马车。一九〇一年，匈牙利人李恩斯输入了第一辆汽车，到一九一二年，上海登记的汽车达一千四百余辆，均为国内外上层人物所占有。自从一九〇八年上海法商电车公司和英商电车公司的有轨电车通车以后，电车开始成为主要交通工具，至于无轨电车，到一九二六年才出现于街头。华商方面虽曾先后组织华商电车公司（后改组为华商电气公司）及华商公共电车公司，在沪南及闸北行驶电车，但车辆极少，路线很短，在敌伪统治时期，其设备已毁坏殆尽。据一九四八年底统计，上海共有有轨电车二百九十辆，无轨电车一百二十六辆，均为英、法电车公司所有，其中英商占三分之二以上。上海英商电车公司一九一二至一九四一年三十年间的账面盈利等于原投资额的九倍多，每一百英镑的股票分得五百镑以上的现金和增股。上海的公共汽车，公共租界于一九二四年开始，法租界于一九二七年开始，均由外国资本经营。一九二八年，华资沪南公共汽车公司与市政府公用局也经营公共汽车，在租界以外的地区行驶，但它实际上是美国汽车制造业的附庸。旧上海公共汽车的设备，以沙逊财团控制下的英资中国汽车有限公司为较好，南京路上行驶的一线有上下

两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未恢复营业。据一九四八年底统计,上海市区行驶的公共汽车共二百三十一辆,其中公用局有一百七十三辆,法商有五十八辆。

### **五、帝国主义船厂的扩充**

英商耶松船厂于一八六五年成立,一九〇〇年合并了上海的另外两个外资船厂(祥生与和丰),资本由纹银五十七万两增加到五百十七万两。六年后,它的资本又增加到七百十四万两。

与此同时,外商又在杨树浦成立了瑞镕船厂,承造机器、水磨、船只、锅炉和火油贮油罐。一九一二年,瑞镕船厂与上海万隆铁工厂合并,加强了造船能力。一九三六年,耶松与瑞镕两大造船工厂又合并起来,改组为上海英联船坞公司,由怡和及沙逊两大财团共同控制。英联船坞公司在杨树浦方面有几座设备较好的船坞,垄断着当时上海的造船工业,还兼营机器制造及修理业务。

### **六、在上海的外国资本集团**

二十世纪以来,国际性的托拉斯组织侵入上海的日益增多。英国的英美烟公司(一九〇二年)、利华兄弟财团的中国肥皂公司(一九〇三年)、通用机器公司(一九〇八年)、亚细亚火油公司(一九一三年)、美国的美孚火油公司(一八九四年)、大来洋行(一九〇五年)、美国钞票公司(一九〇八年)、美国钢铁公司等,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上海设立了机构。战后,外国托拉斯的企业更有增加。英国的卜内门洋碱公司(一九二〇年)、邓禄普橡皮公司(一九二一年)、美国的杜邦公司(一九二〇年)、摩根

财团控制的美国通用电气公司(一九二〇年)、德士古火油公司(一九二〇年)、福特汽车公司(一九二六年)、西屋电气公司(一九二九年)等,均在上海出现。法国的液化气体公司(一九一八年)、永兴洋行(一九二〇年),瑞士的汽巴公司(一九一九年),德国的德孚洋行(一九二四年),瑞典火柴大王的泛美火柴公司等也侵入中国,分别在上海设行设厂。原由丹麦资本创立的慎昌洋行,一九二五年为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所收购,成为十几家美国大制造商在中国的总经理人。与此同时,日本三井、三菱、住友等大财团也相继侵入上海。

在上海的英国资本集中于三大财团和四大托拉斯之手。三大财团是怡和、太古和沙逊,它们控制着许多经济部门,经营范围极广。例如怡和洋行不仅经营进出口贸易、保险、地产、航运、铁路、码头、仓库,还投资于其他企业,又是汇丰银行的大股东。沙逊财团的主要财产是靠贩卖鸦片和进行地皮投机积累起来的。英国在上海的四大托拉斯是亚细亚火油公司、英美烟公司、卜内门洋碱公司和中国肥皂公司。这四家都是带有世界规模的大托拉斯在上海的分支机构。一九四八年,这三大财团和四大托拉斯在上海的企业约占英资企业全部资产的百分之六十、职工人数的百分之五十三、占有土地的百分之五十二。

根据美国人调查,一九三〇年美国对华企业投资有百分之六十五集中在上海,仅美孚油公司和德士古油公司两家的投资就占美国在华财产总额的百分之三十八。

各大集团与托拉斯之间,一面互相火并,一面狼狈为奸。它们以交换董事、收买股票、参与经营等方式,彼此勾结,并对独立

经营的工商业进行控制。几个主要的英国财阀与美商大企业，如上海电力公司、慎昌洋行、海宁洋行等，都有资本和董事的交叉关系。

### **七、外国资本对上海土地和房产的投机**

在上海，土地和房产早已成为外国资本投机的对象。由于上海畸形发展，土地商品化和人口高度集中，于是上海的地价惊人地增涨。这种增涨，给投机者赚了高额利润，却对上海人民的居住问题造成直接的威胁，给上海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害。

一八四六年(道光二十六年)，上海英国领事馆在外滩以银一万七千两购地百余亩，平均每亩地价为一百六十五元。抗日战争前夕，这些土地的估价每亩是十八万八千八百元。距此不远的日本邮船株式会社的原址，当时的地价每亩是二十八万元，位于南京路和外滩转角的沙逊大厦(现在的和平饭店)，当时每亩的价格是五十万零三千五百元。日本投降后，随着通货的恶性膨胀，这一带土地的价格更达到了天文数字。

外国资本在上海设立过许多大大小小的房地产公司，专门对上海的房地产进行投机。归根结底，这些机构都是从属于帝国主义金融资本的。可以说，在上海的外国银行和外国财阀没有一家不从事于房地产投机，也没有一家外国房地产公司不以外国银行为后台。

外国资本在上海占有的房地产，集中性很大。例如英国在上海占有的土地，三大财团和四大托拉斯集中了百分之五十八。在旧上海二十八座十层以上的大楼中，沙逊占了七座，如沙逊大

厦(现在的和平饭店)、汉弥尔登大厦(现在的福州大楼)、都城大厦(现在的新城饭店)、十三层楼(现在的锦江饭店)、十八层楼(现在的锦江中楼)、河滨大厦(现在的河滨大楼)等都是它的产业。过去上海租赁房屋要付“顶费”，建国前夕，十八层楼的一套房间，顶费一般要两万美元，月租一百二十美元以上。帝国主义分子历年将房地产投机得来的利润变成外汇，源源不断地汇出中国。据说，沙逊汇往纽约就有两亿美元。法国人在上海所占的土地，大部分属于教会产业。据美国人统计，一九三〇年法国教会在上海的房地产，百分之九十一以上都是营业性质，教会自用的极少。美国洛克菲勒财团也是上海的大地主。旧上海市区马路交叉的三角地段，差不多都有美孚、德士古、亚细亚三大石油公司的加油站。

#### **八、外国银行是经济侵略的总枢纽**

在二十世纪开始前后，随着国际经济侵略特征的改变，上海外国银行的作用也起了变化。它们同工业垄断资本融合在一起，成为金融资本统治的总枢纽，掌握中国政府的借款，控制财政；投资各项企业，吸收存款，发行纸币，操纵金银，独占外汇，控制中国的贸易和金融。这样，帝国主义国家不但在商品竞争上压倒了中国民族资本，而且在金融上、财政上卡住了中国的咽喉。

十九世纪末期，汇丰银行已成为上海外国银行的领袖。一八九九年东方汇理银行代替上海的法兰西银行，成为法国侵华资本的中心。其他如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一八九三年)、美国的花旗银行(一九〇二年)、比利时的华比银行(一九〇二年)、荷兰

的荷兰银行(一九〇三年)、沙俄的华俄道胜银行(一九一〇年)等,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开业于上海。战后,上海的外国银行迅速增加,比较重要的有:英国的大英银行(一九二二年)、通济隆公司(一九二五年)、沙逊银行(一九三〇年),美国的运通银行(一九一九年)、友华银行(一九一九年)、大通银行(一九二一年)、友邦银行(一九三〇年),日本的住友银行(一九一六年)、三井银行(一九一七年)、三菱银行(一九一七年),荷兰的安达银行(一九二〇年),意大利的华义银行(一九二〇年)等。这些外国银行不仅执行财政资本统治的任务,并且在上海进行狂烈的金融和土地投机。专以投机为业的外国银行在上海就有十几家,其中以美资为最多。法资万国储蓄会(一九一二年),更是有名的诈欺取财的机构。据一九三六年统计,上海有四十几家外国银行,此外还有一百七十几家外资保险公司。外国保险公司垄断着上海的保险业务,华资保险公司多数是代外商分保,实际上就是它们的经纪人。

旧中国对外的借款、赔款,指定以关税和盐税收入为担保,税款收入要存入外国银行,由它们支配。同时,外国银行又通过新的借款来重利盘剥,控制和阻挠中国企业的发展。外国银行垄断着当时的国际汇兑,汇价的变动要看外国银行挂牌。外国银行很早就在中国发行了大量纸币,操纵金融市场。抗日战争前,外国银行在中国(东北除外)的全部资产约值五亿六千万元,而它们在上海一地所吸收的存款,大大超过了这个数字。因此,当时中国政府如果没有外国银行的支持,就不敢在财政金融方面采取任何重大措施。

一九三五年国民党政府推行“法币”和“白银国有”政策，就是由握有中国金融霸权而实际上左右蒋政权财政命运的外国银行，首先是上海汇丰银行所策动、决定和支持的。“法币”实行后，上海外国银行和蒋宋孔陈四大家族都发了一笔大财，美元与英镑很快在蒋政权“法币”的统治地位中平分秋色。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元更获得了独占的地位。

上海既然是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主要据点，又是大工业和贸易的中心，就必然成为金融资本活动的基地。外国银行就是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总枢纽，同时又是中国反动统治的大后台。



# 建国前上海在全国经济中的地位

陈立仪 钱小明

建国前上海作为全国的经济中心,从历史上来看,是由各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一方面,上海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上海地处我国海岸线的中心,是进出长江流域的门户,有物产丰富、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广大腹地。另一方面,由于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把上海作为它们进行经济掠夺的总据点,因而使得上海的经济畸形发展。而且,自太平天国以来,历次战火都未波及,环境比较安定,国内资金、人才汇集上海,为发展工商业创造了前提条件。现就建国前上海的经济在全国经济领域中所占的地位提供一些历史资料。

## 一、交通运输上的优势

上海作为全国经济中心,有着优越的交通运输条件。就航运业来看,随着贸易的发展,上海周围逐渐集中了五条航线:有包括上海至天津、牛庄、芝罘三条航线在内的北洋线和往来于上海和浙江、福建、广东、台湾之间的南洋线;有贯穿我国东西的大动脉长江航线;有连接着江苏、浙江、安徽、山东等地的内河航线;还有直达欧美、日本、东南亚的国际航线。上海港水深道宽流缓,有长达一万零四百七十九米的码头,仓库面积为三千八百七十一万四千七百零五平方尺,仓库容量为一百四十八万—

千一百零八吨，泊位有九十五个，其中万吨级泊位有五十个。这些是发展国内外贸易的有利条件。上海港的吞吐量、集散力居全国各港之冠。这可从上海与全国往来外洋及国内的商船艘数、吨数及其百分比中看得出来。（见表1）

**表1 上海与全国往来外洋及国内商船吨数及百分比表\***

	只 数		吨		%
	上 海	全 国	上 海	全 国	
1909年	54,413	208,516	18,492,809	86,771,809	21.3%
1927年	37,422	154,275	32,463,323	116,210,785	27.9%
1933年	18,115	171,725	35,222,343	137,379,174	25.6%
1936年	16,481	228,818	31,810,259	145,019,018	21.9%

\* 根据《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1909、1927、1933、1936年各期综合整理。

上海不仅是水道运输中心，同时陆上空中交通运输也较为发达。上海是沪杭甬铁路、沪宁铁路之连接点。中国航空公司之平沪、沪粤、沪蓉三大干线，欧亚航空公司之沪兰线均以上海为起点。此外，上海市内交通也甚为便利。如：从一九一〇年创办汽车运货商业起，到建国前夕约有运货车近两千五百辆。这样，海、陆、空运输与市内邮电等设施一起组成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使上海成为全国重要的交通枢纽，在全国经济中发挥突出的作用，也使上海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形成为世界十大海港之一。（据英文《中华年鉴》）

## 二、贸易上的优势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商品流转不断扩大，上海迅速成为全国商品的主要集散地。下面从国际贸易和埠际贸易两方面加以考察。

上海自一八四三年被辟为商埠后不久，即迅速取代广州的地位，发展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中心。我国各地出产的货物长期通过上海输往国外，外国货物输入我国也大部分经由上海进口。据统计，建国前夕上海已同世界将近一百个国家和地区、三百多个港口有经济联系与贸易往来(到一九七九年，上海已同世界一百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两万多个客户有业务联系)。上海的不少厂商同国外有直接往来。上海的对外贸易在全国的外贸中所占比重很大。有关它的外贸情况，可以从货值方面来考察，首先，从进出口贸易的总值来看。(见表2)

**表2 上海直接对外贸易总值及其占全国外贸总值的百分比\***

	上海直接对外贸易货值	上海占全国对外贸易总值的%
1. 1894年	155,083,750(海关两)	53.44%
2. 1918年	416,258,750(海关两)	40 %
3. 1933年	1,051,978,048(国币元)	53.37%
4. 1936年	917,456,595(国币元)	55.56%

\* 1、2 见罗志如：《统计表中之上海》第90页。

3、4 见《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1933、1936年。

其次，可以选择几项商品，从它们的进出口货值证明上述结论。(见表3、表4)

**表3 部分出口货物货值统计表\***

(单位：海关两)

	猪			茶			叶		
	上海	全国	%	上海	全国	%	上海	全国	%
1919年	4,359,632	4,748,890	91.8%	17,685,476	22,398,436	79 %			
1927年	4,527,304	9,290,009	48.7%	23,516,164	31,616,949	73.4%			
1931年	4,528,914	9,760,724	46.4%	26,732,204	33,253,158	80.4%			

	桐 油			丝		
	上 海	全 国	%	上 海	全 国	%
1919年	6,033,415	7,960,968	75.8%	62,388,052	110,531,333	56.4%
1927年	18,052,921	21,970,947	82.2%	79,481,665	136,395,414	58.3%
1931年	10,740,054	20,416,102	52.6%	47,626,898	93,065,735	52.3%

表4 部分进口货物货值统计表\*

(单位：海关两)

	纺 织 机			毛 织 机		
	上 海	全 国	%	上 海	全 国	%
1919年	2,680,769	3,767,406	71.2%	4,393,297	7,548,920	58.2%
1927年	3,166,825	3,837,034	82.5%	17,606,281	28,076,959	62.7%
1931年	11,188,061	13,828,553	80.9%	23,470,020	32,767,034	71.6%

	棉 花			棉 布		
	上 海	全 国	%	上 海	全 国	%
1919年	5,723,469	6,570,844	87.1%	63,503,439	137,516,817	46.2%
1927年	63,885,555	82,204,272	77.7%	54,455,755	130,546,399	41.7%
1931年	165,486,672	180,357,844	91.8%	53,563,562	107,768,736	49.7%

\* 表3、表4见蔡谦、郑友揆编：《中国各通商口岸对各国进出口贸易统计》。

虽然经过政治、经济等方面激烈的变化，上海的外贸有过上下波动，但它总是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并未改变它的经济优势。

上海不仅对外贸易旺盛，而且埠际贸易（包括转口贸易在内）也发展得很快。上海不但商业门类齐全，分工细，商业渠道多，而且交通便利，购销两便，因而国内各地的大宗货物如米、

麦、桐油、猪鬃、茶、蛋品、纸烟、药材等均以上海为集散地。据韩启桐在《中国埠际贸易统计(1936~1940)》一书中记载,一九三六年,上海对全国各通商口岸输出入贸易总值为八亿九千一百零一万九千六百九十一元,全国其他各通商口岸输出入贸易总值为十一亿八千四百七十万零四百四十九元,上海的贸易总值占全国的比重为百分之七十五点二。到一九四〇年,全国的数字为十四亿九千四百七十五万八千七百八十四元,上海的总值提高到十三亿一千五百四十一万零五百零二元,上海的比重上升为百分之八十八。

此外,还可以从部分货物的贸易值来看上海在旧中国埠际贸易中的突出地位和特殊作用。(见表5、表6)限于篇幅,我们仅从海关对轮船的贸易统计来看,铁路、公路承运的货物均不包括在内。

**表5 几种主要货物贸易值统计(输入)\***

(单位:1936年,元;1947年,千元)

	猪 鬃			棉 花		
	上 海	全 国	%	上 海	全 国	%
1936年	12,806,059	13,854,843	92.4%	59,525,446	65,433,670	91%
1947年	152,600,652	163,187,182	93.5%	1,612,874,730	1,956,174,333	82.5%

  

	丝			钨 矿 砂		
	上 海	全 国	%	上 海	全 国	%
1936年	2,849,215	2,862,529	99.5%	3,380,411	3,421,370	98.8%
1947年	20,699,396	29,627,767	70%	287,463	452,713	63.5%

\* 表5见韩启桐《中国埠际贸易统计(1936~1940)》。

**表6 几种主要货物贸易值统计(输出)\***

(单位: 同上)

	棉 纱			土 布		
	上 海	全 国	%	上 海	全 国	%
1936年	98,119,790	128,045,828	76.6%	4,144,322	5,474,904	75.7%
1947年	2,127,414,315	3,010,261,205	70.7%	233,285,348	248,259,961	94%

  

	钢铁及其制品			机器及其他零件		
	上 海	全 国	%	上 海	全 国	%
1936年	2,794,116	3,553,548	78.6%	637,554	795,273	80.2%
1947年	153,659,385	244,733,294	62.8%	36,245,319	44,167,015	82.1%

\* 表6见《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

上海的商品流转由各地商人通过各种商业渠道一直扩展到穷乡僻壤。如上海棉布商业就有天津帮、汉口帮、四川帮、广东帮、湖南帮、九江及江西帮、福建帮、青岛帮、芜湖帮等十余个地区客帮经营推销业务。其他米、茶、百货等等商品,情况大都相仿。一般货到上海后,比较容易推销出去,不至于“货到地头死”。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商品集散地的上海仍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九五〇年上海举办了土产交流大会,组织物资商品交流。参加购销的单位来自全国各个省市,人员达三百零五万,成交生意两千两百八十六笔,金额达人民币六千六百零一万元。

### 三、工业经济上的优势

随着商业的发展,上海的中小型工业(主要是轻纺工业、农副产品加工工业和船舶机器修理业等)得到进一步发展,而上海地区工业的发展,则又为商业的扩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工商业

互相促进,巩固了上海的经济中心地位。

上海是中国近代工业最早兴起的地区之一。至二十世纪初,上海地区的近代工业已初具规模。建国前各项工业均已在全国占绝对优势。根据上海经济统计研究所一九三三年统计:上海工业资本总额占全国百分之四十,工人数占全国人数百分之四十三,产值占全国产值百分之五十。另据谭熙鸿等编的《全国主要都市工业调查初步报告提要》记载,一九四七年全国有工厂一万四千零七十六家,上海有七千七百三十八家,占全国百分之五十四点九五;上海工人数为三十六万七千四百三十三人,全国为六十八万两千三百九十九人,上海占全国的百分之五十三点八四。

上海的近代工业中,以纺织、面粉规模为最大,此外,还有生丝、火柴、卷烟、机器等七十个行业。一九三三年,全国共有棉纱厂一百三十六家,其中六十四家在上海。全国卷烟厂约六十家,其中四十六家集中在上海。上海的民族机器工业在全国中的比重亦较为突出。(见表7)

**表7 1933年上海民族机器工业占全国机器工业的比重\***

	厂数	工人数	资本额(元)	总产值(元)
上海	456	8,082	4,228,007	13,897,724
全国	1,433	25,403	11,994,242	27,515,222
%	31.6%	31.8%	35.3%	50.5%

\* 见上海市工商局、机电一局机器工业史料组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第600页。

上海工厂不仅资本大,设备多,机械化程度也较高,使用动力机数与机器数占全国很大比例。据统计,一九四七年全国各大

城市使用各种机器总数三百十九万两千九百七十七台，上海使用各种机器数为两百零九万六千七百零八台，占全国的百分之六十五点七。全国各大城市使用各种动力机总计为八十二万两千两百七十二点四马力，上海使用的动力机为三十二万五千两百六十八点二马力，占全国百分之三十九点三。工具机床全国为两万四千六百三十四台，上海为一万一千六百十六台，占全国百分之四十七点一。下面从使用纱锭的情况来看。（见表8）

**表8 上海华商纱厂纱锭在全国的比重\***

（单位：枚）

	全 国	上 海	%
1894年	129,020	98,580	76.4%
1919年	658,748	216,236	32.8%
1927年	2,018,588	684,204	33.9%
1936年	2,746,392	1,105,408	40.2%
1947年	2,761,201	1,706,434	61.8%

\* 1947年数字见谭熙鸿等编：《全国主要都市工业调查初步报告提要》第34~37页，其他年份的数字见严中平著《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07页。

#### 四、生产技术上的优势

建国前，上海设有经济管理学科的大专院校有一二十所。再由于有一百多年发展工商业的经验，又吸收了一些国内外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这样就造就了一大批较多掌握近代企业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训练有素的科学人才和管理人才，锻炼出一支有着较高技艺、熟悉生产技能、仿制能力强的工人队伍。这些对发展上海的经济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因此上海产品在洋货充斥的国内市场中能站得住脚，有些名牌产品在国际市场



上也享有一定声誉,有一定的竞争能力,如飞虎牌油漆、ADK雨衣、华生电扇和天厨味精等等。

上海的工业企业门类较全,配套能力较齐,综合加工能力较强,专业化协作较好。以机械行业为例,很多小厂设备不全,但它们靠木模作、翻砂厂、打铁铺等等的协作,解决了这些工序的生产,从某些零部件制造开始,逐步做到能仿制某些新式轻纺工业的机器。

上海企业为了应付国内外激烈的商品竞争,在实践中掌握了商品的流通规律,根据经营传统建立了一些新的经营方式。例如,刘鸿生集团在一九三六年于上海成立了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社,控制了原料的生产和产销的数量。

此外,上海的现代化的经济组织无不齐备,有银行(据《中国银行年鉴》一九三六年统计,当时上海华资银行总行有五十八家,占全国银行总数百分之三十五)、票据交换所、交易所、信托公司、保险公司等机构,电讯及其他城市建设也比较完备,这对促进上海工商业发展也有很大影响。

上海的经济对全国的经济有着很大影响。上海通过资金和技术与内地城乡建立了广泛的经济联系、经济协作与经济交流。如:上海有很多企业采取在上海成立总厂、总公司,在内地设分厂、分公司的办法,把技术和经营管理的知识和经验从建厂之初就带到了分厂、分公司中去。如荣家企业在上海的面粉厂、棉纱厂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到原料产地的济南等地去办面粉厂,到郑州等地去办打包厂等企业,对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 上海棉纺织业简史

张廷霖

长江三角洲本为产棉区，自南宋末年以来，种植棉花者渐多，因之家庭中的织布业随之发展。加以水陆交通便利，每年从北方来此收买棉花或棉布者络绎不绝，在海通以前，松江、上海一带已成为棉花棉布交易之重地。鸦片战争后，中外互市，从外洋输入的棉纱棉布逐年增加。至十九世纪下半期，中国对外贸易之入超日益加剧，其中进口货除烟土外，以纱布为大宗，上海便成为纱布的集中地，中国手工织布业既被摧残，又使漏卮日甚。于是有识人士力主自设机械纺织工厂以图补救，其时清廷官僚中亦有同此主张者。自一八九〇年（光绪十六年）自设纺织工厂起，至一九四九年止，其间发展过程有如下述。

## （一）创业时期——一八九〇年（光绪十六年）至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

一八八二年（光绪八年），北洋大臣李鸿章奏定郑观应、龚寿图、戴恒等三人筹办上海机器织布局，资本四十万两，分招商股足数，议有合同条规，勘定厂址于上海杨树浦临江地带，内分织布、纺纱二部。一八九〇年（光绪十六年），一部分机器装就，先行开工，计有纱锭三万五千枚、布机五百三十台。开车之后，营业顺利，纺纱之利尤属优厚，于是李鸿章决计推广纺纱。一八九三

年(光绪十九年),李鸿章电囑驻英大臣薛福成购置十四支及十五支纱机百部。不料新纱机尚未运到,而织布局突于是年十月因清花间失慎起火,延烧全厂,损失达七十万两。

当局因织布局获利颇优,且有若干机器已购妥,屡次进行再兴计划,然官中出资无望。同年十一月,李鸿章奏调津海关道盛宣怀会同江海关道聂缉槩,负责恢复织布局。盛氏计划筹资百万两,阅一二月即已劝募足额,改称华盛纺织总厂,计有纱锭六万五千枚,布机七百五十台,其中一部分称纺织新局。后华盛纺织总厂屡经改组,三易其名,初为又新,继为集成,终为三新。辛亥革命后,盛氏恐财产被没收,改向香港当局注册,此即后来盛氏经营之三新纺织公司是也。纺织新局后改组为复泰纱厂,嗣又改为官商合办,终因不善经营而失败,转售于大股东聂氏,更名为恒丰纱厂。

在此时期,上海尚有棉纺织工厂四家:(一)华新纺织厂,由江海关道唐松岩所主持之轧花厂改组而成,计有纱锭七千枚,一八九二年(光绪十八年)开工。(二)裕源纱厂,计有纱锭二万五千枚、布机一千八百台,一八九四年(光绪二十年)开工,后在一九一八年售与日商,即内外棉会社之第九工厂。(三)裕晋纱厂,计有纱锭一万五千枚,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开工。(四)大纯纱厂,亦于一八九五年开工,计有纱锭两万零四百枚;一九〇五年(光绪三十一年)由日商租办,翌年收买,即上海纺织会社之第二工厂。

截至一八九五年底,全国已完成之棉纺工厂共计七家。除湖广总督张之洞所创办之湖北织布官局及湖北纺纱官局外,上

海计有五家，多为官办，虽间有商股参加，但中途多退出，改为官股。然官办纱厂其腐败情形更甚于商办，各厂总办皆系候补道之流，但知工于应酬，不理厂务。重要职员，非督抚大员所推荐，即系总办的私人，每有坐领干薪而不事事者，外间皆以“洋房师爷”目之。至于营私舞弊藉饱私囊者，亦所在皆有。在创业时期，官办纱厂之不振，此是主要因素。

## （二）外商侵入时期——一八九六年（光绪二十二年）至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

一八九四年（光绪二十年甲午）中日战争起，中国战败。翌年四月议和，签订《马关条约》，承认日商在中国通商口岸有设立工厂之权利。（中日《马关条约》第六款第四项载：“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订进口税。日本臣民在中国制造一切货物，其于内地运送税、内地税钞、杂课、杂派，以及在中国内地沾及寄存栈房之益，即照日本臣民运入之货物办理，自应享优例豁免，亦莫不相同。”）各国亦援据最惠国待遇来上海设厂，原来中国之纺织业全为我国人自己投资经营之事业，自《马关条约》订定后，外人藉其雄厚之资本、优秀之技术，来华经营纺织工业，中国尚在萌芽时代之纺织工业不能与之抗衡，以致在新式工业中最有希望的纺织工业大受打击。

先是甲午战争以前，清廷为防止外人在华设厂，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飭令海关道缉查外人偷运机器来华，更在上海特设纺织稽查公所，严防外人冒名走私，因此外人设厂之尝试未能实现，但外商对此始终未能忘怀。迨《马关条约》签订，日人即捷足

先登,在上海设立东华公司,购定杨树浦厂址,订购机器。迨锅炉运到上海,忽又发现将日本制成品运华销售比在华设厂更为有利,因之又将机器运回神户,建成钟渊第二工厂。日本虽暂告退,而德英美诸国商人,根据最惠国待遇条款,亦获得同样权利,纷纷来华设厂。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美商在上海设立鸿源公司,资本一百万两,纱锭四万枚(后归英国人承办,至一九一八年以一百三十万两之代价售与日商,即为日华纺织会社的第一厂)。是年德国商人设立瑞记棉纱厂,资本一百万两,纱锭四万枚(第一次欧战时,归英国人经营,改称东方纱厂)。同年,英人经营之老公茂纺织局及怡和纱厂亦完工开车。老公茂资本七十一万五千八百两,纱锭三万零五百八十四枚(一九二五年由日资公大厂收买,改名公茂)。怡和资本一百五十万两,纱锭五万枚。外商于此短时期内,成立四大厂,总计资本四百余万两,纱锭十六万余枚,规模宏大,实力雄厚,中国厂家远不能及,《马关条约》为害之大,可见一端。外资四大厂初设时,获利颇厚,后来连续三年,无一家分派红利,因此外资设厂高潮暂时停止。一九〇七年英商怡和经理与华商合办之振华纱厂,不久即归华商独立经营。以后直至欧战时期,英美商人在华纺织工业中无甚进展。

至于日商,自《马关条约》后,即拟着手进行,后以在华设厂不如以制成品运华销售为得策,故东华公司一度停止,已如上述。一九〇二年(光绪二十八年),日资三井洋行首先收买兴泰纱厂;一九〇五年(光绪三十一年),又租办大纯纱厂,翌年四月复予收买,更名为三泰纱厂。一九〇八年(光绪三十四年),将三

泰与兴泰合并，组织上海纺织会社，兴泰改称上海纺织第一厂，三泰改称第二厂。因上海纺织会社获利，至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日本的内外棉会社亦来沪开设内外棉第三厂，翌年又在沪开设内外棉第四厂。又九成纱厂初为中日合资，在一九〇七年开车，至此归日资独办，改称日信纱厂（一九一六年归华资单独经营，改名恒昌源）。

中国厂家自一八九六年（光绪二十二年）至一八九九年（光绪二十五年）四年之内，获利颇丰。当时因受甲午战败之刺激，全国人民情绪激昂，在抵制洋货运动中，设厂运动一时高涨。在上海有兴泰纱厂，于一八九六年成立（一九〇二年为日商收买，如前述）；裕通纱厂在一八九八年开办，计有纱锭一万八千二百枚。但自一八九九年后，因棉花腾贵，人工来源亦感不足，且因一九〇〇年庚子之役，金融紧缩，交通阻滞，设立新厂遂觉困难。故自一八九九年至一九〇五年的六年中，无一新厂设立。

华商设厂第二高潮在一九〇五年以后。当时中国市场因受日俄战争之刺激，布销大畅，纱利突增，复引起国人投资设厂之高潮。历年增设的厂不少。就上海而论，一九〇五年振华纱厂成立，计有纱锭一万一千六百枚，初为中英合资，后归华资独立经营。一九〇七年九成纱厂开办，计有纱锭九千四百枚，初为中日合办，最后改归华资，易名恒昌源，已详前。一九〇八年设立同昌纱厂，计有纱锭一万一千五百枚。一九一〇年设立公益纱厂，计有纱锭两万五千六百枚，布机三百台（一度中英合资，后归华商接办，最后由英商怡和收买，合并于怡和纱厂）。当时华资纱厂多因资金不足，或与外资合办，或开工后经

营陷于不振，而以工厂设备机器等抵借外债，结果为外资所并吞，能自拔者殊不多见。自一八九七年以后，华资各厂皆以纱业获利远比织布优厚，故专营纺纱，只公益一家兼营织布。其经营状况，多尚平稳，但一方面须同外商对抗，一方面因资金不足，须随时筹划流通资金，其艰苦情形，自不待言。此时日人经营的纺织工厂逐年增加，遂与在沪设厂最早的英资纺织厂，成对立竞争之局势，此为本期特著之事实。

### **(三) 繁盛时期——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至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

一九一四年八月，欧战爆发，向称世界棉纺织业之霸王的英国，举国上下竭尽全力于战争，纺织工人之前赴战场者逐渐增加，原料供给困难，因之纱布生产大为减少。我国进口棉布向来自英国者为大宗，至此遂告缺乏，棉织品市价随之腾贵，此为中国纺织业繁盛之机会。自一九一四年以后，新工厂之设立与纱锭之增加，如雨后春笋。尤其此时期的最后三年，为华商设厂的最盛时期。兹将此时期上海所设立的各纺织厂，按年择要分述如下。

一九一六年，申新纺织公司第一厂，资金三百万元，纱锭三万九千余枚，厂址陈家渡白利南路。

一九一六年，鸿裕纺织公司，资金一百八十万两，纱锭三万八千四百枚，厂址麦根路。

一九一八年，溥益纺织公司，资金一百万两，纱锭两万六千余枚，厂址西苏州路。

一九一八年，厚生纺织公司，资金两百万两，纱锭五万零六百枚，厂址杨树浦西湖路。

一九一八年，德大纱厂，纱锭一万九千余枚。

一九一九年，宝成第一纱厂。

一九二〇年，统益纺织公司，资金一百五十万两，纱锭四万四千五百余枚，厂址莫干山路。

一九二一年，恒大纱厂，资金一百万元，纱锭一万五千五百余枚，厂址浦东杨思桥。

一九二一年，永安纺织公司，资金六百万两，纱锭四万五千枚，厂址杨树浦引翔港。

一九二一年，永豫纱厂，资金四十万两，纱锭一万两千枚，厂址小沙渡路。

一九二一年，振泰纺织公司，资金八十万两，纱锭两万零九百余枚，厂址曹家渡西。

一九二一年，鸿章纺织染厂，资金一百五十万两，纱锭两万零七百余枚，厂址麦根路。

一九二二年，崇信纺织公司，资金一百五十万两，纱锭三万四千枚，厂址谈家渡浜北。

一九二三年，大丰庆记纺织公司，资金一百五十万元，纱锭两万零七百余枚，厂址潭子湾苏州河边（此厂虽系一九二三年开办，但筹备在前，故附列于此时期。又上列资本额及纱锭数，系据一九二八年调查之数，与初设时数额或有出入）。

华资纱厂虽在此时期风起云涌，纷纷设厂，但多数因流动资金短少，一遇挫折俱不能忍受。且进展过速，销路未曾打开，自一九二〇年秋季即呈萧条状况。当时纱厂联合会征求各厂意见，决议集体限制生产，减少工作时间，以渡难关。至一九二三



年，衰落达于顶点。

以上所述，皆系华资纺织业在此时期之过程。日人在沪经营的纺织业，则因欧战期间，日本财阀得到庞大之战时利润，棉纺界纷纷在国内扩充设备，来沪投资设厂并不十分踊跃。总计自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四年之内，仅在战前已设立之内外棉增设新厂三所，上海纺织会社增设布厂纱厂各一所，另在上海新组成之日华纺织会社收买美商鸿源纱厂一所，四年中仅增加纱锭二十万枚左右。至欧战告终，日本国内棉织业渐呈衰落现象，而华商方面正值棉纺织业繁盛时期，加一九一八年中国修正关税，向来棉纱进口仅征单一的从价税者，一律改为复杂的从价税，以纱之粗细定征税之多寡，于是日本厂家认为对华输出棉纱不如在华设厂可免进口税之为愈，因之积极在华设厂，造成一九二一年及一九二二年日资来华设厂之高潮。总计自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二二年之日厂，单就上海而言，有如下述：一九一五年，内外棉增设第五厂，纱锭六万五千四百余枚。一九一六年，上海纺织设立第三厂，纱锭五万余枚。一九一八年，日华纺织收买美商鸿源纱厂，改称日华第一、第二厂。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日商设立公大纱厂；日华纺织会社设立第三、第四厂；内外棉添设第十二及第十三厂；东洋纺织会社设立第一、第二、第三厂；同兴纺织会社设立第一、第二两厂，前者纱锭四万一千六百余枚，后者两万八千枚；丰田纺织会社设立第一、第二两厂，纱锭六万零七百余枚；东洋纺织会社设裕丰纱厂，纱锭四万五千枚。

至于德美英三国在沪之纺织工厂，早在一八九五年及一八九七年分别设立，但德商瑞记纱厂在欧战时由英国人经营，改称

东方纱厂。美商鸿源纱厂设立不久，即归英国人承办，嗣于一九一八年售与日商日华纱厂，故此时保持余力者，只英商而已。然老公茂纱厂后归日商经营，改名公茂；杨树浦及公益两纱厂与怡和纱厂合并，其他仅一东方纱厂。故英商在沪之纺织事业只余怡和及东方两厂，其纱锭数未超过二十万枚，与日商比较，不及远甚。据日人井村薰雄在其所著《中国之纺织业及其出品》一书中云，外人（指欧美）历年来经营纱厂者，非但不事进取，更认为事业已无发展余地，此种消极观念适与日人积极进行在华设厂计划相反。美人经营之纱厂首先失败，德纱厂接踵而亡，惟英商稍能保其余力，维持现状。一九一四年，怡和纱厂之杨树浦工厂实为最后之新设工厂，以后未见有其他纱厂设立。故在华日资纱厂如就出品之销路与公司之基础而言，实执中国纺织界之牛耳。华资纱厂虽不无发展，但其资本及工厂管理方法不及日厂远甚。欧战后，中国人民群起反抗日本侵略，抵制日货运动陆续不断，商人每乐于推销华资纱厂出品，而排斥日厂出品。以此日人之纺织业虽处优胜地位，殊不能常获厚利。

#### **（四）衰落时期——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至一九三七年（民国二十六年）**

华资各厂在一九二〇年秋季已现衰落景象，至一九二三年几有不能维持之势。而日人在沪所经营之棉纺织业则反是，如日华、内外棉俱添设新厂。一九二四年，日本棉花会社更在上海设立泰安纱厂。一九二五年，日华纱厂收买华商宝成一二两厂，公大收买老公茂一厂。自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一年，日商虽不再在上海设立新厂，但对已设各厂仍从事扩充，故其时日厂蒸蒸

日上，称霸一时，多数厂还实行联合，实力雄厚。而华资纱厂除少数外，均系孤军奋斗，其财力多不充实，自难与之对抗。自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七年，华资各厂群在内地小城市开办小厂，日资则向华北扩张。华资在上海设立之新厂，只有上海纺织印染厂。中国的整个棉纺织业，备受日资压迫，气息仅存，而日资各厂则日趋繁荣。

其时中国尚有不幸之天灾发生，如一九三一年夏初，长江流域发生六十年未有之大水灾，殃及十余省，面积达一百五十余万平方里，因之金融紧缩，销路停滞，已无发展余力。当此灾患正深之际，“九·一八”事变又起，关内外商业阻滞，上海金融大受震撼。翌年，上海又发生“一·二八”战争，沪东及闸北纺织工厂，或受炮火摧残，或被迫停工。总计上海华资各厂，约有一百万枚纱锭停转达八、九星期，春销旺季之纱布市场亦被迫停市至三月之久。正在此时，全世界发生经济恐慌，国内农村破产，棉业衰落，再加以日资纱厂对中国纱厂倾轧破坏，衰落程度日甚一日。而在华日厂资本雄厚，机器设备新颖，技术亦较优良，处处远胜华厂。例如廿支纱每包成本，华商高出日商百分之一百十四。在同一市价下，日厂成品可获大利，而华厂能得微薄利润已算大幸，或至亏损。就利息言，华资厂家所付利息，大都在八厘至一分之间，而日厂所付利息只在三厘以下。就税率言，日厂所付之税远较华厂为轻。又华厂机器设备均较陈旧，纺织机器之寿命最长者不过十五年至二十年之间。据一九三三年调查，华资纺织厂各种机器半数以上已超过十五年，而粗纺弹棉机器等，四分之一以上竟已超过二十年，精纺机三分之一以上超过二十

年。机器既如此陈旧，工作效率降低亦可想见。就工作方面言，日厂工作人员少而产量大，华厂则相反。外加日本在华政治势力之优势与日本金融资本之援助等种种因素，遂使当时华资棉纺织业成为日资之附庸，欲求发展，实属艰难。

一九三三年四月，华厂以业务萧条，决议减工。十月，全国经济委员会设棉业统制委员会以图补救，然亦不能挽回颓势。一九三五年六月底，华厂中全部停工者有之，减工者亦有之。从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七年三年中，每年下半年之停工周数，在日厂始终不及一周，而华厂则有高至七周以上者。至若全工开动率，日厂始终在百分之九十六以上，而华厂则从未及百分之八十。总之，如将短期或长期停工各厂合计在内，此时期中能始终维持营业之华厂恐不及十家，日厂打击华厂之猛烈，即此可见。

#### **（五）抗战时期——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

一九三七年七月，对日抗战全面爆发，战区日益扩大。八月十三日上海战事起，除租界一部分初未侵入外，沪东闸北均被日军侵占，华资纱厂损失极大。虽有将一部分机器移至内地者，但为数极少。在上海各厂全部停工，一部分开车者亦时断时续。当时华资纱厂由战区迁至后方者，有郑州之豫丰、武汉之裕华、申新第四厂及沙市纱厂。此四厂合计纱锭约十余万枚。此外尚有战前订货一批，经香港辗转内运，约有纱锭近五万枚。两项合计共廿余万枚。武汉沦陷后，后方交通困难，战时衣着所需，不得不取给于小型纱厂。截至一九四五年胜利前，川陕滇桂湘等数省共有纱厂五十五家、纱锭二十八万枚、布机两千余台。至抗战后期，汪伪承日军部之意旨，设立商业统制会，凡持有纱布者一

律由商统会收购，其价格经商统会核定后，由伪中央储备银行发给分期存款单，折合黄金作价，到期向伪中央储备银行领取价款。违反此命令者，除将货物没收外，并须处罚。至此，上海之零星纱布交易亦完全停止，个人持有整匹布者，每多剪开分藏，否则恐遭不测之祸。故在此时期纱布之生产固无可言，即交易亦完全停止。

至于日资纺织厂，在上海战争时期亦有损失，其纱锭约损失二十二万锭，全部停工，翌年始有复工者。

#### **（六）自抗战胜利至解放——一九四五年八月至一九四九年五月**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后，上海敌伪工厂由国民党政府先派特派员飞沪接收。至十二月，按经济部纺织事业管理委员会规定，组织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由国民党政府拨给法币十亿元，同时将敌伪工厂中所有接收物料原料等，估值一百九十三亿元，并入该公司作为资本。该公司即于该年十二月五日，在重庆举行第一次会议后宣告成立，开始工作。翌年一月二日，接管在华敌伪纺织工厂，截至一九四六年底，共接收纱锭一百七十八万五千四百八十枚、布机三万八千五百九十一台。其中上海纱锭八十八万七千三百六十四枚，居全国接收厂之半数，布机一万七千五百四十八台。所有私营各厂，也筹措流动资金，从事整理，逐渐开车。至一九四七年十月，上海公私各棉纺织厂，日夜班共开纱锭一百四十二万一千余枚、布机两万四千一百台。其中只纺建公司因政治上关系，得到种种便利，比较发展。而私营工厂尚无法打开难关。自胜利至一九四七年间，国民党政府经济部先后有

棉管会与纺调会之设立,其所标榜的主要任务为充裕原料、增进生产、掌握纱布物资、合理配销纱布、促进纱布外销,以及取缔囤积投机,等等。结果终因原料缺乏、电力供应困难,生产无法增进,以致求过于供。于是投机者乘隙而入,花纱布之价格猛涨无已,加以豪门官僚因法币价格日落,加入投机,更使所谓管理政策与调节方案破坏无遗。

当时纺织业本身困难共有四种原因:(一)原棉供应不足。全国纺织业共有纱锭四百五十万枚,其中开车者为三百六十万枚,每年需要原棉一千零八十万担。此外手工织造业尚需二百五十万担。故原棉之需要量在一千三百万担以上。一九四六年,本国棉产为七百四十三万担,外棉输入及联总所赠共六百八十万担,所以尚能勉强应付。至一九四七年,国棉产量虽比上一年增加百分之五十,但因内战影响,交通阻滞,可能运至使用地区的数量,不到上年的半数,不足之数约达四百五十万担(合一百五十万包)。如此大量原棉,何能全数仰给于外棉,故纺织生产只有日益减少。(二)电力不足。由于运输交通不畅,造成煤斤供应减少,加以电机设备不足,因而电力问题非常严重。中纺青岛各厂因缺乏煤斤,由局部停工而至全部停工,即是一例。就上海言,煤斤虽一时尚可维持,但电机设备因战事关系,多年久失修,时时发生故障。国营民营各厂应该每月生产棉纱八百万件,至一九四七年下半年,仅产三万余件,约减产百分之五十七。(三)机锭设备陈旧。当时纺织工厂设备多属陈旧,或待修缮,或待补充,欲求大量生产,更须增添纺锭。但因外汇难得,各厂非但不能增添新机器,而且将前年向国外订购者转售于他国。如申新

纺织公司将已订购之十一万枚纱锭转售于他国，即是一例。(四)生产成本上涨基于成品价格上涨。从前因生产成本低，纺织成品价格较高，所以纺织业比其他各业稍有发展。至一九四六年则反是。生活指数日高，工资激增，同时原料来源大感困难，原料价格高涨无已。例如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下旬，棉花上涨率为百分之十九，而同时期之纺织成品价格上涨为百分之十三点五。照此情形，生产无法进行。加以当时币值日落、金融混乱、战区逐渐扩大，从事纺织业者俱束手无策。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五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会议通过花纱布管理委员会组织规程，并于二十九日公布全国花纱布管理办法。此管委会的业务范围甚广，举凡棉纱棉布之代纺代织，花纱布之统购统销、输出输入，以及纱布之价格核定、军需供应、生产辅导等项，均由其管理。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在上海正式成立花纱布管理委员会，标榜“统购统销、代纺代织”，执行对花纱布严厉的统制政策，且任命与此事业毫无关系的旧官僚为主任，有识人士早断其无能为力，不过藉此名目，增设一官僚机构。上述四种困难一时都无法解决。特别是花纱布管理委员会设立后，其入手办法，首先禁止棉商厂家收买棉花，只委托纺建公司独家收买，结果厂家缩手，棉商大哗，几经交涉，始有给证采购办法，但时日迁延已久，农村棉花分散各处，遂使棉荒情形更加严重。至于代纺代织，因所购原料不过万担，无法普遍分配，只能就各厂原料确实不继者，以成品相交换，总算接济了少数原料，实际上不能算代纺。所交换得来的成品，交由纺建公司销售，纺建售纱本来掌握着市场大权，至是民营一部分成品也归纺建开售。所谓花纱布管理，如此而已。结果花

纱布生产因管理而反见减少，市价也愈管愈高，不但为社会所唾弃，即国民党政府内部亦有不满意者，至八月底，只得裁撤。

此一年中，原棉缺少已如上述，所赖以勉强维持者就是美国棉花，约计三十余万包，由行政院美援运用委员会与美国经济合作分署，共同组织美援花纱布联营处，负责支配。对第一批棉花六万余包，公布分配原则八项，按照全国纺锭平均分配。表面上似尚公平，但实际便宜海口各厂，而内地较远之厂毫无沾润。因规定须在海港仓库解交纱布，然后领取棉花，不但手续繁琐，且内地各厂须负担两道运费，太不合算，因此放弃不领。即就上海已领援棉各厂说，此次美棉品质参差不齐，规定折算工缴亦极苛刻，故所得实际利益殊不及预料之大。按代纺交换的比例，原管理办法以二十支纱为标准，固定在七百十二磅半原棉交换量上。其中每件纱的工缴利润占原棉两百五十九磅半，依规定价格折合币值付给工厂。但各地物价高低不同，机料物料等成本亦有极大差异，加以工厂规模有大小之别，性能有高低之分，需人工有多寡之别，今工缴计算方法作此硬性规定，则各工厂所得之利益每因地区或规模大小而互异。当时民营各厂，对此硬性规定亦不满意。管理办法之最不合理者，为纱布出口反受限制。当时对外贸易萧条已极，唯一希望只有纱布在海外尚有市场，照理自应奖励出口，可以多换外汇，但管委会限制纱布出口只能在各厂生产量百分之二十的范围内，并须各厂自向海外寻觅出路。照此限制，实际上能作出口贸易者不到十分之一，对此倒行逆施，真是怨声载道。

幸而不久全国解放，纺织事业得以走上复兴和繁荣的道路。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广大职工的积极努力，棉纺织工业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单就纱锭来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就新增了两百零一万枚，等于建国前六十年间建成的五百万锭的百分之四十。就生产方面言，经过一年多的恢复和发展，到一九五一年就生产了棉纱两百六十八万三千件、棉布三十亿五千八百万米，都超过了建国前最高年产量。一九五二年是恢复时期的最后一年，棉纱产量三百六十二万件，比建国前最高年产量增加百分之四十八；棉布产量三十八亿三千万米，比建国前最高年产量增加百分之三十七点八。一九五七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虽然上年棉花歉收，但棉纱仍生产四百六十五万件，比建国前最高年产量增加百分之九十；棉布生产了五十亿五千万米，比建国前最高年产量增加百分之八十以上。一九五八年棉纱共生产六百一十万件，比建国前最高年产量增加一倍半；棉布共生产五十七亿米，比建国前最高年产量增加一倍多。

## 聂缉槩父子在上海办纱厂

谭 声 钜

### (一) 恒丰纱厂的来历

一八九三年(光绪十九年),聂缉槩(字仲芳,湖南衡山人)交卸他做了四年的苏松太道(即一般人所称的上海道),亏空公款达八十余万两,查出其中一大部分是由账房徐子靖侵蚀的,他委派另一亲信账房汤癸生向徐清查追缴。此时他升任浙江臬台,势力又大了些,徐子靖不得不把侵吞的公款吐了出来,陆续交还汇丰银行、开平煤矿的股票及飞鲸轮船一艘并码头在内,并将一些珠钻珍宝尽行变卖,清偿了亏空公款的一部分。徐子靖交出的还有纺织新局的股票,原值五万四千两,这些股票在那时已经好几年不分股息,时值不到三成,欲变卖而无人承受。因此汤癸生建议由他与聂缉槩合作接办纺织新局。聂缉槩以自己身居方面大员,在法律上不能经营商业,于是授意由汤承租办理,同时叫他的第三子聂其杰(云台)做经理,工厂改名复泰。

复泰改营后,渐有起色。不久,汤癸生死,由其族人汤寿潜(蟄仙)与聂氏洽商,仍申前议,汤四成、聂六成合办,共计资本八万两。复泰与纺织新局的租约本定六年,后来改为四年,到一九〇八年期满。这四年之间,盈余达十万有奇。纺织新局见有利可

图，决议收回自办。但这时忽值花涨纱跌，势须亏折，旧股东无力还债，决议把厂拍卖。其杰经营了四年，认为前途大有可为，于是就由聂家出价三十二万五千两买了这个厂，并把这个厂改名为恒丰，这就是一般人所称的恒丰纱厂。这个厂仍由其杰当经理，并且逐渐发展扩充。此厂在上海各纱厂中，规模虽不算大，但系国人自营的最早一批纺织厂之一，它的来历表明了我国民族工业的兴起与官僚、地主有着一定的联系。

## (二) 昙花一现的大中华纱厂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的内外棉和英国的怡和、隆昌几家纱厂，在上海扩展势力，一日千里，几乎垄断了我国的棉纺织品市场。一九一九年，恒丰纱厂聂其杰、聂其焜(潞生)兄弟，眼看这种情形，就以振兴实业、挽回利权为宗旨，凭着他们经营恒丰纱厂的经验，发起创办一个以国人自己资本经营、规模比较大的纺织厂，来同外国资本竞争。他们定名这个组织叫大中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大中华纱厂)，股本定为九八规元银一百万两(约等于一百四十万现洋)，分一万股，每整股一百两，零股十两。招股章程一出，认股者纷至沓来，短期内就认足缴齐。他们的原意，每股定得小一点，好让只有小资本的人也来参加，免得股权落于大户之手，故当时有东北某巨商要加入五十万两，他们拒绝了。

股款既已足额，依照计划，一面在吴淞蕴藻浜购地七十二亩兴建厂房车间，一面由英商怡和洋行经手向英国订购纺织机器，这批机器是当时英国名厂的最新式产品。但因所购蕴藻浜地皮

原系水稻田，地势低洼，建造厂房车间必须填高，以致费用超出原定预算，又值英镑突然高涨，机器结价时，也超出预算。同时，组织规模既大，人事也随之庞大，开支浩繁，也超过预算。由于这些因素，所收股款都在筹备期间用罄，还有负债，于是决定添招股款五十万两补充。可是这次招股的情况与第一次大不相同，认股的不象上次踊跃，结果只收足三十万两左右。

一九二〇年下半年，厂房车间竣工，机器也运到安装，一切筹备都已就绪，正式开工。总经理是聂其杰，副总经理是尹任先，恒丰纱厂工程师纺织专家汪孚礼为总工程师，负责生产业务。该厂原来计划最大的设备量是十万纱锭，所以在英国所订定的发电机就是十万锭子的动力设备。这时开工虽只开足四万锭子，可是在当时上海的纱厂中，能够开足四万锭子也就算生产能力最大的设备了。

因为第二次股款招不足额，营运资金发生困难，势成骑虎，只好举办公司债，向银行团抵借款项，以资周转。这是一个饮鸩止渴的办法，银行借款利息既高，银行团又藉口监督会计财务，滥荐、滥派人员到厂，增加厂方开支。这时日英两国纱厂眼见这个纱厂开工生产，因妒生根，联合起来故意抑低纱价，力图排挤。以此种种原因，厂方负债累累，不能维持。一九二四年一月，经股东会决议停工清理，破产拍卖。这个厂自正式开工以至停工清理，为时仅只数月，最初扩展至十万纱锭的计划成为泡影。

当该厂拍卖时，日英纱厂、尤其是日本资本家都想攫为己有，愿意稍出高价盘进。聂氏兄弟针对这一阴谋，提出拍卖的两个基

本原则，一是不卖给外商，二是承受者不能改换“大中华”三字招牌，因此外国资本家打消了想买这个厂的念头。

停工之后，厂中有出无入，数月之间积欠银行团之款愈积愈多，一时竟无受者。最后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只好以一百五十三万两的廉价，忍痛售与永安公司经营，改名为永安纱厂，这时聂氏兄弟也无法坚持他们的原则了。拍卖所得价款，尽先归还银行团还不够，各股东分文无着，所有股款悉数付之流水。聂氏兄弟子侄数十人都是这个厂的股东，就是他们家里的男女工人也都是这个厂的股东，他们之所以添加股本，本由聂氏鼓舞的关系，现在纱厂失败拍卖，多年劳动所得全部落空，大家都向聂氏兄弟哭诉，聂氏无法，只好把他们的股款赔出了事。大中华这个纱厂，只缘计划欠妥、经营未善而失败，受损失的股东人数甚众，而聂氏自己的损失则更大，总计在二十万两左右。

## 旧中国的火柴工业

董兆龄口述 葛祖兰整理

火柴业在我国创办甚早，上海叶成忠父子开设的燮昌火柴厂，在清光绪年间即已名闻全国，嗣后各地火柴厂相继而起。直至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之间，有瑞典进口火柴来华倾销，卖价低于国货。外货一时充斥市场，国货莫能与之抗，不但上海如此，全国亦莫不如此。

上海原设有江苏火柴联合会，广东火柴业来信要求联合会召开全国火柴业会议，集群众的智慧，齐来对付瑞典同业的侵略。联合会据此向全国呼吁，全国火柴业欣然响应，远地省份如东三省等亦都派代表前来参加。开会讨论后，成立全国火柴联合会，并公推代表到南京政府主管部请愿，主管部顾虑重重，一筹莫展，后来总算达到将火柴箱板铁路运输费减等要求，聊资补益。由于主管部软弱无能，所以瑞典火柴依然充斥市场，国货无法畅销。

一九三二年瑞典“火柴大王”伊佛·克鲁格亡故，瑞典厂家由美国企业出面，并在美国注册，改其牌名为“美光”，于是美光火柴又不胫而走，在我国各地畅销。南京主管部熟视无睹，驯致外资进一步在我国境内设厂制造。初，日本资本家在上海、镇江两地设有燧生火柴厂，美光主持人出重价把它收买过来，在上海

者改称美光火柴厂，在镇江者改称内河贸易公司，并从瑞典运来在当时称为最新式的连续自动机，大量生产火柴，倾销更加厉害，国货更不能同它抗衡。后来日资又在青岛、天津两地开设火柴厂，在青岛者有青岛、山东、华祥、东华、益丰五厂，在天津者有中华、三友两厂，虽未备有瑞典发明的连续自动机，产量不多，然除在我国境内制造外，更有从日本运来倾销者。彼时南京政府已实行统税，而日本火柴商有漏税情形，甚至连进口税亦有漏交者。瑞典企业倾销，日本企业漏税，南京政府均置之不问，国货工厂当然大吃其亏。当时全国火柴联合会曾向税务署要求制止日本厂商漏税，署吏说除同日本打一仗之外，没有第二个办法可以制止它们漏税。其软弱无能，不减于南京主管部。

上文所说的全国火柴联合会，是在一九二九年成立的。当时江苏省有三个大厂竞争得非常厉害，所谓三大厂，即苏州鸿生火柴厂、上海荧昌火柴厂、周浦中华火柴厂。鸿生厂主人刘鸿生，认为在外资侵略下，国货厂互相竞争，同室操戈，更令外资得利，乃倡议三厂合并，协力同心，共御外侮。经彼此同意后，于一九三〇年七月合并为一厂，成立大中华火柴公司。后来小厂大明火柴厂、大华火柴厂、中国火柴厂等，如雨后春笋纷纷创立，彼此竞争，不减于前。上海如此，全国皆然，驯致供过于求，大量剩余，只得贬价，以求脱手，结果彼此都亏。刘到此方才觉悟，合并无济于事，乃另拟统制方案，建议成立中华全国火柴联营社，备文向南京主管部请求采纳。由于政府无能，不肯得罪外商，故邀日厂加入联营社，与之订立同意书，并让给它十万箱的产额，形成中日合办局面。为求彻底统制起见，又邀挂美资牌子的瑞典资

本加入,但瑞方认为此事尚须考虑,暂时不允加入。

联营社的主要任务不外下列三端:(一)限制设厂;(二)规定产额;(三)集中出售。实行后,鲁西十八家小厂对联营社社章多方指摘,异口同声反对垄断;彼此争辩极为激烈。不久,抗战开始,不了了之。当时联营社虽冠有中华全国字样,然实际是中日合办,除由刘鸿生任理事长、徐致一(原任大中华火柴公司协理)任总经理外,另设副总经理一席位置日人植田贤次郎,月薪特别丰厚,约近当时法币三千元之多。监事中除陈伯藩(后为汉奸)外,亦有日人小林忠雄。联营社成立后一年,日本侵华,抗战开始,社务无形停顿。植田返日,翌年又来。上海原设有联营总社,总社之下设有分社,植田来后,大权独揽,擅把总社迁到天津,上海只留分社,并任他的私人秘书田口武夫为分社经理,同时用了许多日本人,而他自己则来往于津沪之间,总其大成。到此,不但全国火柴业受尽若辈侵略,对联营社机关也被他们霸占过去,中日合办名存实亡。原料也都从日本运来,肆无忌惮,为所欲为。植田原想把运来的原料统制在自己手里,日原料商不服,勾通社内日人反对植田,要把他逐出社外。原料商仗军人势力,植田仗大使馆势力,各有背景,互不相让,闹得乌烟瘴气。结果如何,不知其详,反正对国货厂无丝毫利益可言,是可以断定的。

以上情况是友人董兆龄对我口述的。他从学校毕业后,初任浙江兴业银行上海总行文书,后转入北京泉通银行任会计主任。后又历任江苏火柴联合会秘书、全国火柴联合会秘书、大中华火柴联合会总务主任、中华全国火柴联营社总社运销主任。抗战期间他应刘鸿生之邀,任重庆火柴专卖公司(后改称专卖事业



管理局)业务处长。胜利后回沪,任火柴同业公会主任秘书。以患高血压症,记忆力衰退,所以口述到此而止。虽所述只是大概情形,然都为他亲身经历,故我乐为之记。

# 上海绒线业发展经过

沈莱舟 口述 朱梦华整理  
吴慕濂

## (一) 毛纺织厂的发轫

我国西北一带草原地区，一向出产羊毛，可惜未能充分利用，除硝皮做衣服及打毡之外，并无其他办法。海通以还，欧美各国收购我羊毛，捆载而去，一经加工成呢成线，复载运而来，一转手间，获利倍蓰。当时有识人士忧虑漏卮不塞，终酿贫困，力谋挽救之方，于是有兰州织呢局之创设。该局由左宗棠发起建设，甘肃产毛最多，为就地取材起见，故厂址择在兰州。一八七八年起建造，到一八八〇年大部完成，纺织机向德国订购，延聘德比两国工程师设计安排。这是我国最早设立的一家毛纺织厂，建厂、排机、管理、运输都没有经验，一切要请外人指点，故厂方诸事隔阂，互相推诿，建厂进程极为迟缓。更兼舶运机器装到汉口上岸，从汉口至兰州，路程既远，又有崇山大川阻隔，载运尤为困难。左宗棠为此特调甘军数千，随同脚夫搬运，沿途辟路架桥，化了不少人力物力，才将全副机件运达兰州。试车开工后，织成呢绒，成绩并不良好，逮左氏离甘，织呢局渐趋停顿。

在兰州织呢局告成之后的一八九〇年，上海又有一家日晖

港织呢局出现。该局系官商合办，发起人为张之洞、郑孝胥，机器购自德国西门子，厂中设备较为完备，并自己发电。呢绒出品，牌号“火车”，全用中国羊毛织造。但以经办不得法，所出货品质地既差，产量亦少，旋即转让与刘鸿生经营，更名曰章华。该厂改组后，逐渐发展，出品也不断改进，对抵制舶来品起了一定作用。由此可见官办企业都是虎头蛇尾，终无结局。推其开办之初，即流于形式主义，所谓官样文章、装点门面，初不问其后果。洎乎创办人一去，更无继起之人，清末官场腐化，于此可见一斑。

## （二）毛冷的销售

毛冷这个名词，在现今一般人听来，好象有些陌生，其实就是妇女扎发髻的细绒线，到后来有了编结衣裳的粗绒线，才把它的名称分别开来，将早先的细绒线叫做毛冷，将后出的粗绒线叫做绒线。这绒线的名称，算来不过起了三十余年，而广东人至今还总称毛冷，并不习惯称绒线。

毛冷和绒线的分别，除线条粗细外，原料支数亦有不同，大约绒线原料为六支到七支半，毛冷原料则为十支以上的细毛，而纺开司米线做哗吱、围巾、袜子等精细品的原料，则更需纺到三十二支、四十二支和六十支。计算毛线支数，有大陆式（法、德、波兰）和英国式两种，其记号大陆式为 mm，英国式为 s，二者换算，则两股三十二支 s 等于两股二十八、七支 mm。

距今八十年左右，西洋毛冷开始进口，由各洋行批发经售，其时德国老鸭牌、银枪牌，开箱时往往得到小镜子、银表和洋

刀之类，用以吸引顾客。还有波兰的宝星牌，亦由德国洋行经销。英国有灯笼牌，由麦边洋行出售。随后始有日本之双喜牌和龙凤牌、英国之BB蜜蜂牌等绒线进口，我国人编织绒线衫，亦从此开始。上海商人销售毛冷的店铺，起初有三家，都开设在老北门外兴圣街，一为横林(属武进)人张鉴英开设之张源盛，一为宁波人金永庆开设之金源茂，一为江阴人薛宝润开设之隆兴昌。这三个创业的老板，出身都很贫苦，张鉴英是个小铜匠，专门替人做修配工作；金永庆是个卖花带的；薛宝润是个扛力的工人。他们都得到机会，在兴圣街上开设小铺子，发售纱红头绳、棉纱线、硬衬、吊袜带、麻线、桅灯等物品，称为麻线杂货店。后来大批毛冷进口，外国洋行到这些杂货店兜售生意，开始试销。这种毛冷质地柔软，颜色鲜艳多样，以土产纱红头绳与之并比，自觉黯然无色，以故试销不久，大为国人所欢迎，全国各省行销殆遍。虽则这种毛冷，不过妇女用以扎头发及嫁时嵌扎之需，用途似不甚广，可是推销面广，数量可观，而承接洋行经手销售的，仅此兴圣街上三家铺子，他们发展迅速自在意中。

后来他们店中营业重点都着落在毛冷上，店名即改为毛冷号。此外白罩桅灯销售数量亦是巨额，此项货品，直接向美国订购，经常是每批五千箱、一万箱，销路分内河帮、小长江、大长江三类。内河帮多由班头航船带货；小长江系指汉口以东长江各口岸，货物由沙船江船驳载到庄口发售；宜昌以上诸码头，称为大长江，江流湍急，大艚不便行驶，货物由白木木船转驳；最远北销山西，西销云南，再由各口岸庄口推广，深入内地各州县；由是这些舶来品遍及全国各乡各户。

### (三) 国人自设绒线厂

绒线进口,大约在民国十五年之后,其时国内会编结绒线衣裳的尚属少数,以故推行并不普遍。最初进口的绒线,首推英国老牌的BB蜜蜂牌,厂设英国哈里法,厂名博德运,设立已历百年。该厂的绒线以蜜蜂牌最良,以三蜂为标记的尤为高细,次之为杜鹃牌,又次为飞艇牌、鹦哥牌、学士牌,都由中和及老公茂洋行经销,但销开的仅蜜蜂牌一种,其余均不甚著名。稍后有怡和洋行所经销的五福牌,销路还好。

随后中国也有了自办的绒线厂,一在上海打浦桥,厂名振兴,开办人顾锡元,由沈联芳任经理。事属初创,办理全无经验,所出货品未能销开。一在天津,厂名东亚,所出羴羊牌绒线质地还好,一时行销南北各省。随之而起的有上海绒线厂,经理王启宇,牌号小团;中国毛纺厂,经理陈志廉,牌号皇后;安乐毛纺厂,经理邓仲和,牌号英雄;无锡协新毛纺织厂,经理程敬堂,牌号锦鸡。这些厂家所出五光十色的粗细绒线涌现到市上,新开绒线号如雨后春笋,人们耳目为之一新。另一方面有编结所的设立,传授编结法,在报纸上、无线电广播中广事宣传,教授各种织物方法,编织既坚固耐穿,着体又柔软舒适,推行并不多久,已风行各地,深入乡村。各省县市都纷纷来沪采购,日销激增,有供不应求之势。英商密丰绒线厂经理见中国自设毛纺厂与舶来品竞争,亦在上海创设毛纺厂,投资八百万英镑,筹设两万枚锭子,占地六十余亩。他拥资雄厚,牌子又老,以中国新出品绒线,要同历史悠久的BB牌竞争,胜券自没有把握。幸而其时正值国人拒

用外货,乐购国产,英国绒线销路遂不能不让英雄、皇后等一筹,于是国产绒线进入黄金时期。所引为憾事的,此刻所谓中国自设的毛纺厂,实在还未能自己把生毛纺制,不过向英、澳、南美购进半成品的毛条,来作梳毛、并纺、染色等加工工作。外国洋行经售此项毛条的,英商有老公茂、麦边、中和、公平、怡和,德商有顺全隆、礼和、天佑、美最时、天利、禅臣,法商有永兴、立兴,意商有义兴公司。中国厂家以资金不足、设备不全,始终未能自制毛条,虽则自己并纺绒线,究竟仰人鼻息,受人剥削,殊深慨叹。

抗战期间,有些中国工厂地址在旧租界范围以外,惟恐被日军收管遭受重大损失,因商通英法领事,借悬各该国旗帜,藉图保全事业。在绒线界中有上海、安乐、裕明三家,就采用这一方法,作掩护之计。安乐、裕明两厂借挂法国旗,上海挂英国旗,并加入英商资本一股,藉此该厂股票得入市场交易,每股票面五元。随后市面转好,在香港也有买卖,从此该厂同各国商人都发生关系,结果为英商并去。

一九四六年后,外国绒线进口减削,新兴毛纺厂一时崛起,裕民、华丰、民治、恒丰、茂新等厂陆续开设。裕民厂是由十家毛冷店合资组织,经理倪锡芳,最初是小厂,开设在新会路,嗣向怡和洋行购得该行所属公益纺织厂,地址在曹家渡武宁路桥,原价一百三十万美元,中间遇到不少波折,直至一九四九年方才交出厂屋。该厂发起人均属绒线界巨子,出品地球牌、双羊牌,立即销开,与英雄牌相上下。华丰厂经理王厚甫,牌号长城。民治厂经理四川人,牌号和平。恒丰厂经理沈莱舟,牌号红福。茂新厂经理邓景澄,牌号美丽。上海绒线业至此已臻极盛,如日方中,而

绒线销路也随着跃进，各厂采购供销，竞争日烈，于是不免兴起争端。

#### (四) 同 业 竞 争

绒线业进入黄金时代后，凡是上海几条有名的大马路上，都开设了绒线号，样橱中陈列各色粗细绒线及多种多样的编结物品，真是形形色色，璀璨炫目，吸引顾客，各尽能事，以故批发零售，备形拥挤。可是兴圣街毕竟是绒线业发祥之地，除原有三家老牌毛冷店（张源盛另换店主，改名倪源盛）扩充为大规模的绒线号外，又新添了几家，远地销路仍集中兴圣街。尤其各洋行进口毛线，统由一个特殊组织的集团包办，在集团以外无论哪一厂号都无权直接向各洋行订购，只能是向集团中的号子转批，让它取得厚利。这一集团早和各国洋行订有专销合同，历经多年，悬为定则。这个集团，由同昌、隆兴昌、兴圣泰、泰隆、倪源盛、义生恒、金源茂等八家组成。它们具有悠久的历史、老牌的资格，更兼势力雄厚，合同牢固，集团以外绒线厂号，纵然人力众多，争执剧烈，历经十年左右，终以积重难返，未能推翻旧贯。十年精力用于无谓之竞争，对于绒线业前途迄无改进，旧时商家中人目光短浅，但营私利，不计公益，良可叹也。

# 英美烟公司

陈子谦 平襟亚

## 一、经济侵略的别动队

卷烟,上海人通称香烟,流入中国有近一百年历史。最早运来上海的是小吕宋和土耳其出产的“铜鼓牌”及“金鼓牌”等,扁匣子,五支及二十支装;又有散支零售的无牌子香烟,上海人称做“马路香烟”。由于当时中国人不习惯吸香烟,所以并不行销。直到英美帝国主义把十支装的“品海牌”香烟输入中国,始大事宣传,我国吸香烟者才逐渐众多。

十九世纪末叶,英、美两国烟草托拉斯为了争夺世界市场,相互之间曾发生过一次激烈的烟草战。最后双方达成互不侵犯对方本国市场的协议,并由英、美两国六大烟草公司共同投资,于一九〇二年在伦敦创立英美烟公司。这家公司设立的目的是为了垄断世界各地烟草市场,而主要的对象又是中国这个人口众多、香烟销路方兴未艾的广阔市场。

一九〇二年下半年,他们在上海设立驻华英美烟公司,并在博物院路(现虎丘路)购地建屋,作为办公处所。在浦东陆家嘴兴建厂房,从外国运来机器,剥削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日夜制造香烟。另一方面,通过原来经销香烟的老晋隆洋行,积极发展销



售网，竟然雇了船只，派推销员深入内地，在各城市、乡镇遍贴广告和招贴，散发小册子，甚至逢人赠送“试吸香烟”，使平时吸旱烟和水烟者，咸人手一支，改吸香烟。他们满以为可以顺利搜括金钱，源源不绝地汇到金元王国去。

谁知到了一九〇五年（清光绪三十一年），美帝国主义者狠毒地虐待华工，使我国人民忍无可忍，掀起了第一次反美浪潮，全国群起抵制美货，提出了“不用美国货，不吸美国烟”的口号。驻华英美烟公司接管的美国纸烟公司所生产的“皇后牌”，当时已成为风行一时的名牌香烟，在这次抵货运动中首当其冲，遭到一定影响。但是狡猾的英美烟公司，采取偷天换日手法，认为中国人誓不用美货，并未说誓不用英货，便将美国纸烟公司改为大英烟公司，皇后牌改为大英牌，业务照样蒸蒸日上。抵货风潮平息以后，他们出品的香烟牌子一天天多起来，营业范围也逐渐扩大，制造香烟的工厂一再增多，几乎垄断了中国的卷烟市场。

## 二、英美烟公司的内部组织和宣传策略

英美烟公司内部组织庞大。最高权力属于董事会，下设法律部、广告部、保险部、供给部、烟叶间、船头房、洋账房、买办间、书信间等。法律部专管有关法律事宜，其下还附设一个翻译部，如发现冒牌等情，便向官厅提起诉讼，要求赔偿损失。广告部负责宣传工作，是推广香烟的动力，其下附设画图部，绘制各种招贴图画、月份牌、广告画以及香烟牌子等。保险部专管水火保险事宜，为公司保值，负安全责任。供给部供应本公司或外

埠分销处需要的日用品或其他物品。烟叶间专司向仓库提货及稽核烟叶的贮藏数量，以免工厂缺少原料。船头房负责运输寄递事务。洋账房负责会计事务。买办间亦称华经理室，上海其他洋行的所谓买办（华经理），大都负责推销产品，英美烟公司的买办则不负营业责任，因为各种香烟大都有华人开设的公司或商行包销（如红锡包有永泰和包销），无需买办代谋，买办的任务仅是调度款项、支付银钱。书信间传递信件，管理文具用品暨其他零星事务。这是英美烟公司内部组织的大概情形。

英美烟公司先后究竟出过多少牌子香烟，恐怕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确数。我们只记得当时最著名的，有如下几种牌子：（1）老刀牌，实在应该叫“强盗牌”，因为烟匣上画着一个持刀的海盗，露着狰狞的面目。大概因为“强盗牌”不好听，他们的广告上总是称为“老刀牌”。不过，中国人总是叫它“强盗牌”。这一种牌子的香烟，在中国民间销路最普遍。（2）红锡包，亦称“大英牌”。“红”，因为它的包装是粉红色的；“锡包”是由于包装内层衬有锡纸。有些地方根据“老刀牌”的称号，把“红锡包”称作“粉刀牌”；把大号的“红锡包”唤做“粉刀王”。这种牌子的销路在晚期胜过了“强盗牌”。（3）绿锡包，亦称“三炮台”。（4）白锡包，亦称“绞盘牌”。这两种香烟在“茄力克”、“三五牌”未到中国以前，盛行于都市中，在大宴会和高初级游乐场所，莫不以此等香烟奉客，视为高等香烟。（5）前门牌，是中级香烟。（6）哈德门，是中下级香烟。以上六种香烟销路最广泛，尤以“红锡包”为首屈一指，被它搜刮去的金钱，实难计数。

此后，又出了“茄力克”，初期是在外国制造的罐装品，运来

中国，被目为最高级香烟。后期亦在中国制造，也有在香港制造的。此外，中国市场上亦有外国其他厂家出品的“三五”、“三八”、“三九”等各种香烟，销路都比不上英美烟公司的“茄力克”与“红锡包”等。惟有在中国的日本侨民喜吸其本国出品之“凤梨”、“白鹤”牌香烟。此后，更有“仙女牌”、“五华牌”等低级外国香烟，虽然亦有相当销路，但不居主要地位。

为了推销香烟，英美烟公司不惜人力财力，多种多样地做广告。除大招贴、传单、报纸广告、杂志广告、油漆牌子、马路广告、墙壁广告、火车站广告、月份牌、日历广告等等以外，又赠送香烟缸、皮夹子、饭碗、筷子等，这些“赠品”上面都有广告。最使人注目的是霓虹灯大广告，彻夜通明，引人注目。有一天，上海各条马路上人力车工人忽然都穿上一件马甲，上面有个很大的“烤”字，看的人都觉得奇怪。后来才弄明白，这是英美烟公司新出的“翠鸟牌”广告。据说，这种香烟的烟叶是经过“烤”法制造的，大家被好奇心驱使，买来尝尝，味道与普通香烟无异。他们凭空设想出一个“烤”字来，使许多人尝它一包，广告的目的已达。

### 三、打击民族卷烟工业

大鱼吞小鱼，是资本主义社会常见的现象，何况有着政治背景和雄厚资金的英美烟公司。首先被它吃掉的就是它的母亲——老晋隆洋行。又经过了二三十年，大美烟公司、花旗烟公司，一个个都并入了英美烟公司，它门口挂出的招牌占了一大片。最可恨的是它对尚在萌芽时代的我国国产卷烟进行了无情的打击。这些国产卷烟厂由于资金不多、规模较小、烟叶与烟纸

等原料受帝国主义垄断统制，成本昂贵，既受外国低价倾销的打击，又得不到本国政府的支持，结果免不了被吞噬。

有一个出产“小乔牌”香烟的殷某，为了挽回利益，苦心孤诣地创办了一家小香烟厂，把所有资金都放在厂里。谁知出品被英美烟公司重重压迫到销不开去，制烟原料亦受该公司统制，到处搜求不到，结果资本蚀光，烟厂关闭，欠了一身债务，终其生亦清偿不了。

有一种“孔雀牌”附有蜡咬嘴的香烟，是日本制造，一九二〇年前后很风行，后来这个商标也被英美烟公司以重价收买了去。

可是，在一时崛起的小厂中，也有压不倒的，那便是当时的福昌烟公司。该公司是黄楚九所创办，黄是当时上海商场中号称足智多谋的一员闯将。那时上海的报纸尚未印过套色的标题或广告，忽然有一天，报纸上印了个大红蛋，当然使阅报的人非常惊奇。后来发表，这是福昌烟公司新出了一种香烟，叫“小囡牌”，向吸烟者送红蛋。利用人们爱护小孩子的心理，作为香烟牌号是聪明的，就是英美烟公司的外国人见了这广告也认为新奇，觉得要比自己的“烤”字广告高明得多。他们开始也不放在心上，想不到以后黄楚九又利用了他的特殊条件，不单在马路上遍贴红蛋的广告，还在他办的大世界游戏场内广泛宣传，甚至随门票奉送一包“小囡牌”香烟，一时千百万游客都喜爱起这个“婴孩”，大家试吸起来。尤其是“小囡牌”同样用红色包装，影响了英美烟公司“红锡包”香烟的销路。这可急坏了几个外国人，他们经过反复研究，认为只有不惜重价向黄收买之一法。当时，黄楚九如果真心为国家挽回利权的话，不难坚决拒绝，斗争到底，

惜乎黄的目标亦仅在捞一票钱，结果以二十万元(一说十万元)成交，以后永远不出“小囡牌”香烟，这条小鱼就给大鱼吞掉了。

从此以后，为了要恢复“红锡包”原来的销路，英美烟公司就在上海各马路要冲的墙壁上大做广告，以一个“盛”字来标榜，夸称：“红锡包”香烟是始终“盛”极一时的。

随着英美烟公司勃起的国产香烟厂也未始没有。当时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就是规模较大的一家，但因为原料方面受限制，推销方面受压迫，仅堪自保，始终未能同英美烟争一日之短长，一任帝国主义分子张牙舞爪。

#### 四、英美烟公司的全盛时代

大约在一九二〇年前后六七年间，是英美烟公司的全盛时代。它的分公司和经销店遍及我国各地。在上海总公司的推销处，有一张一米见方、用照相纸印就的中国各省市地图，凡属有英美烟公司分公司或经销处的地方，都画上一个黑点，又写上一个地名，没有分公司和经销处的地方，即使是大城市，并不画上去，任其留出个空白点。照一般的想法，我国土地之广，城市之多，他们销售香烟的所在，地图上应该是疏疏落落几个黑点，留出的空白点一定是很多的。谁知道，除掉广西、贵州两省黑点较少外，其他各省都是密密麻麻的黑点。尤其是江苏、浙江两省，黑点多到连写地名的空隙都没有了，足见他们经济侵略是无所不至，有孔便钻，手段也是极其毒辣的。

他们有这么多的分公司和经销店，当然也得有个系统。于是，他们把地区进行划分，自上海西至镇江、南至福建、北至山东

是谓华东段，段内营业归永泰和烟草公司负责，这个公司还包销“红锡包”（包销不限地段）。永泰和老板郑伯昭同英美烟公司的关系最深，英美烟公司的外国人见了他都十分恭顺，有次广告部部长外国人邦基正在同郑伯昭谈生意，忽有一个职工来唤邦基听电话，竟被他当面啐了一口，还骂了一句“落地狱的”。等到郑伯昭去后，邦基才向此人说：“郑伯昭是大人物，我同他谈生意，任何电话尽管回绝，何必噜嗦。”于此可见外国人对郑伯昭的重视。他们重视生意经，上面所说地图上这一段黑点最多，而“红锡包”销路又最好，那便是很好的说明。

英美烟公司有了地图上数不清的据点，香烟销路之广可想而知。据说英美烟公司产品当时的销路，旺月大约有十余万箱（每箱五万支），即使黄梅淡季，至少也有三四万箱。平均算它每月八万箱，每年就是九十六万箱。按当时市价，高级烟与低级烟扯算，每箱以三百元计，一年的总数竟达两亿八千八百万元之多。虽然这是卖价，不是纯利润，然而十年八年地积累下来，被夺去的利润也够惊人的了。

### 五、设宴庆功，大兴土木

由于英美烟公司并吞了许多小公司，它的香烟推销网遍布中国，营业蒸蒸日上。外国老板们踌躇满志，一九二四年春节，他们以英美烟公司名义，在上海广东路复兴园菜馆大摆宴席，名目是春酒，实际上是他们的庆功宴。

当时接连请了三天客，还曾演戏三天。共计中菜五百桌，可称为空前盛宴。被邀请者大都为各烟纸店经理，这是为了希望他

们今后在推销工作上更加出力。以每桌坐八人，每席十元统计，在每人身上也只化了两元不到。

英美烟公司又在一九二五年春天，就博物院路原址翻造新屋。依照当时工部局修建房屋章程，凡沿马路的房屋动工翻造时，必须依照原来基址缩进若干尺。英美烟公司这所房屋在博物院路与苏州路的转角处。照例，需要两面缩进，并且还该缩成一个圆角，那就要减少很多地位。可是他们只把墙壁拆到齐宅脚，底下的基石不动，算是大修理，不作为翻造，尽可以不缩进房屋，不让出地皮。假使中国人要在租界上这样做，那就肯定被说成违章建筑，万万办不到。英美烟公司之所以能这样做，因为它的一个董事叫麦克诺登的，同时是当时工部局的董事长，他凭借特权，就很容易地取得了名目是修理、实际是翻造的一纸照会，所翻造的新屋，跟原址一样宽广，而且加高了一层。

## 六、晴空里一声霹雳

当帝国主义分子正满怀欢喜而得意洋洋的时候，晴空里起了一声响雷，那就是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的发生。全中国人民义愤填膺，共同起来抵制英国货。这使英美烟公司的英国人急坏了，他们认为中国人抵制英国货但并不抵制美国货，只要把英国货说成是美国货就行了。可是，别种牌子的香烟可以说成美国货，“红锡包”大家叫它“大英牌”的，怎能说是美国货呢？狡猾的帝国主义分子就把十支装的“红锡包”换上壳子，添上英文“美国制造”一行小字，设计一种广告，画两只手，一只手捏着一包“红锡包”香烟，另一只手指着露出烟壳底面的“美国制造”四个

字，意思是告诉人：“红锡包”不是英国货，你们不用抵制它。可是，大家眼睛雪亮，怎会上他们的当，看英国货与美国货如同一条两头蛇，哪一头都要咬人的，“红锡包”的销路还是一蹶不振。

他们见营业不佳，只得对外扬言说：中国人可以自由买卖英美烟公司的股票，如今英美烟公司已经有中国人的股份了。他们希图用这种掩耳盗铃的方法蒙混过去。那知任何作伪的勾当总要败露，不久真相大白，原来他们在一九二六年创办的“英美烟股票有限公司”（由沈昆山任董事，出面做幌子），只有这个公司可以购买驻华英美烟公司的股票，并非一般中国人都能买进，何况中国人不希罕买什么英美烟公司的股票。后来他们看到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日渐提高，为了掩盖外商面目，一九三四年成立颐中烟草公司，说是接管驻华英美烟公司的业务。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大家都知道这不过是帝国主义玩弄的把戏罢了。

### 七、华成烟公司异军突起

在一九二五年抵制英货声中，英美烟公司的营业一落千丈，这是给中国人自己办烟厂的一个绝好机会。当时已有的华资烟厂，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最大、最完备。该公司系粤人简氏兄弟所创办，资本雄厚，出品亦多，当时已行销市上的有“长城牌”、“飞艇牌”、“白金龙”、“红金龙”、“联珠牌”、“双喜牌”，等等。在“长城牌”的广告里，曾有“不吸香烟，固然最好，要吸香烟，请吸国货长城牌”（大意如此）之语。以“长城”做牌子，就意味着与吸烟者共同抵御外国香烟。当时南洋公司的宣传收到相当的效果。詎知由于种种原因，该公司坐失良机，反让一向不大引人注



意的华成烟公司乘时崛起。华成烟公司系陈某、戴某等人所创办，因资金短绌，规模较小，一向未能与南洋并驾齐驱。可是这次它异军突起，所出的“美丽牌”、“金鼠牌”销路激增，竟然供不应求，大有取“前门牌”、“红锡包”而代之的气势。不满一年，盈余的利润甚为可观。它的股票原来是一百元票面只值三十余元，现在飞涨至两千元，还没有人肯脱售。

帝国主义分子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还图挣扎。他们探听得华成烟公司出品“美丽牌”香烟的牌子是吕美玉以前演出“失足恨”时的剧照。吕美玉为名演员吕月樵的女儿，也是个名演员。或许吸烟的喜爱这位演员，因此连带使香烟风行一时，那就何妨抄它老文章摹仿一下呢？于是颐中方面想尽方法，派人去寻找了一位在戏剧界不甚走红、而在社会上略有名气的女演员潘雪艳，把她的照相做牌子，来打击“美丽牌”，这也可算异想天开、挖空心思了。

起初，潘雪艳不肯应允，后来听别人说，吕美玉的母亲时凤仪曾请鄂吕弓律师与华成公司涉讼，经法庭判决，由华成公司付给吕美玉每箱“美丽牌”十元的权利。潘雪艳想，假如以此为例，倘颐中烟公司月销十万箱，本人就有一百万的收入，因此答应了颐中的请求。颐中即以潘的照相为牌子，出了一种香烟，名唤“华芳牌”，装潢与“美丽牌”大同小异。当时制成纸包的十支装、二十支装、听头的五十支装，货品预备相当之多。结果，群众知道这“华芳牌”是英美货，相率抵制，市上流行的还只是“美丽牌”。此后颐中也就无计可施了。

## 八、别动队结束

“五卅”惨案以后，在抵制英国货的汹涌浪潮中，英美烟公司确已衰颓，当时苟有贤明的政府领导群众，持之以恒，不难把他们这个经济侵略的别动队早日歼灭。惜乎当时是军阀时代，只会残民以逞，不会助民斗争。其后两三年，国民党政府忙于同帝国主义勾结，反共反人民，实质上与北洋军阀无异。群众缺乏领导，日久渐懈，遂使帝国主义分子有喘息的机会。再加以它的分公司和经销处遍及我国各地，纵使营业远不及以前之盛，然利润犹大有可观，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后十余年的挣扎，依然被它搜括了许多金钱。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颐中烟草公司早有准备，负责的外国人悄悄将其所有财产携往香港。胜利以后，还卷土重来，直到建国前，又满载而去。当时，他们没能把主要的机器设备运往香港，是由于工人发动了护厂斗争的结果。

按照颐中烟草公司规定，职工按月抽取薪金百分之五，作为储蓄金，到解雇时，由公司加倍发还，另按工龄长短，分别给予解雇金。工作满三年的，付给两个月工资；满十二年的，付给八个月工资；十二年以后，每三年付给一个月，但以付给一年工资为最高额。

自从外国人将公司全部现金及可能搬走的机器等运往香港后，所有职员的储蓄金、解雇金均无着落。上海解放后，一九五二年工人们提议改为国营公司，曾有个别人去信给香港的外国负责人，信上说：“如果你们不同意，我们情愿全部解雇，请你们按

照工龄长短,把应得的解雇金如数汇来。假如你们同意的话,那末我们全部解雇金都不要了。”(大意如此)颐中烟草公司有上万工人,工龄满二十四年的很多,外国人计算这笔解雇金,大约要几千万元,不能空口白赖的。又眼见中国人民政治觉悟普遍提高,经济侵略已此路不通,不同意也办不到,所以只能回信表示同意,随后把为数不多的职员储蓄金汇来,退回给每个职员,作一结束。关于工人們的储蓄金,因规定五年一结账,所以早就发还了。

从此,帝国主义在我国进行经济侵略的这支别动队——颐中烟草公司就成了历史的陈迹。

## 上海的沙船业

朱 梦 华

沙船这一个名词,在今日青年人看来,也许有些陌生,其实从四五十年前推至三四百年前的期间,海上交通全靠这些沙船。它的最古老的名称,就是飘洋船,明朝永乐皇帝曾派三保太监下南洋,乘载的所谓楼船,也是沙船的一类。最初西洋轮船还没有盛行的时候,这些沙船对于海上游客之往来、货物之输运,曾经起过很大的作用。上海虽是南北沿海中点口岸、中外货物集散大埠,然而溯其最初发展之动力,是藉此种沙船之贸迁有无。那时黄浦江中自吴淞口一直到南市尽头陆家浜,随处都停泊大沙船,尤其在十六铺太平码头以南一两里内,帆樯如织,舳舻蔽江,装卸上下,昼夜不息,蔚成当时南北绾毂的通商巨埠。上海之所以能汇集全国各地货产,形成世界有数之名城,与沙船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沙船用坚韧木料制造,船身大小不等,最大的首尾达一百三四十尺,货舱很深,容积宽广,接装扶梯两三层。舱顶竖风帆三道至五道,中舱主桅粗大,高十余丈,一般用柏木樟木包接以铁箍,后来亦采用花旗洋松,尺寸虽较长,可惜容易烂蚀。桅身极重,起落要用绞关,所谓大将军八面威风者是(桅上都贴有红纸条书此标语),故船上尊之为大将军。桅顶扯顺风旗,随风飘拂,

用以观风向。这种船非但顺风可以使帆，即逆风打斜，一样可以驾驶，帆所以要用三五道，是为了便于迎拒风力，折斜进行，不过利用之得法与否，非老于航海者不知其窍。

沙船虽一样沿海岸行驶，然各有帮口。最盛时沙船达一千艘以外，分北帮、南帮、本帮三大宗，从大连、营口、天津、烟台、上海，一直南下到宁波、潮州，每个口岸都有沙船行号帮口，分线航行，相沿成例，无论承接行号生意，装载各路货品，皆有传统规约，互相尊重。自有沙船以来，绝少有为承揽之争而涉讼者。在上海营业的沙船，最占优势的，厥唯南通、宁绍及本埠三个帮口。南通帮最著名的有陈丰记、彭记、毛凤池三家；宁绍帮以李氏镇康新记公司为巨擘，拥有船只最多；上海帮行号特盛，以泰生、王信义、尤益昌数家较著。

沙船的航线，大别之有三条。一、北线，走山东、天津、营口、大连各口岸；二、南线，走宁波、绍兴、温州、福州、潮汕各埠；三、中线，溯长江而上，一直到四川万县等地。走南线和长江的船，别称曰钓船，其船头昂起甚高，两旁画两枚大鱼眼睛，一望可以辨别。各帮口的沙船，都同上海帮有联络，并且分帮设有会馆，以便同乡人联络。又设有各货栈商行，预备招接本帮货客，供给住宿膳食。当时此种会馆商行，遍设各口岸码头，而设在上海的其数尤多。南市的潮惠（潮州惠州）会馆、福建会馆，福州路的三山会馆（宁波），至今还有形迹可考。惟各商行则都已改营改造，无从查询。据云此种商行名号，末了常带一公字，如祥誉公、通顺公等，至今还留有迹象。此外，各帮总合建立的，还有董家渡的商船会馆，则已完全毁去。在那时候各帮接洽业务以及开

会议事，都在会馆中进行，逢到大节大集会，还要邀请文武戏班演戏酬神，论其作用，不特各帮藉此互通声气，也是他们的行政机构。商行之作用更多，货物之交换在此，经济之通借在此，营业之接洽亦在此。至于招待住宿、膳食，使千里以外初来的客人得到各种便利，有宾至如归之乐，尤其次要也。

船中装载的，主要是“号货”，每只沙船都有固定约装的号子，有些沙船就是号子所经营。号子都集中在南市十六铺里街，资力雄厚，信用昭著，豆市街上各米豆行，尤与他们有密切的关系，盖沙船以运载米、豆、油、饼为营业主要对象。而且为了各行号用款便利起见，所有银钱号家也汇集在豆市街、花衣街附近一带，形成五十年前上海经济的重心。因此船中所装货物，都归沙船自己经营，自负盈亏，与待雇驳货者有所不同。一条大船，北载货要值十三四万两银子，由北回来，亦装货五六万规元，统由该商船自筹款项办货，到达地头自销，不受他方牵制。一年开洋三次，即来回六趟，非殷实信孚者不能办。船中亦间带客号货物，或附载旅客，则均不收搭费，不过是要同该船所属行号有关系的人方许上船，到达目的地时只要出些小费给船伙就算了事，数十年沿为惯例，绝不变更。

他们帮中，另有一种成约：商号货物互相搭配装船，甲船中也有乙船之货，乙船丙船中也有甲船之货，装到地头，各自凭单据提取。如果中途失事，或遇匪徒袭劫，或遭风雨沉没，损失由各号分担。亦有船货抵埠，市面陡涨，则亦由各号分享共利。这是联环保险的方法，由来已久，若问是谁取得这项宝贵的经验及从何人何时开始定此公约，则无由追溯其根源。船中承载货品，

由大连营口装回的，以牛庄的豆油、豆饼、大豆为主，此外还有山东的枣子、胡桃、腌腊、线粉丝，水果亦属大宗。由宁绍方面装回的，则以咸鱼、火腿、干果、笋干和其他土产为主要部分。由上海装出的，有土布、磁器、竹头、大米，后来还转运外洋舶来品。在太平天国前后一段时间内，驳运漕米尤其是专利营业，后来漕米停运，政府为补偿计，特许减捐装载南通土布。走长江的钩船，流通品物更是繁多。总之，上海南市各行各铺的进货出货，唯一的运输工具就是这种沙船，若是没有这种运输工具，那时的上海便成死市了。

各沙船行号为了谨守信用，在扒货装船之时，可缓缴货款二十天，成为惯例。所谓九八规元，亦从豆市街做出，上海全埠金融界都以九八规元换算银两，南北各客帮亦奉为准则，不敢有二话。此例直至一九三三年随着废两改元才消灭，由此可见南市金融力量之大。如果不是满载而是轻船出口，预备到中途添载的，船上人为怕偶或遇着风雨，海浪汹涌，船身不稳，则用大量泥土填舱，到地去土，换载货物。所以在口子上时常有泥船停泊待用，这也是沙船的附属营业。

沙船进出海口，例须诣天后宫拈香拜求护海。为此海口上都建立天后宫，供奉天后娘娘。上海的天后宫，一在南市黄浦江边，一在苏州河上河南路桥南堍。南市天后宫由宁绍帮修复，后屋即宁绍会馆。苏州河上天后宫则由宁绍、南通、上海三帮合建供奉。天后传是海神，一称天妃。查天后称号，明永乐时敕封，系宋代林氏女，但在商船帮中一般传述，则谓是金姓，故沙船牌号恒冠以金字，如金源茂、金长盛等。商船帮对天后的奉祀，非

常虔敬，航行顺利归来自然大香大烛上供，就是遭遇不幸事故，亦唯自认运道不佳，拜祀不诚，故尔未邀神灵监察保佑。这在现在看来，是十足迷信。但在当时神鬼迷信尚未破除，而这种沙船全凭船老大一生经验，扯起五道大篷，投入浩渺无垠的洋面，同惊风骇浪搏斗，前途一无把握，唯一的安慰，只有求告神灵。各个时代思想都有局限性，他们这种迷信举动也就不足为奇了。

一号船上的执事人员，普通一百人左右，有一定的组织方法。司行船的有正副老大，他们能识沙线，能看风色和前途有无礁滩，海中能辨方向，风雨阴晴能够预测，船的进退左右都要听他们指挥，这是一船最重要的人员，非积数十年的海上航行经验，有一定把握者，不能肩此重任。管理全船人员行动风纪的则有正副耆民，船员中发生纠纷事故及维持全船秩序，都由他们作主解决，船中无论何人均应服从他们的命令，宛然一位执法官。担任这项职司的人，一定要船龄较高、品德兼优、为一船人所信服，方为众所爱戴。一条船上的安全无事，都靠老大和耆民，商船上相传的“打船容易用人难”一句话，就是指此而言。

船上伙友养成一种好风气，人人都以船为家，以船为命，对于本船货财利益，无一不爱护备至，无论装货送货，从来不落后手，这种美德，代代相传。因此号家亦放心托付货物，格外信任。其由北方装来的干货，到埠反而会增多斤两，其故由于越到南来空气湿度越浓，货包受润，斤两升高。另一方面，号家对船伙也相当好，薪工之外，年终可分红利，如无大过，亦不贸然辞退，劳资共处，相安无事，为其他行业所罕见。

自近五十年来欧美轮船侵入我国，夺取航行权益，南北沿海



及扬子江各口岸，都有英、美、日各国商轮专利行驶，本国亦有招商轮船，分线航行，载货搭客，稳妥快速。其专事装载货物者，还有拖驳公司，外人经营的如英商会德丰洋行，日商壳件洋行，均拥有船舶多艘，上海人称之为铁乌龟者是。其为中国人自营者，有如上海的鸿安公司、宁波的三北公司、走长江的宁绍公司，北方又有肇兴公司、敏记公司等，均有好几条轮船和拖驳船，装货兼行搭客，以此沙船营业遂逐年趋于清淡，大半自动停业，剩有少数船只，还在勉强挣扎维持，此时的沙船营业已成尾声。到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事变发生全面抗战开始，其时南北航行已经停顿，商货绝少流通，不少船只为军事防御，被凿填海口，在十六铺封江之时，也凿沉了好几艘，有的事先逃出海口，远扬他所，躲避风头。但是也有许多船只在逃亡中途，不幸遇着日帝军舰，又遭到攻击。如尤家船一艘在营口被日舰追赶，触礁沉没，一艘在山东石岛被日军拖到海岸纵火毁去，其他受到打击者，比比皆是。两三百年来盛行海上的沙船，经此浩劫，遂一蹶不振，在上海口岸几乎绝迹。而南市各船号亦多数惨遭焚如，生财船只，荡然无存，再没有卷土重来的力量了。

造船厂先设在浦东高桥，全由老司务计划度材，造船修理，但范围甚小，不能打造大船。随后在高昌庙一带建大船厂（即后来江南造船厂底子）专造大船。最后又迁至吴淞港现宏文造纸厂地址，面积推广至六十余亩，规模宏大，用人增多，名曰四达公司。还有专为船上打造铁铸用品如大铁锚、铁钉、铁箍等物的则有不少打铁厂，厂中工作伙友以无锡人居多数，无锡帮莫云卿、丁性斋、杨少棠、查仲康等人都以此起家，今则吴淞口沿浦江蕴

藻浜一带，尚有此等铁锚厂遗传下来。近三四十年来造船木料缺乏，价值昂贵，打一号船，非三四万金不办，吃本甚重，即是殷实号家亦鲜肯投掷巨资，冒此风险。因此吴泾船厂也不得不逐年紧缩范围，降而代人做修配工作。到抗日战争起，也随着沙船业本身的命运而停厂散伙了。

# 轮船招商局简史

林 介 侯

招商局自创办之日起,至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时止,计共七十七年。在这段过程中,可分六个阶段:(一)筹办时期,(二)官商合办时期,(三)官督商办时期,(四)商办时期,(五)官督整理时期,(六)国营时期。

## (一) 筹 办 时 期

一八七二年(清同治十一年)七月,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奉清廷谕,遵员妥议招商承租官造商船兼运漕粮章程,李氏即令浙江漕运局总办朱其昂(字云甫)酌拟章程,试行开办,一面请户部核准借拨直隶练饷局存款制钱二十万串,以作资本。九月,派朱其诏(字翼甫)、朱其昂昆仲回沪筹备设局,招商兴办,定名为轮船招商公局,赁局址于南市永安街,于是年十二月十六日正式开局。

开办之初,先向英国购进轮船一艘,名曰伊顿号,载重一万担,价银五万两。抵沪后,试航汕头,局旗定为黄底蓝色双鱼旗。后来续向英国订购两艘,一曰代勃来开(改名永清),一曰其泼利克有收(改名福星),又购利运轮一艘,各可载重一万七千担,船价共银二十五万余两。又因直督、苏抚奏准漕米三十万石归

局承运,复购置上海浦东烂泥渡北码头一座、可储米六万余石的陆家嘴南栈房一所、天津紫竹林码头一座;另租栈房五处,可储米四万八千石。此乃招商局最初筹办之情况。

## (二) 官商合办时期

一八七三年(清同治十二年)为轮船招商公局开办之第二年,李鸿章慕粤商唐廷枢(字景星)熟悉船务之能,委充招商公局总办,规划一切,实行官商合办,并派朱其昂、徐润(字雨之)、盛宣怀(字杏荪)、朱其诏等为会办,重订章程,规定资本额为一百万两,改名为轮船招商局,局旗改为红底黄日,并规定选举董事,推荐商总、商董分任局内有关事务。为谋发展业务起见,除在上海设立总局外,并在天津、牛庄、烟台、福州、厦门、广州、香港、宁波、镇江、九江、汉口及长崎、横滨、神户、新加坡、槟榔屿、安南、吕宋等处,共设十九个分局。

招商局开办之初,以漕运为主,客运为辅,为搬运客货关系,引起洋商之忌,相率减低运价,藉以排挤。清光绪二年,我国与英国订立《烟台条约》后,外轮来华逐鹿者更为猖獗,招商局客货减少,营业不振,挪用庄款六十万两之巨,幸李鸿章急筹官款五十万两,以挽危局。当时外商保险公司拒绝承保招商局轮船,以谋抵制,即使允保,保额少,期限短,费用大,种种为难。其后再三磋商,只允依照限额承保六成,自是招商局另筹股款二十五万两,组织济和保险公司,自办保险,承保局轮余额。

后来各外资轮船公司加紧营业竞争,运价一再减跌,招商局固感应付不易,而洋商中号称上海航业领袖之旗昌轮船公司,亦

因亏损太巨，而萌退志，乃有合并于招商局之议。唐廷枢、徐润等以时机难得，请示直督李鸿章并两江总督沈葆楨，均蒙批准，竭力筹划，即于一八七六年（清光绪二年）十一月十八日与旗昌订立契约，将该公司在上海及各地所有轮船资产一并收购，价银两百二十二万两，分期缴付。当时局轮连代理者在内，共只十六艘，将旗昌船栈码头等归并后，声势为之一壮，基础由是坚强。但自旗昌并入后，各外国轮船公司嫉妒益深，运价一再倾跌，招商局蒙害匪鲜。李鸿章条陈整顿招商局办法，并奏请将各省官物统归招商局承运，以维营业，一面与太古、怡和两洋行订立闽津与长江齐价合同，避免竞争，得以转危为安。

招商局股本于一八八一年（清光绪七年）招足一百万两，翌年续招一百万两。又局轮保险，原规定保额六成归洋商承保，自保四成，自旗昌归并后船只倍多，故决定另办仁和保险公司，集股五十万两，所有局轮，概归自保，以辟利源。

一八八四年（清光绪十年）六月，因法舰陆续来华，四出骚扰，海疆不靖，局轮行驶洋面咸有戒心。乃由会办马建忠（字眉叔）禀承直督李鸿章，与旗昌洋行密订合同，将船栈作价五百二十五万两，暂交旗昌洋行代为经营，事定照数收回，各轮换用美旗，照常航行。

### （三）官督商办时期

一八八五年（清光绪十一年）四月，中法议和，局势平靖，招商局即于六月间按照原议，将所有船栈等由旗昌洋行收回自管。旋由盛宣怀等奉直督李鸿章飭令，重订章程，力加整顿。盛氏条

陈用人理财章程，谓非商办不能谋其利，非官督不能防其弊。李鸿章旋委盛宣怀为招商局督办，马建忠、谢家福（字绥之）为会办，调唐廷枢北上，专办开平矿局，于是招商局遂成官督商办。

时以经济困难，需款孔急，原借洋行之款陆续到期，官商均无法挪移，乃由盛宣怀禀明李鸿章，以局产向汇丰银行抵借英金三十万镑，周息七厘，十年偿清。但仍苦不敷分配，李鸿章复奏准维持招商局办法四条：（一）先归洋借，后还官本；（二）漕运水脚不再扣减；（三）轮船运漕回空减税；（四）装运鄂茶出口减税。并与太古、怡和两洋行重订揽载合同，水脚栈租不得有让价争揽之弊，营业渐为顺利。

招商局将轮船保险收归自办后，先后成立济和、仁和两保险公司，获利颇厚。一八八六年（清光绪十二年）一月，将该两公司合并，改名仁济和保险公司，扩充资本为一百万两，仍由招商局代理。

一八九四年（清光绪二十年甲午）七月，中日战争爆发，北洋航行危险。招商局援照中法战役中暂交旗昌经管故智，将海轮十余艘分售与各洋商。至翌年三月中日和议成立，全部买回。

一八九七年（清光绪二十三年）招商局在历年公积及自保船险公积项下，各提出一百万两，共两百万两，转为股本，填发股票，连原招股本共为四百万两。

一九〇〇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五月，义和团事起，八国联军入侵，招商局复照前例，将一部分轮船暂行出售与洋商，以免损失。翌年七月事平，仍照原价买回。

#### (四) 商办时期

招商局自创办以来，均直接隶属于北洋大臣。一九〇九年（宣统元年），奉旨归邮传部管辖。六月三十日开第一次股东大会，公推盛宣怀、施肇曾分任董事会正副主席。九月，邮传部颁行招商局股份有限公司商办隶部章程，于是招商局遂成商办。

一九一〇年（清宣统二年）二月，邮传部筹办水陆联运，以利运输而增收益，爰与各铁路议订联运合同，路线如下：（一）由上海至天津，转运奉天；（二）由广州至营口转运奉天；（三）由上海至天津，转运张家口；（四）由上海至镇江、南京，转运汉口。以上各线一律发售客货直达票，商民称便，局务进展。

一九一一年（清宣统三年）秋，武汉起义，上海光复，政府有迫借局产抵押巨债之议，全体董事一度辞职，旋获得政府谅解，始返局办公，惟仍借与沪军都督四十万两千两。时因时局关系，需款浩繁，而金融阻滞，营业亏折，不得已将所有各埠栈房、市房等向汇丰银行抵押一百五十万两，以资周转。

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六月，股东常会议决仿照日本邮船会社办法，推选董事九人，由董事互推两人为董事会正副会长，主持一切，以三人分别主管船务、营业、会计三科业务，其余四人只参与会议，审定大事，仍须多数取决。并推举杨士琦、王存善、周晋镛、盛宣怀、唐德熙、郑观应、傅宗耀、陈猷、施亦爵为董事，顾润章、张武镛为查账员，互推杨士琦为会长，盛宣怀副之，唐德熙兼营业科科长，陈猷兼船务科科长，施亦爵兼会计科

科长。

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一月二十三日，在上海张园举行股东特别会议，议决所有局产照公估时值核算，将无关航业之市房及各种股份划出，另设积余产业公司，分别办理。当时全部财产估值一千七百余万两，因将航业资本改为银八百四十万两，产业资本洋四百四十万元，改填股票，分发与各股东，并酌予局中职员，作为花红公积。规定凡有局股一股者，得换发新式之航业股份两股，每股银一百两，及积余产业股份一股，每股洋一百元。惟航产划分一案当时曾被袁世凯驳斥不准，故股票虽经分别发给，但仍须二航一产连带一起，方得过户买卖。是年十月，董事会又召开特别会议，重将局内职权划分，规定船务、营业两科专办总局提纲挈领之事，另设沪局分负上海揽载转运、联络商情、招徕生意责任，并升调关子明、许楚卿为沪局正副局长。总局仍由杨士琦、盛宣怀任董事会正副会长主持局务，董事王存善、傅宗耀等分别担任调查各局栈及各埠产租事宜等。董事施亦爵辞职，以邵义璠(字子愉)代之。

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五年中，适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外国轮船多被政府征调回国，为我国航业发展之莫大机会。无奈我国各轮船公司规模有限，招商局亦以资本不足，未能善用时机，作有计划之发展，殊深可惜。战争结束，外轮卷土重来，我国航业复为外商所把持，招商局更为少数股东所操纵，营私舞弊，营业一落千丈，种种腐败至于极点。

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四月二十日，招商局假上海北市总商会举行股东大会。会上大股东盛氏愚叟义庄代表孙铁舟提出



招商局近来种种腐败已达极点，亟应力谋整顿。旋由股东提出改善办法五点，均经通过。但投票选举时，忽有人强抢票匭，一度引起纷乱。投票结果，除周晋镰、郑观应、李国杰留任外，选出盛恩颐（字泽承）、陈兆焘、陈安金、麦坚信（字佐之）、张武镛、邵义鏊六人为新任董事，周国源、金菊蕃为查账员，并另举盛重颐为总经理。前董事傅宗耀即向上海法租界会审公堂起诉，控告愚鲁义庄代表孙铁舟毁坏名誉，要求赔偿损失。又有股东陈永霖向公共租界会审公廨起诉，认为此次系非法选举，请求给谕制止新董事会成立。后经股东施肇曾、陶湘等出面调解，傅宗耀等仍任旧职，英法两租界公堂讼案取消，争端始息，而总经理盛重颐愤不到局。翌年秋，股东张士记等呈控傅宗耀、邵士鏊草菅人命、舞弊营私等七大罪状，北京政府派邵恒浚等彻查。时另有一部分股东组织股东维持会，并推举朱葆三、苏剑泉等十一人组成检查委员会，拒绝部派人员到局查办。嗣因北京政潮突起，王宠惠内阁辞职，吴毓麟任交通部长，于是将查办招商局案根本取消，而当日股东组织之股东维持会亦应告终，惟该会受傅、邵利用，仍俨然以股东大会自居，参与局事。此种无法理根据之组织，延至民国十六年始告解散。

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招商局以频年内战，地方不靖，营业亏损，积欠庄款达三百余万两，期短利高，因谋改借期长利轻借款，以清夙债。经董事会议决，以原抵押品向汇丰银行增借至五百万两。翌年，为添置轮船、加建栈房等，现款竭蹶，又以总局房地产向美资花旗银行借得一百万两。

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招商局设立稽核处，发现南北

栈煤斤月结不符及各轮运费偷漏情事，报告董事会分别处理，并向各报关行追补运费，然欲稽核会计科及沪局账册，均被拒绝，始终未能彻底执行稽核职权，故稽核处不久即行撤销。旋准股东维持会函，恢复三科制。时适“五卅”惨案发生，国人抵制英船，太古、怡和营业锐减，惟招商局以海船不多，未能承接全部货物运输，再次坐失良机。是年孙传芳征用江轮九艘专供军运，九月九日江永轮由南京驶至九江停泊，因兵士失慎，全船弹药爆炸，焚毁无余。除士兵伤亡不计外，船员死难八十八人，以致招商局各轮海员相率罢工达四阅月之久。招商局既受历年内战影响，又因被少数股东把持舞弊，亏损益甚，甚至发薪无款，竟欲以局产中价值六千万元之上海三大码头，作价三千万元售与日资企业，嗣因慑于舆论，其议始寝。

#### (五) 官督整理时期

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春，北伐军攻克武汉，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以招商局为全国最大航业机构，即拟加以整顿。三月间，蒋介石派张人杰、蒋尊簋、钱永铭、虞和德、郭泰祺、陈辉德、宋汉章、杨铨、潘宜之、杨端六、李孤帆等为清查整理招商局委员。五月二十日全体委员到局，开始清查，设委员会办公处于上海招商总局正式办公，调集簿册，详加勾稽。经数月之工作，清查完竣，制成报告书，将招商局数十年之积弊揭发无遗。因董事傅宗耀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曾以多数金钱供给敌饷，复将招商局轮船供孙传芳军事运输之用，即于三月二十六日由政府颁布通缉令，傅宗耀远避他处。

同年十一月，国民党政府据清查整理招商局委员会报告，公布监督招商局章程七条，设立招商局监督办公处，直隶于交通部，置监督一人，总办一人，由交通部长王伯群兼任监督，参事赵铁桥兼任总办，设办公处于上海四马路五号，监督及总办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同时宣誓就职。赵氏就任后，本拟督促原任董事会自动改组，整理局务，不料董事会置之不理，董事会开会时，监督处派员前往旁听，亦遭拒绝。于是监督即与董事长李国杰洽妥，径予接管，由监督处发布解散董事会及将各董事停职查办命令，同时又令招商局改设总管理处，派监督办公处总办为总管理处总办，令李国杰代行董事会职权。二月二十二日，总管理处成立，正式办公，厘订各项章程及办事细则，设立总务、营业、会计、出纳、船务、栈务六科。又以仁济和保险公司原系另有股东，另立账册，与招商局截然两事，经由董事长李国杰呈准改组，另派经理。并设立业务改进委员会、工程委员会等各专其责，以维危局。

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二月，有人密告赵铁桥整理无方，违法失职，经交通部、工商部、监察院会同组织彻查招商局委员会，派员来沪，经一月余之清查，结果并无所获，彻查委员会即告结束。是年六月十七日国民党二中全会决议，将招商局改隶国民政府，不属交通部管辖，由国民政府特派专员负责整理，并令该局总办赵铁桥代行专员职权，赵氏即拟具特派整理招商局专员暂行办事规则六条，呈报国民政府令准备案。是时招商局虽名为商办，实已由政府代为经营。

翌年二月，赵铁桥以积余产业公司原为招商局之附属事业，

应归总管理处管辖，不宜另立门户，以致涉讼法庭，结果积余产业公司名义取消，总管理处另设产业科接管。是年七月二十四日，赵铁桥为整顿局务，被人所忌，于是晨九时左右莅局办公，在局门前，车未启门，即被刺身故。此后政府先后派蔡培、陈希曾、李仲公、郭外峰充任专员，均为时甚暂。一九三二年三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将招商局拨回交通部管辖，并部令设招商局监督处，以次长陈孚木任监督，李国杰为招商局总经理，接收总管理处，继续经营。无如局债过巨，整理乏术，营业仍无起色。

#### (六) 国营时期

一九三二年(民国二十一年)十月，国民党政府以招商局内部情形复杂，整理方案又未能付诸实施，乃出资将招商局收归国营。所有股票均照近三年平均市价，每套(即航业股二股、产业股一股)从优定为现银五十两，由政府收买，继承招商局原有一切权利及合法债务。取消监督处，另设理事会、监事会及总经理。并公布招商局暂行组织章程、理事会及监事会暂行章程，简派叶琢堂、刘鸿生、史量才、张寿镛、张嘉璈、杜镛、杨英、胡笔江、李铭、王晓籁、钱永铭、余日章、张寅、胡筠庄、盛升颐等十五人为理事，卢学溥、陈辉德、虞和德、胡祖同、秦祖泽、荣宗敬、黄金荣、金庭荪、郭顺等九人为监事，刘鸿生为总经理，均于是年十一月十四日就职，改名为国营招商局，总局仍设在上海。其组织除理监事外，复设总经理处，下设总务、业务、会计、船舶四科，另设债务整理委员会，以整理商办时期所借之内外各债，并设购料

委员会，公开标买各种物料。至于收回股票，一时股东虽有异议，然以所定股票作价较市价为高，且事前征得多方面同意，故办理尚称顺利。

自改为国营后，着手整顿，发现前监督陈孚木、前总经理李国杰曾与美资中国营业公司订立三千万借款合同，以招商局四大码头产业作抵，密未报部，且由李向中国营业公司索取贿赂七十万两。案发后，李氏下狱，陈氏逃亡，招商局即与中国营业公司交涉，取消合约。至李氏所收之七十万两，只得由局方承认，分期偿还。刘鸿生接任总经理后，力图振兴，拟具改进局务并整理分局等办法，送由理监事会审核，并派员前往各分局督率整理，视察利弊。又拟定安置本局航海专科第一届毕业生及吴淞商船学校学生上船实习等办法。

此时局轮残旧，业务不振，南北航线几为英日商轮所垄断。因此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将中英庚款存储之英金三十六万镑，暂时借充改进航业之用，由招商局理事会与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订约，分期偿还。并拟具添购船舶计划，签定借款草约，规定所借三十六万镑完全用于在英订造轮船及购买材料运华造船之用，即以所购或所造之轮船各宗收入为还本付息之担保，年利五厘，由签约日起两年后开始偿还，半年为一期，共分二十期，限十年偿清。其时计划添购海轮四艘，委托英厂建造，江轮三艘，购买英厂材料自行建造。招商局派总工程师伍大名等去英驻厂监造海轮，共计造价三十四万一千七百镑。翌年秋冬，四轮陆续来华，定名海元、海亨、海利、海贞，行驶沪港粤线。原拟购料添建江轮三艘，以海轮招标超过预算，借款不敷，遂作罢论。

招商局曾先后于一九二八年（民国十七年）及一九三一年（民国二十年）参加国内联运会议，因时局不靖，联运办法未能实行。刘鸿生曾根据历届联运会议成案，与陇海铁路管理局订立水陆联运细则，以连云港为接运地点，沿线各站为联运站，上海、广州、天津、青岛为联运口岸。并议订国营招商局与国有铁路联运办法二十一条，于一九三四年（民国二十三年）四月，与铁道部联运处订立水陆货物联运合同。试办以后，客商咸表欢迎。后又与胶济铁路实行联运，以青岛为接运地点，沿线各站为联运站，上海、汕头、香港、广州为联运口岸。一九三五年一二月间，又先后与平汉及江南两铁路实行联运，平汉铁路以汉口为接运地点，沿路干支线各站为联运站，上海、九江、安庆、芜湖、南京、广州、厦门为联运口岸；江南铁路则以芜湖为接运地点，沿线各站为转运站，汉口、九江、大通、安庆、镇江、烟台、威海卫、天津、宁波、汕头、广州为转运口岸。刘氏在任期间，复以上海金利源栈、杨家渡栈、北栈、中栈、东栈等处沿浦滩地，历年均未升科，因向上海市府办理升科手续，并将局中房地可以出租者，分别清理出租与人，收取租金，以增收益。又与三北、宁绍、怡和、太古、日清各公司重订长江公摊货物运费合同，以免竞争，而防贬价。更因北洋航线尽为日轮包办，南洋航线为英商垄断，于是修葺船只栈房，淘汰旧轮，添租新船，并确定收支预算，实行审核制度，裁汰冗员，紧缩开支，重订各栈扛力、栈租，改革各轮买办制度，锐意整顿，营业渐有起色。无奈在商办时期，负债总额达三千万元，每年子息要付两百六十七万元，无法清偿，屡请政府拨款，整理债务，亦无具体办法，全体理监事及总经理

均以穷于应付，只得联合呈请辞职。一九三六年二月四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会议通过照准。

刘氏去职后，交通部公布修正国营招商局组织章程，废除理监事会制，设置总经理一人，副总经理两人，委蔡增基为该局总经理，谭伯英、劳勉为副总经理。蔡氏莅任后，根据组织章程规定职员名额，并拟将局中旧有职员举行甄别考试，以定汰留。旧有人员大都是数十年之老职员，引起恐慌，发生怠工情事，相持不解，后由部派员调解，勉强应试，结果被淘汰者不少。又为各江轮业务主任采用包缴比额制流弊至多，毅然废除买办制；所有五栈货运扛力也废除包办制度，一律公开招标承办，另派理货员监督装卸货物事宜。翌年一月，副总经理谭伯英辞职，沈仲毅继任。设立房地产业委员会，整理房地产，清理租金，解决悬案。经过种种改革，营业渐见起色。

招商局截至抗战前夕，共有大小船舶五十三艘，八万六千三百八十余吨。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沪战爆发，不久上海沦陷，蔡增基率一部分人员迁香港设处办公。离沪前，为保全局产免陷敌手，与美资卫利韩公司立约，将全部局产在名义上移转该公司经管，按月总收入提百分之三为酬，以两年为期。长江方面业务，另派一部分人员组织长江业务管理处，设局于南京，由副总经理沈仲毅兼任处长，代表总局指挥沿江各分局处及撤入长江之江海各轮。当日撤入长江供应后方运输的轮船，有江顺、江安、江华等大轮十三艘，小轮八艘。并在局旗上加黄色水纹四条，因原系红底黄日与日敌旗相似，易滋误会，至建国前尚沿用此式。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国军退出上海，南京形势紧张，江新、江顺两轮随政府西迁，沿途被敌机追袭，几濒于危，江天轮担任紧急渡江任务，结果陷落敌手。国民党政府自南京撤退后，汉口人满为患，物资拥积，且以江海各轮集中武汉，有被空袭危险，乃将四千吨之江安、江顺两轮试驶宜昌，试航成功后，其他各公司亦纷纷将大轮加入运输。是年十二月，招商局长江业务管理处奉命迁渝办公。时撤退香港之元亨利贞四海轮，仅用以存趸入口货物，无法出航，由蔡增基奉准出售与英商怡和洋行，价三十四万英镑。

一九三八年，武汉局势紧张，江海轮船集中宜昌。国民党政府运输司令部曾令各航商组织试航长江上游委员会，由沈仲毅兼主任委员，设法将能上驶轮船克日起程，否则必要时予以沉没，免资敌用。经调查川江航路及各轮性能，觉有上驶之可能，乃呈准交通部招聘领航，积极进行，各轮始能依次上驶。自“八·一三”战事发生至一九三九年底止，招商局江海大轮奉令凿沉者，计上海一艘，镇海一艘，龙潭两艘，江阴七艘，马当三艘，合共十四艘，两万八千余吨。至担任军运，或抢运公私物资而遭敌机炸毁或损失之船舶，则有二十艘，两万四千三百余吨。

一九四三年四月，交通部在重庆恢复招商局总局，派徐学禹为总经理，潘光迥、沈仲毅为副总经理，同时恢复理事会，以蔡增基为理事长，刘鸿生、杜镛、盛升颐、何墨林、赵季言等为常务理事，徐学禹、潘光迥、刘攻芸、王选之、韦以馥、寿景伟、赵隶华、魏文翰、骆清华为理事，并将原有之长江业务管理处撤销。其时所存船只大小合计仅十八艘，两万三千余吨，其中六大江轮，因船



身大,吃水深,无法在川江行驶,但为准备复员,所有船上技术员工仍全部留用,照付薪津。当时招商局营业仅赖五艘中型江轮上驶泸县、叙府,下驶万县、三斗坪,以不足总吨数十分之一之船只营业收入,供应全部开支,其中困难,可想而知。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战胜利,徐学禹计划复员迁沪,九月初与副总经理沈仲毅先率一部分人员东下,在沪办理复员事宜。旋接收上海广东路二十号日本邮船会社房屋,即在该处成立国营招商局上海临时办公处,后原在重庆工作人员全部来沪,总局遂正式迁沪办公,并派员赴长江及沿海各地筹备恢复各分支机构,办理接收事宜及成立台湾基隆分局。

招商局于抗战胜利之日,仅残存大小船舶二十八艘,两万五千五百余吨。复员开始后,各地敌伪产业处理机关成立,规定水上交通工具统由招商局接收,陆续接收各项大小船只。留局运用者,共计三百三十二艘,七万四千吨,加上政府预向美、加两国订购及自己向外购买者,共有船舶四百六十六艘,三十二万六千八百余吨,较诸战前吨位相差悬殊。复员后营业发达,徐学禹利用余润与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合资,组设台湾航业公司,另与中国石油公司合资,组设中国油轮公司,并派轮开辟印度加尔各答以及香港、新加坡等航线。

# 旧海关见闻纪要\*

刘佩宜

旧海关的历史,若包括胚胎时期在内,自一八四二年五口通商至一九四九年人民海关成立,共达百年以上,海关总税务司署成立以至消灭,亦有九十年。在这长久的岁月里,外国侵略者一直利用我国海关,勾结封建王朝,支持新旧军阀,操纵国计民生,榨取人民血汗,摧残革命运动。笔者曾在旧海关工作二十多年,友辈中从事海关工作者甚多,平日对海关掌故注意收集。本文回忆范围,起自清末,终于解放,记述五十多年间的见闻,内容分成以下九段,供史家参考:

- (一) 税务司和总税务司的来历;
- (二) 总税务司署组织概况;
- (三) 畸形的管理体制;
- (四) 大小金饭碗的实况;
- (五) 海关的分布;
- (六) 海关控制税务专门学校;
- (七) 江海关控制上海浚浦局;
- (八) 江海关攫夺港口警权;

---

\* 此系已故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刘佩宜遗稿,原文共六万多字,现摘要发表。

## （九）海关造册处与海关图书馆。

### （一）税务司和总税务司的来历

旧海关自建立、巩固、扩大以至灭亡，一直是一个独立王国。早在清咸丰年间，威妥玛以英国领事代表的身份，由上海道札委为稽征关税委员会的委员。委员共三人，其余二人为法、美两国驻沪领事的代表。委员两字是由英文（commissioner）译出来的。这个英文名词，本可以称委员，也可以通用为司长、厅长和局长等一类的官职。威不甘心做关道的下属，改用一个司字。按那时清朝官制，外省官员以督抚为尊，其次是三司，再次是各道，依次排列，统称督抚司道。威当时僭用税务司这个名称，无形中把职位提高到关道之上。后来他把江海关税务司职务交给秘书李泰国，李因购船失职案被撤职后，威妥玛又替赫德活动，继任总税务司。

自一八六四年（同治三年）赫德继任总税务司后，在位历四十年之久，后由安格联接充。他们利用中国清王朝衰微和民国以后军阀割据的局面，除继续控制关税大权外，又扩大职权达数十项之多。现就记忆所及分类列举如下：一、财政方面，兼管常关，征收土产鸦片烟税，征收船钞和代征浚浦捐、码头捐，保管关税及关余，代办整理国内公债，代发军警及政府机关经费；二、军务及交通方面，代管海陆边疆的巡防及运输，代管沿海及内河灯塔浮标，代办气象测量事务，代办海道及内江水道测量；三、水利方面，代办内河水利工程；四、警务方面，代掌港口水上警权；五、港务方面，代管港口内指泊和引水事务，代管码头仓

库；六、工务方面，代办建筑工程和材料工厂；七、邮政方面，代为创办和管理邮政；八、外交方面，代借外债，代办交涉和代订条约；九、工商方面，代办国际展览和商品检验；十、教育方面，代办教育事业；十一、文化方面，代办文化事业和贸易统计；十二、铁道及内地货运方面，代办海关所在地以外的查私。

## （二）总税务司署组织概况

海关总税务司署，由于不断侵越我国行政部门的职权，因此它的内部组织庞大复杂。创立之初，设有五个“文案”。以五个税务司分任：一是总文案；二是汉文案；三是审计文案；四是海务文案；五是驻外文案。这是一个雏形的组织。清光绪甲午以后扩充为四大股：一是征税股，内有六个秘书，各以一个税务司分掌总务、机要、汉文、审计、统计、驻外等职务。二是海务股，由海务巡工司主管，下设灯塔、营造、理船三处。三是教育股，由总税务司兼管，同文馆是主要的附属机构，总教习丁韪良专掌教务。四是邮政股，主管的是一个税务司，以后改称邮政司。

当时海关洋员包括同文馆的教授和邮政总局的主要人员在内，约有八百五十人，华员在征税、海务两股内，有三千五百人左右（邮务员不在关员名册内）。高级人员如税务司、副税务司以至帮办，华员都无资格升充；外班自总巡（后改名监察长）以迄扦子手（后改名稽查员）都是洋员。海务股指泊员和低级灯塔供事人（后改名灯塔管理员），初期也是洋人，后招收华人充任。汉文秘书（在公文上称为“管理汉文事务税务司”）选择熟谙中文

的洋员充当,但只口授大意,由文案(后改名文牍员)起草,草成由他们核稿。

同文馆于一九〇一年(光绪二十七年)改为京师大学堂,邮政总局于一九一〇年(宣统二年)改归邮传部直辖。因此民国以后,北洋军阀时期,总税务司署的教育邮政两股先后取消,而将海务股中的营造处扩充为工务股。至此海关内部共分三股,股的英文名称是 department,在国民党时代始译为部或部门。工务股设立不久,复并入海务股,统称为两大部门。

总税务司署在赫德、安格联、易纨士任内,都设在北京东交民巷台吉场(俗称台基厂)。一九二八年梅乐和把全部人员档卷一齐迁至上海赫德路(今常德路)。房屋系就两所洋员住宅改建,后又扩充到三宅,并排而列,与原设在上海新闻路的统计科和图书馆连成一气,以房屋不敷,把财务、审榷、海务三科设在外滩海关大厦内。财、海两科的规模和实权,比财政部的公债司和海军部的军务司要大得多。当时蒋政府设在南京,而梅乐和不愿往宁建署,只在宁设驻京办事处,以副税务司孙思永驻宁与财政部关务署联系。各科、处、室的人员都在上海办公。

日本投降后,重庆与沦陷区两总署合并,淘汰了一批由日寇录用的人员,可是关员家属和政界要人的亲友陆续增加,总称虽仍为两大部门,各科室内则冗杂不堪,再加上内战影响,各关纷纷撤退,人员都收容在沪,更为臃肿。这时机要科裁撤,并入汉文秘书科,改称秘书科,并添设管理察验事务室。

职工中洋员人数以旧军阀时代为最多,达一千四百四十八人,国民党政府末期只剩两百余人;华员总数在建国前夕为一万

一千七百余入。

### (三) 畸形的管理体制

税务司制度的产生,最初是因江海关洋关试办有效,《天津条约》后这一制度推广到各大口岸,并设总税务司署,李泰国任总税务司,由南洋通商大臣加委,呈报北京理藩院备案。它虽是税收机关,但因有外交、通商和雇用洋员的关系,户部无权过问。一八六一年(咸丰十一年),清廷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直接正式加委。各关用人收税之权归总税务司,而行政事务归监督,监督应负监督用人和收税之责任,可是后台敌不过总税务司,并且尸位无能,就始终办理一些例行公文,而放弃了责任。南北洋通商大臣应有节制指导之权,户部应有查核税收盈绌和经费支出之权,也只好听总理衙门作主,仅仅随同画诺。制度是多头的,而实际上,总税务司可以独断独行。

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本是外务部和外交部的前身。一九〇六年清廷于户部及外务部之外,另设一税务处专管海关,名为独立,实际上是度支部尚书兼税务处督办,外务部侍郎兼税务处会办,仍无异于两部共管,而海关监督一职并未取消,延至一九二七年仍由财政总长安插私人。一九二八年后,税务处改为关务署,完全隶属于财政部,而关监督与总税务司的任免,都由署令发表。在新旧军阀统治时期,军阀虽各踞一方,但对外都不敢得罪洋人,甚至还争取各帝国主义的明暗支持,因此关权比清政府时期巩固得多,各关税务司虽奉到财政部公文,如没有总税务司的命令并不遵办。年代既久,就博得了一个独立王国的

称号。

至于关监督这个骈枝制度，是在帝国主义洋关将亡之前才废止的。在此以前各关税务司始终把呈报总税务司的报表等项，用宣纸白摺写成，按结（一结即一季）函送监督知照，它因总税务司要直接申报财政部，就不再转呈而归档存案，结果等于废纸，一经兵乱片纸无存，反不如总税务司的档册中有案可稽。对于地方上各官署商民等往来函呈，虽向例由监督出面代办交涉，可是税务司为了便捷起见，也常越过监督而直接接洽或批复，监督也从不计较。

旧海关的分工制度也是畸形的。总税务司可把各种人才罗为己有，任意指挥，不独各省各派的华员，连各国各族的洋员，也都做了他个人的奴才。清末赫德兼任总邮政司，把邮政股列入海关四大股以内，虽然邮务人员已经邮政司另编统计另造名册，而工作和人员的分配调用仍由赫德另订制度，由他负责向总理衙门呈报。

总之，旧海关的原则是以洋员来统制华员，并且分化华员，使他们容易受洋员的统制。其次就是用奴化教育来训练华员，以较优的待遇收买他们，使他们实际上帮助执行帝国主义的统治策略。

#### （四）大小金饭碗的实况

旧海关职员的名目极其繁多，而每一项名目又都有许多等级和不同的薪给。简单而扼要地谈，薪给制度的特征就是英文高于汉文、内勤高于外勤，并以税务司和帮办两种高级职员来统

治一切。总监察长在外勤中虽系最高，但仍归税务司管辖。到了建国前一两年，虽规定内外勤不分界限，监察长可升副税务司，以缓和内外勤的矛盾，但并未推行。内勤方面，在帮办和税务员之间暗中划定了一个统治与被统治的分界线，税务员以下完全是被统治者，帮办以上直至总税务司都是统治者。所有征税各科室的基层工作，都以税务员的劳动力为主体；帮办多半以攘夺他人之功劳以献媚于上级洋员为能事。

帮办以上也是等级森严。由帮办上升，第一步是代理副税务司，除原等原级原薪不动外，另加代理津贴每月五十两和特别津贴二十五两。副税务司只有一级，华员月薪五百两，洋员七百两。代理税务司也有代理津贴一百两和特别津贴五十两。税务司华员分两级，月薪六百五十两至七百两；洋员分四级，为九百两至一千两百五十两。华员税务司待遇优厚，这是他们甘心服从总税务司的一个原因。

由于海关华员待遇与其它机关同等公务员比起来确是优厚，因此，当时颇为一般人所羡慕，称为“金饭碗”。其实低级职员卖力效劳，供洋人驱使，日子并不好过。我在旧海关工作，从试用文牍员，经历了二十年，才升为一等一级税务员。当时人们把检验员称为“克劳狗”（英文 clerk 的音译），就反映了低级华员的处境。我们税专毕业生中，只有丁贵堂、张勇年、刘丙彝三人由学习员一直升到一级税务司，并做了江海关税务司。



## (五) 海关的分布

海关是五口通商的产物，原只在沿海口岸设置，随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深入内地，在内陆地区，也设立海关，如西藏的亚东关等。在赫德任总税务司时，共辖二十九关（包括朝鲜四关）。

到一九三二年，英人统治的中国海关共有四十五关（北平分关在外）。一九三三年伪满洲国出现后，日人首先抢夺了东北各关，后来侵入华北、华中等地，南京、镇江、苏州、杭州等关纷纷撤退，在上海的江海关内设立办事处。到一九三八年连江海关也不能保全，英帝在华侵略势力从此一蹶不振。

一九四二年国民党设立总税务司署于重庆狮子山，次年美帝代理人李度就任总税务司，与沦陷区的总税务司日帝代理人岸本广吉遥遥对峙。那时沦陷区的关员纷纷逃往后方，仍旧在洋人指挥下供职。以后三年中，华南各关无一不为日人所夺，李度统治下只有西南的重庆、万县、蒙自、腾冲四关和新设的昆明关（附有贵阳分关），其它如广东的曲江、梅县，湖南的沅陵，江西的上饶，陕西的西安，河南的洛阳，都成了陆地边境的海关。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美帝控制了中国海关，裁撤了苏州、杭州、长沙、岳阳、镇江等十余关，保留二十九个关。一九四六年复员初，本拟恢复东北四关，除沈阳、安东、营口外，尚有大连。原派接收大连关的就是当时重庆关税务司刘丙彝，他带了韩肇连前往长春，株守很久，因蒋介石发动内战，解放军奋起抵抗，大连关没有开得成，李度才命刘回沪，次年升刘为江海关税

务司。

### (六) 海关控制税务专门学校

一九〇六年(光绪三十二年)七月,清廷设立税务处,以铁良为督办税务大臣,唐绍仪为会办大臣,下设提调及四股总办(即股长)。那时海关帮办和税务司都是洋员,华员最高只能升至超等供事,没有人做过帮办。赫德因税务处要他保荐熟习关务的人材,才把陈銓、张锦、张玉堂(都是广东人)三个供事升为帮办,保送到税务处以备任用。陈等到处后,唐绍仪派陈銓任提调,二张为总办,筹办税务专门学校。一九〇八年学校成立,陈任校长,所有后来在海关掌握大权的毕业生,如第一班的杨明新等,第二班的卢斌、刘丙彝等,第三班裘倬其等,第四班丁贵堂、张勇年等,都是他的高足。税专成立后,所有历任副校长都由英籍税务司兼任,主要科目的教员也聘用富有业务经验的关员兼充,只有舍监、文牍、会计、庶务等职员及汉文教员,才由督办、会办及校长选派私人充任。

一九〇九年(宣统元年)秋季,税专第二班招考新生,除照上年在北京、广州、上海等处招考外,南京也有数名名额,由金陵关英籍税务司主考。他函托南京汇文书院院长包文保送,包文遂选择陶文瀾(安徽人,后改名陶行知)、蔡竞平(浙江人,后改名蔡正)、刘丙彝(江苏)、陈滋乐(江西)、卢斌(江苏)等五人持介绍函往下关应试。前四人都是汇文预科行将毕业,与我同班(我因母丧在宝应原籍,未能参加),卢斌已由汇文转学方言学堂,闻讯往谒包文,遂亦得保送。这五人都考试及格,但陶、蔡两人均以

海关新章华人待遇虽略有提高，而不能升至税务司，出路窄小，仍有志于大学毕业后出洋留学，因此两人录取后并未前往报到。陶留汇文（旋改金陵大学），仍与我同班，毕业后由教会补助出洋留美。蔡考入清华大学，后赴美留学。刘、陈、卢三人税专毕业后，在海关不久都做了帮办，后都升副税务司，至建国前一年退休。

此后税专的入学考试资格，由中学相当程度提高到高中毕业。外勤班资格同于内勤，而体格标准尤严。一九三三年起，招收大学毕业生训练一年，即派入海关为内班。此外，一九二八年梅乐和曾在上海佘山灯站设立灯塔管理员训练所一处，招募学员，以备逐渐用华员代替洋员之需。一九三〇年税专又于上海分校内添设海事班，专为海关训练华员。税专校长除陈銮外，余如余文灿等，虽不是关员出身，但他们的副校长和业务教授既靠海关供给，而经费来源又仰给于总税务司，因此外国人势力的影响始终很浓厚。

沦陷初期，伪维新政府没有关务署长，只有伪江海关监督李健南。汪伪政府成立，张素民当了关务署长兼任税专校长，周得禄任教务长，也有几班毕业生派入海关工作，抗战胜利后他们都被撤职。

### （七）江海关控制上海浚浦局

一九〇五年（光绪三十一年），清廷外务部同各国公使订立黄浦江疏浚条约，根据这个条约临时设立一个浚浦局。最初是委员制，由江海关代征浚浦捐并聘任洋员为总工程师，因此，江

海关税务司虽是委员之一，实际上已掌握了用人行政和财务大权。一九〇九年该局完成了高桥沙新水道的工程后，改为永久机构。一九二九年梅乐和升为总税务司后，江海关税务司由梅维亮、巴闰森、罗福德三人相继担任，浚浦局委员一职也由他们兼充。那时新关大厦已建成，浚浦局设在五楼。局务先后由梅维亮等负责，其他委员并不到局办公，实际上梅等于局长。一九四六年丁贵堂就任江海关总税务司时，浚浦局已改为局长制，丁遂兼任该局局长。一九四七年丁交卸了江海关总税务司职务，由副总税务司兼任浚浦局局长，一直到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

#### （八）江海关攫夺港口警权

清末江海关设有理船厅（后改称港务局），管理船只进出港口事务，其职权分为指泊、巡江和救火三项。当时巡江吏（后改称港口警察）不过洋员四五人，而巡逻的任务，则由巡查鸦片而推广到维持交通秩序，对象由船舶而推广到一般人民，地点也由黄浦江延伸到苏州河的一部分。那时海关警务人员为数不多，可是他们有小火轮和舢舨往来巡查，并且可以调用总税务司署海务科派驻江海关的巡船和巡艇协助，把江与海联成一气，再衔接陆上的巡捕房，成为帝国主义统治旧上海的一统天下。

一九二九年，港口警察署在江海关对面浦东陆家嘴成立，并在高桥等处设立分署。据一九四一年统计，警察长一人，巡官、副巡官十人，巡长、副巡长十七人，警员三十八人，都是洋员，其中也有日本人。在当时上海人民心目中，这是一座水巡捕房，同公共租界的巡捕房是一样的。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英日籍

港警先后遣散，警察长职务改由华员代理，但港口警权仍属海关，地方警务机关无权过问。

上海港警是肥缺，久为蒋帮特务所垂涎，早在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间，CC 头子陈果夫、陈立夫就向当时上海市市长吴铁城保荐吴某为上海水巡队队长，在苏州河一部分水道内行使职权。他向吴铁城建议，想从洋人手中夺回黄浦江及苏州河近江警权，以统一全上海水巡。吴铁城商之财政部长孔祥熙，孔不敢得罪总税务司梅乐和，未予同意。

日本投降后，吴国桢任上海市市长，想收回港口警权，行文行政院及财政部。行政院长宋子文和财政部长俞鸿钧交总税务司李度查明议复，李度又转江海关查议。当时江海关税务司刘丙彝研究了全部档案，为了保护自己的职权，以港口警务与海关的征税、查私和监管船只货物都有密切关系为理由，驳复了吴国桢的要求，呈转到财政部作为李度的意见答复上海市政府，吴国桢仍然未能收回港口警权。

### （九）海关造册处与海关图书馆

海关总税务司署设于上海时即成立一个造册处，由一名税务司掌管统计事务，称为统计文案，国民党时代始改称统计科。该处连同所属的印刷所和图书馆都设于上海新闻路，后门与海关总署上海办事处紧紧相对，自梅乐和至李度，二十年内地址迄无变动。一九五〇年海关总署机关和职工迁往北京，造册处旧址一度改设上海海关职工学习班，我曾参加学习，同学中有旧统计人员，因此了解到不少以往工作的情况。

造册处的主要工作是负责整理全国各关汇总送来的进出口和转口货物报单,进行统计,在相当时间内编印成册,名曰贸易报告,包括年报、季报、月报及各种分类的统计表,余如通令、通函、密件以及其它公文、规章、报表及各种专家的调查报告、税则分类等书刊表册,不胜枚举(建国后,笔者在上海海关经手整理过的不下数百种之多,北京海关总署的档卷、单据、记录尚不在内),此外如职员录、会员录、纪念册和《关声》等杂志,更是习见的印刷品。上述各项书刊,除贸易报告及统计材料由造册处自行编制外,其他都由各有关部门将稿件送交造册处校对、印刷和装订。后因印刷事务繁忙,特设一个印刷所,由总署副税务司孙恩元任所长。

贸易报告出版后,除随时分发各部门、各关和分送各有关机关参考外,其余都留存海关图书馆内,以备中外各机关和商人选购查阅。各种重要书刊封面都用黄色,因为清朝皇宫内御用的书籍都是黄色封面,赫德因此也采用这个“高贵”的颜色。各项书刊有保密性的很多,关员不能随意购置,有的限于税务司或帮办以上的人员才有购置的资格,有的发一清单准许关员们自由购买。

海关图书馆的建筑设备及印刷所的机器,都是当时西方最新式的。早期由洋员创办和主管,收藏的也有航海专家适用的外文书籍,略有早年的中文译本。一九二九年海关总署自北京迁来上海后,改用华员阮寿荣(原总署副税务司,后升税务司)为该馆馆长,每年都添购书刊,并添置中文线装和洋装本,最重要的是中国各省的地方志。建国后,这些书刊都运往北京图书馆保存。

# 上海早期的邮政

薛明剑

我国很早就有邮传制度。周朝有步传、马传的设置，汉朝改称驿。羽檄征兵，详见史乘。隋唐以后，都设有专门官员任其事。

现代邮政始于一八四〇年的英国，在我国仿行仅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最初试办的是一八六五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外国侵略者越俎代谋的“上海工部书信馆”，先后设了三十多年，到一八九六年中国成立正式邮局的翌年，始行归还我国。现将经过史实分叙如下，以供研究者参考。但不论“上海工部书信馆”或“寄信官局”以至“大清邮政局”，其最初机构，都设在上海，故同上海近百年史实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 （一）租界工部局设立上海书信馆

一八六五年八月一日（清同治四年六月初十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设立“上海工部书信馆”，办理本地信件的递送事务，同时发行邮票及明信片。总馆设在四川路，分馆设在城内大东门大街，信箱分布各地区，最多时计共二十三处。还在外埠的福州、厦门、汕头等地设立代理处。一直到了一八九六年（清光绪二十二年），中国正式成立了邮局，上海工部书信馆才于翌年的十月三十一日（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六日）结束原有业务，移交中国邮局接办。

上海书信馆的经营,先后约有三十二年(实足三十二年零三个月),一共发行过邮票一百八十余种、明信片十余种,都是在英国印制的。邮票按银两计算,分五分、一两、一两二及一角、两角、二十文、四十文、六十文、一百文等数种。初期式样印有“上海工部”四字,右边为直行“书信馆”三字,左面为银两数字,上面有英文,下为阿拉伯数字。中期式样,四角绘图案,右边印“上海工部”,左边印“书信馆”及票值。后期式样略同中期,惟图案较为精细。明信片大小与今同,一面空白,一面并用中英文。

## (二) 西人开设华洋书信馆

上海外国人邮件,虽由工部书信馆担任收发,而外埠通商各口岸的邮件,则由所在地的领事馆代行收发,侨商必须亲赴各该领事馆投寄或领取,很感不便。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有鉴于斯,因在上海二马路民信局林立地方,设立“华洋书信馆”,最初专寄侨商邮件,按重量纳资,不贴邮票。邮路是水陆兼程,水道雇用民船运送,初时船员不惯同洋人交往,大多观望不前,应者不多。后来赫德出了最高雇价,并予以通过关卡的便利,应雇者方始踊跃。他的邮船上布置黄布一幅,上书“华洋书信馆邮船”七字,头艏高张黄龙旗两面,所过关卡,咸不盘问。后来弊端迭出,船员往往利用机会夹带偷税,因此情愿减低雇金,甚至要求不计雇价,盖利用两面黄龙旗的权威,藉此夹带私货。这时我国原有的民信局包封也都托他附带,取其迅速稳妥。陆道运送大都是北方严寒地方,凡遇海口冰封时期,假道镇江、清江、济宁而达北京。邮件都用大轿运送,押送人员同乘轿内,左右也高张黄龙旗两面,轿夫吆喝,气象威严,很象当时钦差过境。有一天适逢济



宁州知州排道出巡，遇见高张黄龙旗的大轿疾驰而来，知州疑系费钦差，立即避道回衙，后来探悉是护送邮务人员，假借洋人势力，招摇过境，乃奏请慈禧太后查办。这时清政府对于客卿唯赫德最为信任，连李鸿章也很器重他。此事发生后，慈禧即着李鸿章严办，迨李访知原委，仅令赫德将华洋书信馆限期闭歇，奏免议处了事。这一机构即在一八七五年结束。

### （三）海关寄信官局

一八七五年（清光绪元年），上海海关为了便于外国人同海内外通讯，曾在海关附设邮政部，称为“寄信官局”。

一八七八年（光绪四年）夏历七月二十四日，寄信官局第一次发行邮票，俗称海关大龙票，图案由上海关职员摩尔斯（H.B.Morse）绘成，票面依银两计数，分一分、三分、五分三种。邮票上端两角刊有“大清”两字，右面直行是“邮政局”三字，左面直行是票面银数，中心是蟠龙，龙的上格有“CHINA”，下格有“CANDARIN”字样，边有阿拉伯数字。龙的周围云彩和龙爪的地位，三种数值微有差别。印版是凸版铜模，逐步用手工雕刻，可分可合，是在上海海关造册处印制的。边框齿孔十二度半。共分三个时期发行。

第一期海关大龙票，发行于一八七八年（光绪四年）八月，用硬性半透明薄纸，票幅纵二十七毫米半，横二十四毫米半，两票间的距离两毫米半。每全张印二十五枚，人称薄纸狭边大龙票。有一分银（分绿、黄绿色）、两分银（分暗红、朱红）、三分银（分黄、赭黄、棕黄）三种。第二期海关大龙票，发行于一八八二年（光绪八年）六月，全张枚数及齿孔度数，都同第一期相同，惟票幅较上

次纵幅各阔两毫米，两票间的距离四毫米半，人称阔边大龙票，有四分银（分绿色、深绿色）、五分银（暗红）、六分银（赭黄）三种。第三期海关大龙票，发行于一八八三年（光绪九年）三月，纸质较厚，不透明。两票间距离三毫米半，全张由二十五枚减为二十枚，齿孔光洁，称厚纸光齿大龙票，有七分银（分明绿、绿色）、八分银（分暗红、淡红、朱红、深朱红）、九分银（分铬黄、柠檬黄）三种。

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七日（光绪二十年旧历十月十日），清慈禧太后六十寿辰，由总税务司赫德提议发行纪念邮票。图案由海关法籍职员棣维拉特（R. A. De Villard）绘成，全套九张，纸质明薄，有太极图水印，人称“万寿纪念票”，分三种版纹。一八九四年初版，相传在日本印制，叫日本版，惟据当时监印的棣维拉特所记，实系在上海印制。一八九七年时再版，称上海版。因非一次印成，故有明显的区别，票面一分至六分成纵式，九分、十二分、二两四分均为横式，共计九种为一套。

#### （四）中国邮政局正式成立

一八九六年（光绪二十二年）二月，清政府批准赫德的请求，仿照英美方法，专设国家邮局，发行正式邮票，并将原来采用的银两改为洋码。惟因正式邮票一时不及印就，在过渡期中，乃将旧存各种银码邮票，加盖“暂作银洋”字样，以应当时需要。因尚不敷应用，同时将印而未用的红色三分印花税票暂作邮票使用。仍不足，复将万寿纪念邮票原印版复印一批，加盖“暂作银洋”字样使用。这一重大邮政变动期间，有了各种不同的邮票，直到一八九七年（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十六日发行正式蟠龙邮票，在全国各省设立邮局，不再专门由上海发行了。

## 旧上海商业中的帮口

吴 拯 寰

百余年前，上海还没有租界，是江南的一个繁荣的旧式城市。那时隶属松江府，从元初到明清，人口逐渐稠密，商店鳞次栉比，街道由泥路改砌碎石，四周墙垣护防，各地小康之家迁居沪上者日众。它的商业重点集中城内，大小东门、陆家石桥、红栏杆桥、松雪街、虹桥头，其次是新闸和老闸。那时，来沪经商而最有手腕和力量的，可算是徽州人、宁波人、本帮人以及山西、广东和绍兴人，形成所谓“帮口”。到鸦片战争以后，这几个帮口的业务有了兴衰的变化。现分述于下。

### （一）徽州人经营的各项商业

徽州府六县（歙县、黟县、休宁、祁门、绩溪、婺源）人在上海各营专业。

歙县人经营京广杂货。那时洋货尚未大量进口，所有毛巾、线袜、洋火、洋针、煤油灯、五金什货等，都从广州运来。北京是京都，把各地制造的商品称为北京货，因此经营这些商品叫做“京广杂货”。店铺便称京货店、广货店。此业批发店全是安徽歙县人所经营，范围很大，资力也厚，内中如“巨成昶”、“永隆”、“利泰昌”、“怡源”等，都相当著名。

黟县人经营草货、皮革和土布、绸缎。草货就是箬帽、葵扇、

箨壳、广藤、雨伞、箬叶等，都是劳动人民必需品，营业很发达。皮革是做鞋子的鞋底、鞋面、皮梁、皮条等，大量交易集中在南市大码头、如意街、大东门外，次之是新闻和六马路。其中业务最大的有大码头的“永泰”、如意街的“益顺”，还有“隆泰”、“万泰”、“益生祥”，也在大码头，而以“益顺”为首。这些业务全是黟县人所经营，除厨司外，都是同乡。在公会里，草货开盘，黟县语言通行，连参加交易的粤人也略知黟县语。甚至粤人来沪出售草货、皮革，非黟县人开设的店铺不卖。后来，永泰用了本帮学徒，满师后也集资组织，从此也有本帮人开设的这种店铺。到了清末民初，本帮人开设的远远胜过黟县人，至抗战时，黟县人开设的一家也没有了。

土布为浦东布、通州布、宝蓝印花布等，都坚牢耐穿，价廉物美，不但畅销国内，远至南洋群岛、旧金山等处的华侨也很喜爱，每年出口数量很大。土布店也是黟县人所经营，其中历史较久的，有城内三牌楼的“余源茂”、小东门的“周益大”、大东门的“祥大”、北市石路中旺弄的“恒大”、“和大”、“同昌”和棋盘街的“林大成”等。至于批发绸缎庄，在北市里弄中，黟县人开设的也不少。

休宁人经营典当和衣庄。在旧上海，各段街上大都有典当。有的高楼大厦竟达一条街，称为“典当街”。今黄浦区公安局对面的金门路，就有一家典当的旧址。典当有雄厚的资金，收当无限的物资（除戏衣、西服不当）。高高的柜台，掌柜的称做“朝奉”。所出的当票，非业中人不会写，也不认识。当期十八个月为满，满期尚可宽放一月。利息每月一分两厘。职员除薪水外，

还有“存箱”(收当的衣服放在箱内)所加的存箱费和宽放一月的利息,也是他们所得。在典当外,还有“押店”,比典当小得多。当期只有六个月,每张当票最高不超过十元。还有“质店”,比“押店”更小,每张当票不超过一元几角。可是押店和质店限期利息都非常大,每月利息两分,十天一转,五天一转,超过当时的“印子钱”。这些押店、质店遍布全市,大都是广东潮州人所设,附记于此。

“衣庄”那时也是重要商业之一,大都是休宁人所经营。分为三种:一是提庄,二是叫庄,三是综合衣庄。提庄多数附设在典当里,有的同典当联号,有的是典当合股。业务是专门提取满期不赎的衣物,批售给叫庄与综合衣庄,或运往外埠。它的资力很大,生意极广。叫庄是一件件衣物接着时令摊在店门口或挂出叫卖,价格高低不一,各家门口站满顾客,如果碰巧,确有便宜货可买。十六铺里马路与南石路(福建路)是这些衣庄开设的地方。综合衣庄专门销售高贵衣服与皮货,如九江路石路口的“万昌”、汉口路的“翠丰”都是规模比较大的。它们布置得富丽堂皇,有会客室、样子间,请着高手裁缝,销售的衣服多数购料自制,冒称提庄货。顾客一般是富商官僚,他们认为典当满期货价廉物美,事实上未必便宜。每个职员都有相当的老顾客,招待周到,交易十九都能成功。职员除工薪外,对经手的营业还有“厘头”(佣金)可得,每百两有二两至四两不等(当时以银两作价)。所以他们对顾客敬以好茶好烟,午刻并备有丰盛的酒肴待客。他们除应酬门市外,最受欢迎的是送货上门,往往把衣服的明码标签私地加码。这些人在中年后,大都伙开衣庄,或置田产退职回

乡。

祁门人经营茶业。我国茶叶久已行销全世界，业此者以徽州人为多，其中祁门人经营的北京路“洪源永”茶栈为巨擘，专门批发红茶，出口的有饼茶、砖茶和紧茶等。绿茶则黟县人、休宁人也有经营的。如天津路“公兴隆”茶栈是黟县人所开，福州路“汪裕泰”、老北门“老嘉泰”则为休宁人所设，业务也大。

绩溪人经营菜馆。“徽馆”从前在上海有相当的地位。它的组织很简单，只需五六个会烧菜肴的人，请几个同事，有六七百元资金就可开设。当时找房屋还容易，各项菜肴原料馆子可去除欠，月底清帐，甚有三节（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结帐的。当时著名的有大东门的“大辅楼”，小东门的“醉白园”，北市九江路的“太和园”，福州路的“中华第一楼”。菜肴如炒鳝鱼、红烧甩水、青鱼头尾、红烧羊肉等，都脍炙人口。徽馆一般价格低廉，吃一碗火鸡面（火腿与鸡片）只要六文钱；四五个人吃甩水锅面，连每人喝二两白玫瑰酒不出两角钱；五角钱的和菜，有走油蹄子、醋溜黄鱼、三丝汤等，可供八个人吃。还有，红烧甩水过桥面（面外，另有红烧甩水一盆）只要二十文钱，清汤虾仁面三十文钱。不过经营保守，未能进取，不论在布置上、菜肴上，总是老一套。堂倌背着一条油油的抹布，招待顾客也不十分周到。以致粤馆后来居上，在花天酒地的十里洋场，一般人一窝风地到设备新颖、菜点多种多样的粤馆去。抗战时徽馆中人纷纷回乡，等到抗日胜利回沪，由于资金不足，不能再开，大家想吃徽馆都找不到了。

婺源人经营木材和漆。造屋、制家具需要这两种材料。婺源人经营的店铺中，以南市关桥里马路的“胡裕昌”规模最大，它自

置码头、驳船、堆栈于杭州，长达几里。当时，大量漆店都是婺源人经营的，有些茶叶店也带卖漆，后来本帮人也有经营木材的。

绩溪、婺源人经营墨业。绩溪人开设的胡开文、曹素功，婺源人开设的詹大有、二妙堂，都专制墨，在上海有悠久的历史。

## （二）宁波人经营银楼、糖行和海味北货

宁波人经营的银楼，可说是遍布全国，尤其在上海最为发达，它们规模大，资力厚，制出的饰品新颖大方，质地优良。其中的“老凤祥”、“新凤祥”、“杨庆和”、“裘天宝”、“方九霞”等，远近驰名，妇孺皆知。

糖与海味北货是人人爱吃的食品，是宁波人首先经营的。它们业务大、资力雄，每年每户营业额，均在规元数十万两到百万两以上。当时洋糖与外国海味尚未进口，除粤人偶从广州运来少数外，一切全靠国产。这些糖行、海味行最初不过寥寥数家，为了便利船埠上下，都开设在十六铺外滩一带。后因营业逐年增加，乃陆续在咸瓜街、洋行街等地开设，增至五十余家。其中著名的糖行有咸瓜街的“方翠和”、“方惠和”、“元裕”、“元泰恒”、“裕大恒”、“元生”等。海味行、北货行等都设在洋行街、新开河城沿一带。其中如洋行街的“乾丰”、“余发”、“茂昌”、“源余”、“新茂和”、“鼎裕”，新开河城沿一带的“润大”、“益源”、“东源”、“振大”、“阜和”和“震余”等都相当发达。其后，又有“震源”、“东源”、“顺昌”、“源康”等开设，营业也相当大。

海味行经营的品种有三类：（1）干货海味，如“螟蛹鲞”（乌贼鱼鲞）、蜆皮、鱿鱼、刺参、鱼肚、干贝、淡菜、紫菜、鲍鱼、海带、带

丝、生粉、西米等；(2)西洋海味，如龙须堆翅、各种海参(靴参、明玉、梅花、大乌)、各种开洋虾米、黑白胡椒等；(3)综合海味，以各色鱼翅为重点，有荷包、玉结、皮刀、乌钩、吕宋、青翅、东尾等名目。这些鱼翅都要加工开劈，种类极为复杂，品质高低悬殊，有咸水淡水与有沙无沙之分。每担价格，从规元十余两到数百两之巨，不但局外人难以分辨，即业中人也要有丰富的经验始能鉴别。其次，是各项鲍鱼、鱼肚，鲍鱼如纲鲍、牙鲍、紫鲍、明鲍等，鱼肚如荷包肚、广肚、吊片肚、提片肚等，都是复杂货品，无经验的也难分别好歹。综合海味行以“乾丰”、“润大”、“东源”、“益源”、“余发”、“振大”年代最久，经验丰富而且营业额大。

海味行中，也有苏州洞庭山人开设的，但为数不多，只有“鼎裕”和“东茂和”两家。鼎裕兼售参燕，东茂和兼售桂圆、荔枝，当时也都有相当地位。

鸦片战争后，与各国通商，上海又有“香港号家”和“厢管庄”（厢管是日本横滨附近的沿海地区，海产集中地）。香港号家出售西洋海产和杂货，如洋行街的“源来”、“同兴”、“宝来”，龙潭路上的“同福和”，都是苏州洞庭山人所创设。厢管庄出售东洋各项海产和杂货，如福佑路的“震康”、永安街的“新和”、新开河的“同华”、洋行街外滩的“恒发”都是宁波人所设，把货物批给洋行街上各海味行，业务也发达。所谓香港号家，那时都发了财，就中以“源来”为最，从前有个“鸿英图书馆”就是源来店主叶鸿英所设。

### **(三) 本帮人经营粮食、匹头和棉纱字号**

粮食行业种类很多，分杂粮行、豆麦行、米行、面粉行等，集



中在南市豆市街上，各店每天自晨至午，应接不暇。其中比较著名的，要算“泰润”、“顺成”、“顺泰”等。门市零售店遍布全市。这些行业除无锡人所营面粉行外，都由本帮人经营，业务很大。

匹头和棉纱字号资力之厚不亚于钱庄银号。起先集中小东门一带，租界开辟后，迁到法大马路与后马路一带。如“日新盛”、“日新增”、“履泰和”、“同茂盛”、“协盛祥”都很著名。业此者十分之八是本帮人。

#### **（四）山西人经营票号**

山西人的票号，远在宋元以前已有设立。因其时交通不便，商人在外埠营业大都以货易货，山西人乃在各大商埠组织汇票字号，在甲地收受现银，开立汇票，在乙地兑现，准时付款，信用卓著。他们在上海营业发达，规模宏大，每号职员从几十人到百余人，待遇优厚，逢朔望轮班休息。各票号还附有俱乐部，供职员们研究京剧，所谓“票房”实由此始。山西帮最忌嫖赌，一经发现职员有这种行为，立即开除。

#### **（五）广东人经营进出口行**

上海在未辟租界前，洋货如五金、匹头、棉纱、煤油、纸张、海味、糖类、檀香、杂货等，大都是粤人从广州运来的，运出口的各项土产，为茶叶、桐油、苎麻、丝绸、土布等。这种行业称为进出口行。因语言关系，全为粤人所经营。其后，外国人有直接装来的，但因交易上种种隔膜，结果仍由粤人的转口行经手。此业起初不过几家，后增至五六十家。因利润丰厚，业此者都发了财。

#### **（六）绍兴人经营柴炭店、钱店和绍酒店、染坊**

绍酒本为绍兴名产，向为各界人士所喜爱，经绍兴人自己售

出，尤为欢迎。那时，徽馆与本帮馆（粤馆尚未设立）仅供应菜肴，喝酒者都要到绍酒店去。其中以“章东明”、“章豫泰”、“章同茂”等最著。

绍兴人经营柴炭店，钱店大部分由柴炭店兼营。钱店开设，远在清雍正、乾隆年间，除少量拆放外，不过零星兑换制钱，但所出票据以及存放款项极有信用，深得各界信任。到嘉庆、道光年间，逐渐在豆市街、吉祥弄等处正式组织钱庄，颇具规模，由几家增设到二十余家，业务发达。从此，绍兴帮在金融界握有相当的势力，钱庄可算绍兴人的专业。

当时呢绒尚未进口，各界仕女都以颜色衣着为时新，绸布须加以染色，所以染坊营业极为发达，它也算绍兴人专业之一。该业以带钩桥的“一大”、洋泾桥的“恒大”声誉最著，业务最忙。

## 旧上海的报关业与客帮

吴 拯 寰

### （一）报关业的开始

鸦片战争后，上海被辟为通商大埠，从此门户开放，各国货物大量集中上海，向我全国倾销。商人贪图厚利，组织专业代为推销。

当时，外轮通航我国沿海各埠以及长江内河等处，各地土产也大批涌来上海销售，从南市剪金桥、日晖港到吴淞，长达四十多公里，沿浦两岸仓库林立，码头密布，货物堆积如山，每天进出的轮船有几十艘之多。因此，各地商店纷纷派人来申采购，实力雄厚者乃进一步设立申庄，派人长川驻沪。有些小商小店也设法合作，请人长驻上海。

外货向我国倾销，而海关权操之外国势力手中，对我国内流通各货进出转口，都要经过“报关”手续，凡是无外人租界地区，概称之为内地，还要加以“验关”。所有报关、验关的文件如税单、凭证等一律要用英文，验关员全是外人，如狼似虎，查验货物总要行贿，否则任意留难，以致商人视报关、验关为畏途。由此，有些投机者乃创设“报关行”，专门代客报关，报关业从此开始。

### （二）报关栈的组织

后来，各报关行为了招揽生意，又附设寓客馆，供报关客户

住宿。没有多久，在一八六〇年前后，各地客商纷纷集资组织报关栈，招待同乡寓客，有些还兼营轮船生意，如装货、卖票等。各驻沪客商因乡谊关系，各投同乡设立的报关栈。从此分帮别业，称为“客帮”，又称“水客”。

这时客帮生意相当巨大，水客凭藉雄厚资力，广结交游，挥金如土，一时声势煊赫，成为社会上的一帮特殊人物。

### （三）申庄的设立

水客各有专业，代客办货，后来发展为“办庄”，又称“申庄”。他们获利较各本店长驻客尤为优厚，遇有巧价之货，可以不化定金买进，任意加码（业中人称之为“戴帽”），牟取厚利，其余如报关水脚以及大批货物都有回佣，有的照所办的货资百分之二扣算，有的由店家自由赠送，以生意大小为转移。他们既有这些巨额收入，除雇有职工随给薄薪外，概无其他开支，所以业此者都成为面团团的富家翁。如办洋货的宁松泉，在愚园路置有松庐花园洋房，办南北货的胡莱峰，在城内置有大批房产，过着舒适的生活。这些人经常花天酒地，呼卢喝雉，有的甚至将“长三”书寓作为大本营，巨额生意都在书寓成交。他们多数除在本业上极力发展（如搭股开店）外，复在原籍或他处广置房产、田产。

### （四）客帮的帮别

（1）南洋帮。分福州、厦门、汕头、广州、香港、台州、温州等帮。这些客帮都兼营进口，业务相当大，资力雄厚。他们不驻报关栈，均驻各大楼，或在租界（北市）里弄中租赁房屋，有的还向政府注册。

（2）北洋帮。分海州、青岛、烟台、济南、威海卫、天津、大

连，沈阳、秦皇岛等帮。专营出口生意。其中店家直放者居多，业务亦不弱。他们大都驻北帮报关栈，如永安街的新昌泰、利泰昌、东新记，吉祥街的新盛昌等报关栈内。这些报关栈都是北方人所设，房屋都是自己设计打样建造，相当宽大考究，每户客帮均有套房两三间，分帐房、卧室、会客堂（即营业室）等。

（3）长江帮。分芜湖、大通、安庆、九江、武穴等帮，其他汉口与宜昌另称汉帮、宜帮；南京与镇江分别称南京帮、镇江帮；扬州、泰兴、南通、兴化等统称江北帮；苏州、杭州、嘉兴、湖州，直到浙赣路上的上饶、玉山、衢州等统称内地帮；南昌、赣州、抚州、吉安、樟树、吴城、鄱阳、河口等地统称江西帮；四川的重庆、万县、成都统称川帮。长江帮、江西帮大都驻在新开河的长源泰，永安街的太吉昌、复昌恒、振大、贸通等报关栈。还有湖南长沙，称为湘帮，亦驻在长源泰、太吉昌、复昌恒、振大等报关栈内。这些报关栈房屋，较之北洋帮稍次一筹，有套房者少数，房间中设备也相当考究。内地帮、南京帮、镇江帮、江北帮多数驻于北货行与糖行中，有些在里弄中自租房屋兼住家。汉帮、宜帮除少数自租房屋外，多数都住在糖行、北货行等兼营的报关栈内。川帮设于后马路的招商渝、福州路的太古渝、广东路的川裕，亦有少数设于振大、贸通等栈内。再有匹头、洋货帮大都设于北市天津路的太古辉、新昌源，汉口路的复和，北苏州路的信昌隆。还有一般流动客（俗称为野鸡客），都寓于山东南路湘益公、吉祥街同裕公等栈。

书业方面的客帮，除南洋新加坡一带及北洋北京等处自租房屋外，多数是河南、山西、陕西、山东、河北等省客帮，驻在山东

路源泰里北方商行,广东路九福公商行,山东路天和公商行,福建路长发东商行,广东路晋兴公商行,四川路晋豫公商行,淡水路豫丰商行,延安东路豫合公商行,浙江路宝安坊豫成云记、协记商行,四川路西北商行,山东路金隆街新昌公商行,新永安街大利公客庄商行等。而报关的书籍、文具等,由广东路河南路口顺利公报关行办理的不少。

#### (五) 客帮的实力与营业概况

客帮的实力最著名的要算北洋帮(简称北帮),如天津、营口、济南等处,不但生意大,而且银根相当快,装货的次日就扫数付款,毫不拖泥带水。内中天津隆昌南北杂货号生意尤巨,糖每批都在万包左右,海参、鱼翅都是十箱至二十箱,其他如洋货匹头号,每户每批都有数百件。但是他们的架子很大,同他们交易必须真诚可靠,绝对不得苟且,否则第二次莫想再做。由于他们秉性爽直,只要态度诚恳,取得他们信任,会接二连三地自动找上门来。每个行家、每个跑街只要做妥一两家,不愁没生意做,俗云,“客帮乃行家的衣食父母”即指此。其次,川帮银根亦相当硬,生意也大,对他们的生意也要讲究信用,他们对生意相当精明。

江西帮的银根也硬,生意不小,但是他们对于货色相当讲究,买妥的海味细货都要转栈复看复称,由报关栈装船,不容行家代劳,不信任行家自己装出的货物。

内地帮生意亦不小,不过较零星,没有北帮、长江帮的整批交易。这些生意都由南市陶华湖办庄代办。当时行家有句口头话,“若要求生意,须向南陶北胡(指胡兴记)”。

江北帮生意既零星，而且银根又疲，稍不小心，即有“吃倒帐”的危险。行家对江北帮心中有数，大都派小职员去接洽。

#### **(六) 报关业与客帮的关系**

当时报关栈招揽的本乡驻客，因为深知他们的资金底蕴，可以稳得其利，因此百般迁就，对于驻客房金、饭食都不计算，每户又专雇两三个茶役服侍，不要客帮另出工资。伙食相当考究，每餐都是六盘两大碗，厨司是在本乡出大工资雇来的，极合客户的家乡口味。每逢年节，另备筵席，亦极丰盛。除此之外，复由报关栈每户介绍一两家钱庄或银行往来，并代担保信用贷款一两千至万两不等。盖开设报关栈者大都有相当力量，否则不易维持。其后，因开销昂大，物价逐步增高，各客帮乃自动承担房租与伙食费，但报关栈对这些都不计较，总希望驻客生意不要向外走。这种办法，直到全面抗日战争时方止。至于介绍银行钱庄并负担保责任，则于一九三〇年间即停止，因为报关栈自身力量也逐渐薄弱。

#### **(七) 驻沪客帮逐渐衰落的原因**

一九三五年以后，客帮生意逐渐衰落，有以下几个原因：(1) 商店行号直接装货向外地销售，从此客帮生意下降。复加同行竞争，如放弃运费回扣，放宽银期，滥行放账等，结果两败俱伤，弄得倒闭关门，比比皆是。(2) 交通运输变迁，过去江西、福建、广东等地土产均装轮转运。后因沪粤、京汉等铁路相继通车，这些地方的土产，直接分装各地，不再由上海转口，客帮生意大大减少。(3) 有些客帮在竞争中吃了亏，欲思弥补，乃在交易所中经营投机，结果亏上加亏，无法维持，关门停闭。未几，日货大量

走私，继则“九·一八”日寇强占东北，全国抵制日货；接着“一·二八”沪战与“七·七”事变，客帮经过种种损失，已是苟延残喘，稍存实力的，大都转业歇业，到全面抗战时，可说烟消云散。抗战胜利后，有一小部分稍存实力的客帮陆续复业，但生意远不如前。兼之，外货的进口数量极少，有的市场价格初尚平稳，继则动荡不定，暴涨狂升。特别是在反动统治下，币制日日贬值，业此者大多数要代垫款项，归还的日期最快也在半个月左右，处在一日数跳的环境下，一往返间，代垫的款项已经打了大大的折扣，甚至于化为乌有。上述三项是驻沪客帮逐渐衰落的主要原因，各庄家受了种种损失，资金不能周转，无形中搁浅，遂致不能营业，所以后来自动歇业的比比皆是。



# 旧上海的油粮业

陈子彝

## (一) 上海本帮油粮业名称之沿革

上海油粮业,从前分豆业、米业两大帮。大豆和食油类、豆饼类等,属于豆业。其中自己有沙卫船、营运关东营口等处者,称为沙船商号,入南码头会馆街商船会馆公所。代江浙客商买卖、赚取佣金、领取牙帖开行为业者,称为豆行,继又加入麦类,称为豆麦行,加入豆业萃秀堂公所。其行址多数开设在南市大东门外豆市街,另有买卖聚集市场,在街之中心曰采菽堂。经营采购运销米粮者为米行,加入大东门城根米业仁谷堂公所。销售本市零星民食者为米号(即米店),加入丹凤楼米号业嘉谷堂公所。

当初业务、名义各自分开,苟如豆米两业合办者,则冠以豆米业字样。一九二〇年,因仁谷堂办理米业业务感到不便,分立了一个米行公会。一九三〇年,总商会整理全市同业公会,将豆业萃秀堂、米业仁谷堂及米行公会合并,改组为上海市豆米行业同业公会,自此豆业亦称油粮;虽粮非专指米粮,但豆米两业已无形合并,两公所遂亦归于统一。

## (二) 小刀会起义与油粮业的关系

一八五三年，小刀会首领刘丽川及将领潘启亮（即小镜子）在上海起义。时上海知县为钱塘袁子才孙子袁祖德，当场被劈毙。刘、潘守城计十月，为李鸿章军队攻败。所有零星小股，后俱并入太平天国部队。

先是，上海高家浜郁氏，为海上巨贾。除票号、当铺等各项经营外，又多沙卫船，设有商号，营运关东营口，去货布匹，来货油、饼、豆类等。上海有豆行四家，郁氏即占丰泰、利昌两家。小刀会起义后，以郁氏大厦为指挥部；以豫园豆业萃秀堂为司令部，并奉郁竹泉、郁泰峰为首领，唤称大头子、二头子，盖利用他家富有，号召供应给养较易之故。事变中郁氏损失颇巨，据称当时有办理盐运漕运现银解京，在围城时全部被截留，大概有现银四十万两之谱。事定后，清廷因其接济小刀会，欲兴大狱，郁家几遭大辟；幸得有亲戚赵某在京为京曹章京，走了肃顺亲王门路，改为罚锾银三十万两，修筑上海城垣了事。实则连运动费等，用去不下银百万两有奇。因是营业大受打击，家道一落千丈。继由清帝咸丰颁给浩命一轴、圣旨一道、并“功襄保赤”匾额一方，悬诸厅栋；又增添上海生员名额十名，所以太平天国后入洋之上海秀才十名，称为郁家秀才，必以彩旛前导，诣郁氏谒谢。此是清廷在勒索后之笼络羁縻伎俩。

## (三) 九八豆规银之来由

在海禁未开、交通运输不得畅流之际，上海商业中心以沙

船商号为巨擘，豆行更为中心。当时沙船号商有王信义、沈万裕、郭万丰、严同春、陈丰记等家，惟有李久大是宁波帮之后起者，声势独盛，全盛时期拥有沙船两千数百艘之多。迨轮运畅通，火车继之，遂陆续被淘汰以尽。彼时经济流通，除票号外，连钱庄亦尚未有，以银两易银元，银元易银两，其交换市场是在郁氏丰泰、利昌两豆行的门房间内进行。

沙船商号的沙船，每年南北来往，至冬季暂歇，盖北地冰冻季节，小雪封河，大雪封港。至开春春分冰解，谓之开淋，遂衔尾装运油粮等货，扬帆南下。当时各船南北交换，有余款时，辄以整块现银带沪。如需易银元时，须剪碎称分计算，不无折耗，故核算时扣除两分，以九八折计之。嗣以豆行信用卓著，同业买卖，可出二十天之远期本票，票上载明以九八规银计算。于是此制扩张到银钱业，有清一代，相沿成习。至民国时废两改元，无形取消。

#### （四）辛亥革命及“五卅”惨案与豆米业之关系

辛亥革命前上海各同业公会，共同组织商团，人数大概有五千，半数有枪枝。豆米同业参加的团员有百数十人，由同业叶惠钧负责，担任团长，辛亥革命时进攻南市兵工厂，焚毁苏松太兵备道署，道台刘襄孙、县知事田春霆宵遁。二次革命后，叶惠钧为袁世凯通缉，当由同业长义豆行等资助其潜赴大连湾，代升源油粮号坐庄采购油粮，得免于难。一九二五年日本帝国主义者惨杀纱厂工人顾正红，激起全市人民公愤，由总工会领导上海全市工人总罢工，同时商人罢市，学生罢课。时届溽暑，豆米同业

由安东等处运来大豆和杂粮货物，霉烂闷闭在轮船内及仓栈中，损失甚巨。但仍坚持两月以上，不稍气馁，在轰轰烈烈的反帝斗争中表现突出。

### **(五) 成立杂粮油饼业同业公会**

一九一七年，上海油粮业八帮应大团结之需要，在福佑门外民国路购置基地，建筑三层钢筋水泥会所，成立上海华商杂粮油饼同业公会。其购建基金由全体同业借垫。八帮的名义是：上海本帮，萃秀堂、仁谷堂；汉口帮，志成堂；广东帮，慎守堂；潮州帮，潮州会馆；泉漳帮，泉漳会馆；福州帮，三山会馆；镇江帮，暨远堂；汕头帮，潮州会馆。各帮同业公推豆米业叶惠钧为会长。

萃秀堂地址在邑庙之后园，即豫园，为明末潘允端废圃，清咸、同间毁于动乱。后由县饬二十一个行业分户承粮，执业管理，油粮业分得土地十一亩有零，即后来之萃秀堂、三穗堂、仰山堂、神尺堂，及大假山、荷花池、回廊曲榭等处，历年修葺所耗费用为数甚巨。

### **(六) 油粮业早期的职工运动**

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上海工人运动空前高涨，各行业职工在总工会领导和产业工人带动下，先后组织了职工会。嘉谷堂米号业也组织了米业职工会，于一九二八年一、五、九月接连举行了三次大罢工，都是由于米店资方不履行协议条件而引起的。早在一九二一年，全市米店为反对工部局强迫领照问题，也掀起了一次连续一个星期之久的罢市运动，交涉两月，始获工部

局让步解决，这是上海私营粮商及职工同租界统治者开展的一次胜利的斗争。

### **（七）豆米业公所的附属事业**

上海人口众多，米粮一日不可或缺，为谋各地来沪米船停泊和上下起卸之便利，一九三〇年，豆米业公所在三泰码头购地建造了米业专用码头五座，及钢筋水泥三层平台仓库一所，共用洋三十八万元左右。又成立同业公磅处，购置新式磅秤一百余具，分别存放在各个码头及华洋仓栈，供同业使用，以保障同业利益。为了便利同业子弟入学，于一九一一年创立豆米业高小学校，初在大东门外仁谷堂公所，继迁豫园萃秀堂公所，经费由萃秀负担百分之六十，仁谷负担百分之四十。又设立萃仁两舍于斜土路，另于沪南长桥购置土地十亩，拟设立萃仁公墓，供同业寄柩和埋葬之用。还组设豆米业扶济会，作为两公所的慈善组织，对贫、病、残废及老、弱、无依的同业经常进行抚恤，常年有数十户获得救济。

### **（八）抗战前的上海油粮业**

民国一二十年代，粮食业最重要的一事，是西贡、仰光、曼谷运来大量洋米，一九三〇年更甚。是年江浙水灾，洋米进口达四百二十多万石，以每石一百五十六斤计，其数目殊是骇人。况尚有美国、加拿大、澳洲洋麦大量入口倾销我国，漏卮无算。一九三〇年后，帝国主义者更丧心病狂，要求国民党政府对洋米免税。同业闻之，急电请政府争取关税自主，对洋米麦增税，以挽

危机。积电盈尺，未获满意答复。

“九·一八”、“一·二八”事件后，东北诸省陷于日敌，上海市场的油粮来源受到严重影响，采购行大部分在陇海、津浦路线一带采办，而汉口、苏北等地水路运输亦渐发展，来源乃不致中断。后来国民党政府对东北的油粮，其由大连运来者，作洋货征税，而由营口、安东二港运来的作土货论，不征关税，因而上海同业又群趋东北，深入内地，赴四平街、长春、哈尔滨等处采购。然而，营口、安东每年冬季都要冰冻，不似大连的不冻港便利，因此粮商大都在冬季大豆出新时期，派人深入东北，集中采购，由陆路车运至营口，等候冰融开淋，由营口运沪。当时市场价格，三月份最高，四月即降低。

东北沦陷后，上海油粮来源减少，价格递增，苏、皖、鲁、豫等处之来货，不断增加，这间接推进了该地区的农业生产，不论大豆、花生及其它杂粮，都有相当增产。一九三四年，皖北、鲁南小麦与大豆丰收，当时津浦线每个车站，待运杂粮堆积如山，农村经济相当活跃，是一时环境所造成。

### （九）抗战时期及胜利后的上海油粮业

抗战开始，全民奋起，“八·一三”淞沪首当其冲，不数月全部陷敌。当时租界形成孤岛，大部分物资都由沪南、沪北移入租界，市价波动剧烈，转口业务停顿，只供本市民食零销，故当时虽外来断绝，而因转口无销，并未感不足。一九三八年苏浙皖相继沦陷。局势安定以后，来货始陆续化整为零运沪。那时敌伪对油类控制很严，户口油由彼分配，内地如常州、无锡榨制的油，

只能运至南翔，再由零星小贩转运上海出卖，黑市价高出倍蓰，而米价黑市更较市价高几倍。后敌伪控制逐步加强，油粮由专业委员会掌握，幸得有大磨麻油由蚌埠直接运沪，因之黑市油价随着渐趋正常。当时油行多组织食油批发处，专门代销敌伪分配的食油给零售商，从而取得一定利润，再经零售商售给市民，又收取一部分利润，转辗剥削，加重了人民负担。在一九四三年间，敌伪规定上海油粮要有正式专业机构方可由东北运来接济，因而成立一油粮专业委员会，称专业而不名统制，藉以分别于其它统制会。初则运来大豆，交油厂加工榨油。一年后，复以统一为名，强加统制。

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忙于劫收敌伪财产，置人民生活于度外。杂粮行业表面虽似繁荣，复业者有之，新创者有之，实际则多属买空卖空和栈单交易，参加贩运业务者只是少数。因当时津浦、陇海线陆路运输尚未畅通，杂粮来货，大部分仰给于长江沿岸，由重庆、汉口、九江、安庆等处运来的为多。华北口岸如天津、青岛等处，过去均有大量油粮运来，这时，反而需要上海运去接济。不久全国解放，油粮业务始渐步入正轨。

# 上海糖业概述

吴慈堪

## 一、中国土糖产销概况

我国制糖历史悠久,唐代贞观年间遣使至印度,得制糖熬煮法以归,所制之糖味甘色白,名曰糖霜,是为制造白糖之始。当时制糖原料主要是甘蔗,后又发现甜菜亦能制糖,南方主种甘蔗,北方主种甜菜,原料丰富,产量甚多,故昔日称世界有两大制糖国家,一为印度,一即中国。至今,糖类成为我们生活上必不可少之食品,在许多工业中亦为重要之原料。

自开海禁以后,我国食糖贸易执东方之牛耳。在一八九五年以前,虽有洋糖进口,然据海关贸易册记载,土糖出口数字远较洋糖进口为大,一八八〇年出超达关银两百九十多万两。一八九五年以后,土糖日渐衰落,逐年陷于入超地位。

土糖衰落的原因,主要是:(1)鸦片战争后,英割香港,在该地设立怡和、太古两糖厂,所产之糖用机器新法制造,我国手工所制之糖不能与之抗衡。(2)甲午中日战争后,将台湾割让日本,我国丧失这一重要产糖区域,日人设厂制造,从台湾向大陆倾销。(3)辛亥革命后,军阀割据,经年内战,北伐以后国民党政府不重视土糖生产,加以水旱风虫诸灾层见迭出,内地农商不能安



业，以致闽赣等省业制糖者相率罢业。(4)我国制造土糖，种植原料不知选种施肥，制造方法墨守成规，种种落后，难与机制洋糖竞争。(5)在反动派统治下，各地对土糖捐税繁重，关卡林立，路愈远则税愈重，而洋糖只纳一道关税。

有此种种原因，我国土糖产销一落千丈，洋糖入超竟有不可遏止之势，一九一九年高达一千四百八十万担，货值达关银一万万两以上，漏卮之巨，殊属惊人。当时向我国输入洋糖的国家和地区，以日本、爪哇、香港、英国居多，其余则为古巴、美、法等国。

我国土糖重要产区为广东、福建、四川，其次为广西、江西，再其次为安徽、浙江等省。山东适宜种植甜菜，一九二〇~一九二七年间，曾有溥益糖厂以机器制造甜菜糖，因受内战影响，兼以甜菜种子不佳，销路不畅，旋告失败，屡谋恢复而未成。又有国民制糖公司设在上海，因办理不善，又值日寇侵略，沪战发生，经过三次失败，三次恢复，结果仍一蹶不振。其他糖业中人亦尝企图设厂机制精糖，挽回利权，只以力量不足，纷告失败。

广东素称产糖之区，然自洋糖输入后，由产糖丰富之区变为洋糖竞销之地。一九三一年粤省当局为复兴糖业起见，派员赴欧考察新式机器制糖方法，并订定三年计划，购备机器，先后成立省营糖厂四家、军垦糖厂两家，于一九三四年始有国产机制精糖出产。粤省鉴于以往产销方面未能合作，上海系商业中心，尤为食糖运销总汇，乃同上海糖业方面取得联系，由上海糖商有力分子组织“兴华行”同粤省签订承销协约，负责推销，直至抗战军兴糖厂被毁为止。

## 二、上海糖业沿革

### (一) 抗战以前

上海糖业创始于鸦片战争以前。五口通商后，轮运畅通，成为全国食糖经营之中心、集散之总汇。

上海经营食糖的贸易机构，分为糖行、进口行、外商洋行、客帮申庄与外埠号家、本街零售与需糖各业。(甲)糖行为糖业中心，论其帮别，大致有三，一是宁波帮，二是镇江帮，三是本帮(包括苏沪两地之经营者)。宁、本两帮纯粹经营糖品，镇帮兼营杂粮。开设糖行必须有相当的资本与信用及堆栈设备，一九三六年，全市糖行共有八十家，其经营方向固属操奇计赢，然大都具有实力，不似以后投机者日众，“歇壁字号”林立，以致糖业成为投机市场之渊藪。(乙)进口行分洋糖进口与土糖进口。洋糖进口行有源记等四家，其性质与经营糖类的外商洋行相同。当时其他各业贩运国外货物，莫不假手洋行代为订购，惟有糖业运销洋糖，大部分由华商进口行办理，近自荷属爪哇，远至欧美各国，皆直接订购，不但能及时供求相应，调节盈虚，且对世界糖市变化，亦可随时了解。土糖进口行，分广帮、潮帮、建帮，其营业方式有两种：一系向产地收买糖品，转运来沪，待价而沽；一系代产地出售糖品，收取佣金，不负盈亏。各帮均有会馆组织，广帮为广安堂，潮帮为潮惠会馆，建帮为泉漳会馆、晋惠会馆。(丙)外商洋行分西洋、东洋两帮，各向本国糖厂订购糖品，供给中国糖行需要。西洋帮包括英、法、德等国，有太古、怡和等八家，东洋帮有三井、三菱等六家。(丁)客帮申庄与外埠号家，此为上海糖业最

大销路的对象，客帮代表北方及长江流域一带，此帮客人大都住在报关行及旅舍，又称栈房帮，余为浙江瓯台、宁绍等客户，则自设庄号。客帮办运之货，以糖为主要，亦有兼及南北各货，又有运土货来沪销售，以有易无，但不过是一种副业。（戊）本街零售与需糖各业，以南货业零售为大宗，其次则为糕团等业。至于糖行同业交易，名曰“划盘”，例须在同业公会市场上交易。

自粤省机制糖厂先后成立，上海糖业即遴派代表前往协议订约，对该省省营市头、新造、顺德、揭阳四糖厂出产之精糖，实行包销，同时为防止洋糖侵袭，乃纠合同业组织“糖业合组公司”为推销国糖之机构，因此洋糖受到抵制，输入量锐减，纷纷走私。糖业公会团结同业，坚持不销私糖，一面悬赏征求密报，并拟订制裁走私办法，建议当局施行。同时联合全国产销糖商组织“中国全国国糖产销协会”，设总会于上海，以指导改善食糖生产，维护国营民营糖业产销，调节供需，调查世界各国食糖产销及种植、制造方法，一面警告日本糖业界及来华经济考察团，要求协助制止走私。一九三四年设立“食糖运销管理委员会”，以防止私糖、增加关税、调节糖价、提倡土糖、保护正当糖商为任务。

糖行业务原是批发，零售业务属于南货业。但介于批发与零售之间，有“拆兑”业务一种，亦称糖行，盖因当时经营批发之糖行均是大量整批，拆兑业务则由一整包以至零拆亦作批发，以便利小型零售商批购。嗣后营业情况转变，向来大量整批之糖行，原件一包亦可批售，如小型糖行兼营拆包即作零售，于是拆兑名义已无存在之必要。

一九一〇年起，上海糖业开始经营冰糖。在此以前，国内所

销冰糖或是德美等国进口，或是向闽粤等省运销（日本及香港进口冰糖在一九二〇年以后）。闽粤之冰糖即所称建冰、广冰，产量不多，而进口之冰糖价格较昂，因此上海糖商将砂糖加工试制，出品尚佳，深得消费者欢迎。此法是江西人首创，旋由同业雇用江西籍制冰糖工人，集资设厂制造，徐家汇路上海冰糖厂为首创之一家，此后业中相继制造，全市正式设厂制造冰糖的有八家。制造冰糖所剩余之糖浆，最初不知利用，大都廉价售与蜜饯作坊作原料。嗣经研究，发明以糖浆复制绵白糖之一法，即将制冰糖剩余之糖浆加砂糖若干，入锅熬煮，用人工拌揉而成绵白糖。后以冰糖剩余糖浆不够供应，乃改用饴糖和砂糖制造，成本减低，获利较厚。以后仿制者日众，甚至租一亭子间，设一锅一炉，亦称制造绵糖的糖厂。

## （二）抗战时期

一九三七年日本大举发动侵华战争，粤省糖厂被摧毁，土糖来源亦因战事阻滞，顿告绝迹。惟海航尚能通行，香港运输未断，本业经营乃以洋糖供应需要。迨太平洋战事发生，中外航线阻断，同时日军进入租界，控制一切物资，食糖亦在控制之列，因此上海糖商在此后四年间，无业可营。

在太平洋战事发生前，日本军事力量虽未达及旧租界范围，然一切恶势力已蔓延全市。一九四一年以吴世宝为首的恶势力占据糖业市场，组织所谓“砂糖公司”，专做投机交易，设立经记人字号，强迫糖商参加。各糖行在威胁之下，欲拒不能，大都用变通办法，另立牌号参加，派人代理。当时吴世宝以为食糖可以操纵垄断，由伪公司大量收购，大做多头交易，没有料及海运尚可

通行，正式糖商仍可自行向爪哇或香港采办，来源不缺，糖价反而下跌。吴世宝恐受亏损，威逼糖商承购伪公司栈单，一般正式糖商被其蹂躏。幸不久敌伪之间发生内讧，吴世宝败亡，砂糖公司即告解体，然糖业投机之风由此而起，业外人之插手经营亦由此开端。

太平洋战事发生，日军侵入旧租界范围，对于上海糖商堆存洋商仓库之糖八十余万担悉数封存。各糖商以所存之糖若被掠夺，不但企业立即破产，且人民食用更有断绝之虞，乃推派代表向日使馆据理力争，证明该糖纯粹为华人所有，要求发还，经多次交涉，始允限量提取，以供民需。于是由存糖持有人一百六十余户，组织“上海糖商合作营业处”，先行登记数量，继则办理配给，并声明只限供应上海华人食用，其他国籍人民及军队士兵概不供应。其配给办法，由该营业处就每月提取之糖额依参加者之股权分配，再就全市各区人口核定应配数量，分配于所在地区的零售商转售市民，因此在敌伪盘据之下，食糖尚能接济市民需要，延续至抗战胜利为止。当时配给户口糖，由零售商凭购糖证发售，由于购糖证是伪组织所制发，这就成为汉奸们的发财机会，他们虚报克扣，层层作弊。一般“黄牛”小贩乃乘机而起，每值配糖之时，各零售商门首排成长蛇阵的挤着购糖行列，黑市糖价高出配价十倍以上。

### （三）抗战以后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后，各糖商力谋恢复业务，但交通未复，货源缺乏。适有苏浙皖敌伪产业处理局准备将所接收之糖以拍卖方式发售，那时糖业已成立同业公会整理委员会，要求

将此批食糖交本业承销，得到允许，乃接受承办，并按货值提取佣金，凡属会员均得承销。当时公会主持者，以会员资力枯竭，将此项佣金除去实际开支，悉数分派与各承销户，使各企业得有复业资金之周转。

抗战胜利台湾收复，台糖重为国产，正宜发展生产，充裕民生，乃国民党政府不此为图，竟利用官僚资本势力囊括台省存糖，于一九四六年五月设立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独占经营，与商贩争利。更复操纵垄断，抬高稳定已久之糖价，使糖市陷于混乱。上海糖业公会理事长郑翊周以该公司假借调剂供应名义，一味垄断居奇，又不依照公告办法公开发售，利用掮客限额抬价兜售，病商害民，莫此为甚，乃纠合同业与该公司作斗争，提起控诉，坚持要求将该公司撤销，并招待各报馆记者，一时舆论沸腾，群起斥责。此次糖商控诉与当时的粮贷舞弊案，同为全国所注目，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派员查办”。结果由上海市社会局以稳定物价为词，规定价格配售，对于台糖公司存废问题以“听候裁处”四字了之。

上海糖业控诉台糖公司后，一时虽得舆论支持，然而在当时的条件下，此举实无异与虎谋皮。该公司上层分子仍然操纵垄断，而下级爪牙虚设字号从事投机，因此，台糖黑市不但从未稍戢，反而日益高涨。社会局存心报复，藉口糖商不守信用发生黑市，突然对糖商停止供应，一面由社会局督饬台糖公司直接配售与零售商及本市用糖各业，使上海糖商业务停顿两个月之久，后经市商会出面斡旋，方始恢复供应。

一九四八年八月，国民党政府实行所谓“币制改革”，发行

金圆券,限制物价,一时抢购风潮蔓延全市,黄牛党乘机蠢动,各种商品都有黑市。旋蒋经国组织经济检查大队,令工商界执行限价,不料正式商号依限价出售之货全落于黄牛之手,弄得无法收拾。蒋经国极为不满,宣布凡有某种货物发生黑市,即严惩该业公会的理事长。适有广东路黄牛小贩将少量食糖以黑市价出售,被经检大队查获,乃小题大做,指责糖业公会有纵容操纵黑市之嫌,由蒋召公会理事长郑翊周谈话。郑理事长偕同公会秘书朱国明携带卷宗前往,见到蒋经国后,尚未交谈,他们即被扣押。旋以妨害农工商罪名解送地方检察处讯办,地检处以事无佐证无法办理,又不敢擅释,乃转送特种刑庭处理。各糖商以本业因遵守限价而损失物资,郑朱两人反无辜被诬,群情愤怒,联名要求释放,结果当局鉴于舆情所在,只得由特刑庭检察部门以不起诉销案。

### 三、糖商同业公会的变迁

上海糖业远在百余年前,即有团体组织,当时以邑庙豫园点春堂为同业集会之所。一八六八年(清同治七年)上海县署以豫园迭遭兵燹,筹款善后,将豫园公地交各业认购承粮,负责兴修。糖业认购点春堂一处,募资兴修,辟作固定会所,于是“糖业点春堂”之名由此肇始。那时的组织名称为糖业公所,由同业推举董事主持,并轮值司年,掌管收支。此乃公会之雏形时期。

一九二四年,糖、洋货、南北货、柏脂、芝麻、杂货等九个行业,集资在中华路购买地基,自建房屋,成立糖洋南北杂货联合公会,除集会之外,兼作进行交易之用。一九三〇年,当局规定

应分业设立同业公会，糖业即将糖业公所名称，改为上海市糖业公会，自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七年执监委员计有四届。

抗战军兴，会务中断，公会资产以点春堂保管委员会名义保管，以避免敌伪纠缠。抗战期间，有部分同业在伪商统会策动下，另组所谓上海区糖业同业公会，当时各糖行已无业务，伪公会即吸收经售户口糖之零售商作为会员，至抗战胜利前夕自行解散。

抗战胜利后，一九四五年十月，各糖行为谋恢复业务并恢复公会，即推选委员五人，组织糖业公会整理委员会，继续抗战前原有公会的职权，重办会员登记。至一九四六年二月整理完毕，选举理监事，成立上海市糖商业同业公会，历任理监事计有两届，至建国后改组为止。

过去糖业交易都用茶会形式。最初在南市陆家宅桥万云楼茶楼，由同业与客户自行集合，以作交易。后在小东门彤云街（即今嘉鱼路）租赁房屋为固定茶会处所，同业交易均集中于此，一九二四年成立联合公会时，即为联合茶会。一九三〇年分业成立公会后，将联合茶会改组为糖海南北杂货联合市场。一九三七年南市陷入战事范围，仍迁小东门彤云街原址。抗战胜利后，恢复交易，仍在原址，改称茶座，并订立管理规则，推派人员监场，稍具规模，惟只限于同业交易，对于零售商及需糖各业的交易则在联合市场进行。



# 上海广告史话

平襟亚 陈子谦

广告的范围极其广泛，大别有二。一是属于营利的广告，通称商业广告；二是属于非营利的广告，通称人事广告（如寻人广告等）。本篇所要谈的是商业广告。

## （一）广告的演变

商业广告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有了商品，有了商业，就非利用广告不可。

开始，广告的方法很简单。如唐宋诗词和小说上所反映的“卖花声”，刀鞘上插个草标，卖汤者吹箫，卖糖粥者击柝，卖卜者鸣钲，货郎担播鼗鼓，酒家高悬酒帘，以及眼科医生门首画一只眼睛，剪刀店门前画一把剪刀，浴室门外挂上清水盆汤的灯笼，典当和酱园墙上写斗大的“当”字和“酱园”两字，都是广告。此外还有用实物悬挂店门首作广告的，如广东酒家宰了蛇，把蛇皮从窗口垂下，药铺宰鹿，将鹿皮、鹿角挂于门前，出售象牙器皿的店铺，在柜台旁竖一枚象牙，弹棉花店门首挂一个棉胎，都是拿实物做广告的例子。

自从有了木刻雕版，就出现了仿单广告，用小幅纸张，刻印品名、效用、店名等等，附入出售之物品内。这种仿单，药店首先

采用,其实也是一种广告。以后发展到用文字、图画刊登在报纸上,才发展为报刊广告。特别是外国资本主义侵入我国,为了倾销商品,把广告作为“出马第一条枪”或“临阵第一排炮”,刊登广告更成为推销商品的有力手段,引起人们注意。

## (二) 报刊广告的发展

我国报刊广告的创办,始于一八七二年(清同治十一年)的《申报》。当时在报纸上刊登广告的为数不多。笔者看到《申报》第五六四号(一八七四年即同治十三年正月十六日出版),广告地位仅占第六版的四分之一,区分为十二小格,其中外商广告占了七格。老晋隆洋行出售花露水占两格,怡和洋行出口船期、美国医生出售药品、英商拍卖货物、英商货栈招贮货物、太古轮船到埠,各占一格。说明这时外国资本经济侵略的魔爪,已争先伸进了报刊广告阵地。

一八九三年《新闻报》出版,它是作为美商注册的,因此外商刊登报纸广告者,群趋《新闻报》,后来华人工商界欲登报纸广告者,亦皆趋《新闻报》。辛亥革命后,申新两报,被公认为全国销路最广的两大报纸。《新闻报》后来居上,销数激增,在本市的订户,到一九二〇年,已超过《申报》百分之二十。那时两报在版面编排上大事改革,把广告与新闻夹杂排列,于是广告地位增多,刊例亦分门别类。本来刊登报纸广告,以封面旁的第一条价格最贵,当时只登重要启事;后来有的商人把全版或半版包下来,甚至把两全版(第一版和第四版)完全包下来,使报纸的篇幅突然增多。当时报纸对于药品和戏目广告,刊费特别从廉,因此

报纸上刊登药品广告特别多，而戏目广告上几个主要角儿的名字，每字直径达两英寸以上。尤其是《新闻报》的张数最多，平时出版四五张，星期日往往发行八张，每逢节日甚至出十张，最多出过十六张，非但足够开支，而且年有盈余。那时《新闻报》所刊登的广告，几占全部篇幅三分之二，报上显著地位大半给外商包定，尽管有人讥刺说《新闻报》把灵魂交给了魔鬼，可是它收入丰富，《申报》依然不能与之抗衡。

当申新两报为了广告而勾心斗角激烈斗争时，一班广告商亦挖空心思办法，企图吸引人们注意。有的在报上留着一整块空白；有的只印了一个红蛋，不加说明，到第二天才把要登广告的物品说出来，使阅者留下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而报馆方面一笔生意变成了两笔或三笔，收入益丰。

申新两报在广告方面收入很丰，可是其他报刊却非常清淡，尤其是国民党的《民国日报》，去登广告的人实在太少。于是国民党政府想出一个办法，规定不论遗失声明、保留产权、脱离关系等都须在《民国日报》上刊登广告，在其他报刊上刊登广告一律不发生法律效力。这样，《民国日报》虽然在商业广告上吃不到西瓜，总算在人事广告方面尝到了几粒芝麻。

### （三）其他各种广告

广告是商业战争的重要工具，除报刊广告以外，其他各项广告先后出现，其效力，有的超过了报刊广告。

（1）路牌广告。辛亥革命以前，铁路沿线每一车站附近都有路牌广告，宣传狮子牙粉、仁丹、大学眼药、美孚火油、白礼氏洋

烛、中将汤等商品。这些都是外商广告公司承包下来装置的。中国人装置路牌广告起源于一九一一年。当时上海有“明泰”、“又新”两家广告社，雇用漆匠在铅皮上替日本三头洋行绘写仁丹的广告，只是加工性质，技术幼稚。到一九一八年，美国人开设的克劳广告公司替大美烟公司红屋牌香烟做广告，工人蒋梦麟开始招收学徒，培养了一批技术漆工，现在的中老年油漆广告工人，有一部分是他所培养的。一九二一年，又新广告社的一位工人王万荣创办了荣昌祥广告社，开始时不过做做水木工程，代漆路牌，到一九二七年，美灵登广告公司及陈泰兴广告社委托荣昌祥代做路牌广告，于是发展到在上海任何一条马路上以及沪宁、沪杭两路沿线的所有路牌广告，几乎全是荣昌祥所包办。一九三五年，荣昌祥把克劳、麦克、彼美等外商广告社一一收买下来，到一九四一年英美广告社全部结束。最后结束的是美灵登广告公司，被日本侵略军接收过去，改名为“太平广宣公司”。同时日军想收买荣昌祥，为王万荣拒绝，王联络了“国际”、“新新”等广告社，组织同业公会，对付日军控制下的太平广宣公司。到一九五一年，上海举办土产交流大会以后，荣昌祥已成为上海广告业的巨擘。

(2) 无线电广告。上海自美商开洛公司于一九二五年运来播音机，到一九二八年设立了广播电台以后，就有了无线电广告。当时开洛广播电台，只是推销外国货，后来华商私营电台逐渐发展，中国工商业者也利用无线电广告宣传商品。有万仰祖者，首先组织空中书场（在空中书场以前，开洛公司播唱评弹的艺人，是擅说《王派三笑》的蒋宾初），为大百万金牌香烟做广告，约定评弹艺人排定节目，逐日连续播送评话和弹词，于播送中插

入广告,收效颇著。当时上海规模较大的商店,如绸庄、药房,大都自己选择各种曲艺,交电台播送节目做广告。一九三七年以后,无线电播音广告极度混乱,有些电台被市侩流氓控制,采用打电话点唱、送货上门等方法,于是小商店竞相效尤,借夸大的广告进行欺诈。

(3) 霓虹灯广告。一九二八年,有葡萄牙人开始在上海开设“丽耀霓虹灯厂”,不久,转让给华商,更名为“通明霓虹灯厂”。后来又有美国人开设“丽安霓虹灯厂”,设备比较完全,解放前夕由中国人接办,改名为“中国霓虹灯厂”。华商创办的霓虹灯厂,是一九二九年由董景安首创的“远东霓虹灯厂”,后改名“东方霓虹灯厂”。上海解放前夕,最大的霓虹灯厂只有东方和中国两家。

霓虹灯初装置时,光线固定,仅作市招装潢之用,其后技术改进,光线能跳动交换,制作各种图案,栩栩如生,于是商店、酒楼、戏院、舞厅竞相装置,彩色缤纷,斗艳争妍。用霓虹灯宣传商品,首先是红锡包香烟的广告,地点在大世界斜对面的屋顶上,建造了一个又高又大的铁架子,中间装一座大钟,收到的广告效果很好。此后蜂房牌绒线也用霓虹灯做活动广告,远远望去,许多蜜蜂不停地飞舞,使人注目。又有天厨味精的广告,矗立在国际饭店,在当时是上海市最高的霓虹灯广告。

(4) 电影广告。上海电影院在放映舶来无声默片时代,即有电影广告,大都为外商宣传商品,由洋行直接与电影院接洽。一九三〇年,“华商广告公司”开始代理电影广告,大都仅在一张画片上加些说明,名曰“幻灯片”,其实并无变幻。就笔者所知,

一九二三年前后，英商英美烟公司曾在安南路特设一动画绘制所，为该公司作广告，由杨左甸等执笔，当时画的是《武松打虎》，其他未有所闻。

(5) 招贴广告。招贴广告手续简便，历史悠久，不仅在都市里，就是在村镇上，早有招贴广告，如“布种牛痘”、“新开店舖”等等，到处可见。戏院“海报”（用红纸书写金字戏目及艺名报道）即招贴广告中的一种，往往重重叠叠粘贴墙上，经风吹干落下，被马路上流浪者拾取，充作被头，号曰“金花锦被”。当时贴招纸广告必须领取照会，始准粘贴，而且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各分畛域，不许越界乱贴，更有组织公司专以贴招纸为专业者。

明星电影制片公司每逢新片上映，亦效法京戏贴海报，与明星公司有关系的凤昔醉，为此开设了“大中华广告社”，专接招贴广告。另有名李雅声者亦经营此业。同行嫉妒，竟彼此把自己要贴的广告纸贴在别人的广告纸上，因此引起纠纷。

(6) 邮递广告。亦称“传单广告”，属直接向消费者宣传商品的一种方法，在上海行之已久。有雇人分发的，有委托邮局指定在外埠某一地区分发的，亦有抄录通讯录、行名簿或电话簿，把传单装在信封内寄递的。一九二五年，上海有几家规模不大的书店，印了书目，采用以上方法推销，有相当效果。一九三三年，上海土产公司亦曾普遍分发宣传商品信，效果未详。

(7) 空中广告。上海过去先后有两次“空中广告”的试办。一在一九三五年上海开第六届全国运动会时，新闻报馆曾使用过一次气球广告，在好几个轻气球之下系以长布条，上写“《新闻报》、《新闻夜报》销数最多”，“《新闻报》、《新闻夜报》效力最大”，

“《新闻夜报》欢迎各选手”等，飘扬在天空中，引人注目。一在一九三六年，中国航空公司曾试验过飞机散烟书字于天空的广告，写的是“中国航空公司”几个英文字，但为时短暂，且辨认不清，此后没有采用过。

(8) 其他广告。一九二一年某日，上海新世界游艺场开办“花国群芳选举”，由邵伯谦（邵力子之兄）和狄芝生（狄楚青族孙）两人合办，为大美烟公司及雀巢牌炼乳公司做推销商品广告，当时把选出来的“花国大总统”称为“牛奶总统”，这是奇特的广告方法之一。一九二八年某日，黄楚九在大世界共和厅宴请七八十岁的老者百余人，号曰“万龄大会”，替他所制售的“百灵机”药品做广告，这是奇特的广告方法之二。其他想入非非的广告方法不胜列举，没有历史意义，不再叙述。

#### (四) 广告公司史实

辛亥革命以后，广告事业勃兴，上海除外商广告公司外，华商广告公司亦相继成立。荣昌祥是专营路牌广告的，此外有以代客送登本外埠各报刊广告及规划设计各种广告为业务的。如从美国镀金归来的“广告博士”林振彬与黄梓廉等，设立了“华商广告公司”与“维罗广告公司”；另有陆梅僧与陆守伦、郑耀南、姚君伟等（人称广告四巨头），在申报馆张竹平支持下，借申报馆余屋，开设了“联合广告公司”，以广告托拉斯姿态出现。这个公司的营业范围广阔，附设的图画部，有职员十余人，包办设计、送登各种广告，外国公司的广告亦经手不少，在当时可说首屈一指。

旧社会的商人总是大鱼吃小鱼，同行嫉妒，何况广告公司。有一位吃了几十年广告饭的先生曾说：“大‘利’灭亲，优胜劣败，吃我们这行饭必须具备几种特殊条件，首先手要长、脚要快，手长才能抢得着，脚快才能跑得着广告。此外头要尖（会钻），皮要厚（不怕碰大老板的钉子），心要狠，要六亲不认，把所有的同行都当作七世冤家。”虽然这是牢骚话，但是广告商之间勾心斗角，互相倾轧，确是事实，下面举一个例子。

某一时期全上海报刊上的香烟广告大部分掌握在一个姓陆的手里，但有三家烟草公司他无法染指，一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属广东人势力，外帮人不易打入；二是洪沧亭、渭亭兄弟创办的华达烟公司，广告由孙光第经手，洪孙关系相当深，不许他人染指；三是华成烟公司的美丽牌、金鼠牌香烟广告，每天在申新两报出现，全由狄芝生经手，每月坐收佣金不在少数。陆某必欲得而甘心，竭力向华成几位老板进攻，结果与狄平分秋色，《新闻报》方面的广告仍由狄经手，《申报》方面的广告，则归陆承办，狄固不乐，陆亦不能满意。当时，永安公司的广告，亦系狄芝生经手。有一次，永安公司大减价，将广告底稿送给狄芝生，指定刊登在《申报·本埠增刊》第一版的封面，限第二天见报。狄芝生亲自出马与申报馆广告部打交道，据称增刊这一部分广告地位已给联合广告公司包去，无法刊登，狄与联合广告公司洽商，主持人坚决回绝，称这一地位早已被客户占登，无商量余地。狄芝生只好把广告底稿退回给永安公司。永安公司因大减价必须如期举行，而《申报》广告非常重要，急得毫无主意，谁知狄芝生刚走，联合公司就派人来兜做广告，声称《申报·本埠增刊》的广告，别家



送去登不出，他们却有办法，而且可以指定地位。永安负责人一听，喜出望外，连忙给他底稿，到第二天果然登在《申报·本埠增刊》指定的地位。从此永安公司的广告，便从狄芝生手里转给联合广告公司。由此可见广告商人抢做生意的狠心辣手。

### （五）外商最大的广告部

上海外国企业自设广告部的很多，范围最大的应推英美烟公司。该公司广告部有外国办事人员两三人、中国办事人员六七人，另有勤工三四人，广告种类很多，在报刊上所占地位亦很大。另有各式各样的赠品，如皮夹子、香烟缸、钥匙夹、饭碗、筷子、日记簿等，不胜列举。广告部下面还附设一个图画部，由一个英国人充部长，绘图人员德国籍、俄国籍、日本籍、瑞典籍都有，中国绘图人员多至二三十人，有全国闻名的大画家，亦有初出校门的练习生。画件种类有月份牌、大招贴、小传单、小画片、西洋画风景、中国画山水、油漆牌子、日历等等。另外还附设一个橱窗部专搞橱窗广告，一个动画绘制所专搞电影广告，对于任何广告都能自己完成，不需外求。印刷方面，还自己设立了一个“首善印刷公司”，据说，沦陷时期汪伪组织发行的储备票即系该公司印刷的。

英美烟公司各种牌子香烟的广告，都有专用词汇或图案，如“三炮台”常用“驰名中外”，“大前门”常用“中华第一名烟”，“品海牌”常用“多年老友”，“红锡包”常用四周八角框子中间一个“盛”字，“翠鸟牌”常用一个“烤”字。最使他们得意的是“哈德门”香烟的“还是他好”。据称这四个字，是向各地征求来的。其妙处

是不论用南方或北方方言说起来都差不多，而又酷似老吸香烟者的口吻。然而笔者以为，这四个字终不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长城牌”香烟广告常用的一句——“不吸香烟，固然最好，若要吸香烟，请吸国货长城牌”来得爽快有力。

# 上海先施公司

姜 豪

南京路是旧上海的商业中心，大商店比较集中。先施、永安、新新和大新四大百货公司先后建立后，南京路更加繁华兴旺，名扬四海。在四大公司中，先施创立最早。

我同上海南京路有过历史性的关系。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中，我在南洋大学（交大前身）读书，参加了南京路上的示威游行，我们的队伍被租界巡捕阻止，停留在先施公司前面，排枪声响，同学陈虞钦烈士中弹牺牲。当时我和他并肩同行，虽然幸免于难，但竹布长衫上，染满了烈士的鲜血。回忆五十多年前往事，此情此景，历历在目，终生难忘。抗战胜利后，我一度主持过老闸区的地方行政工作，同南京路各大商店有不少人事往来，尤其同四大公司人员往来较多。现在把我所知道的四大公司中建立较早的先施公司的情况，记述如下。

## 一、上海先施公司的创立

上海先施公司创立于一九一四年，地址在南京路浙江路口（现上海服装商店所在），占地十余亩，自建七层大厦。它是由香港先施公司发起，在上海扩大招股而建立起来的。最初招股港币六十万元，在香港注册。由于建筑工程浩大，原定资金不敷，

乃于一九一五年增加资本为一百二十万元，可是投资者非常踊跃，招股超额，于是把资金增加到两百万元，一家商店拥有这样的巨额资金，在当时是少有的。建筑工程费时三年，至一九一七年十月完工开幕，大部分房屋作为商场，高层建筑中一部分作为东亚酒店，设有旅馆和酒菜部。顶楼平台辟作先施乐园，俗称屋顶花园，又称屋顶游乐场，设有好几个剧场。

在此以前，南京路上原有很多大商店，但都是专业性的，一家商店只供应一类商品，如南货店、绸缎店、银楼、西服店、时装店、鞋帽店、酒菜馆、食品店等，如果要买几种商品，就得跑几家商店。自从先施公司一开张，只要踏进它的大门，衣着、日用品、吃、喝、玩乐统统齐备，而且品种花色多，价格贵的和便宜的都有。这在当时还是新鲜事，所以公司一开幕，就轰动社会，营业鼎盛，从而推动了其他投资者相继在南京路开设其他几家大百货公司。

先施公司在经营管理上，还有几个特点。如旧时商店出售商品从不标价，很多商店做买卖要讨价还价。先施公司首创标价和不二价制度，而且售货一律开发票，这在当时商业上是创举。旧时商业从业人员，除了春节有几天休假外，终年累月，并无休息。先施公司每逢星期日休息，这是又一创举。旧时商店中除了夫妻老婆店偶有女性参加服务外，其他商店皆无女性充任店员。先施公司破例雇用女店员，为女性开辟了就业道路。凡此数端，不但在商业上别开生面，而且也在当时社会风气上创了新，为此后南京路上各大商店的改革作出范例。

先施公司创立时以“搜罗环球百货”为号召，它的商品中固

有很多工业先进国家的产品，而实际上也采办了不少国内各地的优秀商品，并且设厂自行生产。如一九一七年，在闸北会馆设厂，开始时设了木工、铁工、家具、油漆四部。到一九二三年，在华德路购地二十多亩，耗资十余万元，把旧厂迁去，职工有三百多人，产品有车床、钻床、银箱、首饰箱、火炉、中西家具、儿童玩具等，并且承接装修工程，成为工商联合企业的雏形。

## 二、先施公司的来历和发展经过

先施公司是一九〇〇年(清光绪二十六年)由马应彪发起在香港创设的。马应彪原在澳洲雪梨经商，一八八四年至香港开设永昌泰金山庄，经营进出口商品。当时香港一般商店都用老的经营方式，货价不一，买卖两难。马应彪看到工商业先进国家的大型百货公司，商品齐备，明码实价，买卖称便，因之创议在香港筹设百货公司，但附议者寥寥无几。直至一八九九年，得到澳洲华侨蔡兴、马永灿、郭标等赞同，又得到在港同乡林敏良、李月林等及美洲华侨郑干生的赞助，一共结合了股友十二人，集资港币两万五千元，筹备开业。一九〇〇年十二月在香港皇后大道开张，店基是两开间三楼房子，底层及楼上都设商场，当时一般商店只在铺面营业，独有先施也在楼上营业。开业时店员二十五人，男女都有，是从乡间招来加以专业训练的，他们接待顾客，热情诚实，远胜一般商店，因之得到顾客好评。同年因台风吹塌三楼，暂迁永安街营业，至一九〇四年旧铺修复迁回。一九〇七年因盈利日增，扩充资金为二十万元，改组为有限公司，向香港政府注册，新股东有陈少霞、夏从周等。

香港先施扩充改组后，在香港德辅道另租五开间四层楼房一所，由底层至四楼统统开设商场，为其时香港首屈一指的大商场，并促使该处市面兴旺起来。一九一三年，先施资金增至两百万元，又在德辅道购地建筑六层楼一座，除各楼商场外，层顶辟为天台乐园，附设酒楼、茶点部，夜间则为游乐场。一九六二年起，又把德辅道房屋改建为二十七层楼房，至一九七三年工程完竣，六楼以上作为写字间，租给政府机关及商业单位应用，当时资本已增至一亿元。

先施公司在香港创立后，由于经营得法，业务蒸蒸日上，先后在国内设立分支机构。一九一二年，在广州设立分公司。一九一四年，在上海设立分公司。一九一七年，在新加坡设立支店，又在日本神户设立办庄。

港、粤、沪三公司，本来各自招股，经济独立，至一九一九年，把三公司合并起来，统一调度，资本增至港币七百万元。一九二二年又在英国伦敦设立办庄。一九三五年在澳门设立支店及东亚酒楼。一九六二年设立九龙分公司。由于分支机构不断增设，声誉益著，营业更盛，不仅在中国为第一流百货公司，即在亚洲也是第一流的百货公司。

### 三、先施公司的兄弟企业

先施公司奠定基础后，除了经营百货业务外，进而以先施公司的投资为基础，扩大招股，组成兄弟企业。情况大体如下：

#### (1) 先施保险置业有限公司

一九一五年在香港成立先施保险置业有限公司，资本实收

六十万元,经营水火保险及地产业,由于营业发达,先后在广州、上海、石岐、江门、梧州、福州、天津、汉口、新加坡、泰国、越南等地设立分公司。当时营业范围,国内遍及华中、华南、华北、西北与东北各城市。国外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及越南各地分设代理业务处。由于营业日益发展,一九二五年再行增股,实收资金五百万元。此后泰、越两公司,因火险赔损很大,于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间被迫停业。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发生,国内外分公司相继停业。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只有香港、上海和新加坡三地复业。但新加坡业务不振,又于一九四八年停业。上海是在解放后的一九五二年停业的。

### (2) 先施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继先施保险置业公司之后,又于一九二二年设立先施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资金为港币两百万。从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五年间,先后在上海、广州、天津、石岐设立分公司,并在南京、南昌、宁波、济南、九江、汕头、江门、澳门、福州、安徽等地设立代理处。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和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件相继发生,天津、上海分公司及华北各地的代理业务几至停顿。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发生,上海业务无法开展,广州分行撤回香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军攻占香港,保险业务全部停顿。但该公司的资产一部分是房产,它们没有受到损失,以后仍能维持营业。

### (3) 先施化妆品厂及先施化妆品有限公司

先施公司在辛亥革命后就开始制造化妆品,先后在广州、上海开设各种化妆品制造场厂。一九二二年在香港创建总厂,增

加资本至一百三十万元，成为独立的先施化妆品有限公司。产品有面膏、头水、头蜡、香水、花露水、爽身粉、香皂、牙膏等。

#### 四、先施公司及兄弟企业的人事情况

先施公司是股份有限公司的组织，股东会设有总监、监督、董事等职。业务管理方面，总公司设有总司理(等于总经理)、司理、副司理。各地分公司、先施保险置业有限公司、先施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和先施化妆品有限公司，股东会方面设有董事局主席和董事等职，业务方面各设司理、副司理等职。

从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七四年间，先施公司主要人员如下：总监马应彪，总司理陈少霞，监督有陈少霞、黄炳南、陈丽珍、蔡兴、欧彬、郑昭斌、马炎璋等。香港公司司理先后是马永灿、郑干生、陈丽珍、马文辉等，副司理先后是郑干生、林齐恩、马焕彪、陈志明、欧炳光等。上海公司司理先后是黄焕南、郑昭斌、马焜林等，副司理先后是刘锡基、马炳业、马焜弼、马文藻、黄祖康等。香港先施保险置业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先后是郑干生、夏从周、马应彪、蔡兴、马文辉、马炎璋等，司理先后是蔡兴、夏从周、罗大尧等，副司理先后是伍耀廷、郑文耀、马显利、罗大尧、马文照等。上海分公司司理先后是欧彬、黄泽生、梁国华等，副司理先后是黄泽生、林瑞书、梁国华、吴鹤隐等。先施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先后是陈少霞、雷维治、蔡兴、马炎璋、马文辉等，司理先后是林瑞书、李福苍、古卓仑、马永汉、马焜弼、马文藻等，副司理先后是刘拔茹、古卓仑、马永汉、马焜弼、马建启等。先施化妆品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先后是蔡兴、马应彪、马永灿、马炎璋、马文辉



等,司理先后是欧治、李福苍、李元灿等,副司理先后是陆仲山、蔡东生、李元灿、黄健初、蔡天福等,上海司理先后是马显利、黄学荣、郑崇龄、冯迪仪、庄志生、庄德民等,副司理先后是黄学荣、冯迪仪、庄志生等。

附记:

本文承上海先施公司原负责人黄祖康同志提供了一些资料,特致谢意。

## 建国前的上海国际饭店

唐渭滨

在上海最热闹的南京西路黄河路口，耸立着一座二十四层楼(地面上二十二层，地面下两层)的大厦，那便是中外闻名的国际饭店。建国前我在中国旅行社工作，早就同它有业务上的关系。建国后在一九五三年二月，我兼代这个饭店的总经理。国营以后任副经理。一九六三年夏，调任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参事，才离开饭店，对饭店的情况有些了解，现就所知写出来，供有关方面参考。

国际饭店是由金城、盐业、大陆、中南四家银行的“四行储蓄会”投资建造的，发起人是四行储蓄会主任吴鼎昌。吴要办饭店，久有此意。据原大陆银行总经理谭公远对我说：“我的父亲(谭丹崖，和吴鼎昌、周作民都是日本留学生)亲口告诉我，吴鼎昌早年向他表示过有三个志愿：一是办一个公正的报纸，二是当一个有作为的清官，三是开一个出色的大旅馆。他办了《大公报》，担任过国民党政府的文官长、贵州省政府主席等要职，开创了国际饭店。不去谈他的《大公报》办得怎么样和为官如何，作为三个志愿来说，总算是如愿以偿了。”谭又说：“国际饭店名义上是由吴主持，实际上是钱新之负责。”

负责建筑设计工程师是邬达克(Hudec)，匈牙利人，专业

建筑设计。全部工程是由陶馥记营造厂的老板陶桂林承包的。据谭公远对另外一些朋友说，现在座落在延安西路近江苏路口的“达华宾馆”那座大楼，就是邹达克用承办国际饭店建筑赚到的钱和造国际饭店剩下来的材料建造的。

国际饭店的打桩工程是由丹麦人开的康益公司承包的。这个公司曾承包钱塘江大桥的打桩工程。饭店的打桩工程花了一大笔钱，打的是密度较高的梅花桩，最深处达一百二十英尺，差不多相当于饭店地面高度的一半。因此，在上海的高层建筑中，国际饭店的沉降率是最小的。

饭店自建造始，就追求世界第一流的水平，好些设备当时是很先进的，而且各有特色。例如：

一、消防设备特别周全。由于过去公共租界工部局对高层大厦，特别是当时国际饭店在远东要算最高的建筑，要求特别严，饭店对此就特别注意。它的每层楼都有专用的消防龙头，每一层的平顶上还装有自动的灭火喷水头，如果一处着了火，空气达到一定的热度（一百二十华氏度）时，喷水头子的孔就自动熔化开启，水在压力作用下立刻喷出水来把火扑灭。有一次因厨师烧菜温度过高，熔化了顶上的灭火器，各处警铃大响，人们以为是失火，闹了一场虚惊。

二、自流井的装置。井打得很深，从地面打下七百英尺。通过砂砾，井水用压缩空气打上来，送上屋顶水塔，不用消毒，直接通过冰冻管送到每一层楼，成为饮用的冰冻水，完全符合卫生部门的标准，当时许多外国旅客感到非常满意。饭店还商准有关当局，准予同时使用自来水（过去租界规定，凡有自流井设备的，

不许再用自来水)。这当然是经过花钱运动的，但从经济上考虑，饭店有时用自来水，有时用自流井水，可以根据水费和电费价格的变化及时调节，还是合算的。

三、饭店的电梯多种多样，大小合起来共有七部。最大的是运输汽车用的，因为当时饭店门前马路很窄，对面又是跑马厅围场沟，不好停车，遂在大楼附屋二楼开辟了室内停车场，汽车上下由这部电梯输送。最小的是为客房客人送饭菜用的，称为食品梯，上下于客房、厨房之间。旅客如需在客房内进用餐点，服务员只要在服务室里的食品梯门旁揪一下电钮，梯门开启，随将点菜单放进送下，厨房搞好后将食品送上，揪下电钮开门取出。另有职工上下用的电梯和进货的电梯各一部，在饭店后部，就是大门内供旅客用的三部电梯，其速度很快，直上十八层只需二十秒钟。后来由于有人嫌快，乘搭时感到头晕，遂改开中档，高档不开了。有一次三部客梯中有部电梯因司机疏忽，未等到梯外的门关闭好就向上开，在这一瞬间，有位电影女明星叫白璐的（她的丈夫也是一位电影明星），从店外进来，一只手提了一个手袋，面上戴着一副黑眼镜，见梯外的门还未关拢，就向里面挤，结果跌到梯井下面。本来这下面有保险弹簧，未料跌得不巧，受了重伤，送凤阳路同济医院急救无效死亡，引起一场风波。

四、饭店的叫铃与一般旅馆不同。一般旅馆客房都有揪铃，客人一揪服务员不但听到铃响，且看到灯亮了，可以知道哪个房间叫人，但是，如果服务员在别的客房工作，就听不到铃响，也看不到灯光明亮。国际饭店却有一种办法，侍应生（即服务员）每人都有一把小钥匙，可以把它插在他正在工作的客房线

路内,有人撒铃,他能听到响声,立刻知道有人在叫,就去服务。这个装置同经理室也有联系,旅馆部的经理可以借此检查侍应生的工作。

国际饭店筹备处成立于一九三二年,地址在上海汉口路四川路转角。开始时工作人员仅有外国经理希勃勒(Schplel,瑞士人)、中国工程师吴清泉(英国留学生)和由希勃勒介绍进来的英文女打字员(广东人)共三人。四行地产部负责人孙立己有时也参与其事。后来逐渐增加会计、稽核员等。一九三三年迁到饭店大厦内办公。据吴工程师对我讲,他原在美资电话公司任工程师,由于不愿帮外国人做事,放弃高薪,进入四行地产部,主要搞国际饭店工作。在大楼建筑时期和饭店成立之前,他审核大楼和饭店内部设备的设计方案,检验从国内外订购的机电设备是否合乎合同上所列的技术规范,检定大楼内承包工程公司所装置的机电管道以及各种其他设施,测试这些设备的工作效果是否完全符合合同的规定,招请和训练大楼内各种设备和装置的维修人员,制定各部门的职责和各种维护制度。吴清泉还讲,在饭店成立后,他的主要工作是制订各种设备和装置的统计报表,包括损耗、水电消耗、空气温湿度等月报表和年报表,维修大楼内的电梯、电话、照明、冷气、暖气、冷热水、卫生等各种设备以及家具,还有其它建筑上的修理工程。四行储蓄会所属其它大楼内的维修工程也要代管。正是由于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工作,一座耗资四百万元建成的大楼和投资一百万元开设的饭店设备,才能够维护得很好,保持其特色。

国际饭店大厦建成以后,中国工程师学会于一九三三年底

借用饭店餐厅举行年会，并参观大厦的各种设备，由饭店吴工程师作了详细的介绍。出席会议的工程师们异口同声地赞扬。建国后，有一位苏联市政专家对饭店有过很好的评价，认为在上海高层建筑中它的设计最佳，外表雄伟美观，占地不大，每块地方都充分派了用场。

饭店开业时，大楼各层楼的布局是这样的：楼下正厅是四行储蓄会西区分行营业场所；一楼半（即夹层）由四行租给中兴轮船公司、中兴煤矿公司、光艺照相馆，饭店由东面大门出入。二楼设餐厅，专为客房客人用餐。三楼一部分供客房客人会客，一部分供应茶点。四楼至十三楼是客房。十四楼是餐厅，对外营业。十五楼及十五楼以上的客房，安排长住客人。

餐厅时有变化。敌伪时期，二楼由上海新新公司经理萧宗敬承办，以“孔雀厅”名义对外营业，供应广东菜。三楼由乔家栅供应面点。十四楼包给义生公司开办“摩天厅”供应西菜，由干静庵、张祖望两人主持，张在餐厅具体负责。他们同日本人搞的“兴亚院”有关，因此，饭店才同他们合作，因为有了他们，一有靠山，二是原料有着落，特别是糖、米、面粉来源有保障。在摩天厅，有五个白俄人组成的乐队，还有鞠云、白光、张露、晓露等一些歌星轮流演唱。日本投降后，“日本通”搞不下去了，合作也就终止。

国际饭店为了要开办第一流的北京菜馆，特让常务董事施博群前往北京，找了丰泽园的经理栾理庭，请他到上海来开京菜馆。栾为人精明，深恐赚不到钱，弄得不好，还要亏本，不敢应承。后经商妥，由栾配备一个班底，国际饭店安排营业场所，盈余

照分,亏损概不负责。丰泽楼开张后,搞得有声有色,饭店自办的餐厅都比不上它。尽管如此,栾在经营中也有投机取巧之处。他曾亲口说过,酒席上有人点用熊掌,他曾用骆驼蹄代替,以伪充真。

饭店设有董事会。董事长是吴鼎昌,副董事长是钱新之(四行储蓄会协理)。除有四行高级职员担任董事外,另找了前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官如顾维钧、颜惠庆、王正廷等担任董事(这些人的名字外国人是熟悉的),也找了地方势力如杜月笙当董事,其目的是一是壮大声势,二是遇到什么问题,便于解决。在饭店掌权的人是常务董事,先后有项仲雍、施博群、孙立己(后又兼任总经理)。副经理先后有卢寿联、林勉之、吴沈钺。饭店还用了一些外国管理人员,担任经理的先后有瑞士人、英国人;担任厨师的有法国人及瑞士人;还有担任总招待的德国人。饭店用这些外国人既便于招徕外国客人,并表示饭店的气派,又能利用他们的经验技术把饭店搞得更好。

饭店在管理上成绩比较显著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建筑和机电设备的使用和维修保养,一是侍应工作服务周到。

关于建筑和机电设备,饭店设有工程部,主持其事的先后有五个工程师。第一个是吴清泉,抗战初期他离开了饭店,到航空委员会技术厅工作,现在是邮电部离休干部,离休前是邮电学院教授。第二个是吴沈钺,现任同济大学教授兼图书馆长。第三个是支德明,现任上海市人民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基建处工程师。第四个是徐乃俊,现在泰国一个饭店当经理。第五个是方春霖,现在上海电梯厂任总工程师。这些人工作都很认真负责,

对规章制度坚持执行。饭店为了做好设备维修工作，在即将开业前，就在供应设备和承办安装工程的外国公司或洋行中，选择了美资约克冷气公司、德资道柏克电器公司、美资沃的斯电梯公司、美资电话公司里的几个技工，留在饭店工程部工作，以资熟手。

侍应工作搞得好，最突出的一点是饭店自开业以来，就办了侍应生训练组，一共办了十期，培训了饭店基层服务员。招收的都是初中毕业生，开班上课，让他们学习如何做好侍应工作、客人未来之前的准备工作、客人来时的招待工作、就餐时的服务工作以及离开后的整理工作等等，要求讲究礼节，不断提高技术。工程师还在班上传授如何正确使用各种设备等。经过培训，饭店不断地增加了服务的中坚力量。

饭店各层次均有矛盾。比较显著的有饭店与银行的矛盾，饭店生意好时，款子存进银行，只收到一点利息，而银行却能避免货币贬值，把饭店的存款进行囤积物资赚钱，特别是抗战胜利后，饭店收入是美金，存进银行，它却折算成法币入帐，把外汇头寸全部拿去，好处很大，因此纠缠不清。另一矛盾表现在饭店内部高级管理人员的纷争上。饭店开业时，在结构上有工程、财务、客务、餐务几部，常务董事直接管财务、工程两部，而经理只管客务、餐务部（当然也要听常董的）。正因如此，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经常闹别扭。还有经理与服务员也发生磨擦，主要是为了小账的分润。

国际饭店定名是经过一番议论的。开始时，英文名称定为International Hotel。当时西经理希勃勒认为这个名称不够响



亮,建议要搞一个易听易叫的名称。原来办国际饭店的打算,除上海外还要在外地办些国际饭店,听了希特勒的意见后,就在译成英文的国际饭店股份有限公司的名称下,加上一个 Park Hotel 的名称,以示在上海的国际饭店股份有限公司所办的是 Park Hotel,将来在别处办,可在国际饭店股份有限公司下面再加一个别的名称,既保持了国际饭店的名称,又有所区别。中文招牌的名称仍是国际饭店。Park 一词是采用饭店右首黄河路的原名 Park Road (派克路)中的第一个词。回忆一九五三年夏,英首相艾德礼来我国时,陈毅市长在饭店三楼进行接待,并在二楼宴请艾氏和他的随员。当时有外国新闻记者打电报到国外报道这一盛会,特别地提到是在 International Hotel 举行的,还说冷气开放,以示建国后的上海经济迅速恢复。

建国前我们中国人能创办在远东首屈一指的大饭店,并不简单。可是国际饭店也给军阀、官僚、大资本家、买办、汉奸、国际间谍和帝国主义分子等提供了寻欢作乐、为非作歹的场所。当时有个四川军阀是鸦片贩子,抗日战争前,用武装贩运烟土到上海出售,包用过国际饭店十五楼,一住就是一年半载。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侵略者占领上海,这里又成为日本特务和德、日法西斯第五纵队的巢穴,他们包下十六楼,用一个洋行的名义作为掩护,在这里进行国际间谍活动。抗战胜利后,一九四八年初,孙科等人为争夺“副总统”的宝座搞竞选,十四楼变成了一大群政客相互竞争的所在。只有在新中国成立后,饭店才回到了人民的手中,真正发挥了为人民服务的作用。

## 旧上海的四个废品大王

朱 梦 华

建国前，上海有些资本家被人称为“大王”，例如：面粉大王荣宗敬，纸头大王詹沛霖，证券大王杨寿生，金子大王陈霖生，地皮大王周湘云，等等。此外也有自称“大王”以资号召的，例如，腌肝大王稻香村，栗子大王新长发，排骨大王小常州，头奖大王老汇利源、大福来，西瓜子大王西园，等等。这些大王在当年确曾名重一时，到今日还有不少人晓得他们，兹不赘述。这里我要写的是旧上海的四个废品大王。

### 破布头大王夏同德

夏同德是夏同德行老板，字继阳，宁波人，住南市薛家浜。原是一个收破布的穷汉，常年挑一副担子到大街小巷收破布，后来开小铺子，做起老板来了。手下也有十多个人替他出外收货，每日回店过秤付钱。替他收破布的人日益增加，营业日益扩展，遂由小铺子发展为行号，并在各处分设收购处或约定若干联购处，于是上海整个破布业，基本上在夏同德掌握之中，“大王”尊号非他莫属。由于收破布是极其零星的生意，一笔生意最多不过百数十文，最小的只有一两个铜板，只可买糖哄哄小孩，他便自设一爿糖坊，做好大盘饴糖。收货人员每日清晨出担收货，领饴糖

一盘，以糖换布，人称“换糖担”，深得小孩欢迎。数量多的，用钱收购。晚上回到号中，称货结算，所收破布还要拣选、分类、加工；成块的裱硬衬，成条的扎拖把，大量的零星碎布和老棉絮则卖给纸厂做纸浆原料。最没用途的是绸缎片块、纽头、鞋底，这些东西在当时毫无用处，一钱不值，如果不拣出来，送到纸厂去，要轧坏机刀，造成大损失。

那时，上海有三家大纸厂：一是曹家渡的江南造纸厂，专做毛边纸和连史纸，不用棉絮做原料，所以不需要破布。一是日晖港的伦章纸厂，最初专做洋连史，一九三二年“一·二八”后改制道林，原料来源是纱厂地脚花和大量破布，因此夏同德行便成了该厂的特约收货处。一是浦东的天章纸厂，专做灰报纸和次道林，适合北销之用，所进原料不求高档，因此夏同德先将破布拣出较好的送伦章，余货送天章，两厂各取所需，而夏同德的货色也就完全出清了。上海收破布的当然不止夏同德一家，但论到收货魄力之大，存货数量之多，除夏同德及其联号夏复泰之外，其余都是零星户头，或者收到货色还是卖给夏同德。夏同德很有一套生意经，为他人所不能及。如伦章、天章虽是有相当规模的厂家，但是经济却时常支绌，往往拖欠夏同德的货款。有一年，天章欠款达十余万元之多，大除夕夏同德自己到厂收账，天章连职工的薪工也发不出来，账房间聚集了不少人在吵闹叫嚷，会计员急得一筹莫展。夏见到情况，非但对欠款一声不问，反而垫出五千元替该厂解围。平日凡是替他收货的，若借贷款，并不需要担保，只要有人介绍，便可给糖盘、借本钱，收货后结账；到年节或遇有疾病，向他借钱，也没有不应允的；欠款一时还不出，他也不

追索,借钱的人除非真是还不出,否则一定清还。以上这些,就是夏同德营业鼎盛的原因。

### 纸边大王方德宣

方德宣,徽州人,人家顺口叫他小方。也同夏同德一样,原是挑担子收些旧货,维持个人苦生活。他为人机智,看到收旧货无大赚头,有另起炉灶之念。当时,徽州帮在上海纸业中很占一部分势力,小方也熟识几个,他见纸号中往往积压许多包皮和破旧零纸,没处存放。印刷所和报馆、书局的刀口、裁余、汇司(即零头)等废品,也日积月累,结果只有花钱雇人出清。小方便动了“人弃我取”的脑筋,浼托熟人代向各纸铺、印刷所、报馆和书局,介绍他长期出清积存地脚。他招集同乡帮同到各处收废纸,集中处理。这项处理工作也很繁重,因为废纸数量非常大,品种又极复杂,所以第一要有巨大容积的堆栈,第二要有细致工作的人手。又因这些废纸来自各处,内中有洋纸、中纸,也有颜色纸;有些还可以成料,有些碎杂只配回浆,需分门别类拣出。第二步是把较阔的汇司、刀口订成大小拍纸簿,洋纸可做信封、切名片,粗细条子可利用来垫饼干听、玻璃器、帽匣,其余零杂废纸则一古脑儿车送造纸厂,重做纸浆,于是废料乃各尽其用。用今天的眼光看来,这些似乎人尽能之,不足为奇,但是在小方的时代,还没有人对这项废料充分利用。就是拍纸簿也直到董和甫办中国切纸公司方才大量推广。由是可知小方心思灵敏,善于找窍门。小方是江南造纸厂特约收货人,他收来的纸边,除一部分拣出利用外,大部分都送江南造纸厂,每年数量相当可观。不上十年,已

俨然成了大老板，全埠纸边由他一手掌握，“纸边大王”之号也就当之无愧。某年，南市九亩地发生火灾，小方的栈房店铺付之一炬，多年积储几乎荡尽，屡欲自杀。但他随后还是收拾余烬，重振旧业，然已力竭气衰，营业不复如前顺手，当年盛况一去不复返了。

### 再生胶大王谢禾泉

再生胶是把旧橡胶废料重行回炉，熬成新胶，再制成应用品，故有“再生”之名。大王谢禾泉原是永和实业公司的工人，自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一直做到一九三二年（民国二十一年）“一·二八”淞沪战役，方才离开公司。永和实业公司最初学天虚我生的方法配制袋头牙粉发售，称嫦娥牌牙粉，后来改做橡胶制品。谢在公司中学到这套本领，心思灵敏，会翻花样。脱离公司后，替几间橡胶厂跑街，积累了一些本钱。一九三七年（民国二十六年）“八·一三”战争爆发后，上海同海外的交通运输发生阻碍，既而沦为孤岛，尤其是被日军指为军用品的橡胶，完全禁止进口。上海数十家橡胶厂，都有原料断档之虞。一九三九年（民国二十八年）后，这些厂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不是停闭，便是减工，剩下几家实力比较充足的，也是前途暗淡，一筹莫展。谢见此情形，私念各厂历年堆积胶鞋剪口和热水袋切缘诸废品，家家弃置，数量可观，大可回炉利用，倘若试制成功，则既可救急，又可发财。他即自设熔炉，收些橡胶废料和着桐油脚、硫磺一起煎熬，一试便即成功，因此名曰“再生胶”。斯时，沪上各橡胶厂正苦胶料不继，得此廉价的再生胶，莫不乐于接受，一时争相定货，大

有应接不暇之势。于是集资自设胶厂于康脑脱路(今康定路)延平路,号曰“申禾”。除技术人员及工人外,又招收货员数十名,挑着担子向各处收买橡胶废料,其对象以各胶厂剪口、缘条为主,此外则旧破套鞋、旧胶底、破热水袋、皮球、皮带管、破轮胎,都以极廉价钱收进。本埠不足,又到外码头设庄收购,汇集解厂。该厂工作主要在熔煮再生胶,供给各厂镶配之用,也自制一些鞋底、鞋跟等件发售,然并不注重,不需要许多技术人员,仅用两个老师傅已足应付,故厂中开销极省。谢自开申禾厂后,一帆风顺,名利双收,不到四五年,已拥有“再生胶大王”称号,积资巨万,商场中起家的快速,无有能及之者。

谢开办申禾厂的时候,自己并没有多少资本,而其时各厂定货踊跃,设厂需款,购机需款,收货需款,以信用未孚,招股无人过问,行庄不肯贷款,如何能应付呢?其唯一途径,只有向人家拆头寸。可是当时市面上金融紧张,向朋辈相识调拆,往往失望而归,倒是他平日在北里和跳舞场中认识的几个妓女、舞女,手头有积蓄,听了他天花乱坠的诱劝,都愿解私囊听其调用。转辗相介,有不少红倌人、名舞女,都和谢有了借贷关系,他的“花界拆头寸”,在北里中大出其名。他利用源源不绝的头寸,营业发展更快,同行中多说他手法巧妙。但是他因常在花柳场中行走,生活日趋糜烂,大小老婆多至十房,住家以外还有几处“小房子”,不但日用开支庞大无边,而且各房争吵,家庭不安,以致无心经营厂务,营业渐形不振。建国以后,厂务更加紊乱,各房互相控诉,更是狼狈不堪。

## 粪大王阿桂姐

粪大王阿桂姐，在建国前，是旧上海大名鼎鼎的人物。她掌握着整个上海市民的清洁卫生命脉，只要三数天不出粪车，市内便要粪秽山积、臭气冲天。阿桂姐管理法租界粪车数十年之久，除了一部分人家备有抽水马桶外，其余家家户户要同粪车打交道，所以“粪大王”之名，传遍各里弄。此人姓马，素善交际，很有魄力。她年轻时住在公共租界，同巡捕头、包探都有来往，仗了他们的恶势力，曾开过茶楼、澡堂等，挣了不少钱。这些生意，原都是帮会里人经营，不是普通人可以对付的，阿桂姐就用“白相人嫂嫂”的手法，来应付那班所谓“日里吃太阳，夜里吃月亮”的脚色，倒也平安无事，未出事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她又认识了法租界某总巡，有他撑腰，包下整个法租界的出粪工作，自设马鸿记粪行，地点在外滩新开河粪码头，粪车数百辆都归她一手调度。以前住在上海市内的人，应还记得粪夫清早出粪，每月都要索取月规钱，千门万户，为数可观。粪夫所得月规钱，例须同马鸿记分拆，阿桂姐从中剥削，坐地分赃，每月进益非个中人不知其详。这项收入还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是没本钱收下来的粪便，每日午前汇集粪行，由农民买去肥田，也有压榨成干饼外销的。由于千门万户聚来，再散向四乡八镇去，每日粪市热闹非常，收进时是秽物，运出去便是银钱，正如前人说的“末等生意，头等利息”。阿桂姐这种好买卖，一连干了二十余年，家私积成巨万，此时已住必洋房，出必汽车，纪纲侍应成群，对人颐指气使，俨然一有身份的“老太太”了。某年，阿桂姐得疾而亡，在桂福里本宅设奠开

吊，上海一班大人先生纷纷送礼临吊，门前高扎牌楼，车水马龙，颇极一时之盛，挽联莫幛，多至宅内不能尽容，一直从里弄底悬挂到街上，市人对之有歆羨者，亦有窃笑者。总之，“大王”虽死，雄风犹在。既而，诸子分产不均，引起争讼，后事如何，不得而知。



# 邮政储金汇业局始末

王安素

我在一九三一年进邮政储金汇业局工作，一九四八年退休。该局于一九三〇年成立，至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后，所有储金部分以及所营银行业务，统由中国人民银行接收；邮政汇兑部分，则仍由邮局办理。现就我所知道的一些材料，分述如下。

## （一）创始和定名

一九二八年，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长王伯群召开交通会议，该部邮政司司长刘书蕃鉴于世界上有些国家办理邮政储金非常发达，建议同样创办。经该会议通过后，即由交通部派刘书蕃前往国外考察。回国后即将考察所得书面报告，并拟定创办计划，呈交交通部转报行政院准予成立，定名为邮政储金汇业总局，由交通部直接管辖，与邮政总局并肩而立。局址设在上海福州路，继迁至福州路江西路建设大厦。抗战胜利后，分配到接收之日本三菱银行（九江路三十六号）为自有之局址。

该局因须与外国邮政往来，需有一英文名称。但英文名称，系用“邮政银行”名义，而不用邮政储金汇业总局字样。当时何以有此中、英文名称不同之决定，不得而知。

一九三五年，邮政工会认为邮政储金汇业总局不能与邮政

总局并立，应与各区之邮政管理局同样隶属于邮政总局。当时几经讨论，嗣呈部核定，把“邮政储金汇业总局”的“总”字取消，改为“邮政储金汇业局”，由“部直辖”改为隶属于邮政总局。该局局长由邮政总局副局长兼任。但行文方式对于各区邮政管理局则仍沿用训令和指令。

## （二）分支机构

邮政储金汇业局在成立之初，只有总局一处，设在上海，而对外营业则称为沪局，负责人并无经理名义，系由总局营业处直接领导。同时全国凡办有储汇业务之邮政局，一律加挂“邮政储金汇业分局”的牌子。但只办储金、汇兑业务，而不兼营银行事业。所有办事人员，俱由邮政局原有人员担任，并不另派专人，对邮政局之开支，也不负担任何义务。因该局在成立之前，即与邮政总局协商确定，凡邮政储金汇业局每年所获之盈余，全部拨归邮政总局作为邮政收入。

一九三一年春间，在南京和汉口两处设立分局，其营业范围与上海之邮政储金汇业局同样办理。其名称则为“邮政储金汇业局某地分局”，以示与邮政局办理储汇业务之分局不同。其组织内容亦与上海相同。嗣后又在昆山、无锡、湖州等处设立办事处，除办储、汇业务外，只作农村放款，不办其他银行业务。昆山办事处并自建仓库，存储抵押借款之农产品，规模较大，成绩亦较好。抗日战争爆发后，所有南京、汉口分局以及上述各办事处先后撤退至后方。抗战时期，该局迁至重庆后，设立重庆分局，办事人员多数系南京分局撤退之人员。嗣后又在昆明、贵阳、桂

林、衡阳、西安等处设立分局。抗战胜利后，凡大都市如北京、天津、济南、青岛、杭州等处都先后设立分局，规模较前愈大，业务亦随之繁荣。

### (三) 领导人选和变迁

该局领导人，最初是用总办、会办等名义。总办（后改局长）一职，由交通部派该部邮政司司长兼邮政总局总办之刘书蕃兼任。会办（后改副局长）：一为沈叔玉，曾任中华懋业银行副理，专管银行业务；一为麦克伦，英国人，为邮政界之老邮务长，专管会计事务。在总会办之下设有总务、营业、会计、储金、汇兑、保险等六处，其职掌和组织具载该局之组织法，不再冗叙。此外又设立联合会计处，专管该局与邮政局往来之会计关系。

一九三二年春，交通部长王伯群去职，刘书蕃随之下台。继任交通部长陈铭枢派杨剑平为邮政储金汇业总局局长，副局长沈叔玉亦被免职，遗缺派该局营业处处长任嗣达升任，还有一个副局长麦克伦是外国人，没有更换。不久，朱家骅继陈铭枢任交通部长，派唐宝书为邮汇局局长。副局长任嗣达因与杨剑平贪污案有关，被免职扣押讯办，遗缺内定派程士范继任，嗣又改派徐柏园为副局长（在唐宝书为局长期间，还有一位副局长，任职时间很短，姓名记不清了）。

一九三五年唐宝书去职，改派沈叔玉为局长，副局长徐柏园调任天津交通银行经理，遗缺由中央银行业务局副局长周守良兼任，嗣又改派徐继庄（曾任中国农民银行总经理）为副局长。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发生，是时交通部长为张嘉璈，调沈叔玉为广

九铁路局局长，改派刘攻芸为邮汇局局长。在此期间，刘攻芸带同副局长徐继庄及部分工作人员迁至香港办公，嗣又搬到重庆，而留一部分人在香港工作。旋刘攻芸调任四联总处秘书长，遗缺由徐继庄升任。

该局在由上海搬去香港时，留在上海的业务和部分工作人员由副局长麦克伦负责，因为他是英国人，可以同当时的租界当局取得联系，得到便利。至于在上海的对外业务，则以营业处名义进行，派会计处长林绍棠代理处长职务。在重庆时，又添派何纵炎（何应钦之弟）为副局长，他本是该局南京分局经理。抗日战争胜利后，该局全部由重庆搬到南京，从此即设在南京，但局长、副局长均在上海办事，大约是因便于同中央银行联络的关系。一九四七年，该局局长徐继庄因贪污案被撤职查办，所遗局长一职由谷春藩继任，直至解放后该局结束为止。

#### （四）资本和流动资金

该局成立时并无固定资本，仅对外说明系以邮政信用为担保。流动资金则令全国各区邮政管理局将所有各邮政局之存款，悉数交存邮政储金汇业局，各邮政局存放当地银行之存款，亦全部改用邮政储金汇业局名义存放，以备调用。同时交通部所属各机关之存款亦悉数交存邮政储金汇业局。因此该局流动资金之运用，颇形活跃。交通部如需扩充交通事业，费用亦可不必向银行筹措，可径与该局订立借款契约，随时拨用，邮政储金汇业局无异是交通部的金库。

抗战时期，法币贬值，邮政收入锐减。当时邮政储金汇业局

已在重庆加入四联总处(当时所谓四行两局),彼此可以用轧账方式调剂资金,因此邮政方面需要款项,可商得邮政储金汇业局同意,开给中央银行之支票,由中央银行划账。当时该局欠付中央银行之款,为数甚巨。

### (五) 业务概况

该局除办理邮政储金和邮政汇兑之外,其主要业务与一般银行大致相同。所吸收之储金,大部投资于有利事业,当时认为稳妥可靠者,莫过于投资于上海之房地产。故该局先后买进之房地产不在少数,以当时买进之价值计算,大约在五、六百万元之谱。计有:1.南京西路长沙路口(今华侨饭店隔壁)之房地产;2.淮海中路兴业里之房地产;3.襄阳北路颐德坊之房地产;4.巨鹿路采寿里之房地产。此外还有邮政局保险项下买进之陕西北路西摩别墅房地产一处,华山路大洋房一所,占地九亩有余(此屋在谷春藩为局长时卖去)。此外还有由邮政局转来之房地产数处。总之,该局房地产之投资确实不在少数,以之作为对邮政储金之担保。但是房地产系不动产,不能以之应付急需,于是同时投资于中外债券和市上认为确实可靠的中外公司股票,随时押款应付急需。

该局对于吸收华侨汇款,曾极力设法发展。当时南洋一带华侨甚多,每月汇回家用,数量十分可观,但几乎全部是由民信局汇划,而在南洋之华侨以福建、广东人为多,故民信局在福建、广东亦较多。如要吸收华侨汇款,首先必须禁止民信局之存在,但民信局有悠久之历史,华侨对之信用极好,一时禁止不易。于

是一方面由政府禁止民信局之存在，同时宣传邮政汇款之历史和信用，使华侨认识到它比民信局更为可靠。数年以后颇收成效。抗战胜利后，该局兑付华侨之汇款为数亦颇可观。因此该局之外币存款颇为当时之中央银行所注意，一再要求将所存外币存款划还邮政局旧欠，该局始终推宕，未予允许。

## 上海橡皮风潮

陈 诒 先

一九〇八年(清光绪三十四年)秋天,一些外商声称在澳大利亚种有大量橡胶树,为开设橡皮公司大量招股,并不断抬高股票价格。一些外资银行如麦加利银行、汇丰银行、花旗银行等,同这些外商勾结,承做该项股票押款,因此,中国商人和市民纷纷争购。到一九一〇年(清宣统二年)七月,幕后操纵者趁股票价格抬高之际,暗中将股票卖出,潜逃国外。这时外国银行宣布停止受押,并追索以前所做的押款,于是股价顿时猛跌,股票有卖无买,成为废纸,不少钱庄受累倒闭,商人和市民受害者更多。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橡皮风潮。

有一年,大闹公堂案(黎黄氏案)的主角——我的同乡、同学关纲之对我谈起这次橡皮股票风潮,言彼做会审官多年,所有积蓄尽丧于此。以下是关纲之的话。

“在一九一〇年上海市面出现一种橡皮股票,没有多时,有钱人竞相购买,一些公馆太太小姐换首饰、卖钻戒,转买股票,如痴如狂,有了钱,还要四面八方托人,始能买到股票。我因做会审官多年,认得洋人,费了许多力买到若干股,买进时每股为三十两银子左右。上海县知事托我买,我也代他买到一些股。我买进之后,股票天天涨,最高涨到每股九十几两。有许多外国人知

道我有股票，手里拿着支票簿，只要我肯卖，马上签字。有一天星期五，股票开始下跌，但为数极小，第二天星期六，只有上午行市，比昨天又小，我心中有点动摇。当时有一老洋人，系研究外国股票的权威，我去问他橡皮股票下跌的意见。他说：‘股票下跌，正是大涨的先声，据我看，这种股票最高可以涨到两百两一股，你如愿意卖出，就卖给我好了。’我听了他的话，决计不卖。第三天星期日无行市，不料自下星期一起股票价天天下跌，由每股九十几两，跌到八十几两，由八十几两跌到七十、到六十、五十、四十，一线下跌，只跌不涨。我若在四五十两一股时卖出，仍可赚进，但贪心不足，九十几两不卖，跌到四十、五十再卖，总不甘心。到了后来，我每股只卖得二两银子。这是一个大骗局，不但有钱的中国人倾家荡产，就是洋人中也有吃大亏的。当七月间风潮正大时，有正元、兆康、谦馥三家钱庄先倒，跟着倒的钱庄不计其数，连票号也起了波动，仅正元三家钱庄，就亏倒六百余万两。当时的上海道蔡乃煌乘专车到南京见制台张人骏，结果决定由上海道会同商会出面借洋款三百余万元，先将所欠各外国银行拆票约两百万元还清，后来又在庚子赔款存款项内挪借两百余万元，周转市面，风潮始渐平息。总计这次风潮，我的朋友中未吃倒账的只有上海县一人，他在八十几两一股的时候，将所购股票卖去一半，另一半看市面到底。他说卖去的一半已有赚头，要是另一半再涨，那就大赚特赚，就算一文不值，也不吃亏，这真是老州县的办法。”

从关绅之叙述的做橡皮股票的经过，可以看出橡皮风潮完全是帝国主义包庇下外国投机商在中国制造的大骗局。



## 旧上海的土地凭证和税收机构

余 芷 江

旧上海的土地凭证名目繁多，主要有以下数种：

一、田单。俗称方单，一八五五年（清咸丰五年）制发，人民所有土地均凭此管业，如有买卖、继承等情，亦凭单转移。如须划分，则将此单分割，由所有人各持一部分，因此此种田单往往分成数片，甚至只有一角者，即将原单所割去的文字，另行抄录，拼粘成单。倘有争执，则取齐配合，以资判断。

二、印谕。凡田单遗失，或遇人力不可抗拒的灾害而遭毁灭，经所有人申报上海县署，查明实情，给予印谕，代作田单凭证，谓之“代单”。所载内容述明失单原因，以及土地坐落、地址和数量，盖用县印，日后原单发现，即作废纸。但年代久远，地痞有勾结图保乘所有人他乡作客，或死亡后遗族孤零，向县署瞒报失单，冒领印谕，并转换道契，谋占土地，酿成日后讼争。至国民党时期上海市政府土地局成立后，市辖区域停止发给印谕，后又开始发给作为溢地代单之用。

三、部照。土地不属人民私有的，如营地、宫宇、官署、寺庙、庵观、书院等，统为官产，设官产局管理，受省署总局节制。如人民需要，得申请价买，由局发给财政部印制的执照，凭照管业（照上加盖厅县印）。又沿黄浦江两岸淤沙成滩，谓之沙田，设沙田

局管理,受省署管辖。人民得依据垦荒条例缴税领地,由局发给财政部执照。

官产和沙田有区别,管理范围各有定章,但上海两局始合后分,继又合一,且一度与宝山县合并,政令迭更,以致发生同一土地,两局各自发给部照,所有人各持部照为凭,虽至司法机关亦不易得到合理裁判。一九二七年后,两局一并裁撤,改归市政府土地局管理。

上海县城墙在一九一二年后拆除,原有城基和城壕(护城河),填平筑路(环形,今中华路和人民路),一部分拨给教育以及公共事业机构应用,余地任凭人民购买,由官产局发给财政部执照,临时设置官产丈放局承办,事竣裁撤。

四、道契。英美法等国在上海开辟租界后,不断谋占土地权益,但依据约章,不能取得所有权,只可用租赁名义,定名永租。其手续是由申请人先向各国洋行或外籍律师事务所设立的挂号处挂号,报明所需土地,经该处转报各本国驻沪领事馆注册,由领事馆照会苏松太兵备道署发给道契。一九一二年后,归驻沪通商交涉公署接办(辛亥革命后南北未统一期间,由上海总商会承办)。至一九一四年沪海道尹公署成立,则由交涉公署和道尹公署合办,契由交涉公署填注,送道署加盖道印。一九二七年道署裁撤,由当时的市政府土地局办理。此后又收回道契,改发永租契。

凡土地成立道契后,原有各凭证和任何契约均作废。以道契向银钱业抵借款项,较田单等抵押为易,并可作各种保证,因此申请换契者日增,开始限于租界以内地区,后渐扩展至界外,特

别是越界筑路地段。一些地痞流氓往往假借外商名义换领道契图利，一时物议沸腾，当局者不得不加以限制，于是对租界外地区，以图保为别，凡未发道契各图保，不得申报转换；已发区域再有申报，即变更名称为“华商道契”，实际与已发之道契并无区别。

道契虽称永租，但可转让权益，由挂号处出给权柄单交持有人以作凭证，实际上等于所有权的转让。

一八五三年小刀会起义，法帝国主义水师助清军作战，事后索酬，清廷即将县城东北门附近地区赠予开辟租界，租界当局有权出卖土地，发给道契，定名“公馆道契”。此后法租界日渐扩展，发给之契和英美帝国主义注册契相同。此项公馆契市上罕见流通，惟在敌伪时期，伪地政局设敌产登记处后曾有发现。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地政局换发土地所有权状时，亦查见法帝公董局出卖土地，竟称法产，帝国主义侵略野心可以概见。

五、营照。清季防军有营基地，如防营变迁，得将营地出租于人民使用或卖给人民，发给营照为证。设立官产局后，并入官产范围，改给部照。

六、芦照。上海县属黄浦江两岸以及吴淞江、龙华湾等处，在清季有芦苇低地，人民可缴价使用，发给执照，由县署征收年税，谓之芦课。

七、土地执业证。国民党时期上海特别市政府所属土地局成立后，本市各种土地凭证一律换发土地执业证。

八、土地所有权状。土地局改称地政局后，又将土地执业证换发土地所有权状。其理由为依据当时法律，执业证有追索权，

原有人得向持有人追索产权，改为所有权状，则永远确定持有人管业之所有权。

清季及民国初年，征收土地赋税及有关机构，迭有变迁。先后有以下各机构的设置：

一、升科局。清季对于无单无粮土地，可由使用人向升科局缴款，取得所有权，称曰升科。至官产和会丈等局设置后，分别接办升科局事务，升科局裁撤。

二、钱粮柜。设于县署内，专事征收土地赋税，一年分两次，称上芒、下芒，另有漕粮，年纳一次，收据统称粮串。初时概缴实物，约土地十六亩缴米一石，惟有上则、中则、下则田区别。后以实物不便，改按米值折合制钱、银币等计算。各乡设有分柜，收集事宜归各图保轮值经办，县署设有催征吏加以督促。此外，该柜尚兼收屯租、芦课、津运、营粮等项，城厢一带非农田土地，亦按芒漕定则征收。此项粮串，如遇田单遗失或毁灭等情，亦得作为所有权凭证或报领印谕证件。

三、宅地税局。上海各区房屋基地及非农田的空地，谓之宅地。一九二六年间，有邑绅呈准省署，筹设宅地税局，从事征税。地方人民认为一地两征，增加负担，群起反对，未经开办即行撤销。

四、官契处。土地买卖以及分割、转移，均须购立官契方可成交。契纸由省财政厅印制，县署设官契处，领发各乡各自承办。

五、年租局。道契地租按年缴纳，由各国领事馆收集，汇交苏松太兵备道署。辛亥革命后，由上海县署接管。开始以银两

折合银币，继以铜币计算，均有溢额。例如收入银元一元五角折合铜币为一千五百枚，按照市值可兑四千五百枚左右，为过去道署和县局额外收益。租界内尚有免租之地，传闻各国领事馆在清季有另行酬报之说。

六、会丈局。土地凭证转换道契，应由注册各国领事馆派员会同会丈局将亩分数额测丈明确，使单地符合，始可立契。一九一一年前，由苏松太兵备道署管理，以后由交涉公署接管，继又加沪海道尹公署会办。凡转换道契，先经挂号洋商报领事馆转交涉署，发交会丈局核丈后，绘图复报交涉署，制契后送道尹署核盖道印，送回领事馆发交挂号洋商，由申请人具领。初时一经会丈，即可确定，各无异议，后以租界工部局均备有租界和越界道契底册，因此日渐干预其事，会丈图稿须经工部局核对，不得任意增删变更，与工部局所丈符合，始能制契。

# 上海租界的房地产买卖制度

叶 叔 眉

## 一、道契和挂号洋商

道契原来是中国官厅所制定的一种特殊契纸，专供外国人到中国经商者在上海租界内租地建屋之用，于便利中寓限制之意。第一，只有驻上海的江南兵备道（海关道）有发给此契之权，所以称为道契。第二，外国人不能在中国买置地产，所以契内不称买卖，而称永租，承租人还须预付年租，抵充国赋。第三，中国人欲在界内租地造房，须经领事馆与中国官宪之准许。

道契本来只适用于外国人在租界内向中国人租用土地，后来由于国势积弱，政府媚外，官吏颺预，酿成国内一班富室巨商不相信中国政府，宁愿托庇于外人，因而购买房地产也要假手外人请颁仅有永租权的道契。这有几种原因：（一）道契经会丈局勘丈绘图，四至明确，不似田单之四至不清，分割时易生纠葛，甚至涉讼多年。（二）道契交割手续简单，无保甲及中证人等从中渔利及含混舞弊情事。（三）道契由洋商出面，一切抵押借款，以及造屋经租等事，都可委托洋商办理，有许多方便之处。由于这些原因，所以经营房地产的商人都欢迎道契。

道契在租界内有特殊信用，而道契的取得必须由洋商出面，

于是洋商中有一种特殊事业应时而生，通称曰“挂号洋商”，极盛时多至数十家。据笔者所知举其著名者：英商有业广地产公司、新沙逊洋行、哈同洋行、德和洋行、通和洋行、公平洋行、新瑞和洋行、泰利洋行、恒业洋行、轮免洋行、公和洋行、马海洋行、德利洋行、玛礼逊洋行、祥茂洋行、昌业洋行、爱而德洋行、高易律师事务所、哈华托律师事务所；美商有中国营业公司、普益地产公司；法商有中法银公司、建业公司、达理会计师事务所、逊百克律师事务所、巴和律师事务所；比商有义品洋行、罗义士洋行；还有意商开宜公司等。其中规模大者，除自营房地产外，兼做房地产押款，更有兼营经租和打样业务的。

凡中国人在租界内购置房地产，必须委托挂号洋商出面，请求发给道契，由洋商签发权柄单（即代管产业的凭证）连同道契交与委托人，手续即告完毕。此后业主如欲将产业出让与人，须买卖双方同至挂号洋商处，卖方将原权柄单交出批销，由挂号洋商另立新权柄单，连同道契交与买方，称为小过户。如买方不信任原挂号洋商，而要求另行委托其他挂号洋商时，则必须用大过户的手续，由有关两洋商向该管领署申请过户注册，由领署将道契送请上海道加批过户后，送回该管领署，转交新承办的挂号洋商，然后由该洋商出立权柄单连同道契交与买主，方算完成大过户手续。

## 二、挂号洋商的盘剥和房地产投机

按照惯例，挂号洋商向道契持有人每年收费银十两，小过户收费银二十五两，大过户加收银五十两。但大宗房地产的委托挂

号,或委托人同洋商另有押款或经租等关系者,则对挂号洋商的酬金往往超过惯例。至于洋商代办经租及打样的费用,更无一定规例,随实际情况而定。

以上各项费用,是挂号洋商向中国房地产主所收取的报酬,积少成多,为数已甚可观。但帝国主义侵略者利用道契制度,以巧取豪夺的手段,向中国人掠得的利益,有倍蓰于此者。举一例如下:由于道契在金融界有优越的信用,又由于外资银行乐于承做以道契为抵押的放款,于是一般企业多用道契向银行抵借款项,作流动资金之用。更有一般专做房地产投机的商人,俗称地皮鬼者,工于计算,看到某处房地产有利可图,即与挂号洋商接洽,先以该房地产的道契作抵,借得款项,然后买进此房地产,再行转让,如此一转手间,即以少量资金博得大宗利润。也有用此方法买进空地,委托洋商打样,建造高楼大厦以博更大之利益者。固然有人因此发财致富,但亦有因投机失利而不能依照押款合同还本付息者。尤其是在抗战时期上海沦陷后,多数房地产主避居他处,对于押款到期还本付息等事,无暇顾及,其在上海者亦多销声匿迹,顾命不遑,于是挂号洋商即以押主不能履行为理由,没收押品,大宗房地产就这样转入外国人手中。

抗日战争时期,租界房地产盛行分宅出售办法。盖因抗战开始后,日军攻陷淞沪,租界形势岌岌可危,中国房地产主多思脱售房地产,迁居内地或香港,而苦无受主;另一方面,东南滨海各省沦陷区的大中地主及有活动能力的殷商富室,争先恐后,挈眷避难上海,谋在租界觅屋定居,虽出挖费数千元乃至万余元,



亦所不计。于是房屋顶费愈抬愈高，漫漫乎接近买价。这时有房地产投机商人勾结挂号洋商，将整个里弄的房屋分宅出售，以图厚利。但整个里弄的房地产，其道契只有一张，不能分割，这时挂号洋商想出一种变通办法，要求旅居外埠的房地产主，把道契并全权处理房地产的委托书寄与挂号洋商，实行分宅出售；对于分宅的购买人则由挂号洋商分别出给权柄单，以证实其产权。这办法推行顺利，群起仿效，以致大量房地产买卖集中于某些挂号洋商，他们所得的挂号费既数十百倍于从前，而经手介绍及办事人员的报酬为数也极可观。分宅购买人忍痛出重资购进房产，原为得屋居住，取得产权凭证后，即通知房客迁让出屋，因此引起许多纠纷，甚至涉讼。此外，这些分宅业主中有贪小利者，利用余屋隙地，分租与人，收取挖费，以弥补其置产之损失，于是棚户与阁楼住户开始兴盛。自抗日战争至全国解放十数年间，是租界统治势力消长的变化时期，也是房地产买卖制度紊乱时期。

### 三、帝国主义利用道契进行政治侵略

以上所说我国人买卖租界房地产，因沿用洋商道契制度，所遭受之损失犹属于经济范围，其属于政治范围者，则损失更为重大。

公共租界内的行政机关为工部局，工部局的最高权力属于董事会。董事会由外人纳税会产生，依公共租界章程，凡外人有地产估价在银五百两以上，或每年缴巡捕捐或地税在银十两以上者，才有做会员的资格；界内居户中每年纳税在银五十两以

上，或自己没有地产而年付房租在银一千二百两以上者，才有当选为董事的资格。中国人向无权利参与租界行政，一九二〇年成立华人纳税会，至一九二八年始有华董三人，一九三〇年华董增为五人。这固然由于国势积弱，遭受不平等条约压迫，而道契制度之丧权辱国，也是一大原因。因道契须由挂号洋商出面，挂号洋商英文称为Registered Owner，直译为注册业主，而实际业主则称为Beneficial Owner，直译为受惠业主，因此中国人虽然尽了纳税义务，却要让外国人来享受纳税人的权利，这全是半殖民地的表现。

#### 四、华商道契的由来

一八九〇年，上海人士鉴于洋商道契的发展，为挽回国家主权，向上海道建议，详请南洋大臣核准，创办华商道契，凡华商购地，经会丈局勘丈绘图后，呈由上海道核发道契，同洋商道契一律待遇。一九〇七年，将华商道契事务划归商务总会（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后改称总商会）办理，设华商道契处专司其事。但在帝国主义经济垄断下，华商道契远不及洋商道契吃香，因之请领者并不踊跃，甚至有逐利商人于取得华商道契后再请转换洋商道契者。迨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我国参战，同德、奥绝交，将德、奥地产全部没收，所有本国商人用德、奥商人名义向德、奥领事馆所领道契，全换华商道契，因而华商道契渐为国人所重视。一九二七年上海市政府土地局成立，将洋商道契改称为永租契，对华商道契则予废止，改发土地执业证。一九三〇年又由土地局布告，禁止本国人委托洋商出面领取永租契，但原有挂号洋商

的委托关系,仍旧沿用。直至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人民政府成立,经过房地产制度的改革,道契两字始随着租界的消灭而成为历史陈迹。

## 闸北水电公司

尹邨夫 余芷江

一九一〇年(宣统二年)，由李钟珏(即李平书)等创立闸北水电厂，除募集商股外，由苏松太兵备道库中拨给部分资金，为官商合办性质。至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因借款关系，曾为日资大昌洋行接管，后由江苏省署拨款收回，成为省办事业。主办者单纯追求利润，对于地方主权、人民利益毫不顾及，首将原有小型发电厂废除，向租界外资电力公司馈电，以高价供应市民。水厂因陋就简，向苏州河谭子湾吸收水源，其时苏州河为租界污水宣泄之所，污浊不堪，又因年久失于疏浚，日见淤涸，在此取源，不仅严重影响公共卫生，亦不足供市民日用所需。市民虽一再呼吁改善，省署置若罔闻。省署实业科长金左临鉴于馈电转卖，有厚利可图，与吴淞镇人虚设淞滨电力公司，利用职务上便利，通过省署蒙请实业部批准，划闸北水电厂铁道以北的供电区域(沪宁和淞沪铁道)作为淞滨公司的营业区域。

一九二二年七月间，闸北川公路祥泾丝厂失火，因水厂水力不足，救火会无法施救，酿成焚毙十余工人巨祸。闸北市民联合地方自治筹备会、商业联合会等开会，认为唯有将闸北水电厂改归市民自办，方足解除痛苦，巩固主权，一致议决设立闸北水电公司筹备处。八月间成立，号召市民投资，在殷行乡(宝山

县境)剪淞桥沿浦置地四百余亩作水厂基地。一面推举代表组织请愿团,由余宗周、尹邨夫任团长,向省署和省议会请愿,将水电厂改为民办。在筹备期内,官僚威胁以及绅士和帝国主义者利诱,层出不穷,有如下述:(一)苏省巡按使韩国钧受实业科长蒙蔽,令闸北水电公司筹备处,通缉发起人徐春荣、陈维翰、尹邨夫、管际安等,激起市民公愤,闸北全市罢市三日。江苏县议会联合会和上海、宝山两县县议会以及其他地方团体,纷纷电省抗议,使省署不得不放弃高压手段,进行洽商。(二)淞滨电力公司浣宝山县绅士向筹备处说项,愿意合作,未为所动。筹备处并将该公司内容向实业部申诉,部派黄子仁调查属实,撤销淞滨电力公司注册。(三)英帝国主义覬觎闸北,企图推广租界,乘筹备处集款困难之际,由汇丰银行派人游说,愿取低利尽量贷款,帮助早日成立公司,经发起人等拒绝始息。

经过两年以上筹备,于一九二四年九月间,筹备处向省署缴纳厂价一百三十余万元、营业权六十万元,接收省办水电厂,成立商办闸北水电公司。成立后按原定计划,号召市民认股,由于市民经济力量薄弱和组织不够坚强,这一计划未能实现。公司投资,市民仅占一小部分,大部分仍握在资本家手中,由施省之(即施肇基)任董事长,陆伯鸿任总经理。一九二五年在原购基地上建造水厂,后续购基地建造电厂及其他工程,在当时均属新型设施。沪西一带各大工厂,过去由外商越界供电,亦逐步收回自办。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战起,电厂为日军炮轰,淞沪沦陷,即被占据,破坏惨重。至抗战胜利后收复,仍由商办公司管理。

## 上海开埠初期的洋行

陈文瑜

### 最早涌进上海的洋行

鸦片战争后，英国用武力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上海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最早到上海的一批洋行都是就近从广州分支过来的。一八四三年紧跟着英国领事巴尔福(Captain George Balfour)到上海的，有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宝顺洋行(即颠地，Dent Beale & Co.)、仁记洋行(Gibb Livingston & Co.)、义记洋行(Holliday Wise & Co.)和一个叫司密斯(J. Mackrill Smith)的商人。<sup>①</sup>到一八四七年，也就是上海“地皮章程”签订后两年，“上海租界内已经开设起二十四家进出口洋行、五家洋商店铺、一家旅馆和俱乐部了。”<sup>②</sup>租界市面不断扩展，洋行不断增多，到一八五〇年，上海不仅增加了许多为适应进出口贸易而设立的拍卖行、仓栈以及海船用品和伙食供应等商店，而且创办了英文《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大英医院(Shanghai Dispensary)、丽如银行(Oriental Bank)、大英轮船公司(P. & O.S.N.Co.)，英商成立了商会，以经营进出口贸易为主的洋行增加到三十二户，<sup>③</sup>到一八五二年，也就是太平军进入江南的前一年，继续增加到四十一户。

这四十一户是：

怡和洋行	Jardine Matheson & Co.	英	1843 年
宝顺洋行	Dent Beale & Co.	英	1843 年
仁记洋行	Gibb Livingston & Co.	英	1843 年
义记洋行	Holliday Wise & Co.	英	1843 年
广沅洋行	J.Mackrill Smith	英	1843 年
沙逊洋行	D.Sassoon Sons & Co.	英	1845 年
祥泰洋行	Rathbone Worthington & Co.	英	1845 年
旗昌洋行	Russell & Co.	美	1846 年
利名洋行	D.Remi	法	1848 年
泰和洋行	Reiss & Co.	英	1849 年
和记洋行	Blenkin Rawson & Co.	英	1850 年前
广隆洋行	Lindsay & Co.	英	1850 年前
公易洋行	Mac. Vicar & Co.	英	1850 年前
华记洋行	Turner & Co.	英	1850 年前
太平洋行	Gilman Bowman & Co.	英	1850 年前
客地利洋行	Hargreave & Co.	英	1850 年前
公平洋行	Sykes Schwabe & Co.	英	1850 年前
琼记洋行	Augustine Heard & Co.	美	1850 年前
啤地玛洋行	Wetmore & Co.	美	1850 年前
丰茂洋行	Watson & Co.	英	1850 年前
浩昌洋行	Sillar Bros.	英	1850 年前
名利(隆茂洋行)	Mackenzie Bros. & Co.	英	1850 年前
森和洋行	Wolcott Bate & Co.	美	1850 年前

李百里洋行	Thos. Repley & Co.	英	1850年前
同珍洋行	Bull Nye & Co.	美	1850年前
裕记洋行	Dirom Gray & Co.	英	1850年前
顺章洋行	Pestonjee Framjee Cama & Co.	帕西 (印度祇教徒)	1850年前
复沅洋行	F. S. & N. M. Langrane	帕西	1850年前
天长洋行	W. R. Adamson	英	1850年前
得利洋行	James Mc Donald	英	1850年前
泰昌洋行	Dimier Bros. & Co.	英	1851年
火柏洋行	James Hooper	英	1851年
祥记洋行	Amroodeen Jofferbhoy	帕西	1851年
广昌洋行	Cowasjee Pallanjee & Co.	帕西	1851年
架记洋行	Cassumbhoy Nathabhoy & Co.	帕西	1851年
广孚洋行	Eduljee Framjee Sons & Co.	帕西	1851年
广兴洋行	Dhurmseey Poojobhoy	帕西	1852年
宝文洋行	James Bowman	英	1852年
咸享洋行	Khan Mohammed Aladinbhoy	帕西	1852年
利兴洋行	Thos. Platt & Co.	英	1852年
裕泰洋行	Dallas & Co.	英	1852年

资料来源：根据1852年英文《北华捷报》汇编。

早期的洋行，几乎都是英、美洋行。一八五二年四十一户中，英商洋行有二十七户，占上海洋行总户数的三分之二，从属于英帝国的帕西洋行八户、美商五户、法商一户。英商洋行势力最大，“他们作为进口商和出口商，直接经营的进出口商品，大约



占有全数的三分之二。”④一八四八年开设的法商利名洋行，《北华捷报》称它是钟表商(Watch Merchant)。德商洋行直到一八五五年才开设一家鲁麟洋行(Wm. Pustan & Co.)，一八五六年开设一家禅臣洋行(Seimssen & Co.)。

### 商人领事“二位一体”

早期西方一些国家的驻华领事大都由商人充当。在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上海除英国领事是正式政府官员外，其他国家的领事都由洋行商人兼任。如旗昌洋行大班华尔考(Henry G. Wolcott)、克雷斯乌(Criswold J. N. A.)和金能亨(Edw. Cunningham)，先后担任美国领事，金能亨还兼任瑞典和挪威领事，法国利名洋行职员爱棠(B. Edan)一度担任法国领事，宝顺洋行大班比尔(F. C. Beale)是葡萄牙和荷兰领事，怡和洋行大班波斯乌(Alex Percivel)是丹麦领事，广隆洋行大班浩格兄弟(Wm. Hogg 和 James Hogg)是汉堡(Hamburg)、卢卑克(Lubeck)和不来梅(Bremen)领事，广沅洋行大班金氏(D. O. King)是普鲁士领事，旗昌洋行职员劳瑞欧(Loureiro P. T. S.)是西班牙领事等，⑤他们既是进出口商，又是具有条约特权的外交官。这些按照条约“专理商贾事宜，与各该地方官公文往来”的领事官，原来就是洋行的商人。裁撤了“行商”〔注〕后，担保外国商人不违法走私、“清楚交纳货税饷钞”的领事官，也是洋行的商人。李鸿章也说：“上半天勾通作弊之商人，下半天即可亲自赴

〔注〕行商，即十三行商人，又称“保商”，是广州一口通商时期负责管理外商在华活动、保证交纳税钞的垄断官商。

道署商办公事，此日到关受罚之商人，即明日道台来拜之领事。”<sup>⑥</sup>清朝官吏平日诚惶诚恐，对外国领事连碰都不敢碰一下，那么这些商人领事理所当然地更加嚣张不法，为所欲为了。

### 洋行的两种类型

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英国纺织工业发展起来以后，虽然已经引起贸易方式和商品结构等一系列变化，但总地来说，仍然没有完全摆脱早期商人资本的原始落后状态，新的产业资本的商品侵略和旧的商业资本的原始掠夺处于交叉进行的状态。洋行贸易仍以鸦片输入和丝、茶、白银输出为其主要经营内容。进口鸦片一般接近上海进口商品总额的四分之三，而棉毛纺织品、杂货和南洋输入的商品总共只占四分之一多些。怡和、宝顺、旗昌、广隆、琼记、沙逊等英美洋行和架记、顺章、广昌等帕西洋行是经营鸦片的主要洋行。这些洋行都是东印度公司垄断时期即在广州从事“港脚贸易”(Country Trade)[注]的老牌洋行，从私贩鸦片发财致富，积累了庞大资金。随着时代的发展，又同英国纺织集团相结合，贸易占绝大比重，拥有很大势力。另外一些洋行，如公易、义记、泰和、丰茂、祥泰、和记、公平、李百里、裕记等洋行，一般都以经营纺织品为主。这些洋行都是东印度公司在华垄断结束和鸦片战争后来到中国的，规模较小，户数较多。一八五三年太平军进入江南、上海纺织品市场停滞时，公

[注] 据《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作者格林堡称：“印度、东印度群岛同中国之间的贸易，从十七世纪末叶起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汽轮出世为止，都叫做‘港脚贸易’(Country Trade)……不论是本地人还是欧洲人经营的。”

易等十四户洋行上书英驻华商务监督，要求进口货物于售出后再行付税。呈文中开宗明义就说：“我们是以承办制造品输入为特点的商人。”又说：“本呈文的具名人是代表大多数和接受大部分英国制造品输入本港的代理商。”还说：“鸦片并不为那些热中于兰开夏(Lancashire)和约克夏(Yorkshire)贸易者所普遍经营。”<sup>①</sup>为了对洋行经营业务有个比较清楚的概念，举一八五一年各洋行经理的进出口船货列表如下：

洋行名称	国别	进港船数	进口装载货物					出港船数	出口装载货物				
			鸦片	棉织品等	杂货	空船	其他		金银	丝茶	杂货	空船	其他
怡和	英	25	18	2	2	3		28	6	9	2	10	鸦片1
宝顺	英	25	17	4		4		26	6	10	2	8	
旗昌	美	34	8	2	7	13	檀香木3 煤1	36	3	14	11	7	谷物1
广隆	英	16	5	4	4	2	米1	20	1	15	1	3	
琼记	美	12	3	2		6	皮毛1	11	2	8		1	
广沅	英	17	1	2	6	5	糖1、米1 木材1	16		9	4	3	
沙逊	英	2	2					2				2	
顺章	柏西	4	3			1		2	1		1		
公易	英	12		7	2	2	檀香木1	11		7	1	3	
和记	英	8		1	2	3	糖2	8		6	1	1	
同珍	美	8		3	2	3		7		7			
仁记	英	7		4	1	1	糖1	7		7			
客利地	英	7		4		2	糖1	9		9			
李百里	英	4		3		1		4		4			

公 平	英	4		2	2			7		4	3	
华 记	英	4		2	1	1		4		4		
啤地玛	美	3		1	2			3		2		1
森 和	美	6		1	2	3		7		4	3	
太 平	英	3			3			3			1	1 陶器 1
义 记	英	2				1	糖 1	2		1		1
隆 茂	英	2		1	1			3		2	1	
泰 和	英	2		1		1		3		3		
祥 泰	英	1		1				2			2	
裕 记	英	1			1			2		2		
大英轮船公司	英	1	1					2			2	
W.M. Davison		1				1		1			1	
丰 茂	英	1				1		1		1		
广 昌	帕西							1			1	
其 他		15			3	10	石 1 家具 1	10			6	3 硝 1
共 计		227	58	47	41	64	17	238	19	128	43	44 4

资料来源：根据 1851 年《北华捷报》每期登载的《进出上海港口船期报告》汇总编制。

怡和、宝顺、旗昌是三大鸦片贩子。一八五一年，上海进口货物总值一千六百三十一万元，其中鸦片一千两百万元，占百分之七十四；棉毛织品、杂货共四百三十一万元，占百分之二十六。<sup>⑥</sup>按照上表，这年进港的鸦片船共五十八艘，其中属于三大洋行经理的有四十三艘，如按鸦片进口总值平均估算，每船二十万六千九百元，计八百九十万元，占鸦片进口的百分之七十四。

进港的其他商品共一百零五船，属于三大洋行经理的有二十一船，如按其他商品总值平均估算，每船四万一千元，计八十六万元，占其他商品进口总值的百分之二十。仅鸦片一项，三大洋行进口的货值即达上海进口商品总额的百分之五十五。如果包括其他商品在内，三大洋行的进口额占上海进口商品总额的百分之六十。输出的情况同样如此。一八五一年，洋行从上海运走金银（主要是白银）十九船，其中属于三大洋行的即有十五船，占百分之八十；丝、茶、杂货五十船，占百分之三十。

### **商人与船东一体，代理行兼营保险银行业务**

洋行的经营方式，以代理为主，兼做自营贩运。在港脚贸易时期，从印度大商号的随船大班（船货管理员）转化为常驻广州代理的洋行商人，开始时都称代理行（Agency House），它的业务主要是代理印度商号买卖货物，同时自己就便做些冒险生意<sup>①</sup>（即自负盈亏的生意，英文称 Speculation）。二三十年代，洋行从贩运鸦片中发了财，本钱多了，以后就经营自己的船队，<sup>②</sup>自己经营冒险生意就成为比较平常的事情。英国纺织业发展起来以后，它们把剩余工业产品运到中国，委托洋行代销，洋行的代理业务更为广泛。

英国是距离中国极其遥远的国家，当时苏伊士运河尚未凿通，海上交通全靠几百吨大小的帆船，绕道好望角来到中国，每一航程就需要半年时间。由于交通阻隔，洋行的代理和自营业务并不限于进出口商品贸易，同时兼营航运、保险和金融汇兑。这种一揽子无所不包的经营方式，是早期贸易处于低水平

下,分工较粗的必然现象。在这种经营方式下,代理内容更为广泛,举凡代购、代销货物,承保票据、证券或其他契约,代办汇票,代人租船,买卖船只,代收进出口运费,保险、理赔,代收债款,代管财产,转运货物等无不代理经营。远隔重洋,市场消息如此隔膜,这批最早到上海的冒险商人都可以从其中取得操纵居奇之利。

试举洋行代销鸦片为例:

印度鸦片的货主大都是帕西或印度本地商人。他们委托怡和等大洋行运至中国代售,由洋行按每一百西班牙银元合两百十卢比的折合率,照发票价预付货主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货价按在中国售得的银元计算。假如一箱鸦片售价为七百元,则洋行代理销售,每箱收入如下:

1. 佣金 3 %	\$ 21.00
2. 墨西哥银元折西班牙银元贴水 5 %	\$ 35.00
3. 按每百元 225 卢比购买印度汇票(与 上述每百元 210 卢比差价)	\$ 50.00
4. 汇款佣金 1 %	\$ 7.00
	共计 \$ 113.00

另外洋行用自己的飞剪船装运鸦片,收取高昂运费,和代理保险收取的佣金都未计在内。但是事情还不止于此,洋行赚钱的花招甚多。形式上虽然同委托户结清账目,实际上它们往往把这批鸦片作为自己的货物,每箱抬高一百元或再多些售出,收进的是纹银,还可以拿到百分之二到三的贴水。按照这样的做法,怡和洋行在短短的一二十年间,股东分红达三百万元之多,

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sup>①</sup>

### 洋行的冒险活动——贩卖鸦片、 走私偷漏、非法沿海贸易、掠卖人口

万里迢迢，远隔重洋到中国来的都是一些冒险商人和流氓。他们憧憬着这个初被打开海禁的富饶帝国，企图冒险寻找发财机会。他们依仗特权势力，在本国领事包庇下，贩卖鸦片，走私偷漏，进行非法沿海贸易，掠卖人口以至抢劫烧杀，无所不为。现分述如下：

一、武装贩运鸦片。鸦片战争后，香港代替了早期的伶仃<sup>〔注〕</sup>成为洋行走私鸦片的大本营。洋行把鸦片从印度运到香港，囤聚在香港的鸦片趸船上，然后随时从香港分运到中国沿海各地销售。象怡和洋行七百吨的霍尔曼·罗曼济号（Horman Romanjee）和宝顺洋行的约翰·巴里号（John Barry）终年停泊在香港。从事这项肮脏冒险生意的洋行，都拥有一支海盗式的武装船队。船只先进，人员充足，武装齐备，各种船只有着完密的分工，据《中国飞剪船》著者拉巴克说：“一种，是从印度载运鸦片到香港，装到各大洋行停泊在香港的趸船上；第二种，是专门把储存在香港趸船上的鸦片分运到各通商口岸；第三种，是把鸦片从香港运到中国沿海不准通商的城镇港口销售，这类鸦片船最为凶狠，因为它们要出没在生疏未经探测的港湾，同陌生的中国土棍打交道，还要对抗清政府官船的缉捕；第四种，是停

〔注〕 伶仃系广州虎门外伶仃洋面上鸦片的集中点，鸦片战争前，走私鸦片一般是先运到伶仃，卸入泊在伶仃洋面的鸦片趸船上，然后走私进口。

泊在沿海各港口外面的鸦片趸船。”<sup>②</sup>前三种都是一两百吨或三四百吨的优质小船,因为运载的唯一货物是鸦片和白银,没有使用大船的必要。船上的水手船员都是重金罗致来的亡命之徒。举怡和洋行两百八十三吨的兰立克号(Lanrick)为例,据《中国》的作者马丁说:“这条船是由一位自有航海活动以来胆量最大、技术最熟练的海员驾驶,……装备着发射九磅炮弹的长炮和枪支等全副武装。这种船使我想到十七八世纪经常出现在南美洲的海盗。”<sup>③</sup>宝顺洋行的伊蒙特号(Eamont),“每侧配备着四门能发十八磅炮弹的大炮和两门旋转炮。”<sup>④</sup>一个鸦片飞剪船上的船员说:“我们有充分的准备和……中国人较量一番,一两艘官船决计把我们赶不出航线。”<sup>⑤</sup>

上海开埠时,约三至六艘鸦片趸船停泊在吴淞口外洋面已有一年之久了,售出了八千箱、近六百万元的鸦片。<sup>⑥</sup>上海开埠后,吴淞口外的趸船经常有八至十艘,趸船的名称和所属洋行的名称,报纸上公开登载,毫不避人耳目。一八五〇年各期《北华捷报》登载的鸦片趸船如下<sup>⑦</sup>:

复兴号 (Emily Jane)	427 吨	属于宝顺洋行	英
元发号 (Folk Stone)	406 吨	属于怡和洋行	英
顺利号 (Science)	388 吨	属于旗昌洋行	美
开沅号 (Mastiff)	148 吨	属于沙逊洋行	英
和利号 (Snipe)	176 吨	属于琼记洋行	美
威廉第四 (William IV)	176 吨	属于广隆洋行	英
广南号 (Clown)	152 吨	属于广南洋行	帕西
英昌号 (Masteu)	236 吨	属于架记洋行	帕西



(Time)	110 吨	属于顺章洋行	帕西
威廉 (William)	130 吨	属于太平洋行	英

往来于香港上海的鸦片飞剪船经常有一二十艘，每年共行驶五六十船次。以一八五一年为例：怡和洋行一百六十三吨的马济帕号 (Mazeppa)、一百五十一吨的沃达克斯号 (Audex) 和一百四十七吨的埃欧那号 (Iona)，共装运鸦片十八航次；宝顺洋行一百九十五吨的海岛女皇号 (Island Queen)、一百零六吨的纳姆夫号 (Nymph) 共装运十七航次；旗昌洋行三百七十二吨的羚羊号 (Antelope) 装运鸦片八航次等。<sup>⑧</sup> 所有鸦片船都不直接开进上海港口，它们先在吴淞口外把鸦片卸到趸船上，然后空船进港报关。上海本地土棍同洋行谈妥生意后，凭洋行开出的鸦片提单到吴淞趸船提货，自行运回上海。这些鸦片贩子，依仗领事包庇，勾结地方官吏，“贩卖鸦片和吸食都是毫不避人，……整箱整箱的鸦片在街上运来运去”<sup>⑨</sup>，“而且是唯一不受检查的进口货物”<sup>⑩</sup>。

鸦片走私的发展如此迅速，到一八四七年，就是上海开埠后的第四年，洋行在吴淞趸船上售出的鸦片已达一万六千五百箱。这个数量比一八三〇年以前的任何一年输入全国的还要多。从一八四七年到一八五六年，不到十年，从上海输入的鸦片增加了一倍。见下表：

1847 年	16,500 箱	1852 年	27,358 箱
1848 年	16,960 箱	1853 年	20,757 箱
1849 年	22,981 箱	1854 年	25,133 箱
1850 年	19,498 箱	1855 年	28,727 箱

1851年      22,596箱                      1856年      33,572箱

资料来源：以上前三年出自《Return of the Trade of the Various Ports of China for the Year 1849》，p.50。后七年出自《北华捷报》《上海年鉴》(Shanghai Almanac)。

二、商品的走私和偷漏。禁止进口的鸦片要走私，准许纳税进口的商品，尽管协定税率已经很低，洋行走私和偷漏仍极猖獗。中国法律和条约规定一概被置之不理，有时是一伙人用强力破坏港口章程，但比较更常见的却是本地官厅同外国人之间的行贿串通。<sup>②</sup>吴淞口外的趸船是走私的大本营。大量的丝、茶先用小船偷运到吴淞趸船上，洋行商船于结关后，再驶往吴淞载运出口。或者在进港以前，先把私货卸到吴淞趸船上，然后开进上海港报关。用以多报少、高税率报低税率等办法来偷漏关税也是极其普遍的。如丝，通常以包为计量单位，洋行往往把两包打成一包，按一包付税，偷漏关税一半。<sup>③</sup>印花布(chintz)规定每匹付税两钱（约合两角八分），不合销的花布、色布(colour and fancy cotton)规定每匹按值付税百分之五，洋行往往把印花布报成不合销的花布、色布，实际上应付两角八分税款的只付一角。一八五二年一至五月初的四个月期间，洋行呈报进口的印花布共八百五十四，而实销则有两万五千匹，不合销的花布、色布，呈报的进口数量则不下三万九千匹。<sup>④</sup>上海海关自道台以下，对于这种不法行为都视若无睹。<sup>⑤</sup>当时由于洋行之间的矛盾，两起走私案件被公开在报纸上披露出来。一起是一八五〇年怡和洋行利用吴淞走私方法，走私六百九十九包价值二十四万元的生丝，结果仅处以两百元的罚款。<sup>⑥</sup>另一起是一八五一年公平洋行装载四十五万八千六百五十一磅茶叶结关开往伦

敦,发现有二十五万七千两百五十一磅未经报税,也仅责令加倍付税,另课一百元罚金。但是货主却提出抗议,说:“走私惯例,是中英当局一向纵容不管所造成的。”<sup>⑧</sup>既成惯例,走私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了。一八五三年上海小刀会起义,外国领事拒绝清政府行使海关职权,洋行走私更为疯狂,整船整船的丝、茶和进口货物不付关税,公开进出上海港口。

三、非法的沿海贸易。五口通商以后,洋船不顾中国法令,任意往来中国沿海各口,从事航行和贸易活动,这种活动,到五十年代进一步发展。一八五一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外国商船有三十一艘,到一八五五年增加到六十四艘,一八五七年更增加到一百三十三艘。从上海开往其他沿海口岸的商船,增长速度更快。请看下表:

年 份	上海进港船只及来自地区										上海结关出口船只及开往地区									
	进 港 总 数	英 国	美 国	香 港	澳 洲	印 度	南 洋	中 国 沿 海	其 他	日 本	高 港 总 数	英 国	美 国	香 港	澳 洲	印 度	南 洋	中 国 沿 海	其 他	日 本
1851	227	32	40	87	5	6	23	31	3		238	71	35	70	12	3	17	28	2	
1852	218	25	39	88	9	11	20	21	5		216	60	47	61	16	3	14	15	—	
1855	353	30	23	152	24	4	41	64	15		363	75	30	106	14	—	16	109	13	
1857	495	43	17	216	13	8	60	133	5		492	42	22	133	2	2	41	236	14	
1860	652	96	34	141	12	0	19	180	39	131	629	33	16	160	1	1	13	239	21	145

资料来源:根据各年《北华捷报》每期《进出上海港口船期报告》汇编。

这种沿海航运和贸易更扩大到条约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从中国沿海开进上海港口的一百三十三艘船只中，有八十艘是从非通商口岸进港的，其中从汕头到上海的有六十二艘，台湾岛的旗后（今高雄）、台湾（今台南）、淡水、基隆都是外国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

四、残暴的人口掠卖。洋行掠卖人口更是惨绝人寰。它们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香港、澳门、南澳、厦门等地，公开诱拐绑架人口，运往南北美洲新开发的地区作为“苦力”出售。上海情况也不例外。黄均宰所著《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租界地），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sup>①</sup>

五口通商后进入上海的洋行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还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sup>②</sup>当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实行“行商”管理制度时，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曾叫嚷说：“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sup>③</sup>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商业法典，但是进入上海后展开的商业活动，却是灭绝人性的贩卖毒品、掠卖人口、走私偷漏、到处流窜，成为真正野蛮人的商业法典。

---

①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282. ② 《Return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 Amoy &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8》, p.46.

③ 根据1851年《北华捷报》汇编。 ④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27～628页。 ⑤ 《北华捷报》历年所载《上海外侨人名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⑥ 李鸿章撰：《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四，第12页。 ⑦ 《北华捷报》，1853年9月3日。 ⑧ 《北华捷报》，

1852年7月3日。 ⑨ 怡和洋行的孖地臣1819年同伊里萨里签订合伙契约时就订明“合伙人的意图，主要是专心经营代理业务，不过并不排除在当地做些安全的投机生意(即冒险生意)”。见格林堡著、康成译：《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135页。

⑩ 1837年怡和洋行的资本已发展到261.3万元，其中大部分用在船队和鸦片进货上，这个时候行号是个大投机户(即自负盈亏的商人)。怡和洋行于1836年已经有了壮士号、阿斯丁号、扬格少校号、海叶斯夫人号、红流浪者号、芬莱总督号、希腊号、奥秘加号、查顿号、哈丽号、维纳斯号、珊瑚号等12艘各种类型的船所组成的一支船队。见格林堡著、康成译：《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128~133页。 ⑪ R. M. Martin: 《China: Political, Commercial & Social》, p. 257~258.

⑫ Basil Lubbock: 《The China Clippers》, 1922年版, p. 7. ⑬ R. M. Martin: 《China: Political, Commercial & Social》, p. 259. ⑭ Basil Lubbock: 《The China Clippers》, 1922年版, p. 33~34. ⑮ 泰勒·丹涅特著、姚曾虞译：《美国人在东亚》, p. 111. ⑯ J. K. Fairbank: 《Trade &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p. 229. ⑰ 《北华捷报》，1850年10月10日。 ⑱ 《北华捷报》1851年各期《进出上海港口船期报告》汇编。 ⑲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09页。 ⑳ J. Scarth: 《Twelve Years in China》, p. 297. ㉑ 莱特著、姚曾虞译：《中国海关沿革史》，第44页(1857~1859年额尔金出使中国及日本有关通讯汇编)。 ㉒ 《北华捷报》，1852年5月15日。

㉓ 莱特著、姚曾虞译：《中国海关沿革史》，第446页。 ㉔ 《A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P. & O. 1837~1937》, p. 103, 《北华捷报》，1851年7月1日。 ㉕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 334. ㉖ 摘自丁名楠等著：《帝国主义侵华史》卷一，第62页。 ㉗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一书中恩格斯《英国对华的新侵略》。 ㉘ 格林堡著、康成译：《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165页。

① 莱特著、姚曾虞译：《中国海关沿革史》，第446页。 ② 《A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P. & O. 1837~1937》, p. 103, 《北华捷报》，1851年7月1日。 ③ Lanning &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 334. ④ 摘自丁名楠等著：《帝国主义侵华史》卷一，第62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一书中恩格斯《英国对华的新侵略》。 ⑥ 格林堡著、康成译：《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165页。

# 汇丰银行及其买办漫记

许彦飞

汇丰银行是建国前英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的总枢纽，自一八六五年成立到上海解放八十多年间，它操纵着中国政府的各项对外借款，保管关税盐税，垄断国外汇兑，置中国整个财政收入于其监督控制之下，而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中国的财政总管，而买办又是它的得力助手和帮凶。本文仅就建国后组织座谈时市民建和市工商联所提供的资料，参酌中外文献，加以整理，不足以概全貌，故曰漫记。

## 一、汇丰银行的创立和惊人利润

英帝国主义于一八四一年占领香港后，随着对华经济侵略的扩展和港沪间汇兑业务的日益频繁，原有麦加利等银行不能满足需要，于是汇丰银行应时而起。当时英国人苏石兰勋爵(Sir Thomas Sutherland)发起组织“香港上海银行有限公司”(Hongkong &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在港注册，并采取“国际合作”方式(集股不分国别)，除英商外，投资者尚有德、美、法、波斯等国商家，推法国人克雷散为第一任总经理。后因各国投资者利害不一致，德、法等国商人先后退出，逐步成为英国商行的独占金融机构，在远东的英商十大洋行中的旗昌

(后由美商经营)、怡和、太古、沙逊、蓝特尔等洋行均在该行董事会中占有董事名额。一八六六年，该行华文名称改为“汇丰银行”。一八七五年以后，该行业务从经济范围扩展到政治范围，承揽政治借款，代收战争赔款，后又增设“伦敦委员会”为最高管理机构，负责监督指导行务。从此，它的性质表面上虽仍为商业银行，实际上已成为英政府控制下的一个垄断金融组织。

汇丰最初的资本为港币两百五十万元，一八七二年增为港币五百万元，一八九一年增为一千万元，一九〇七年再增为一千五百万元。一九二一年股东大会决议增资为五千万元，实收十六万股，每股港币一百二十五元，合计两千万元。除一八七四年和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未发股息外，一九一三年以前，每股上半年发息两先令，下半年发两镑三先令，另外分红五先令。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九年，每股每年所发利息和红利合计在五镑左右，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八年达八镑左右。每股股金港币一百二十五元折合英金十八镑，而发息八镑，月息达三分七厘。一九二二年共发股息一千万元，等于股本的半数。这种惊人的超额利润，都是从中国人民的身上剥削去的(以上数字根据汇丰银行英文年报)。

## 二、汇丰银行的经济侵略活动

汇丰银行进行对华经济侵略，主要是凭借不平等条约，控制进出口贸易，操纵外汇，垄断铁路借款和政治借款，进而控制中国的关税、盐税，运用中国人的资金赚中国人的钱。

汇丰在业务上的主要收入是操纵外汇。当年中国采取银本

位制,全银兑换率变动极大,汇丰银行设有电报间,每日从世界各大都市拍来行情密报,消息异常灵通。大班(经理)清早到行,先到电报间查阅密电,了解世界各地的汇兑行情,然后根据上海市场的需要,定出汇兑价格,于上午九点钟挂出汇兑牌价,这时不但中外银钱业都要以汇丰牌价为准,就是上海金业交易所,每天也要看到汇丰牌价后才能决定开盘行情。外人一针见血地说,每逢汇价一缩再缩的时候,汇丰大班只要在挂出汇兑牌价的时间上稍许压一压,就能赚到大笔钱,足够建筑一间大厅。

旧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向来都操在洋行手里,尤其是英商怡和、太古、沙逊和早期的旗昌等行,它们都同汇丰有密切的关系。就进口贸易说,华商如要向英国采办货物,大都通过上海英商进口洋行同伦敦出口商行接洽,将货物单据凭证向汇丰做押汇运沪,货到之后存在汇丰仓库,将货价折成规银,华商用十天期庄票交付进口洋行转解汇丰,提取货物。庄票由买办盖章负责,汇丰收票之后,折成英镑,汇寄英国出口商行,由它们坐收其利。就出口贸易来说,也要经上海洋行同伦敦进口商行接洽,由英国商行出具汇票,汇存上海汇丰银行,后者允许在一定限额内透支,规定利息八厘;上海出口洋行逐日用透支款项在市场收货,迨货物收齐后,即包装交与轮船公司运输出口。洋行以信用向汇丰透支之款均为规银,其对伦敦所出的汇票则为英镑,在进出口贸易中,无论规银折英镑或英镑折规银,都要经过汇丰之手,汇丰从中操纵汇价,剥削中国商行,中国商行又把这一剥削转嫁到消费者及广大农民身上。

根据以上情况,不难看出,英国对华贸易额越大,汇丰银行



所得利润也越多。汇丰掌握对华贸易，是从印度贩运鸦片为起点，当时上海沙逊洋行专营此项非法交易，汇丰银行为了承揽鸦片垫款，从中牟取汇兑利润，曾订出章程，呈请清廷北洋大臣批准，取得垄断专利。兹录汇丰银行大班网密郎·鲍韦士光绪七年十月十九日（一八八一年十二月十日）为揽办洋烟（鸦片）垫付银款呈北洋大臣李鸿章文中所列条款如下：

一、中国在印度购买洋烟，所有价银均由汇丰银行垫付，其款在中国各口由承办洋药之人，随时算还。

二、从在印度垫付银款之日起，至中国拨还之日止，按照月日扣算利息。

三、按年每本银百两，行息七两。惟利息时价不同，如中国可以七厘为定价，汇丰亦愿遵办。

四、中国揽办洋烟，在印度垫付之款，自必甚巨，至于洋烟装载上船，起存各处栈房，并在各口招商购买，银行分应帮同办理之事，亦极繁琐，故七厘之息实不为多。现在英商购烟垫借款目，所行之息亦不能较此便宜，惟此项生意极巨，七厘之息，银行已可酬劳。

五、在印度垫付之款为罗贝，在中国收回之款为银两，其罗贝之价随时不同，中国如欲定一划一之价，应照时价算账，均无不可，汇丰并不因之取利，因七厘之息已有盈余。

六、在印度垫付银两之日起，至中国各口拨还之日止，大概以四个月为率，然借款之或久或暂，听凭中国为主。

七、中国国家日后如派有总办洋烟事务之员，无论华员洋员或系认派之公司，汇丰银行均愿遵照以上章程办理。

八、洋烟公司未经定议之先，彼此均宜秘而不宣。

九、此事是否按照以上章程办理，敬候核示遵行。

一九一七年三月鸦片贸易根据国际协定被停止后，汇丰掌握控制下的进口贸易，改以工业制成品为主，出口贸易则为中国土产原料，汇丰本身仍然从汇兑上攫取巨额利润。

汇丰银行一向以操纵外汇为其经常业务，同时为英国外交部提供中国的经济情报。北京汇丰银行大班赫利(E. G. Hillin)是个中国通，穿了清政府的袍套，戴着朝珠朝帽，红顶花翎，头上还装上一根假辫子，除面目肤色不能改变外，看上去俨然是个中国的大官僚。后来眼睛瞎了，每天仍要华员读中国报纸给他听。赫利死后，上海行派盖世尔(Cassal)继任(汇丰银行总行在香港，上海是较大的分行，管辖北京、天津等分行)。盖在中国多年，不但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并且还能看中国的报纸。北京大班是不管业务的，专以结交官场为任务，其处心积虑可想而知。

由于汇丰熟悉中国政治和商业情况，在金融界又拥有巨大的势力，所以在英国对华经济侵略的政策上，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英政府对华借款多由它居中策划。一八九八年以前，汇丰银行与德华银行订有协议，共同经营中国铁路借款，后因李鸿章同帝俄订立密约，排除英国在东北的势力，英国为了抵制俄、德两国，授意汇丰银行同怡和洋行合组中英公司(British and Chinese Corporation)，后又改组为中华铁路有限公司(Central Chinese Railways Ltd.)，承办铁路借款，发行铁路债券，购买铁路材料，承包建筑、修理等工程，所有资金均由汇丰银行

负保管之责。

英国对华的政治贷款在一八七〇年前后，由汇丰承贷过一次五百万两，指定以盐税收入为担保。以后续有贷款，大都由汇丰经手收付，均以关税作抵，如一八七四年的六十万英镑贷款，一八七七年的—百六十万英镑贷款和—百九十四万九千两规银的八厘贷款，一八八—年的四百三十八万银元贷款，一八八五年的一—百五十万英镑贷款和七十五万英镑的六厘贷款，一八八六年的七十六万两规银的七厘贷款，一八九四年的—千万两规银贷款，一八九五年的三百万英镑贷款等。

中日甲午战争后，汇丰在华势力愈益膨胀。为了垫付中国赔款，它同德华银行合作，两次垫贷三千二百万英镑，第一次年息五厘，期限三十六年；第二次年息四厘五，期限四十五年，均以关税收入为担保。自—九——年起，中国关税收入全部存入汇丰银行，要由英籍总税务司签字才能提取。—八九八年，德国曾要求以德国人继英国人赫德之后任总税务司，英国大起恐慌，乃以英国在华商务最大为理由，胁迫清政府承认总税务司必由英籍人担任。从此，汇丰经手的各项政治贷款有了更加确切的保障。—九〇五年又贷—百万英镑与清政府，年息五厘。—九—三年五国银行团提供袁世凯两千五百万英镑善后大贷款，以盐税、关税作抵，设盐务稽核所，其副所长—职即由英国人担任，盐税收入也就存进了汇丰银行。这时，汇丰实际上已成为北京政府的财政总管，历任财政当局只有仰承它的鼻息，才能站得住脚。这—情况，—直继续到北伐战争前没有改变。

### 三、最初的两个买办

汇丰上海分行与香港总行差不多是同时成立的。行址原在南京路花园弄，即汇中饭店的旧址。一八七三年迁至外滩海关隔壁。

分行成立前，上海英商会德丰洋行大班麦克利得知在港英商有组设香港上海汇兑银行之议，认为这是个人发展的良机，拟即回国募集股金，筹设上海分行，以便捷足先得。他向该洋行买办叶吉庆借贷二千两银子作为回国旅费，叶与跑楼胡奎兰（一说是胡笛栏）商量之下，认为他的话未必可信，因此婉拒其请。麦失望之余，又去找三余钱庄跑街王槐山商量，王不谙英语，麦的中国话也讲得不好，但因平日业务上往来频繁，因此建立了私人交情。麦请筹借二千两银子，以便返国募股开办银行，言明六个月归还，王为人颇重情面，当即随口答应，但他本人资金有限，麦来取款时无从应命。麦再三声明，此去少则半年，多亦不出九个月，一定返沪，借款本利奉还，决不有误。王鉴于麦氏平日信用昭著，而且情不可却，乃挪用钱庄客户存款二千两借给他。不料麦氏一去年杳无消息，钱庄年终结账，发现王有宕用庄款情事，老板陈三余虽是王的舅舅，也因恪于店规，不便包庇，只得将王开除。王失业后生活十分贫困。两年后，麦克利在英国募集到五百万股金，来沪开办上海汇丰银行，到三余钱庄找王，知其因宕款被开除回乡，更觉歉然于怀，于是函电交驰，促其来沪。一见之下，即要王担任汇丰买办，并声明不要任何担保品。王初犹半推半就，舅舅陈三余表示全力支持，又邀请当时钱业能手俞晓

安、陈广延做他的业务助手，王才敢走马上任。王因得到洋大班麦克利的极端信任，库房钥匙均在其手，遂利用汇丰牌子，做洋厘生意，在汇丰全日收解中，了解到全市现银的存底，从而买进卖出，翻云覆雨，稳操胜算。

王在账房间雇用职员达两桌人，终日忙忙碌碌，全年进账约达十万两银子。他前后做了六年汇丰买办，赚了八十万两银子，真是平步登天，一帆风顺，当年做梦都不曾想到。此人头脑冬烘，封建意识极深，平日头戴红顶瓜皮小帽，脚穿粉底缎鞋，身着团花马褂，腰束纺绸带子，手持长旱烟管，每日在账房间里踱来踱去，活象个乡气十足的土老儿，没有半点洋账房的派头。年终谢财神，新正接财神，一切都保持着旧商店的习惯，在当时吃洋饭的买办中颇为突出。

王槐山吃的是洋饭，发的是洋财，但并不相信洋人能够长呆在上海。他说：“洋场十里繁华，好比戏文一出，锣鼓一停，就要曲终人散了。”所以他从来不肯在上海购置产业，除洋大班麦克利将其应得红利代购四万股（每股一元）自来水公司股票外，他没有一幢房子或一块地皮，把所有赚来的资财全部汇到家乡余姚买进田产，创建怀德义庄，一心一意要做一个乡下土财主。

同治、光绪年间，清廷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之后，由于军用浩繁，国库空虚，直隶总督李鸿章派人到上海向汇丰借款五百万两，麦克利要买办负责与之接洽。这是一笔大借款，王槐山一时没了主意，不借，怕触怒皇帝，首领难保；借吧，又怕将来不归还，倾家荡产也吃不起赔账。他和跑楼（副买办）席正甫商量应付办法。席认为这是送上门来的好买卖，但表面不向王说穿，只允承

代为处理。他随即代表王槐山到了天津，与北洋大臣签订了五百万两的借款合同，指定以盐税为担保，从中赚取回扣。这是一笔十拿九稳的赚钱生意，也是汇丰承揽中国政治借款的开端。后来李鸿章以王、席两买办襄赞借款有功，曾保授官职。但在那些日子里，王槐山因怕吃赔账而急得魂梦难安，竟然得了精神病，只得向汇丰提出辞职，麦克利挽留不住，派人把他护送还乡。过了三年中风死去，年仅五十三岁。

王生前将遗产托好友陈广延保管，并同陈合伙在余姚开设钱庄一所，王死后继续营业。王的堂侄王霭如在汇丰进口部任职，因赌博亏空行款，向陈借贷不遂，乃向王槐山之子王其庆进行挑拨，诬陈营私舞弊，侵吞叔父遗产。王其庆大闹要查账，结果陈只得将钱庄收歇。王其庆将王槐山存款划到宁波，开设康太花号，从事棉花投机，不到两年功夫，存款全部蚀光。幸尚存有自来水公司股票及田产，母子仍可维持相当富裕的生活。那知当时有个名叫卢伯祥的候补道，同清廷权贵有来往，谋署上海道缺，王霭如以任道署账房为条件，私下将自来水公司股票变卖（这时股票已大涨，超过票面甚巨），借钱给卢，结果王霭如的道署账房没有做成，而王槐山一生为帝国主义效劳得来的大量家产，至此荡然无存。

席正甫继王槐山之后为汇丰第二任买办。他是苏州洞庭山人，十九岁到上海做钱庄学徒，学会了几句洋泾浜英语，由其出继给舅家的弟弟沈吉成（老沙逊洋行买办，绰号沙逊阿四）介绍，进汇丰银行任跑楼之职，王槐山辞职返乡后，坐升买办。他并非富有，由王槐山垫款二万两作为买办间的周转资金，双方订

立合同，言明按期分派红利。王槐山死后，席并未履行合同分给红利。一九二九年，王槐山的家属找到这份合同，本拟向法院提出控诉，因席的孙子席德懋任中央银行业务局局长，同孔宋豪门有密切关系，不敢贸然打官司，乃托虞洽卿向席德懋说情，希望顾念旧情，予以照顾，但席德懋坚决不买账，结果不了了之。

席正甫做了几十年的汇丰买办，处处得心应手。他自办理清廷的第一次政治借款获得二品衔红顶花翎后，身价顿时提高，清廷大官僚如闽浙总督左宗棠、北洋大臣李鸿章等为了借款问题，每到上海，都要移樽就教，席也乐于效劳，从旁极力促成。左宗棠几次要保举他到北京户部任要职，席不愿改行做官，但与当时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往来极密。他在上海金融界、洋行界都很吃得开，儿孙袭其余荫，一个个扶摇直上。清廷创办的第一个银行——大清银行，其协理一职，就是由他的第三子席德辉充任，第五子席聚星和次子席友于先后任汉口大清银行经理和营口大清银行协理。他的胞弟沈吉成是以贩卖印度鸦片起家的英商老沙逊洋行的买办，其他外商银行的买办也大多与席家非亲即故，如三弟席缙华是有利银行的买办，胞侄席锡藩是麦加利银行的买办（后为华俄道胜银行买办），后任买办王宪臣（沈吉成之婿）是席正甫的侄女婿，正金银行买办叶明斋是席缙华的女婿，花旗银行买办王俊臣是王宪臣的胞弟，华比银行和三菱银行的买办胡寄梅父子也是席家的亲戚。那时席正甫真是上海金融界炙手可热的红人，只要他一点头，任何银行钱庄开一张十万两银子的本票，都可如期兑现。因此，上海钱庄为了取得支援，都要求他加入二毫半的股本，并且要用他所介绍的人做助手，在

上海银钱业中形成了所谓“洞庭帮”(俗称“山上帮”,席是洞庭山人)。当时有一句流行口语说:“徽帮人最狠,见了山上帮还得忍一忍。”

除钱庄外,席正甫还兼营金号、银楼、绸缎等业。据说发生“橡皮风潮”时,宁波帮陈逸卿投机失败,不少钱庄银行受到拖累,外资银行买办间也受了一定影响。为了处理这一问题,外资银行买办组织了一个公会,写信给外国大班,对于有关债务,他们保证清偿,但以两年为清理期限,要求在此期间不计利息。此项要求得到外资银行大班的同意,因此在橡皮风潮中,外资银行都未吃亏,受牵连倒闭的都是中国钱庄,席家在上海钱庄多有股份,要负无限责任,不免吃了一些“哑巴亏”。

席正甫于一九〇四年去世,汇丰买办一职由其长子席立功继任。初由谭海秋垫款二十万元担任副买办,席将垫款还清后,即与谭解约,改聘有利银行跑楼龚子渔任跑楼。立功死后,又由其长子席鹿笙继任,但鹿笙不务正业,终日寻花问柳,实际上由龚子渔负责,双方订有合同,鹿笙仅居买办之名,坐分红利。不久,鹿笙因争风吃醋为仇家暗杀,乃以龚子渔为买办。子渔死后,由其子星五继任。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发生,日军进占租界,龚星五恐库存客户押款黄金被掠夺,曾打电话催促押款人速来提取。不料行内有一汉奸,竟向日本海军司令部报告,诬蔑买办间职员王嘉铭私运黄金出行,日军即将王逮捕,非刑拷打,被释后疗养很久才复元。不久,英美籍侨民都被日军关进集中营,汇丰银行由日本正金银行接收,华籍职工都转为正金职工,龚星五也成了正金银行的买办。上海解放前夕,他去南美洲,买办一职



由其本家龚振方代理，龚在建国初期去了香港。

#### 四、买办的帮凶作用和发财秘诀

帝国主义者初来中国时，因言语不通和情况隔膜，不得不雇用中国人为其利益服役。英语买办一词 Comprador 来源出于拉丁文 Comparaorem，其意义是指西方人在中国开设商行的听差头子，葡萄牙文意则为采买。由于外国商行业务不断扩展，做进口要靠中国人推销，做出口要靠中国人到农村采货，因此买办就成为帝国主义者在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得力助手，地位不断提高。汇丰银行的买办虽然可以大发洋财，其实不过是从帝国主义大量剥削中国人的血汗中分尝余沥。

汇丰除执行银行业务外，在北京、天津两地开设分行，其主要目的是便于同中国政府打交道，刺探政情内幕，策划政治借款。洋大班固然要以中国通充当，华买办也以善于结交王公大臣、军阀官僚者为上选。北京分行第一任买办吴幼龄，就是这样一个手腕玲珑的角色。他同清室王公密切往来，有些王公常将自宫内偷出来的古董字画，通过他做借款的抵押品。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很多亲王贵族将稀世珍物一箱箱地寄存在汇丰银行，以保安全。这些古董文物，其中被洋人贱价收买偷运国外的为数不少。北京分行第二任买办邓君翔同北洋官僚潘复有交情，当总税务司安格联承认拨付关余发放“九六公债”息金时，潘把这个消息秘密告知邓君翔，邓即大量买进，不料安格联食言而肥，“九六公债”因到期不付息而行情惨落，邓投机失败，亏欠汇丰两百万元，汇丰大班念邓效劳多年，未加追究，这场风波才得平安

度过。同一时期天津分行买办吴懋鼎，也是一个交际能手，终日陪伴寓居津门的清室王公躺在鸦片烟榻上，吞云吐雾，伺候非常殷勤，因此颇得这些王公的欢心。他们常将大量赃款及从宫内偷来的古董字画变成现银托其代存，不要任何凭证。辛亥革命后，王公们有的病死了，有的逃亡失踪，于是这位黑吃黑的大买办就把无名存款一律收归己有，从中发了一笔大财。

上海汇丰银行买办间的正常业务，主要是对中国行庄做拆放生意。初期全凭信用，只要钱庄打一张庄票送来，由买办盖章负责，就可放款，两日一转，买办可以取得二厘半的佣金。自从橡皮风潮发生后，钱庄受累倒闭的很多，汇丰银行就提出要道契担保才能放款。放款利息，英国银行法规定不得超过八厘，但对殖民地及华人不受此法限制，因此买办间经手道契放款利息都在八厘之外，再加二三厘作为买办的佣金。钱庄打出五天或十天期的庄票，到期应将现金送到汇丰，每百两由汇丰贴送力五分。后来大都由买办间划账，不必送现金到行，五分送力仍由汇丰担负，也就成了买办间的一笔外快。此外，客户支票要由银两换银元或由银元换银两，照牌价有二厘差额，谓之“洋水”，算是买办间的“合法利润”。

到了席正甫做买办的时候，由于他长袖善舞，应酬广阔，拉到不少政府借款，洋大班对他颇为重视，因此他赚的钱也更多。中国是用银国家，汇丰银行经常从伦敦运进白银大条，每条重一千两，每次运到总有四五千条，摆在汇丰库房，当时有汇丰金银铺地之说，就是从此而来。此项大条成色较纯，交由买办间送到银炉，烱化铸成五十两一锭的元宝。每烱化一条，买办间就有千

分之一的手续费。银炉铸元宝时渗杂两分，铸成“九八规元”。席正甫开设的银楼，包揽了这笔生意，一年就有四、五万两银子的赚头。当时内地商人大多不谙英语，购买洋货不得不依靠掮客，而掮客没有身家字号，不能取得洋商的信任，也就不能先取货后交款，于是由钱庄出一庄票交掮客付与洋商，此项庄票解进汇丰银行，必须买办盖章负责，买办可以从中取得一定的手续费。如果买办自己开设钱庄，这票生意就可承揽到手，成为可靠收入。

汇丰银行的人事组织，大班、副班之下有大写、二写等职，写字间的职员均由大写选用，一律都是洋员，其中也有少数是葡萄牙籍的澳门人。买办间的职员则由买办雇用，一律都是华人。后来帝国主义者为了充分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写字间的职员亦逐渐以华员代替洋员，四个华籍职员的工资仅抵一个外籍人员工资。写字间的华员，虽不属于买办领导，但进银行必须由买办介绍，并负担担保之责。这样，买办又可上下其手，另辟生财之道。

以上所述都是汇丰早期的买办情况。后来，外国人在中国任职较久，情况摸得较熟，就不是那样依靠买办，而买办的身价步步趋于下降。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买办的地位更不如前，这是因为南京政府的历任财政部长如要进行政治借款这类勾当，可以单刀直入，用不着绕买办那个圈子。同时由于华资银行风起云涌，过去的钱庄业务大部分为银行所代替，旧式买办人物已不合需要，而以当权的所谓“高等华人”代之，坐在买办位子上的龚星五之流，只等于从前买办间的账房而已。

## 五、关于中国人存款

汇丰银行所吸收的中国人存款，其数目之大，骇人听闻。前清时代的王公大臣，民国以后的军阀官僚，争先恐后地将贪污赃款和克扣得来的军饷都存进汇丰银行，以为可以高枕无忧。在清末就发生过这样一个故事：

庆亲王奕劻将赃款一百二十万两银子秘密存进东交民巷汇丰银行，事为御史蒋式理所闻，上奏参劾，慈禧太后派军机大臣户部尚书鹿传霖彻查。汇丰拒绝将存款人名单宣布，当然查不出真凭实据，御史反而受了诬控的处分。上谕批示说：“该御史以毫无根据之词，率意陈奏，况事情重大，名节攸关，该御史着回原衙门行走，以示薄惩。”

外国人存款都以签名为凭，中国人习惯用印鉴，有的存款人既不谙洋文，也不愿用印鉴，就用相片代替，取款必须亲到，一旦身死，这笔存款就永远无人能够支取。而且买办间核对印鉴极为严格，稍有疑问即拒绝付款。外传汇丰有巨万存款无人领取，并非无稽之谈。本来银行存款人死亡而继承人并不知情，以致存款无人来取，中外银行都有这样的事情，不过汇丰所吸收的不可告人的“死款”特别多，所以就显得更加突出。

一九一一年以后，中国关税收入完全存入汇丰，每月二十日结算一次，届期公布本月所收关税数字，并将应付赔款结汇付给各国庚子赔款代收银行，余数则交还中国政府，后者称为“关余”。后来盐税因借款关系亦完全由汇丰保管。关税、盐税是旧中国政府的两项重要财源，在汇丰掌握之后，头寸周转有多无

少,所以对于一些小额存款满不在乎。因此,有些迷信洋人的财主,要把钱存入汇丰银行,还要托人介绍,才能开户。

华资银行为了要利用汇丰的牌子,经常将现银五万、十万地存在汇丰,目的在于周转头寸时,打出汇丰支票,显得更外有信用,这种存款汇丰是不给利息的。有的华资银行为了要汇丰买办间代为推广钞票,除给以一定的回佣外,同时还要存一笔保证金在汇丰,也是没有利息的。

上海汇丰银行前后曾发生过两次华人提取存款和挤兑钞票的风潮。第一次是一九一二年,这一天适值星期例假,汇丰大班非常狡狴,听了传闻之后,立刻要买办在市场上收购现洋,委托往来钱庄代为兑换,同时请求中国政府出面维持。当日上海都督陈英士出了一张布告,指出这次风潮是满洲奸细散布的谣言,企图破坏南方金融,晓谕居民毋得听信谣言,自相惊扰。因此,次日风潮即行平息。第二次是“五卅”惨案时期,市民激于爱国热情,拒用汇丰钞票,纷纷前往兑现。由于该行钞票在上海流通数目不大,兑现没有问题,但华人提取存款转存华资银行的为数甚巨,当时汇丰是受了一定影响的。

## 六、建筑新行址过程

汇丰银行自同中国反动政府发生借款关系后,营业蒸蒸日上,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二五年尤其是它的黄金时代,每年所获净利在数百万元以上,最高达一千三百万元。上海行为中国各地分行的领导行,规模最大,前后翻造过两次房屋,但仍不敷办公之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政府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对于海

外英资企业加征利得税二成。汇丰董事会为了逃避这笔税款，乃决定于一九二一年在上海重建新屋，提出盈余三千万到四千万作购地及建筑费用，由英商德罗建筑公司打样承造，造价一千万。这些外国佬也十分迷信，请中国阴阳先生选择了一个黄道吉日，于五月五日举行奠基典礼。破土后，在基地内放下中外金银货币数十枚，作为招财聚宝的吉兆。最滑稽的是，在大门正中顶上放了一块蓝底金字牌子，活象中国人的神主牌位，请当时上海闻人朱葆三、傅筱庵等毕恭毕敬地捧上去，同时军乐大奏，表示庆祝，仪式十分隆重。

该屋采用新型希腊式样，建筑朴素坚固，库房设备尤为远东银行界之冠。为了表示威武，特地仿照中国衙门的形式在大门两边置有铜狮子一对，一雄一雌，连同三扇铜质大门，就花了不少的钱。德罗公司既不相信中国建筑工人，又不能从英国雇人前来，于是在外国工头的监督下，以点工的方法剥削中国工人，引起罢工数次，以致工程旷日持久。从一九二一年五月开工，两年还未完成，最后还是请了中国建筑公司帮忙才告落成。一九二三年六月二十三日该行举行落成典礼时，柬邀中外来宾参加，该行总董蓝恩发表了一篇侮辱中国的演说：“深信中国将来有希望，商务必发达。今日中国政治及社会情形虽多可悲，致受外人之干涉，倘至必要时，则外国虽以武力为后盾亦无不可。盖非此不足以恢复中国之秩序，且为大多数受害之中国人所欢迎。鄙人深信今日可憾之情形，惟有各国可以救济。”（见一九三六年中华书局出版《上海研究资料》）

汇丰银行在我国各大城市如北京、天津、沈阳、哈尔滨、大

连、青岛、烟台、汉口、广州、汕头、厦门、福州等地都设有分行，大都是自己建造的房屋。日本投降后又在南京买了大块地皮，准备大兴土木，还没有来得及建筑，南京就解放了。

# 旧上海的洋行买办

杜 温 民

上海开埠以后，外商营业发达与其雇用中国买办有很大关系。盖买办者，外通各国之商情，内联各地之商贾，凡关于外商出入之货物，莫不极力经营，使外人坐收其利。当时各外资银行和轮船、保险等公司，莫不雇用买办，以经营业务，买办之实力，亦日益扩张，乃至成为一特殊集团，在我国近代历史上起了一定的作用。

## 一、买办之起源

最初外人来中国通商，对中国复杂的商业状况以及风俗、习惯等均不了解，又不谙华语，不能不雇用中国人之通晓商事者，使之负一切买卖上之责任。其后贸易日大，各通商码头开辟日多，各地商人见此职业获利独厚，乃争学外国语文，踊跃应雇。既有巨商大贾或知识分子乐充外人买办，于是买办成为专业，而为华洋贸易间不可缺少之人物。

## 二、买办之业务

买办业务，视洋商行号性质之差别而异。（一）洋商银行，各有其营业规则，对买办执行业务，规定不同，但关于中国之银两、



银元、银票、庄票、期票、汇单及票据押款等项，有真伪不辨及到期不兑者，均由买办负其责任。(二)轮船业，洋商以太古、怡和两公司为最大，其次则有鸿安、瑞记、大阪商船、日本邮船、大东汽船、湖南汽船、禅臣、美孚、美最时等公司，皆以运载货物为主，人载为副。其买办有两种：社内买办，管理所有轮船进出之货物，掌握社内事物之全权，称为总买办，另有船上买办，船各一人，经理运载各种货物，及船中一切事务。至搭人船票价格，本由公司核定，除太古、怡和两公司外，其他各船公司多统包于买办，每上下水一次，结算一次。(三)仓库多为轮船公司附业，乃货物屯集之所。昔日代民船存储货物之庄棧，皆狭小而不敷用，不得不自立仓库，以图货物装卸之便利，亦用买办监理货物出进，兼负保管之责。(四)一般洋行买办，业务极为复杂。盖洋行名称虽同，其实则大异。即就上海洋行言之，如纺织业之瑞昌洋行，杂货业之茂生洋行，拍卖业之元芳洋行，生命保险业之永年洋行，水火保险业之老公茂洋行，种类繁多，不胜枚举。行内规则，全由行主规定，买办虽总理行内事务及税关往来之货物，而执行细节，不能逾越行主所定规则之范围。

### 三、买办间之工作人员

买办业务浩繁，不得不雇用人员，以分担其事。雇用人数，以行号资本之大小、业务之繁简而定。今举上海外国银行买办使用之人及职务之分配为例，汇丰最多用五十人，麦加利、道胜各二十五人，德华、正金、东方、花旗均十数人，义丰、宝信、荷兰、华比皆在十人以下，分任跑街、鉴定货币、现金出纳、会计、文书

等事，所有工薪伙食各项开支，均归买办付给。其他各行号买办雇用之人，大体条件与银行无异。如雇用人员有亏空款项等情，则由买办赔偿。一般雇用人员到职时，例须觅取殷实保人，出具保结，保证一切，设有弊端发生，买办固对行号负责，而保人又须向买办负责。兹附列外轮公司买办雇用人员之保结格式如下：

立保单人大英公司×××，今保×××在某轮船公司内管理帐房及水脚银两等事，担保英金××镑，日后如×××私用银两在××元以内，自然照亏缺之数赔偿，决不推诿。此系当面言明，各无异说，恐后无凭，立此保单为据。

年 月 日

立保单人×××

#### 四、买办之收入

银行买办之薪俸，各家所规定均甚微薄，麦加利月薪二百五十两，汇丰、道胜均二百两，东方百五十两，正金、花旗不过百两。但买办经手收入之中国银票、期票、汇单等，每千两准提一两二钱五分，以为买办之手续费（即佣金），卖出千两，其手续费亦同。正俸之外，杂项收入颇多，有至四、五万两一年者。轮船公司之买办，太古、怡和月俸二百元，大阪一百五十元，日本邮船会社和瑞记洋行均为一百元。其他手续费等杂项收入亦不少，通常输出之货物，买办应得之费百分之五。进出口业务之洋行，买办收入除正俸外，则有输出入货物之手续费。例如日商福爱洋行规定：进口洋布、绒线，照买入原价，每千两付买办八两，绢棉织物，每千两付银十两，纯丝绸缎每千两亦付银十两，出口货

粗丝、细纱、丝绵等照卖出原价每千两付买办银五两，盈亏由行商担任，买办概不负责。而在此正俸及手续费等杂项公开收入以外，更有不正当额外收入，或取自卖主，或取自买主，所得实多。有谓行主得一佛郎，买办亦得一佛郎者，故买办之大者，一年所得大有可观。因此生活奢侈，一面奉承外人，一面追求享受，其生活程度之高，至足惊人。

### 五、买办之保证

洋商雇用买办，必先缔结契约，并交保证金，数额根据营业大小而定。即如上海外国银行买办之保证金，数额亦大有出入，道胜十五万两，麦加利、汇丰十万两，正金、东方四万两，华比、荷兰则三万两。保证金之外，仍需保证人四名，互相担保，如买办有不正当行为，银行受到损害，保证人共负赔偿责任。其他各外国行号雇用买办之条件，大体上均相类似，不过细节稍有出入。现在附列上海某银行雇用买办所立之合同与保单各一式，由此可以了解行东、买办与保人三方面之关系。

#### 甲、合 同

立合同人行东某某、买办某某今于西历××××年×月××日，在××银行订立合同，并将议定条件开列于左：

- 一、行东在上海开设某某银行，聘请某某为买办，彼亦愿就银行之聘，自立合同之日起，即按照以后所开各条办理。
- 二、买办非执有本行行东字据，不得用银行之名，向人交涉、出入银钱及私行抵借契券票据等事。
- 三、凡属银行机密事件，买办不得在外泄漏。

- 四、买办应遵照银行指示，所收金银元宝、银元、押款票据、契券等项，均需妥慎收管，倘有失误，惟买办是问。凡属买办代银行收付及寄向外埠之金银、押款票据契券等项，均系买办之责。所有买办自己雇用人等，代银行收入之银票、期票、庄票、汇单、票据，押款到期能否收兑，并中国政府官员之欠款及应办事件，可否照议，亦均系买办之责。以上各节，银行如未与买办商议，则概与买办无涉。
- 五、买办应于每日晚间，照银行规则，将总帐交出，以凭核算，或将所收金银、押款票据等项，悉数交付清楚。
- 六、行内雇用帮办×人，由买办自理，所需薪水均由买办名下支給，如有失误亏空等弊，买办照数赔补。日后银行自用人员，与买办无涉，惟雇用如由买办作保，则买办亦负失误亏空赔偿之责。
- 七、日后无论何处银行，有控告买办涉讼之事，即以本银行所立帐簿，及买办代银行管理所立之帐簿为凭，不必另寻帐簿。
- 八、买办于立合同之时，即需备足银××两，存储银行。若日后买办有应行赔偿之款，银行即可按照买办存款随时提出，若此数不足，再将下期之款如数填补。若买办无赔偿之事，则所存于银行之款，银行每年照五厘行息计算，半年给付一次，俟合同满期，各帐交清之后，银行将此款交还买办。
- 九、银行每月给予买办薪金银××两，并按银行指示所买之中国银票、庄票、期票、汇单等项，每千两给佣银一两二

钱五分，又照银行指示所卖之各色银票、期票、庄票、汇单等项，佣银亦照前例给付，此外不得索取。

十、立合同后，银行如欲停歇，此项合同可以随时作废，惟必须六个月以前函知买办。若因买办有欺骗、旷职情事，银行即可将合同销去，勿庸预期函告。如买办欲自行告退，亦必于六个月以前函知银行，方准解约。

十一、此项合同，用汉英两国文字各存一份，日后无论办理何项事件，均以英文为凭。

十二、凡为担保之保人，如遇失业、病歿或不在本地，不能作保者，买办另请妥人代保，且必得行东允许。至保人赔偿银数，均与原保保单所载各节，毫无区别。倘买办于两月限内，尚未觅人担保，银行即可将合同销去，亦不必预行函告。

十三、银行以买办保银及保人银数为准，若有不足之时，即令买办增加保银、保单，买办需照所派之款，如数增加。

以上合同双方画押盖印，双方合意，无得异说，此据。

西历××××年×月××日

行东 × ×

买办 × ×

### 乙、保 单

立保单人某某等，今保到某某银行聘用某某充当买办，如有致使银行受亏情事，应即照数赔偿。为此订立保单如下：

一、买办需请四人代为担保，并提出现银××两，存储银行。

二、担保该买办尽心竭力为银行办事，及买办雇用之人不得更改帐目。

三、担保该买办各事认真，小心谨慎，不得将银行机密事泄漏于外。

四、担保该买办代银行进出存款，寄往外埠之金银元宝、银钱、货物押款券票等类，务必奉公守法，不得有丝毫作弊情事。

五、担保该买办雇用之人，代收中国庄票、银票、期票、汇单、票据等，到期不能收款，或因该买办出口作保，失误欺骗，致使银行受亏，均必遵守信用，全数赔偿。若与买办无涉之事，保人不任其责。

六、担保该买办应交银行各款，不能照数付还，致令银行亏耗时，不论是何情况，均照上文所载将保银赔补，如尚有亏耗不敷之数，仍照上文所载，保人四名，一律摊赔。若银行通融，使买办展限认赔，一任银行之便，即不必函知保人，待其应允后行。所有四家保人情愿担保之数，开列于后：

某某以银 × × 万两为限	} 共银 × × 万两。
某某以银 × × 万两为限	
某某以银 × × 万两为限	
某某以银 × × 万两为限	

如保人情愿退保，均需在六个月之先，专函通知银行行东或署理人，仍俟六个月限满之后，其担保责任方无关系。倘于限内银行有损失情事，仍照以上所载，均系四保人之责。若四家保人

有一人或数人退保时，未退保者之责任仍在，不得藉口推诿责任。

此项保单，用汉、英两国文字缮写，日后如有争议之处，应以英文为准。

××××年×月××日

立保单人 × ×  
× ×  
× ×  
× ×

洋商买办是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帮手。上海买办人数，据日本同文会列表，有姓氏可稽的有朱葆三、虞和德、王一亭等一百七十余人。而大中型洋商行号，雇用买办者，银行有汇丰等十一家，保险业有瑞记等五十五家，轮船公司有太古等二十三家，其他大公司有茂生等七家，代理经销商有祥记等二十六家，代理店及公司有礼和等七十家，经销人有利泰等四十一家，杂项商行有汇泰等一百三十一家。各家除本身营业外，还有代理国外其他行商业者，如茂生洋行代理国外五十四户，每一行号，至少雇用买办一人，太古、怡和各轮船公司，一家且多至数十人，若统计上海买办全部人数，至可惊人。而各华商董事、经理，虽无隶属关系，未尝不事事仰其鼻息。因此建国以前，买办声势在上海市面非常烜赫。反动政府时代，数十年来，凡上海经济界有地位的人，很少不是出身于买办，即使偶有没做过买办，也必与买办有深厚的渊源。

# 英商新沙逊洋行

陈其鹿

## (一) 英商新沙逊洋行的来历

上海有两个沙逊洋行,一个叫新沙逊洋行,另一个叫老沙逊洋行。新沙逊洋行的创办人伊莱亚斯·大卫·沙逊(Elias David Sassoon)是沙逊洋行创办人大卫·沙逊(David Sassoon)的长子,他于一八七二年独资开办另一沙逊洋行,并在行名后缩写己名 E. D.为记,俗称新沙逊洋行。新沙逊洋行的总行原在印度孟买,上海分行原址在仁记路(现滇池路)五号。新沙逊洋行的营业范围比老沙逊洋行要大得多。

九十多年前,沙逊只身来上海,专以贩卖鸦片毒品为业,顿成巨富。他随即以贱价购置位于今南京东路外滩与滇池路口的地产,并雇工建造了一座五层楼的西式房屋,作为贩卖毒品的交易机构,命名为新沙逊洋行。一八八〇年伊莱亚斯死后,新沙逊洋行由其长子雅各比(Jacob)接管,仍以经营鸦片贸易为主。此后将鸦片利润逐步投向房地产并进行抵押放款,自建高楼大厦出租。新沙逊洋行第三代主持人是维克多·沙逊(Victor Sassoon),由于他的祖辈曾得到英国的爵士封号,所以中外人士都称他为沙逊爵士。他能讲华语,没有妻室。他一足是跛的,人称



“蹩脚沙逊”。他一九二三年第一次来上海，看到上海这个“冒险家的乐园”是当时中国商业、金融的中心，而且英国人在上海有很大势力，认为过去新沙逊洋行的经营作风过于保守，决心把他先人的肮脏事业进一步发展，所以自从他继承以后，不再把剥削来的资财大部送往海外，而留在上海作为进一步从事冒险活动的赌注。

## (二) 进出口贸易

一九二一年新沙逊洋行只有洋布间、地产间与保险间，但规模极小，仅雇一两个犹太籍职员办事。保险间是代理英商巴勒水火保险公司 (North British Fire and Marine Insurance Co. Ltd.) 业务。洋布间范围较大，定货客户众多，业务比较发达，上海天津路一带的宝泰洋布字号、久大洋布字号、同盛洋布字号、宏昌洋布字号，南京路的同茂盛洋布字号以及著名的三大祥(信大祥、宝大祥、协大祥)洋布商店等，都是新沙逊洋行的定货客户，尤以宝泰洋布字号的定货为最多。

新沙逊洋行经销最多的棉织品是冲泰西缎，畅销于全国各地，其他黄边泰西缎、丝罗缎、洋斑绫、条子府绸、丝光府绸、花洋布、珠罗纱等次之。以上各货都是由英国曼彻斯特、利物浦和格拉斯哥等地运来。那时，孟买运来的棉花、棉纱、漂细布、漂市布(俗称竹布)、市布(俗称龙头细布)等定货额与冲泰西缎不相上下。以上各种棉织品的定货期一年两季，每年营业总额约值上海规银一百五十万两。加尔各答的麻布、麻袋略有定货。呢绒毛货中毛直贡呢定货较多，其他如轧别丁、凡立丁、毛哔叽、大衣呢等

定货较差，每年营业总额统计约值上海规银五十万两。其定货客户都在河南路一带，例如华新、春和永、新昌、大纶以及承大等呢绒字号。又蜜蜂牌和双虎牌毛冷绒线定货亦旺，尤以前者为多，两种毛冷绒线每年营业总额约值上海规银六十万两。

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八年间，新沙逊把南京路和滇池路之间的旧址翻建大厦，在建筑期内迁至四川路九江路口的安利大楼办公。一九二八年，新屋落成后，新沙逊洋行的招牌改为英商新沙逊股份有限公司，总行改设英国伦敦，上海作为分公司，在香港注册。这时，上海安利洋行因业务范围过广，资金周转不灵，沙逊乘机垫入资本，把它并入新沙逊系统。安利洋行总行设在上海，分行遍设沈阳、天津、汉口等地，因此新沙逊对外营业仍利用安利洋行名义，不过招牌改为英商安利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新沙逊股份有限公司的附属公司。这时沙逊将原来的洋布间改为进口部，扩充了业务范围，兼营汽车零件、荷兰砂糖、人造丝、大小五金、宝塔牌麻纱手帕、纸张、玻璃、玻璃器皿、洋钉、三角铁、水泥、铜皮、钢条、铅丝等，同时兼做了一两年的出口生意，如芝麻、猪鬃、蛋白干、蛋黄干、桐油、肠衣等。

客户向新沙逊洋行定货，照例须经由华买办负责担保，公司给买办百分之二的回佣作为报酬。新沙逊洋行原来只有一个买办，就是南市半淞园的主人沈志贤，他是洋布间的买办，有房地产道契存在公司作为担保。一九二八年新沙逊扩充业务范围时，向沈志贤要求增加担保品，适值他金子投机失败，无力缴纳，不得不拉拢友人邢鼎丞与之合伙当买办，专司新沙逊的洋布、呢绒、绒线等业务。新沙逊后又经营人造丝进口业务，并雇用李廷

栋为买办。安利洋行名下有五金杂货买办吴登瀛，洋布呢绒买办地产商周渭石，人造丝、棉花、棉纱买办尤菊笙等。

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帝怒潮，上海人民举行罢工、罢市、罢课，抗议英帝国主义暴行，英国货受到抵制，客户定货停滞，新沙逊遭到极大亏损。同时，外汇跌价，存货无形贬值，又须负担日积月累的利息和栈租，客户无力出货，宣告破产的、结束业务的、逃避的时有所闻。那时日本布匹在市场上异军突起，日货价钱便宜，装船期迅速，日本资本家又在上海开设好几家纺织工厂，大有后来居上之势。洋布客户乃改变营业方针，群趋日本商行交易。在此情况下，新沙逊洋行亦改弦易辙，经营意大利司尼亚厂出品的人造丝，归其独家经理，现货与定货交易很旺，孔士、华嘉等洋行都向新沙逊进货。三四年间，新沙逊每年营业额总值约有上海规银两百五十万两。日本货虽竞争剧烈，充斥市场，但质量较差，所以新沙逊的人造丝业务还是蒸蒸日上。后来，司尼亚厂见到新沙逊经理的人造丝业务旺盛，于合同满期后，收回自营，因此，新沙逊洋行在一九三六年结束了进口部业务。

沙逊不但经营上海的进出口贸易，还投资于国外的制造业和金融业，在英国伦敦、曼彻斯特、利物浦、格拉斯哥开设大规模的纺织厂、银公司、呢绒厂、人造丝厂等；在美国纽约投资于纽约银行家信托公司；在印度孟买有孟买棉花厂、莱蒙纺织厂（Raymond Weaving & Textile Cotton Mills）、孟买信托银公司，在加尔各答有麻布、麻袋厂；在荷兰有荷兰制糖厂。这样，从商品的生产到贩卖联成一体，利权不致外溢。

### (三) 地产业务

沙逊是一个机警善变、精明狡猾的大市侩。他早料到进口业务不可久恃，狡兔三窟，不能不预备出路，因而在一九三一年成立了上海新沙逊银公司，总行设香港，在香港注册。这个银公司在上海汇丰银行和麦加利银行都订有无限额透支户，欠息月息四厘，而做出的押款，月息五厘半至八厘。银公司还做外汇业务。有了汇丰和麦加利作后盾，在这个大冒险家的主持下，其地产投机事业，达到了空前的规模。

一九二八年，沙逊新屋落成后命名沙逊大厦（今和平饭店）。自从这所大厦建成以后，沙逊顿时身价十倍，此后他就向高层建筑的业务发展。沙逊大厦底层出租作为商店，一楼、二楼出租作为办公室，三楼由新沙逊洋行自用，四楼以上辟为饭店及旅馆，命名华懋饭店，内设餐厅、舞厅。饭店里不仅富丽堂皇，而且搞了很多花样；房间里设有中国式、日本式、英国式、法国式、意大利式、西班牙式的设备，因此颇受富商巨贾、达官豪绅的欢迎。

上海人口不断增加，为沙逊通过地产业务进行掠夺制造了大好机会。在一九三〇年、一九三一年，他将原有沿苏州河畔的西式住房翻造为公寓式的河滨大楼；又将原有江西路福州路之间的里弄房屋拆除，翻建为朝南的都城饭店（即今新城饭店）和朝北的汉弥尔登大厦（即今福州大厦）。此后又在四川路桥堍沿苏州河、天潼路建造了瑞泰公寓；又在茂名路、淮海路、长乐路之间建造了三座大厦，一座名华懋公寓，近处居民称之为十三层楼，即现在的锦江饭店；一座名高纳大厦，即后来的茂名公寓，近

处居民称之为十八层楼，另外一座名高纳花园。此外，又在南京西路建造一所华贵的舞厅，取名仙乐舞厅（即今仙乐剧场）。

沙逊银公司利用客户押款到期无力偿还的机会，收进很多房地产。一九三六年以后，成立了地产部，专营房地产业务，在它的管理下组成的附属公司，有汉弥尔登信托股份有限公司（Hamilton Trust Co.Ltd.）、上海地产股份有限公司（Shanghai Properties Ltd.）、远东投资股份有限公司（Far Eastern Investment Co. Ltd.）、东方地产股份有限公司（Eastern Estates & Land Co. Ltd.）和华懋地产股份有限公司（Cathay Land Co. Ltd.）。以上各公司都在香港注册，投资人都是沙逊的亲属，除华懋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有很小部分是外来搭股外，其余各公司股权都属于沙逊，股票也不在市场交易。沙逊所有的房地产，除以上列举的大厦和舞厅等系属自建外，其很多房产及地产都是押款过期没收或贱价买进的产业。

沙逊在上海的财产主要是房地产，分布在全市各处，共有近百个单位名称，大小房屋共计一千九百多幢，占地六百多亩，所以有“房地产大王”的称号。除上述自建的大厦外，其他押进和买进的大产业有四川中路的安利大楼、四川路三三〇号、江西路和九江路口的老沙逊洋行的沙逊房子、南京路黄陂路口怡和洋行的怡和产业、衡山路建国西路口的衡山公寓等。此外还有很多花园洋房、华式里弄、市房及住房；东面杨树浦、汇山路有百余亩空地、厂房及里弄房屋；南面淮海东路有很多里弄房屋与店面；西面徐家汇路、衡山路、华山路、虹桥路、番禺路、复兴西路、茂名路、淮海西路、南京西路、新乐路、陕西路、长乐路、南阳路有里弄

住房和花园洋房,还有一个小菜场(俗称西摩路小菜场);北面深阳路、嘉兴路、长春路、七浦路、四川北路、乍浦路、天潼路、河南北路、江西北路、苏州河畔等地有公寓大厦、花园洋房、华式里弄、市房与住房。中区除以上列举的大厦外,在浙江路、南京路、山西路、山东路、天津路、宁波路等处也有华式里弄与市房。

#### (四) 其它营业

沙逊贪多务得,细大不捐,除房地产业务外,还设立华懋饭店、华懋洗衣公司、上海啤酒厂、中国公共汽车公司(一度经营双层公共汽车)、都城饭店、仙乐舞厅和国泰大戏院等。对这些企业他都自己握有实权,不轻易借手他人。

他常去外国,在上海的时间不多。某年他来上海,晚上同朋友到百乐门舞厅消遣,侍者见他跛了一足,貌不惊人,不知道他是赫赫有名的沙逊爵士,因而没有特别趋奉他。他大为不满,拂袖和朋友离去。翌日即招工建造仙乐舞厅以泄愤。好在他有现成的空地,咄嗟可办。舞厅初造成时只供他私人娱乐,不对外营业。他离上海后,没有多久就出租与大流氓谢葆生,最后出售给谢。

#### (五) 地产业务剥削的内幕

沙逊系统的投资公司和地产公司都是旧上海有名的地产商。沙逊利用这些公司的名义发行股票和公司债券以吸收大量资金,著名的十八层楼和十三层楼等就是由华懋地产公司发行债券建筑起来的。

沙逊经营房地产押款时所提出的条件非常苛刻,一般押价

极低,只合产值三分之一,而利率却很高,索取八厘甚至一分,还要按季累进。有许多到期无力偿还的押户,产业就被没收,如浙江路同春坊、湖北路迎春坊和黄陂路安义里等产业就是如此。

上海原有租地造房的办法,沙逊在出租土地时不但索取高额地租,还要由他设计建筑图样,并订定租地到期后全部房产归他所有。南京路上的劝工大楼、淮海路上的国泰大戏院、西藏路的东方饭店(今工人文化宫),以及部分新式里弄产业,就是被他用巧取豪夺的手段得来的。

沙逊经营房地产对外用新沙逊股份有限公司与华懋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名义,而内部帐册则又分成华懋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汉弥尔登信托公司、东方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地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等。除华懋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外,其它几个附属公司将每月租金收入总额的百分之二手续费付给新沙逊公司。新沙逊在建国初期的房租帐册记帐单位分美钞、英镑先令和折实单位三种。固定租金以美钞单位折合计算。帐务科的记帐单据分红、黄、蓝、白、绿各色,以示各公司的区别。每月应收租金总共约合新人民币一百六十余万元。

抗战前,新沙逊在新房客办理租赁手续时,先收两个月押租,退屋时发还,同时要收六个月预付租金,连本月份共收九个月的租金,还要商铺担保按期付租。租户进屋后,公司将所收的预付租金于月初转帐扣除。租户转让居住权时,公司索取一笔过户费,相当于十个月的租金数额。抗战胜利后,公司巧立名目,将此项过户费改称“善后补助金”,继续向要求过户的房客收取。此项“善后补助金”的收入,在建国前的一个时期不说,只在建国

后自一九四九年五月三十日起至一九五〇年五月三十一日止，在华懋地产公司名下总共有四十七件，计收入旧人民币五千三百五十四万多元；上海地产投资公司共有二十三件，计旧人民币四千一百六十八万多元；上海远东地产投资公司共有六件，计旧人民币一千四百七十多万元。为了逃避纳税，还有一些租金，由房客以外币付给香港总行。公司当局备有秘密帐册（俗称暗帐），记载不公开的帐目，这种逃避资金的手法，后来被人民政府禁止。

旧中国许多官僚、军阀在上海拥有的房地产，常常化名由洋行代理经租。沙逊公司代理这项业务时收取百分之五的手续费。这些官僚、军阀靠帝国主义洋商牌头，坐收租金，而沙逊从中渔利。抗战胜利之初，上海房屋紧张，有不少国民党军人穿着高级军官的服装，神气十足，来到新沙逊公司要求租赁房子，公司当局对于这些军人的要求均予满足。这些军人亦官亦商，把租得的房子出租、出顶，换取金条。还有不少地皮掮客，俗称黄牛，挂着“房地产经租公司”的招牌，实际上是房地产中间人，专门招揽房地产买卖或做租顶房屋的勾当，从中赚取数目可观的利润。他们经常西装革履，出入于外国地产商行。新沙逊也很欢迎这班黄牛，外籍职员可以从中得到贿赂，公司方面亦可多得过户费。

建国后，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再不容许帝国主义搜括人民血汗。新沙逊就故意拖欠国家房地产税和营业税，日积月累，为数颇巨，而对房屋的保养修理则置之脑后。党和政府为了保障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曾代为进行大规模的修理，公司拖欠了



巨额的修理费。因此在一九五八年十月三十一日新沙逊洋行的全部财产都由中国人民掌握管理。

#### **(六) 新沙逊洋行与安利洋行的关系**

新沙逊洋行同安利洋行的关系在上面已讲了一点。英商安诺特 (H. E. Arnhold) 曾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总董，他原是德国人，最早和另一个德国人卡勃 (Karberg) 组设瑞记洋行 (Arnhold & Karberg Co.)。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安诺特和卡勃拆股，改入英籍，独开安利洋行。该行因沈阳分行吃了倒帐，又因规模过大，资金周转不灵，沙逊乘机投资合伙，解救了安利洋行的困难。同时，安诺特在工部局也能处处帮沙逊的忙。这时正当国内军阀混战，迫切需要军火，沙逊就通过安利洋行，把欧战剩下来的大批破烂军火，以高价转卖给中国军阀，从而获取暴利。一九三四年，宋子文也曾为上海海关缉私营向安利洋行购买步枪等军火。

自从沙逊投资于安利洋行之后，由于资力雄厚，手段灵活，逐渐操纵了安利的全部业务，终于吃掉了安利和它的所属产业。一九三五年，安诺特退出安利，安利就正式成为新沙逊公司系统的机构。

#### **(七) 华洋籍职工的不平等待遇**

新沙逊洋行有华籍职工五百人左右，其中职员一百几十人，工友三百几十人。西籍职员自总副经理、部长以下共二十六人。华洋籍职工待遇，相差悬殊。西籍职员中，副总经理、部长的月

薪折合人民币在四五千元以上（照建国初期外币折合），其他西籍职员，待遇亦有区别。从外国调来的高级职员称 Foreign Staff，多数是英国籍，底薪按英镑计算，折合人民币约两三千元，供膳宿（由洋行自己的饭店和旅馆供给），出入一天四次，由汽车接送，月薪在上海支取一半，在外国支取一半。在上海雇佣的西籍职员称 Local Staff，有白俄、犹太、葡萄牙人等，也有一两个比较高薪的人，月薪约人民币一千元，一般只有人民币六七百元。他们居住在洋行所属的房屋内，可享受仅付原租金额十分之一的权利，房租全免；可享受乘坐洋行特备的大型汽车，每辆十四人，一天四次接送。

华籍职员除买办月薪约人民币一千元外，高级职员月薪人民币六百元者两人，四百元者三人，其他自人民币一百二十余元起至两百元不等。工友的月工资自人民币九十余元起至两百元不等，技术工头的月工资约两百元。华籍职工人数虽有五百左右，但每月薪资总额只有人民币一万元左右；西籍职员包括副总经理在外，人数只有二十六人，但月薪总额约合人民币三万元。华洋职工待遇的不平等，于此可见。

华籍职员中只有十几人住在洋行所属的房子里，其余四百八十余人都不租住在洋行所属的房屋。

西籍职员每日上下午由华懋饭店免费供应牛奶茶、饼干或其他糕点，中国职员除买办和高级职员能享受外，其他职员不得享受。华籍职员与西籍职员各有专用厕所，华籍职员厕所的门，终日敞开，可以随意出入；西籍职员厕所的门，终日紧锁，他们各备一把钥匙启用。建国后，洋老板们装腔作势，愁眉苦脸，每天

哭穷，连华籍职工们的低微薪工也想拖欠。职工据理力争，揭穿公司的假面具，监督公司收入，控制了公司的经济权。党和政府为保障职工生活，将公司收入尽先拨发中国职工和一般西籍职员薪水，使他们的生活得以维持。

### (八) 沙逊的生活

沙逊在上海期间，在跑马厅里养了很多马。在马霍路（今黄陂路）有一个马厩，英文名 Jardine Stable，特雇马伕数人专门养马，又在沙逊公司内特辟一办公室，雇佣一犹太人依席克尔（J. H. Ezekiel）专门管理马伕与马匹的帐务工作。每遇上海跑马厅赛马时期，沙逊就利用这些马匹夺取奖金。他有一头马名华伦飞（Wallenfield），曾在跑马厅大赛马期夺得锦标，因此更增加了他养马的兴趣。他溺爱赌博，不惜一掷数千金。在一年两次的赛马期中，新沙逊洋行放假三个半天，以便职工们参加赌博。后来，赛马被禁，沙逊的这些华贵的马匹都卖掉了。

沙逊来中国时年龄已在四十左右，虽终身不娶，但有一秀丽的女秘书形影不离，俨同夫妇。沙逊最后一次离沪时，把重要的房地产契据带到海外，上海只留一份摄影副本。传说他在建国前已将在沪的大产业在海外成交出卖，此说是否事实，无从证实。

# 解放战争时期

## 上海华资民营进口行的暴兴暴衰

华 洪 涛

从抗日战争胜利到上海解放这一段短暂的岁月中，上海华资民营进口行，一切只能依随着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意向和国民党政府贸易政令的松紧而兴衰消长，“荣枯由人”，自己掌握不住命运，并无自由发展壮大可能。加上这些行家在开设时就先天不足，根基脆弱，开设后的经营方式，又只是想在投机上发横财而不是在正常的国际贸易上谋发展，因而它们尽管能乘机钻出头来，但所形成的表面繁荣极为短促，仅仅一两年的时间就没落了。

在这里，我对它们的兴衰历程作若干调查，并探索它们所以兴衰的原因。

### 一、抗战胜利后，华资进口行暴兴

#### （一）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初，户数激增

抗战胜利后，在一九四五年的年底，原有的华资进出口业旧行家固在亟图复业，新组织的也已开始萌动。到一九四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上海市进出口商业同业公会组成时，已有华商共近六百户，其中参加该同业公会的达三百八十五户（尚有二百多户

未参加该公会)。

一九四六年起,华资进出口行大量增设,历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八年春季,达到了一千六百二十一户的最高峰。(其中民营户占百分之九十八左右。官僚资本商行以户数论所占不多,但它们倚仗特权,垄断操纵,能量很大。)

在一九四六、一九四七年所大量增设的华资进出口行,考其业务重点,绝大多数是进口专业;即使号称“进出口兼营”的行家,这时期也实际以进口为主。因为这时的特殊情况是进口稳获暴利而且经营较易,所以新开的华资进出口行固然都以经营进口为主,那些本来是出口专业的老行家,也因那时的进口业务易获暴利,见猎心喜,都兼做了进口。甚至原来只限于专代南洋行家办货出口的“南洋办庄”,也转变业务而兼做了进口,成了进出口兼营。其中尤以菲律宾办庄的采运美军剩余物资来华,更加活跃。

正因如此,华资进出口行在抗日战争前经营业务时,进口专业与出口专业本有明显的分工,而到抗日战争胜利后,则不象以前那样清楚划分了。这时,既因进口易于获利,原来的出口专业尚且改做进口,新开的商行当然更以进口为主。这些商行在向政府登记时虽自称“进出口兼营”,实际都应归于进口专业的一类。至于纯粹只做出口的专业户数,根据材料统计:一九四六年的户数,反较一九四一年的上海“孤岛”时期减少了九十四户;一九四六年冬季到一九四七年春季之间,进口商行正在大量激增的时期,出口专业行反而又再减少了四十户。这说明当时华资进出口行户数的激增,完全是增加了进口专业行。

## (二) 华资进口行所以暴兴的原因

### 1. 国民党政府施行低汇率政策, 进口货易于赢利

这时期华资进口行所以暴兴的客观原因, 最重要的是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通货膨胀, 币值不断下跌, 而又施行“钉住制”的低汇率政策, 以致造成了凡是经营进口货都能赚钱的局面。

“当时国内的物价高, 对外的汇率低, 法币的对内价值与对外价值有极大的差别, 进口商结得廉价的外汇输入货物, 依国内高昂的市价出售, 一转手间利市三倍。”<sup>①</sup>以当时进口硫化元染料为例: 据业内人回忆, 一九四六年春, 从美国购运一担硫化元到上海, 本钱四十美元, 而在上海卖掉后所得法币, 却可按官价挂牌汇率结购外汇五百美元。再以之向国外定货, 可买到十二担硫化元再进口, 这样一来回转手之间, 时间不过四五个月, 竟有十二倍的暴利可得。

这里再略举下列几种进口货作为具体事例, 说明当时进口业务在一九四六年春的一个时期里可获得的暴利(表1):

表1 进口货国外国内差价对比表

商 品	国外批发价	上海市价	比数约计
五灯无线电收音机	每只美金 20元	美金 250元	1比12
丝 袜	每双美金 0.75元	美金 3元	1比4
英 国 呢 绒	每码美金30~50先令	美金 10磅	1比5
配 尼 西 林	每支美金 0.86元	美金 15~20元	1比20

此表根据李宗瀛《进出口贸易巡礼》(1946年4月9日《大公报》)编制。

上海本来就是一个投机的都市, 国民党政权的通货膨胀政

策，更刺激了投机商业的发展。上海商人们吸取了抗日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重货轻币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市场上流传着“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汇”的结论。而这时的进出口业，尤其是进口专业，它们既是用低汇率向政府结购了进口外汇，待外货到埠又因法币币值狂跌，物价飞腾，稳得暴利，它们正是在时代动乱中既作囤货投机又作外汇投机，成为左右逢源、最易发横财的行业。

### 2. 上海人口激增，物资缺乏，游资充斥，投机泛滥

人口的大量突增，一方面是增多了上海都市的日用消耗，使战后本来缺乏物资的上海更感供应紧张，替进口商经营洋货进口扩大了市场；另一方面，又由于内地人口的向上海集中，随着也带来了大批游资。据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初的估计，在三个月中，各地流入上海约有法币六千亿元之多，加上上海原有的两千亿元，游资竟达八千亿元。<sup>②</sup>以当时美金价格计，约有四亿美元之巨。由于大量游资找不到归宿，在法币不断贬值的情况下，拥资者惶惶不可终日。这样，市场兴起投机囤积之风，并给新开设的华资民营进出口行在集资方面创造了有利条件。

### 3. 原来压在华行头上的外国洋行，战后户数大减

在过去，上海的外商洋行，一直倚仗着不平等条约的特权，凭藉其雄厚的资力，把持操纵市场，把华资进出口行压得不能抬头。抗战胜利后，原来在上海占户数特别多的日本洋行以及德意洋行老板，都被遣送回国；英法商人也因身经大战，疮痍未复，不遑东顾。因而，百年来独霸上海的洋行，在这时期，除美商外，户数大为减少，其垄断压迫的力量也相应有了减轻。根据资料统

计：一九四一年上海外资进出口行的总户数原共一千一百四十五户，一九四六年春季锐减为四百九十一户；一九四六年冬季略增数十户而为五百二十三户。<sup>③</sup>这样，无疑是给华资进出口行以有利之机。加之这时很大数量原来在外资洋行服务的买办和职工，脱离了洋行而出来自己开行。他们从洋行中带来了业务技术和国外关系。这种情况，打破了我国外贸商人原来由于找不到国外生产厂的直接关系而不易经营进口业务的难关。

#### 4. 国外厂商对某些华行特意扶植

抗战胜利后，美国垄断资本企图独占中国市场，竭力倾销剩余物资和奢侈品、消费品，对于愿意为它效劳的中国进口商人，特意大力扶植。这时，华资民营进口行对于进口商品的选择，由于一心只在利润上打算盘，便倾全力进口美国的剩余物资、消费品、奢侈品，其品种大自轿车、冰箱，小至香粉、唇膏、香烟、洋酒、水果、玻璃、皮包、玩具、卫生纸无所不有。而对有利于促进国内生产建设的机器、电机等重工业器材设备，则因成本高、手续繁、技术高、利润薄和周转时间长，经营进口的行家寥寥可数。

同时，对于进口商品的价格、规格、数量等，则完全由国外支配。对于他们希望能够订到独家经销合约的那些国外厂商，更是如此。在取得经销合约后，他们为了自己可以按合同多得到佣金和奖励金起见，总是扩大推销，不遗余力。

#### （三）华商经营进口的商品面和量，显有扩展

在抗日战争时上海形成“孤岛”期间，华资进出口行中对于进口业务，不但若干历史上素被洋商所垄断的大宗商品如汽油、煤油、柴油、棉花、煤及焦炭等几乎完全空白，即使数量上可以分



散定购的大路货,如五金、钢铁、化学产品、纸张等商品进口,华商经营的户数亦很寥落。<sup>④</sup>但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情况不同了。华资进口行一方面是户数急剧膨胀,另一方面经营进口的商品面和量也大有扩展。这情况,在一九四六年国民党政府采用所谓“鼓励输入”政策期间,特别显著。

这里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国民党政府输出入管理委员会档案中,上海华资进口行向该会申报而由该会核实的一九四六年份进口实绩,经详细统计,把经营某些“大路货”商品的户数如表2:

**表2 1946年上海华资商行经营进口的“大路货”商品户数表\***

货 名	户 数	货 名	户 数
煤 油	22户	次要化学品	58户
汽 油	1户	未列名化学品	45户
柴 油	17户	西 药	52户
煤 及 焦 炭	9户	安尼林染料及 其它煤膏染料	47户
油、脂、蜡	18户	硫 化 元	35户
黑色金属(熟铁条、块、 片、锭和各式型铁)	32户	旋 青	7户
合 金 钢 板	10户	白 报 纸	13户
铜类金属(包括紫铜)	20户	各种其它纸张	57户
锌 类 金 属	15户	香 烟 纸	16户
白 金 属	9户	生 橡 胶	18户
铅 类 金 属	3户	橡 皮 制 品	12户
镍 类 金 属	3户	棉 花	28户
管子及管子配件	9户	木 材	34户
重要化学品	82户		

\* 此表所列户数,系指经营该类商品的户数而言,而每一家进口行,通常都兼营几类商品进口。例如某一进口行既营西药进口,又营硫化元及化学品进口等等。因此不能以各类经营的户数去相加而求得进口行的总户数。

此表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输出入管委会各卷》综合统计。

按照表 2 所列，可见抗战胜利后华资进口行所经营进口的商品面，以户数之广来说，确已大非昔比。而且，更重要的是对各该进口商品的经营的比重，也空前增加。同样根据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存档，把上海口岸对于纸张及纸浆、拷皮膏、橡胶及其制品、面粉、米、五金类、化学品类、药品、染料、木材、煤及焦炭、人造丝、化学肥料的十三类商品在一九四六年进口的实绩，作综合编算，结果华商所经营进口的比重已上升为百分之五十点六，洋商则下降到百分之四十九点四。<sup>⑥</sup> 这比重是空前的，较战前相差很大。

#### （四）华资进口行在此期内，大都获得暴利

国民党政府放宽进口管制，施行低汇率政策，不少华资民营进口行乘着这个机会，从主要是替美帝推销剩余物资这项生意中获得了惊人暴利。

抗战胜利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七年上半年这一年多时期内，是上海华资民营进口行攫取暴利最好的时机。这时，进口商经营业务，凡是自营进口、自负盈亏的，其利润率已不是论成本的多少百分比，而是论几倍于成本甚至几十倍于成本了。根据访问材料：那时华资民营进口行中的大户维大行，在一九四六年主要经营美国香烟进口，一年间获利一百多万美元；另一大户南洋企业公司，一九四六年度抢购美国海军剩余物资来华，至少获利四十万至五十万美元；一家复业极早的中型户联益商行，以战时存美保险赔款两万美元抢先购运美帝剩余物资，于一九四五年底就运货到沪，接着往返周转一年，获利达五十万美元；一家一九四一年开创时仅四万美元资本的可大公司，

一九四六年经营美国奶粉、咖啡进口，全年获利二十万美元以上。<sup>⑥</sup>

以上几个例子，有两点是共同的：一是它们都在替美帝推销剩余物资、奢侈品、消费品；二是都赶在抗战胜利后的最早时期就抢先经营。在此也说明，华资国际贸易业虽有一定经营能力，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们的经营活动带有很大的消极因素。

## 二、一九四七年下半年起，华资进口行迅速走向下坡

从一九四七年下半年起，上海华资进口行就开始走下坡路。一九四八年初，出现了大批华资民营进口行入不敷出、纷纷停歇的局面。根据当时《同业公会会员录》和《行名录》材料，一九四七年年底，进口行（包括进口专业及进出口兼营）登记户数最多时达一千四百八十二户；一九四八至一九四九年间，户数大量减少，到上海解放后在一九五〇年初新政组的同业公会重作登记时，华资民营进口行已仅七百四十二户，减少几达一半。<sup>⑦</sup>而且即使幸存的行家，也很多是苦撑硬挺，奄奄一息了。

### （一）暴衰的内在因素

#### 1. 资金微薄，先天不足

抗战胜利后新开的华资民营进口行，由于资金微薄，因而经不起风浪。

那时的华资民营进口行，有很多是所谓“皮包公司”。这种公司，只备有极少的一些资金，有的甚至竟是赤手空拳，毫无

固定资金。它们并不雇用职工，有的租着一间、半间房子挂个招牌，也有连自身的办事房间都没有，仅仅借别人的“写字间”（营业所）附挂一块招牌，以收取电报和信件，全公司的全部资产，都在资本家随身携带的一只“皮包”之内。例如那时新开的以进口呢绒为主要业务的熙成商行，股东们除了最初垫付极少数开办费外，并无固定资金；又如在一九四六年二月开设的以进口洋纸为主要业务、到一九四八年底曾积余八万美元资产的胜利贸易公司，初开时公司借设在一家“久记纸号”内，全部资金除购置一架打字机、一本电码簿（CODE）和一些印刷品外，已无多少余款。全靠代客进口，积累佣金，才有了自己进货的本钱。<sup>⑧</sup>

## 2. 经营方式，投机冒险

新开的华资民营进口行，由于资金薄弱，就在经营方式上更趋于投机冒险。当时这些进口行经营业务的做法，大都是先争取取代客定购进口货的生意。在代客定货中，第一种手法是乱加高额佣金。象熙成商行代客定购呢绒进口，佣金率大概要加至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五十。这样的高佣金率，在那时已非罕见；第二种更重要的手法，是浮收客户定洋成数或预收高额佣金，把浮收预收的金额，移充自己向国外定货进口、自负盈亏的货款押汇保证金。由于那时进口货易获暴利，定货客户盲目委定，对代定的条件，佣金高也罢，定洋预付全数也罢，都不大计较，这使进口商易于取巧谋利。如此滚上几笔，如果机会好，进口商就可白手起家。这类的事例很多，简直大中小户进口行普遍都是如此，仅仅在程度上有些差异而已。

另外，这时进口行的经营作风也渐趋于恶劣。对定货客户的欺骗，不仅浮收定银，而且出现掉货、赖货。甚至有些进出口行，收足客户定银，代向国外定货，在货到时因市场价格风俏，即自行变卖，拒不交给原定户，使客户蒙受损失，自己坐获暴利。这作风逐渐蔓延到较多的行家。

资金微薄，经不起风浪打击，是那时华资民营进口行的共同特征之一，而经营方式中的欠债借款、欺骗作伪、进行赌博式的冒险投机，也是它们的共同特征之一。华资民营进口行内部存在这些缺陷，一受外来打击，就迅速倒下去了。

## （二）外来打击，促使急剧衰落

### 1. 输入配额每季缩减，业务愈来愈狭

进口商所赖以获得利润的是进口业务。进口总值上升，进口商业业务旺盛，利润增多，就出现繁荣；反之，进口总值下降，进口商业业务萎缩，利润减少，就必然趋于衰落。一九四七年起，国民党政府因外汇枯竭，不得不改变原来的所谓“鼓励输入”政策，加强进口管制，实行“输入限额”，核定各季限额，按比例分配给各进口行，不在配额内的，不发许可证，不准进口。嗣后上海的进口总值就大为下降。华资民营进口行所能经营到的业务，无论是代客进口而收取佣金的，或是自营进口而自负盈亏的，都被动地一年比一年缩减。

几年中上海进口总值有如表 3。

再就一九四七年二月起开始实行“输入限额分配”制度以后的限额数字来看，限额是一季比一季减少，进口商的业务当然也被迫而季季压小。这种情况可从表 4 看出。

**表 3 上海口岸历年进口总值消长表**

年 份	上海进口总值 (千美元)	与 1946 年 进口作比较 (1946年为100)	备 注
1946年	557,257	100.0	1946年尚未施行“输入限额分配”办法。
1947年	330,246	59.3	1947年2月起,国民党政府开始施行“输入限额分配”制度。
1948年	165,734	29.7	
1949年 1月至5月	63,716	27.4*	1949年全年进口值为78,320千美元,其中14,605千美元系上海解放后6月至12月所进口。

\* 这比数是以1949年1月至5月进口63,716千美元的五分之一,与1946年全年进口557,257千美元的十二分之一相比而得。  
此表根据历年海关“贸易统计报告”综合编算。

**表 4 各季公布“输入限额”比较表\***

季 别	公布日期	包 括 年 月	全国输入限额公布数 (千美元)	与第1季度 限额相比
第1季	1947. 2. 17	1947年2月~4月	99,700	100
第2季	1947. 5. 19	1947年5月~7月	72,610	73
第3季	1947. 8. 5	1947年8月~10月	67,873	68
第4季	1947. 11. 23	1947年11月~ 1948年1月	53,393	54
第5季	1948. 2. 20	1948年2月~4月	} 两季合73,475	每季平均37
第6季	1948. 2. 20	1948年5月~7月		每季平均37
第7季	1948. 9. 8	1948年8月~10月	} 两季合42,140	每季平均21
第8季	1948. 9. 8	1948年11月~ 1949年1月		每季平均21
共 计	—	—	409,192	—

\* 自1947年2月17日公布第1季度“输入限额分配”起到1948年9月8日公布第7、8季度止,共公布了六次,其中第5、6次和第7、8次都是合并公布的。到1949年3月1日,输管会发布了“第9、10两次限额不再公布”的消息。  
此表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输管会档案”综合编算。

从一九四七年五月第二季度配额起，输出入管理委员会又接受工业界请求，将进口商所得配额划出一部分由输管会直接配给工厂，进口商对此只能代理工厂进口，收取有限的佣金。削减了进口商可以自营进口、自负盈亏、多得利润的机会，实际上等于再度减少了给进口商的配额。

其后，输管会接到行政院命令，“凡美援中已有物资，将由第七季限额中抽出，暂缓进口。”而美援物资是由国民党政府特设“美援运用委员会”直接进口的，这样一抽出去，华资民营进口商无从分润，配额更少。

总之，国民党政府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以前，是执行“鼓励输入”政策，滥供低价外汇，尽量放宽进口，华资民营进口行业务大盛，表面上出现了短暂繁荣；而到一九四六年年底，国民党政府对进口突然强力管制，输入限额既逐季减少，商人自备外汇进口的物资也要作走私论罪，进口商的业务愈来愈狭。

## 2. 汇率改采“机动”，进口货成本增加

在一九四五、一九四六年间，“进口商在〔进口货〕成本上受了政府〔低汇率〕的津贴，输入进来的货物还得以较高的价格<sup>①</sup>在市场出售，所以他们的利益是双重的”；<sup>②</sup>后来改行输入限额分配制度，进口的数量大为压缩，但在施行的初期，输管会把各商品的输入限额按核定比例分配给各“合格进口商”，进口商得此配额后，既可以按额申请此项货品的进口许可证，又可以按照官价挂牌汇率向中央银行如数结购进口外汇。当时，一则进口货是由于严格管制进口而来源减少了，能有定货到沪更可保证赚钱；再则官价汇率还是采“钉住”办法，远比黑市为低，能结

购到官价外汇就肯定得了便宜。所以仍旧是双重利益而两面赚钱。因此,在实行输入限额分配的初期,尽管每家分到的配额为数不多,但小户已足抵开支,大户更月有余润。——这情况,当时进口商的从业人员称之为“吃限额”,真是不劳而获,坐享其利。

不过,好景不长,到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国民党政府废除钉住外汇率而采用“机动”的基准汇率市价了。这市价,基本上是随黑市汇率而上下。接着,在一九四八年五月三十一日,又改用“结汇证明书”办法,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再采用“外汇移转证”办法,这些办法都使进口商不能再得到等于“外汇津贴”的低价外汇。也就是说,到了一九四七年八月份以后,华资民营进口行所分配到输入限额,在结汇时付出的汇率,已与黑市相仿佛,所有以前经营进口时那种外汇按官价结购,货价照黑市卖出,商人可坐收汇率差额巨利的机会,从此已经失去。这对进口商来说,是断了他们主要的一重利润。因而论者认为:“一九四七年八月,可视作为中国进口贸易的转折点。”<sup>⑩</sup>

### 3. 民族工业日益衰颓,进口原料销呆价跌

一九四七年下半年起,上海市的购买力就已显著下降。一九四七年秋季,南京路国货、新新、大新、先施、永安五大公司的营业总额,较一九四六年同季减少为百分之二十七点五<sup>⑪</sup>。上海《商报》在一九四八年四月底发表了《工商业的坐食危机》社论,并举行“工商业坐食危机座谈会”,邀请工商业者座谈困难情况,他们的发言,使人痛感对外贸易商人前景一片凄凉。<sup>⑫</sup>

由于人民购买力日益减弱,工厂生产日益萎缩,进口商所进



口的工业品和工业原料，就从风俏热销一变而为销呆价跌。当时，华资民营进口行一厄于进口受严格限制，业务削减；再厄于汇率改为机动调整，进口货成本增加；三厄于商品销呆价跌，进口货无利可图。受此三者打击，进口商们尽管神通广大，也无计可施，只能坐吃山空，日趋没落。

#### 4. 普遍受到金圆券的致命打击

上海华资民营进口行，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所遭到的最普遍最致命的打击，是一九四八年八月间国民党政府以暴力推行金圆券以及随之而来的限价政策。

在实行金圆券之初，国民党政府特派的“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专员”一到上海，就立即倚仗暴力，对民族资本工商业和劳动人民加紧榨取。上海华资民营进口行当时普遍受到的严重损失：第一是资本家悚于雷厉风行的法令，不得不把自己所持有的一些金银外汇，全部捧出，兑换了金圆券。而金圆券币值旋即狂跌，几同废纸，资本家们过去历年所累积的一些资财，大部分因此化为乌有。第二是当时实行暴力限价，将所有物价全面冻结于八月十九日的价格水平上，不得上涨。进口商的仓库被封，查点存货，勒令按限价出卖，上海出现了波涛汹涌的抢购风潮。进口行的进口货，也同样因强制按限价出售，被抢购一空。到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国民党政府因金圆券政策彻底失败而宣布取消限价，上海的物价起了“总暴动”以后，上海零售物价的指数激升，“以八月十八日时为一百计算，则十一月应是两千五百四十三，十一月十七日为止应是两千六百六十五。”<sup>④</sup>相隔三个月，物价较前涨起二三十倍，那些在限价抢购中被抢购掉的货物，已无法

再按原价补进了。

在金圆券的风暴中，过去主要靠“既囤货又囤汇”的双重投机而最易发财的进口商，到这时适得其反，变成为两面受夹击而损失最惨重的行业之一。连实力较雄厚的大、中型民营进口行也都不容易站住脚跟；至于一般实力薄弱的中小户，受损后更普遍陷入困境，无法周转，终致纷纷倒闭了。

---

注：① 李宗文：《一年来的经济》，1947年5月22日《商报》。 ② 参阅资耀华：《国民党政府法币的崩溃》，《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1960年8月全国政协版。

③ 分别根据字林西报馆1942年1月、1946年7月、1947年1月出版的《一元行名录》统计。 ④ 据现有材料，查得在“孤岛”时期华商经营钢铁五金进口的，只有八户；经营化学产品（包括化工原料、西药、染料、颜料）进口的，只有九户；经营各种纸张进口的，只有四户。 ⑤ 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输出入管委会各卷》综合编算。本文在这里所列举的十三类进口商品（其它商品不在内），统计出的数字为：1. 1946年上海这十三类商品的进口实绩共为122,210,000美元（100%）；2. 其中上海洋商经手进口的为60,365,000美元（占49.4%）；3. 其中上海华商经手进口的为61,845,000美元（占50.6%）。 ⑥ 根据当时经营各该行的原经协理张二铭、忻礼斌、曹家球、王承祥访问记录（1962年）。 ⑦ 根据上海市国际贸易业同业公会存档：《1950年会员登记名册》核算。 ⑧ 根据各该行的原资本主陶际云、钱本义访问记录，1962年5月。 ⑨ 行策：《略论进口结汇新办法》，《经济周报》6卷21期，1948年5月20日。 ⑩ 吴元黎：《战后之中国对外贸易》，1948年11月29日《大公报》。 ⑪ 参阅《从五大公司的营业看国民购买力的低落》，《经济周报》6卷9期，1948年2月26日。 ⑫ 参阅1948年4月26日《商报》载出席4月24日该座谈会的各业代表人士说：这时橡胶工业30%已停工；40%在减工；皂烛33%停工；染织工业30%减工；棉布商业门市生意，最近减去40%至50%；百货公司外强中干，营业收入仅够开支；国货工业品外销公司等，都吃了大亏；全市商业营业数字，本月较上月要减少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 ⑬ 《银行周报》33卷1期10页，1949年1月1日。